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

第四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

第四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
第四卷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9.125 插页3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424,000 册数：10,000
统一书号：3011·184 定价：3.00元

编 者 的 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是实现人类社会解放的伟大的革命洪流。它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迄今已有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在我们国家只是近二十五年来事。为了使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编辑出版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和史料，是这门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的夙愿。

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们按照它的体系，编辑了这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供本学科的教师、学员和有关科学工作者使用。

本书由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是：林甦（第一、二、三题），胡瑛（第四、五题），曹德成（第六、七、十一题），王鹤杰（第八、九、十题），张心绪（第十二、十三、十四题），韩忠英（第十五、十六、十七题）。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本书成稿都是十分可贵的，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本书编者水平的限制、材料占有的不够和时间的仓猝，疏误之处，敬希指正。

下面就本书的编辑事项作几点说明：

（一）本《选编》的时限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二) 本书根据通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根据《资料选编》的特点，分为十七个大题。每个大题中又分为若干中题和小题。这些大中小题构成本书的体系结构。

(三) 本书收编的文献史料计二千四百余件。为节约篇幅，其中凡属已有的中文材料，只列篇目，注明出处，不印全文。本书收印的文献史料，除极个别的以外，均属从俄文、德文、英文、塞尔维亚文和法文新译出的文件，计九百五十件近二百万字。

(四) 本书正文中，凡类目标题下所属文件，均为已有中文材料者，一律只保留类目空题，以求编辑体系的完整。而这些文件只在目录中，列出篇名，注明出处。

(五) 列目和选印的文件采取混合编目。每个部分材料的排列，一般以时间为序。

(六) 文件标题后面标明的时间，系指文件产生或发表的时间，除个别难以确定者外，均为公历。根据个别需要，在公历之后注以旧历，即儒略历。

(七) 选文的标题，根据编辑规范的需要，有些由我们作了适当的改动。

(八) 有关注释，一律随文作为底注。其中除“原作者注”、“原编者注”和“译者注”以外，余为“本书编者注”。

(九)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的概貌，特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要目》于下。

一九八二年七月

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史料选编》要目

第 一 卷

- 第一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 第二题 共产主义者同盟
- 第三题 欧洲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 第四题 第一国际

第 二 卷

- 第五题 巴黎公社
- 第六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 三 卷

- 第七题 第二国际
- 第八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第九题 俄国1905年革命
- 第十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 四 卷

- 第十一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第十二题 十月革命后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潮
- 第十三题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第 五 卷

- 第十四题 共产国际
- 第十五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十六题 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
- 第十七题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目 录

第十一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五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4—20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号召推翻专制 政府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传单

（1917年3月12日〈旧历2月27日〉）…………… 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宣言

（1917年3月12日〈旧历2月27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
版，第662—663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执

行局宣言（1917年3月13日〈旧历2月28日〉）…………… 4

临时政府的宣言（1917年4月1日〈旧历3

月19日〉）…………… 5

附录：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声明

（1917年3月28日〈旧历3月15日〉）…………… 7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二月革命后的形势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20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12页)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4月20日〈旧历4月7日〉)

(同上，第13—18页)

附录：

我们的分歧 (1917年4月21日) 加米涅夫 …… 9

论列宁的提纲 (1917年4月25日) 加米涅夫 …… 10

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

注意 (1917年5月5—8日)

(见普列汉诺夫著：《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7—26页)

列宁：论策略书 (1917年4月21—26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3—35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一、二、三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17页)

列宁：论两个政权 (1917年4月22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22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决议

(1917年5月1日)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6—127页)

列宁：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演说

(1917年6月1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95—106页)

附录: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7年3月27日) 加米涅夫14

苏维埃关于对外政策的决议

(1917年5月17日)16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
的报告(1917年5月7日<旧历4月24日>)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99—214页)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
的报告的结论(1917年5月7日<旧历4月24日>)

(同上,第215—217页)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
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
副报告(1917年5月7日<旧历4月24日>上午) 加
米涅夫17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
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

的副报告的总结发言(1917年5月7日<旧历
4月24日>) 加米涅夫28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对临时政
府的态度决议(1917年5月10日<旧历4月

27日>)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4—245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战争的决
议(1917年5月12日<旧历4月29日>)

(同上,第240—24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
的决议(1917年5月)

(同上,第249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
的决议(1917年5月)

(同上,第277—280页)

莫斯科的柯兹洛夫厂、库兹涅佐夫厂、军事
部门工厂和氧气厂工人全体会议决议

(1917年5月19日) 31

里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1917年5月24日) 32

喀山省农民代表苏维埃决议(1917年5月26日) 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议

(1917年6月18日) 3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军事局决议

(1917年6月19日) 39

五十四个工厂的代表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
联席会议上的声明(1917年7月17日) 42

号召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劳动人民在

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的呼吁
书 (1917年6月30日 <旧历6月17日>)44
列宁：六月十八日 (1917年7月3日 <旧历6月
20日>)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95—97页)

斯大林：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
和士兵书 (1917年6月30日 <旧历6月17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90—94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彼得堡委员会传单
(1917年7月19日晚间)4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扩大会
议决议 (1917年7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4—47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关于彼
得格勒七月事件致地方党组织
的通报 (1917年7月28日)50
附录：陆海军部长命令 (节录)
(1917年7月29日)51

列宁：论口号 (1917年7月)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07—114
页)

列宁：革命的教训 (1917年8月上半月)
(同上,第115—129页)

斯大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1917年7月28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99—101页)

(二) 准备起义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
结报告** (1917年8月9日 <旧历7月27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47—
157页)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

(1917年8月12日 <旧历7月30日>)

(同上,第159—16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四、
五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7—
227页)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
会组织工作报告(节录)**(1917年8月9日 <旧历

7月27日>)52

布哈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17年

8月12日 <旧历7月30日>)5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
于目前形势和战争的决议** (1917年8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0—
48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
于政治形势的决议** (1917年8月)

(同上,第482—48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

	(同上, 第494—49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1817年8月25日)	(同上, 第501—507页)	
列宁: 政治形势 (1917年7月23日)	(见《列宁全集》第25卷, 第166—168页)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 书 (1917年9月9日)	57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代表会议决议 (1917年9月10日)	59
彼得格勒五金厂职工大会决议 (1917年9月10日)	60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大会决议 (1917年9月11日)	61
列宁: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12日)	(见《列宁全集》第25卷, 第277—28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 作斗争致地方党组织的通报 (1917年9月13日)	62
前线部队的情况 (陆军关于1917年10月2— 13日的军事情报) (节录)	63
后方部队的情况 (彼得格勒电报通 讯社的官方报告) (节录)	66
农村骚乱 (彼得格勒电报通讯)		

社的官方报告)〔节录〕	68
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关于政 权的决议 (1917年9月13日)	71
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费姆县比谢尔特 厂工人群众大会关于同反革命进行 斗争和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决议 (1917年9月14日)	72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 (1917年9月18日)	73
托木斯克警备部队士兵代表苏维埃要 求立即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电报 (1917年9月21日)	75
彼尔姆省下乌发列伊厂工人群众 大会决议 (1917年9月22日)	76
列宁: 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 给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 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25—27日)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3页)	
列宁: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8月26—2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77— 283页)	
列宁: 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 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 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代表 (1917年10月14日)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2— 123页)	

莫斯科纺织工人和工厂委员会代表共同举行的代表会议关于要求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 (1917年10月22日)	77
爱沙尼亚边疆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1917年10月25—27日)	78
北部地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通知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1917年10月26日)	79
弗拉基米尔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局势的决议 (1917年10月29日)	80

(三) 夺取政权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六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7—23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决议

(1917年10月23日<旧历10月1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1—512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

(1917年10月29日<旧历10月16日>)

(同上,第514页)

附录:论发动〔节录〕(1917年10月24日<旧历10月

11日>)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81

加米涅夫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917年10月29日 <旧历10月16日>)

(见《列宁文集》第5册,第366页)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
的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

(1917年10月31日
<旧历10月18日>)

(同上,第366页)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

(1917年10月31日 <旧历10月18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46—
349页)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由来.....84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1917年11月5日 <旧历10月23日>)85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 (1917年11月6日

<旧历10月24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
351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

员会决议 (1917年11月6日 <旧历

10月24日>)86

维堡区的赤卫军司令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和工人士

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

(1917年11月6日 <旧历10月24日>)87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11月6日 <旧历10月24日>)87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11月6日 <旧历10月24日>)89

给彼得格勒驻军的命令 (1917年11月6日〈旧 历10月24日〉)	90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1917年11月6日〈旧 历10月24日〉)	90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武装 起义和推翻临时政府经过的通告 (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	91
列宁：告俄国公民书 (1917年11月7日〈旧历 10月25日〉)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6页)	
列宁：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1917年11月8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 353页)	
列宁：和平法令 (1917年11月8日) (同上,第354—356页)	
列宁：土地法令 (1917年11月8日) (同上,第363—365页)	
列宁：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 (1917年11月8日)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41— 242页)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 代表大会关于行使政权的声明 (1917年11月8日)	9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国际 社会党委员会呼吁支持新苏维 埃政府的联合声明 (1917年11月8日)	94

(四) 巩固苏维埃政权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七章第七、
八节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7—
247页）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士官生的

暴动的发言〔节录〕（1917年11月11日）……96

附录：

车列米索夫撤销克伦斯基命令的电话

〔节录〕（1917年11月7日）……97

克伦斯基关于继续向彼得格勒进

军的命令〔节录〕（1917年11月8日）……99

克伦斯基给北方战线司令的电报

（1917年11月9日）……99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节录〕

（1917年11月11日）……100

卢契尔斯基就克伦斯基失踪致杜

鹤宁〔节录〕（1917年11月14日）……100

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全俄铁路工会的

最后通牒的记录〔节录〕（1917年11月11日）……101

附录：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

停止内战和成立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

最后通牒……102

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取得协

议的条件（1917年11月14日）……103

附录：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中断谈判的

决议〔节录〕（1917年11月15日）……104

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达成协议的 条件的决议〔节录〕(1917年11月15日)	10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 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15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6— 518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 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 (1917年11月16日)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1— 26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宣言(1917年11月18—19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69— 373页)
布尔什维克给反对派的最后通牒 (1917年11月18日)	107
附录: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宣言〔节录〕 (1917年11月9日)	108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成立革命 统一战线的呼吁书〔节录〕 (1917年11月11日)	109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纲领〔节录〕 (1917年11月12日)	110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中央执行 委员会上宣读的辞职声明	

〔节录〕（1917年11月17日）	111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 诺根、米柳亭退出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1917年11月17日）	111
反对派辞去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的 声明（1917年11月18日）	113
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节录〕 （1917年11月20日）	114
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节录〕 （1917年12月8日）	115
附录：彼得格勒国家雇员工会 联合会关于雇员举行罢工 的决定（1917年11月10日）	115
关于逮捕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 克伦斯基的命令（1917年11月8日）	116
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 法令（1917年11月9日）	117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关于逮捕立宪民主党 领袖的命令（1917年12月11日）	11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给各级党 委员会的通告信（不晚于1917年12月28日）	119
契卡关于逮捕切尔诺夫和其他人 的命令（1918年1月13日）	124
契卡关于逮捕、枪毙反革命分子的 命令〔节录〕（1918年2月22日）	125

全俄肃反委员会命令(节录)(1918年3月27日)	125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书 (1918年8月30日)	126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917年11月15日)	127
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关 于废除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 (1917年11月23日)	129
苏维埃政府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节录) (1917年11月27日)	130
列宁：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 金额(1917年12月1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2页)	
关于法院的法令(1917年12月5日)	131
关于设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 法令(1917年12月14日)	133
建立肃清反革命分子全俄非常委 员会的法令(节录)(1917年12月20日)	135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 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发 言(1917年12月2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82 —384页)	
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1917年12月27日)	136
列宁：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 (1918年1月15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7页)	
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 (1918年1月19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 第407—408页)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1月25日)	137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 法令(1918年1月28日)	139
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宗教和 宗教团体的法令(1918年2月2日)	141
全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决议 (1918年1月23日)	143
关于没收私人银行股本的法令(节录) (1918年1月26日)	145
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决议(1918年2月16日)	146
托洛茨基1918年3月27日在俄共(布)莫斯 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47
关于大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节录) (1918年6月28日)	149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定(1918年12月8日)	150
列宁: 关于专家的工资决议草案 (1919年5月23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 第136—137页)

(五) 摆脱帝国主义战争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停止战争实 现和平的建议”(1917年11月8日)	152
人民委员会给最高总司令杜鹤宁的 命令(1917年11月20日)	154
苏维埃政府给美国大使的照会	

(1917年11月21日)	156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声明 (1917年11月22日)	157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建议举行停战谈判告 交战国人民书 (1917年11月28日)	
(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 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359—360页)	
苏维埃政府致彼得堡各国外交代表 的通告 (1917年12月5日)	158
托洛茨基致各同盟国政府使馆的照 会 (1917年12月20日)	159
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 克发表的声明 (1918年1月4日)	160
附录：康特·采尔宁以四同盟国代表 团的名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 斯克发表的声明 (1918年1月7日)	161
托洛茨基向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 发出的邀请 (1918年1月11日)	164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 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 明 (1918年2月10日)	167
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 (1918年2月21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36— 437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	

维克) 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割地

的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1918年2月24日)

(见《列宁全集》第27卷, 第44—47
页)

附录: “左派共产主义者” 反对党中央

媾和条件的决议 (1918年2月24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 第438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为一方和德国、奥地利—匈

牙利、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为另

一方之间的和约 (1918年3月3日)

(见《国际条约集 (1917—1923) 》,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第4—
8页)

列宁: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1918年3月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 第452—
474页)

列宁: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

(1918年3月)

(见《列宁全集》第27卷, 第106—
107页)

附录: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18年3月7日)169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

(1918年3月15日)171

“左派共产主义者” 关于目前形势

的提纲 (1919年4月4日)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42页)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1918年11月13日) ……173

(六)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918年1月24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18—435页)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919年4月15日)

(同上，第808—815页)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 (1921年10月14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573页)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1918年11月6日和19日)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18—126页)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1924年12月17日)

(同上，第276—308页)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1927年11月6—7日)

(同上，第617—624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节录]

(1949年6月30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7—1408页)

- 1917年11月12日《工人通报》的论文〔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733页)
- 保加利亚士兵“紧严派”党员X·喀拉契夫的回忆录〔节录〕
 (同上，第732—733页)
-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保加利亚的影响
 格奥尔基耶夫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1—367页)
- 罗马尼亚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宣言〔节录〕
 (1917年底)175
-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党小组宣言
 (1918年11月7日)176
- 维也纳工人革命委员会关于号召总罢工并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传单 (1918年1月18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748—749页)
-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奥地利的影响
 费恩伯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1—566页)
- 不列颠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的决议 (1918年1月30日)177

- 英国社会党1918年10月24日《号角》报关于
俄国事件的论文〔节录〕……………177
- 十月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 波立特
(见《国际问题译丛》1957年第10期)
- 英国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
通过的决议(1920年)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746—747页)
- 卡·李卜克内西为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
给第六次非常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贺电〔节录〕(1918年11月10日)
(同上,第743页)
-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工人运动
威·皮克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3—461页)
- 1918年11月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的
《告城乡劳动人民书》〔节录〕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版,第739页)
- 1919年4月5日巴黎劳动人团结苏俄大会
(同上,第743—744页)
- 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 法戎
(见《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现代史部分之二,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

研室1959年编印，第202—206页)

十月革命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多列士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26—844
页)

美国社会党左翼的纲领 (1919年通过)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
献》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
1958年版，第750页)

十月革命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福斯特

(见《国际问题译丛》1957年第10
期)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决议〔节录〕(1920年9月)17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捷克

斯洛伐克 瓦·考彼茨基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1—544
页)

《10月28日和11月7日》〔节录〕

(1941年11月) 尤·伏契克179

伟大的十月革命对阿尔巴尼亚的影响

霍查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330
页)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7—1918年匈

牙利革命力量的增长 德治·涅梅什

(同上，第368—420页)

十月革命对丹麦工人运动的影响

盖·隆德

(同上, 第642—662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荷兰工人运动

巴凯尔、巴鲁赫

(同上, 第743—764页)

十月革命对芬兰独立及工人阶级解放斗争
发展的意义 维利·培西

(同上, 第800—825页)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瑞典工人

阶级 (1914—1921) 康·法纳

(同上, 第845—884页)

十月革命和瑞典革命运动 卡尔逊

(同上, 第885—902页)

1917年12月3日(旧历11月20日)人民委员
会主席列宁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
林告俄国及东方全体劳动穆斯林人书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 第3分册, 高教出版社1958
年版, 第751—754页)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1918年7月1日) 李大钊

(见《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第101—104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

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1919年7月25日)

(见《五四运动文选》, 三联书店
1959年版, 第359—362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
中国政府的宣言 (1920年9月27日)

(同上, 第366—369页)

中国各群众团体和舆论界对于苏联对华宣
言的反映

(同上, 第373—399页)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日)

李大钊

(见《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第401—402页)

伟大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和蒙古人民 泽登
巴尔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人
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62—499页)

印度代表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1918年11月)181

(七) 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

一个士兵对红军国际营的回忆(节录)181

我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录)185

在一个国际支队中(节录)192

记执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项任务(节录)196

我当过列宁的警卫员199

在十月的日子里(节录)201

我是红军在中亚细亚的特别信使(节录)203

三,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八章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249—
273页)

英法关于在南俄行动对象的协定

(1917年12月23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现代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5—16页)

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关于干涉俄国的决议

〔节录〕(1918年7月2日)

(同上，第16—18页)

苏维埃政府公告(1918年4月5日) 206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照会(1918年4月24日) 208

苏俄人民委员会告法、英、美、意、日劳

动群众书〔节录〕(1918年8月1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
年版，第704—706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给

大不列颠、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

的照会(1919年2月4日) 210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捍卫十月革命》呼

吁书(1918年8月2日) 213

西班牙农业工人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干

涉俄国的决议

(见《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页)

英国工党索恩波特代表会议关于制止干涉

俄国内政的决议〔节录〕(1919年6月27日) 215

兰加州纺织工人罢工(1919年6月)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 第3分册, 高教出版社1958年
版, 第708页)

工人H·贝林在曼彻斯特工人群众大会上的 演说〔节录〕(1919年7月初) (同上, 第706—707页)	
纪念十月革命二周年伦敦工人群众大会上通 过的决议(1919年11月10日) (同上, 第707页)	
各工业部门的工人、各社会党和英格兰、 苏格兰、威尔士各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决 议〔节录〕(1920年3月中旬)	216
马赛·加香在下议院会议反对干涉俄国内政 的发言〔节录〕(1919年3月24日)	217
法国劳动总同盟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1919年5月26日)	219
法国社会党公告(1919年6月24日)	219
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三国际委 员会和加香派提出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 决议〔节录〕(1920年12月29日)	221
意大利北方社会党人会议决议 (1918年12月29日)	223
意大利劳工总联盟与社会党及铁路员工联合 会领导共同召开的联席会议的决议 (1919年7月6日)	224
意大利五金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不给苏 维埃俄国的敌人制造武器的决议〔节录〕 (1920年5月21日)	226
罗马尼亚工会总委员会和社会党执行委	

员会宣言〔节录〕（1920年8月24日）	227
美国农民要求美国停止对苏俄的干涉	
（1919年3月1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年	
版，第709页）	
苏联远东游击队所属朝鲜支队司令给白党将	
军雅斯特列波夫的回信〔节录〕（1919年）	227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向哥萨克首领宣战的布告	
〔节录〕（1917年12月9日）	228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节录〕（1917年12月17日）	231
附录：阿列克谢也夫呼吁协约国援助给驻	
基辅法国使团首席代表的信〔节录〕	
（1918年1月27日）	232
红军中捷克中队的决议（1918年5月24日）	234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清除右派政党出	
苏维埃的法令〔节录〕（1918年6月14日）	235
苏维埃政府公告（1918年7月6日）	236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告各级党组织书	
（1919年3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1—	
582页）	
保卫彼得格勒宣言（1919年5月28日）	237
俄共（布）中央通告（1919年5月28日）	238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1919年7月3日以前）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0页）	

列宁：为战胜高尔察克告工农书

(1919年8月24日)

(同上，第62—69页)

附录：1918—1919年间美国提供军火给高
尔察克军队的往来电报

(见莫洛克等编：《世界近代史文献》
卷2，第3分册，高教出版社1958
年版，第700—701页)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议 (1919年9月24日) 241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议 (节录)

(1919年10月17日) 242

人民委员会声明 (1920年1月28日) 24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

(1920年2月2日) 244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给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的
致敬电 (1920年3—4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
36页)

第十二题 十月革命后欧亚 革命运动的高潮

一、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 1923年汉堡起义

列宁：给斯巴达克派成员(1918年10月18日)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7页)

列宁：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

(1919年4月27日)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90—291
页)

德国十一月革命四十周年提纲 (1958年)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见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关于十一月革命的

回忆 威廉·皮克

(见《史学译丛》1958年第1期)

论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 恩斯特·台尔曼 ……251

论十一月革命的性质 (瓦·乌布利希在关于十一月革命宣传提纲准备委员会上的讲话)

(见《史学译丛》1958年第4期)

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节录〕 威廉·昆恩 ……253

柏林罢工工人的要求〔节录〕 (1918年1月29日) ……323

德国左派全国代表会议呼吁书 (1918年10月) ……324

基尔士兵委员会的号召书 (1918年11月4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117页)

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社会主义

共和国而斗争的号召书 (1918年11月8日)

(同上，第117—118页)

斯巴达克派关于在柏林夺取政权的号召书

(1918年11月8日)

(同上，第118—119页)

社会民主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就组织政府问

题进行的谈判 (1918年11月9—10日)

	(同上, 第120—122页)	
“斯巴达克团”关于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呼		
吁书 (1918年11月10日)	328
德国共产党关于保卫革命成果和武装无产阶		
级的号召书 (节录) (1919年1月8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	
	辑》现代部分第2分册, 商务印书	
	馆1982年版, 第141—144页)	
慕尼黑工兵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巩固巴伐		
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号召书 (1919年4月15日)		
	(同上, 第145—149页)	
德国共产党慕尼黑党组织关于捍卫巴伐利亚		
苏维埃共和国的号召书 (1919年4月底)		
	(同上, 第149—152页)	
附录: 魏玛宪法 (节录) (1919年8月11日)	330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节录)		
(1921年1月8日)	333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工厂委员会全		
国委员会为在全德国举行反古诺政府的总		
罢工而发出的号召书 (1923年8月12日)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	
	辑》现代部分第2分册, 商务印书	
	馆1982年版, 第158—160页)	
柏林各工厂委员会关于推翻古诺政府的呼		
吁书 (节录) (1923年8月)	3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1923年10月德国事		
件的声明 (节录) (1924年1月19日)		
	(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	
	文件》第2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年版，第96—111页)

汉堡起义的教训〔节录〕 恩·台尔曼 ……………337

二、匈牙利1919年革命

列宁：向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播送贺词

(1919年3月22日)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6页)

列宁：给贝拉·库恩的电报记录 (1919年3月23日)

(同上，第197页)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1919年5月27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56—
860页)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十周年 贝拉·库恩

(见《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33页)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贝拉·库恩

(同上，第34—40页)

为什么无产阶级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 贝拉·
库恩

(同上，第41—59页)

明尼赫总理在匈牙利国民议会为纪念匈牙利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举行的会议上
的报告〔节录〕

(见《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7号，
第147页)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意义 匈党中央
书记马罗山

(同上，第152—154页)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关于在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

通告 (1919年3月23日)	340
告全国人民书 (1919年3月23日)	
(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第25—26页)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工矿交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 (节录) (1919年3月26日)	342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地产国有化的法令 (1919年4月3日)	343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建立红军的法令 (节录) (1919年)	344
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	
(全匈苏维埃代表大会1919年6月23日通过)	
(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第27—29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全世界无产者书 (1919年)	345

三, 欧美和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

列宁: 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 (1918年2月)	
(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386—387页)	
列宁: 给美国工人的信 (1918年8月20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86—599页)	
列宁: 给欧美工人的信 (1919年1月21日)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107—114页)	
列宁: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0日)	

-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44页)
- 列宁: 给英国工人的信** (1920年5月30日)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9—123页)
- 列宁: 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 (1920年8月15日)
(同上,第234—236页)
- 列宁: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1921年10月19日)
(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138—139页)
- 斯大林: 关于芬兰的独立** (1917年12月22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1—23页)
- 苏俄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共和国独立的决议** (1917年12月31日)347
- 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宣言** (1918年1月29日)348
- 1919年4月“法兰西”号和“让·巴尔”号水兵起义纪实**
(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 《波涛》周刊关于“法兰西”号和“让·巴尔”号水兵起义的报导**
(同上,第2—4页)
- 福斯特论1919年美国钢铁大罢工** (节录)
(同上,第260—266页)
- 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919年6月16日)351
-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执行委员会关于总罢工的号召书**

(1920年12月10日)	353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各国无产者书	
〔节录〕 (1920年)	355
1918年挪威革命运动的高涨	357
1920年9月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	360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 决议 (1922年12月)	
	(见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 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 第494—498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扩大全会关于意大利问题的 决议 (1923年6月)	
	(同上，第537—540页)
保加利亚共产党致保加利亚工人和农民的公 开信 (1923年10月)	362
 列宁、斯大林和蒙古代表团的谈话	
(1920年夏天以前)	369
列宁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节录〕	
(1921年11月5日)	370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向蒙古人民和 蒙古自治政府发表的宣言〔节录〕(1919年8月)	
	(见兹拉特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国 发展史》，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 第127页)
蒙古临时政府文告 (1921年3月)	
	(见乔巴山著：《蒙古人民革命简 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第50—52页)

-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924年6月13日)371
- 蒙古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924年11月26日)372
- 毛泽东: 五四运动 (1939年5月)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524页)
- 毛泽东: 青年运动的方向 (1939年5月4日)
(同上,第525—533页)
- 五四运动的经过 (1919年7月)
(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 邓中夏
(见《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 朝鲜三一运动宣言书 (1919年3月1日)374
- 朝鲜三章公约 (1919年3月1日)376
- 迎接“三一革命”告朝鲜人民书 (节录)
(1946年3月1日) 金日成376

第十三题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一,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经济和政治

(一)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

- 列宁: 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 (1917年9月10—14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30—170页)
- 列宁: 怎样组织竞赛? (1918年1月7—10日)
(同上,第392—401页)
-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第十一章 (1918年3月28日)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1—195页)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1918年3—4月)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93—529页)

列宁: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5月26日)

(同上,第568—575页)

列宁: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1919年3月23日)

(同上,第792—807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1919年3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2—575页)

列宁: 关于在中央纺织工业管理局实行一长管理制以代替集体管理制 (1919年9月4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51页)

列宁: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1919年10月30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84—94页)

列宁: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1月27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8—282页)

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常会决议

(1920年2月3日) 383

列宁: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 (1920年3月15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 第392—398页)
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条例	
(1920年3月24日)	384
列宁: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1920年3月31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 第432—438页)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2—17页)
列宁: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0年4月7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 第460—473页)
列宁: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演说 (1920年11月26日)	(见《列宁全集》第31卷, 第391—394页)
列宁: 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 (1920年12月6日)	(同上, 第399—418页)
列宁: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1920年12月22—29日)	(同上, 第420—483页)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0年12月29日)	385

国家计划条例〔节录〕 (1921年2月22日)·····	386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1921年3月8—16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 257页)
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21年3月27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86— 499页)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 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 (1921年4月11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89— 301页)
人民委员会《就小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合作 社给政权机关的原则性指示》的法令 (1921年5月17日)·····	388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1921年5月26—28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1— 428页)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后的作用 (1921年11月5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74— 581页)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1年12月23—28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6— 152页)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农业合作 社》的决议 (1921年12月28日)·····	390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8—290页）

列宁：论合作制（1923年1月6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1—688页）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7日）

（同上，第689—692页）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提纲

（1925年4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51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4—308页）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节录〕……………392

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产粮省分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

（1919年1月11日）……………410

《铁路员工》杂志关于铁路运输情况的报道

（1919年5月1日）……………411

农业人民委员部报表（1920年）……………413

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节录〕（1920年）……………414

国防委员会红军供应特派全权代表报表

（1920年7月16日）……………416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0年12月28日)	416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给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 表大会的报告〔节录〕 (1920年12月)	418
军事工业委员会报表 (1920年)	420
沃洛格达省格里雅泽维茨县潘非洛弗乡农民 致弗·伊·列宁的一封信 (1921年3月8日)	423
(三) 新经济政策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 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1921年3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 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105— 107页)	
列宁: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 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 的报告 (1921年4月9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 第273— 287页)	
列宁: 论粮食税 (1921年4月21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 第503— 540页)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1—1922年粮食实物税 数额》的法令〔节录〕 (1921年3月28日)	425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经济 政策》的决议 (1921年5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 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120— 122页)	

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节录〕 (1921年4月7日)	426
人民委员会《关于交换》的法令 (1921年5月24日)	428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手 工业和小工业》的法令(1921年7月7日)	430
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 律条件》的法令(1920年11月23日)	432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 企业出租条例》的法令(1921年7月5日)	433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新经济 政策的决议〔节录〕(1921年12月28日)	435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 员会的报告》的决议(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 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0— 152页)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 (1922年11月20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3— 401页)	
(四) 苏维埃文化教育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1918年6月5日)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418— 419页)	
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招生规则》的 法令(1918年8月2日)	441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	

- 演说 (1918年8月28日)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67—70页)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
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条例)》
的法令〔节录〕(1918年10月16日)442
-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的演说(1918年10月18日)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
389页)
- 《无产阶级文化》杂志关于各地俱乐部的
报道〔节录〕(1919年2月).....444
- 列宁: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贺词(1919年5月6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16—
819页)
-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22页)
- 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
(1919年12月26日)446
- 列宁: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
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2月25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2—
346页)
-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14—
360页)
-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
(同上,第361—362页)

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同上，第363—372页）

列宁：论综合技术教育（1920年年底）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560页）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统计局关于各省图书馆、俱乐部数量的报表

（1920年）448

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2—122页）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1921年10月17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0页）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

的法令（1921年12月6日）450

列宁：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76—680页）

第四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会关于

文化革命初步总结的决议（1927年10月20日）451

（五）苏维埃政权建设

列宁：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

（1917年12月1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2页）

列宁：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

（1918年1月15日）

(同上,第17页)

列宁: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

草案 (1918年12月12日)

(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9—332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 (1919年3月18—23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9—571页)

列宁:关于专家的工资 (1919年5月23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36—137页)

党团向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草案 (1919年12月2—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4—608页)

列宁:对托洛茨基《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提纲草案的意见 (1920年3月3日)

(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219—220页)

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第7、8题 (1921年5月21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8—380页)

列宁: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 (1921年8月16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13页)

列宁：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小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指示草案（1922年2月27日）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4—545页）

列宁：给财政人民委员部（1922年2月22日和28日）

（同上，第552—553页）

列宁：关于给小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草案

（1922年2月21日）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8页）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

后一部分（1922年3月6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4—197页）

列宁：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922年4月11日）

（同上，第298—305页）

列宁：给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1922年8月21日）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02页）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后一部分（1922年3月27日）

（同上，第268—273页）

列宁：《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演说》后一部分（1922年10月31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4—356页）

列宁：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2年11月22日）

- (同上, 第402页)
- 列宁: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1923年1月23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 第693—697页)
- 列宁: 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 (1923年1月)
(见《列宁文稿》第4卷, 第449—456页)
- 列宁: 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 (1923年3月2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 第698—712页)
-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
(1923年4月17—25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292—297页)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的法令 (1922年1月9日)457
-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2年12月27日)458
- 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2年12月30日)459
- 米·伊·加里宁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2年12月30日)460
-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公开信》的法令 (1923年7月13日)461
- 米·伊·加里宁在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25年1月5日)464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决议〔节录〕（1925年5月20日）	467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决议（1925年5月20日）	468

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十章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9—330页）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1925年12月18—31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5—328页）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1925年12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9页）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

（1926年4月13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09—134页）

我们要用自己的资金实现苏联的工业化〔节录〕

（1926年5月8日） 费·埃·捷尔任斯基……474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1927年2月19日）……47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1927年12月2—19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6—

396页)

沙赫特事件和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

(1928年4月11日)

(同上, 第133—141页)

斯大林: 在粮食战线上 (1928年5月28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第71—83页)

斯大林: 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

右倾 (1928年11月19日)

(同上, 第212—249页)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决议 (1929年4月23—29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2—9页)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关于反对官

僚主义的总结和最近的任务》 (1929年4月23—29日)

(同上, 第25—42页)

联共(布)中央关于工厂的社会主义竞赛的

决议 (1929年5月9日)481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国民

经济干部》的决议 (1929年11月10—17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75—87页)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联共

(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

(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

(同上, 第122—136页)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33年1月7—12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45—208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1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333页）

（二）苏联农业集体化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十一章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1—363页）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部分（1927年12月2—19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8—278页）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1927年12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6—365页）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1927年12月）

（同上，第396—416页）

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1929年11月3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06—121页）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

(1929年11月17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99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集体化的速度
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1930年1月5日)

(同上，第112—115页)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1930年3月2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7—
174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反对歪曲党在
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1930年3月1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
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
120页)

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年4月3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7—
200页)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
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

(同上，第207—321页)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关于集体农
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的决议(1930年6月26日
—7月13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
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0—
183页)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9—

40页)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

(1931年6月23日)

(同上，第49—72页)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演说(1933年2月19日)

(同上，第212—229页)

苏联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1935年2月17日)

(见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单行本)

三，联共（布）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

(1918年3月8日)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75—487页)

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同上，第772—791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

的决议(1919年3月18—23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4—569页)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共

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年3月18—23日)

(同上，第526—551页)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1919年10月11日)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6—78页)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

(1919年10月21日)

(同上, 第79—83页)

列宁: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

(1919年12月2—4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 第114—167页)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

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年12月2—4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589—600页)

列宁: 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

的信(1920年3月2日)

(见《列宁全集》第30卷, 第369—373页)

列宁: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

(同上, 第403—448页)

列宁: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演说

(1920年9月24日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见《列宁文稿》第3卷, 第258—263页)

列宁: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

(1920年9月24日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同上, 第264—265页)

列宁: 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1920年11月

21日)

(见《列宁全集》第31卷, 第369—387页)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

(1920年12月30日)

(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02—425页)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

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

(同上,第426—467页)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

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8—16日)

(同上,第478—481页)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

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

稿(1921年3月8—16日)

(同上,第482—485页)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

8—16日)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257
页)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8—290
页)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1923年)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5—620
页)

斯大林：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1921年8月

28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81—90
页)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结论

(1923年4月17—25日)

(同上, 第159—192页)

斯大林: 关于党的任务(1923年12月2日)

(同上, 第289—302页)

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

(1924年1月16—18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5—41页)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1924年1月16—18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355—362页) *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1924年1月16—18日)

(同上, 第362—372页)

斯大林: 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62—165页)

斯大林: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1924年5月23—31日)

(同上, 第167—205页)

斯大林: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1924年11月19日)

(同上, 第281—309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1925年1月17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5—535
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88
页)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

(1926年10月26日)

(同上，第191—205页)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1926年11月1日)

(同上，第206—264页)

**联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
（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

(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
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6—
249页)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1926年12月7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56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
席全会《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
党纪的问题》的决议**(1927年8月9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3—311
页)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第三部分(1927年12月2—19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79—302页)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8年5月16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6—66页)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
(1928年10月19日)

(同上,第192—205页)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
(1929年1月底2月初)

(同上,第274—279页)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年4月)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96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1929年4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0—498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1929年11月)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0—111页)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51—334页)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苏

联共(布)党章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3—409
页)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

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3—5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12—151页)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三部

分《联共(布)的进一步巩固》

(1939年3月10日)

(同上，第240—261页)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全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的决议

(1939年3月10—21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5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59页)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全苏

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9年3月

10—21日)

(同上，第59—77页)

附录：

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

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

决议草案(1921年2月1日)

(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
资料》1982年第3辑，第135—153页)

四十六人政纲——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 会政治局(1923年10月15日)
 (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2期,第23—26页)
- 新方针(1923年12月) 托洛茨基……………484
- 十月的教训(1924年9月15日) 托洛茨基
 (见《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35—289页)
- 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1925年4月17日)
 布哈林
 (见《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379页)
-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年)
 布哈林
 (同上,第390—476页)
- 索科里尼柯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5年12月)……………511
-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六人声明(1926年10月16日)……………521
- 八十四人声明(1927年5月)……………524
-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12月)……………539
-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年9月30日)
 布哈林
 (见《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99页)
- 不断革命(1929年) 托洛茨基
 (见《“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80—226页)

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十二章

（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4—387页）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5月4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31—37页）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

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7日）

（同上，第45—60页）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1936年11月

25日）

（同上，第81—111页）

苏联宪法〔根本法〕（1936年）

（见人民出版社1954年单行本）

苏联生产力发展水平统计表（1936年）

（见苏联国家计委编：《苏维埃政权二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版，第16—81页）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

民大会上的演说（1937年12月11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59—165页）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关于制定发

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9—298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工业

和运输业中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问题》

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

(同上, 第438—452页)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的决议(1939年3月20日)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5分册,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6—13页)

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1939年3月10日)

(见《斯大林文选》上册, 第220—239页)

莫洛托夫同志给《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

一封信(1955年9月16日)544

第十一题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号召推翻专制 政府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传单

(1917年3月12日<旧历2月27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被奴役的人民解放的时刻到来了，向沙皇政府报仇并惩办它的时刻到来了。

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

赤手空拳、袒胸露背的无产阶级起来了——而且他在革命部队中找到了兄弟般的伙伴。只有雇佣警察的手不软，向手无寸铁向往自由的人民扣动扳机。军队和你们在一起，同志们，这就是**第二次俄国革命胜利的保证**。革命军队和人民的联盟从关押的牢房里，从《十字架》监狱里营救优秀的自由战士使自己得到了锻炼。

后退是不行的，后退意味着**出卖起义了的士兵**并使他们遭到枪杀。我们应该完成已经开始的事业。彼得格勒工人，继续并扩大全面罢工和游行吧，同士兵和哥萨克人结成友好，准备武装斗争。为了胜利我们要求有组织性，要有运动的领导核心。

尽快地开始在工厂里选举罢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代表将

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将负担起组织运动的任务，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打倒战争！打倒沙皇专制政府！

临时革命政府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译自《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第二次革命（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26—227页。刘宇端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 莫斯科执行局宣言

(1917年3月13日〈旧历2月28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

彼得堡在革命！士兵们加入到工人的行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沃伦斯基团、帕夫洛夫团和谢苗诺夫团站到了人民方面。克科斯戈尔姆团在短时间的犹豫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起义正在顺利地发展，起义部队占领了军火库，炮兵管理局，从维堡监狱（《十字架》）里放走了政治犯。在两个小时的包围后，起义部队拿下了彼得帕夫洛夫要塞。根据最后消息，侦探局爆炸，起义部队已接近警察总局。

俄国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彼得堡起义！否则，那里人民的鲜血将要白流。

同志们，放下工作！士兵们，请记住，现在要决定人民的命

运！大家都走上街头，大家都站到革命的红旗下！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团结成一股革命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临时政府以召开立宪会议！

革命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打倒战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莫斯科
执行局**

（译自《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第二次革命（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27页。刘宇端译）

临时政府的宣言^①

（1917年4月1日〈旧历3月19日〉）

俄罗斯的公民们：

一个伟大的事件发生了。在俄罗斯人民的强大攻势下，旧秩序被推翻了，一个崭新、自由的俄罗斯诞生了。伟大的革命结束了长年的斗争。在觉醒的民众力量的压力下，根据1905年10月17日法令，俄罗斯应有立宪自由权；然而，这些诺言尚未得到兑现。第一届国家杜马——国民希望的代言人，被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同遭厄运。政府无力摧垮人民的意志，便决定根据1907年6月3日法令，剥夺人民已经得到的参加立法工作的部分权利。

^① 这是临时政府发布的第一个宣言。原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47），1917年3月20日。

在九年的漫长岁月里，人民赢得的一切权利被逐步剥夺。国家又一次陷入专横武断、专制主义的深渊。一切使政府恢复理智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敌人把国家拖入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斗争中，政府道德沦丧，脱离人民，漠视我们祖国的命运，腐化堕落，声名狼藉。不论军队怎样竭力对付国内出现的动乱，也不论民众代表在民族危亡之际怎样团结一致地，呼吁，都无法使前任沙皇及其政府走上与人民联合的道路。由于统治者采取了非法的毁灭性行动，俄罗斯面临最严重的灾难，此时，国民必须使政权回到自己手中。

人民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基于他们的革命激情和国家杜马的决定，临时政府诞生了。临时政府认为，其神圣、应尽的职责在于实现国民的希望，并把国家引向建立自由公民组织的光明之路。

政府相信，在人民反对旧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同样会鼓舞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战士。至于政府本身，它将竭尽全力给我们的军队提供各种必要装备，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政府要恪守我国同其他大国结成同盟的义务，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协约国签订的协定。在采取措施保卫国家打击国外敌人的同时，政府认为其首要任务就是使民众有可能对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发表意见。政府要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会议要在普遍、直接、平等、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要保证为保卫祖国而血溅战场的勇士参加选举。

立宪会议将颁布根本法，保证国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由于缺少公民权，我国国民备受损害，而无法在国家剧烈动荡之时自由发挥其创造力。临时政府意识到国家所肩负的这一重担，认为有必要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立即使国家拥有保护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以使公民为国家的利益在创

造性的工作中自由发挥其精神力量。政府还要制定法律条文，保证全体公民在广泛投票的基础上，享有选举地方政府的平等权利。

在国家解放之际，全国人民都以崇敬的心情，缅怀那些为实现其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奋斗、不幸成为邪恶旧政府牺牲品的仁人志士。临时政府认为：欢迎那些曾为国家利益而蒙受苦难的流亡者光荣归来，这是一件乐事。

在完成这些任务时，临时政府奋发图强，因为它相信它将执行人民的意志，相信全体国民将真心诚意地支持它，以使俄罗斯得到幸福。这一信念激励着临时政府。只有全体国民与临时政府同心协力，才能保证成功地建立新秩序。

1917年3月19日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311—313页。高燕译，高放校）

附录 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声明^①

（1917年3月28日〈旧历3月15日〉）

三年来，国外敌人千方百计奴役朕之国家，在同他们进行的伟大斗争上，上帝乐于使俄罗斯经受一次新的艰难考验。国内新

^① 1917年2月27日（即公历3月12日）俄国彼得格勒人民举行了起义，推翻了沙皇，取得了革命（通称二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的杜马代表卡拉乌洛夫在杜马宣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让位于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卡拉乌洛夫本人。尔后，米·亚·卡拉乌洛夫又为人民革命的洪流冲走了。

起的民众骚乱使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顽强斗争。俄罗斯的命运，朕之英雄军队的荣誉，朕之子民的福祉，朕心爱之国土的未来前景，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斗争，直至最后胜利。我们凶恶的敌人正在垂死挣扎，但是，朕之勇敢的军队同朕之光荣的盟国并肩作战，粉碎他们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

在决定俄罗斯命运的时刻，朕认为，尽其所能帮助朕之子民团结一致、集中全力、加快胜利步伐，乃是朕之职责。为此，朕同意国家杜马的意见，认为退出国家王位，交出国家最高权力乃是上策。

由于与朕之爱子难舍难分，朕把继承权交给朕之兄弟——大公米哈依尔·亚力山大罗维奇，并祝愿他登上俄罗斯帝国的王位。

朕责成朕之兄弟同于民代表按照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原则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治理国家。他应该以朕之亲爱国家的名义宣誓，履约照此行事。

朕号召祖国所有的忠实儿女，履行其对国家的神圣职责，在国家危亡时刻服从沙皇，协助他和子民代表使俄罗斯摆脱困境，将其引上胜利、康富、光荣之路。

愿上帝扶助俄罗斯！

尼古拉

1917年3月15日下午3时 于皮斯科夫城

帝国法院院长、参将

弗里德里希伯爵副署签名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297—298页。高燕译，高放校）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 二月革命后的形势

附录 我们的分歧

(1917年4月21日)

加米涅夫

在昨天的《真理报》上，列宁同志发表了她的《提纲》^①。这个提纲代表着列宁同志的个人意见，通过它的发表，列宁同志也就完成了负责的社会活动家的应有职责：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提交俄国革命民主派进行讨论。列宁同志虽然以极简要的形式完成了这件事，但是做得很彻底：由说明世界大战开始，他作出关于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的结论。因此，在自己的报告中，他十分自然地，不仅要批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的政策，而且要批评《真理报》的政策，而后者在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就已形成，并且在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反映。《真理报》的这一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的决议案中，得到精辟的表述。而这决议案是由中央委员会常务局起草，并经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所通过。

^① 指列宁的《四月提纲》（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3—18页）。

直到中央委员会作出任何新的决定和党的全俄代表会议作出任何新的决议之前，这些决议案始终是我们的纲领，而我们也要捍卫它既不受“革命护国主义”的腐蚀影响，又不受列宁同志的批评。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方案，那是不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因为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打算立即把这一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这种估计而引伸出来的策略，是同《真理报》的代表们在全俄代表大会上所捍卫的——既反对苏维埃中的官方领袖，又反对把苏维埃拉向右转的孟什维克——那个策略大不一致的。

在广泛的争论中，我们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政党，而不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员的一个小团体，就只有采取这种观点。

(译自191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27号。徐平译)

附录 论列宁的提纲^①

(1917年4月25日)

加米涅夫

列宁同志为自己的提纲作辩护时这样写道：“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人类，不能使千百万人免于毁灭。”这种说法对吗？对于社会主义者说来，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绝对的真理。不幸的是：这一绝对真理毫不适用于作为今天

^① 指列宁的《四月提纲》（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3—18页）。

某种实际政策的论据。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战争和饥饿中拯救人类——这始终是正确的：在沙皇制度下是正确的，在推翻了沙皇制度后也还是正确的。并且，这是属于这一类的真理之一，即任何谢德曼，不管是德国的、英国的或俄国的，都会即刻签署认可的。为了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仅这一个真理还是不够；还必须估计历史环境，权衡各种力量、阶级在目前这个国度中——它同其他国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对比关系。这一点无论在列宁的提纲里或是他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的提纲是纲领……在英国、德国、法国发生革命后初步活动的堂皇纲领，而不适于完成了的俄国民主革命。列宁的提纲所以表现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个提纲对当前俄国政治生活中任何问题都没有做出答案。

党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应当怎样呢？护国分子说：应当在前线上捍卫革命。《真理报》说：应当即刻在俄国开展争取全面和平的最广泛的全民运动，以促进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发动。列宁同志的提纲是怎样说的呢？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列宁关于战争的唯一具体的劝告就是“必须特别慎重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向广大人民阶层解释资本同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对于力图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和身穿军装的最贫苦农民的党的实际政策问题却绝然不做任何解释。

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对于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同志回答说：（1）“应当推翻它”，（2）“但也不能马上推翻它”，（3）“决不能用通常的方法来推翻它”。不错。为了“推翻”临时政府，应当争得国内的多数到自己方面来。但大多数群众，又同样是列宁自己的意见，仍然“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是偶然的情况吗？不是的。这种情况会在今天或明天改变吗？不会的！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有着一个较长久的由群众来清除自己“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的时期。（在括号中说明一下：在其他国家，这个“时期”已延

续了数十年，直到今天还没有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结束这一时期）正是为了“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在这一个时期才需要一个向政府提出要求的纲领，既然我们不愿驱使拥护我们的人从事在今天注定要失败的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尝试，那末，还要不要同它保持一定的联系呢？这样，我们重新又回到党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上来了。而列宁同志却用临时政府“必须推翻，但也不能马上推翻”的诺言把这个问题轻易地撇开了①。

究竟为什么在列宁同志那里“找不出”对群众最迫切问题的任何解答呢？因为他有一个总的万灵答案。这个答案就叫做：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在俄国已经真正完成了民主革命，并且走上——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压力下——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向政府提出有关和谈的任何要求才是绝对荒谬的，谈论立宪会议、考虑议会制共和国也都是荒谬的。因此，列宁同志在不想改变逻辑的情况下，即或也想到了所有这些问题，但仅限于前置词“不”方面：不向政府提出要求，而是揭露它；不是要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苏维埃，等等。

究竟怎样做呢？列宁同志写出并加以强调说：“应当采取坚决步骤去推翻资本，应当巧妙地、逐步地去做，然而，这些步骤必须采取。”说得既清楚又肯定。但是，走向社会主义、走向推翻资本的步骤只有工人才能实现。而他们却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度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农村中甚至连农奴制还没有消灭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决不适于走向

①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做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列宁同志是正确的，即“现在还不能推翻临时政府”（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那么，他就应该公开承认立即推翻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瓦解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加米涅夫原注）

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

星期日的报刊上公布了一个具有头等历史重要性的文件。这是炮兵部所属工厂的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这次会议代表了最大官办工厂的工人近十万人。这次会议要（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的正是使我们同列宁同志发生分歧的那个关于“推翻资本的决定性步骤”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生活本身，是这样的事实向10万工人提出的，正如报告中所说：

——在伟大的俄国革命正炽时，某些工厂中，如像弹药工厂和谢斯特拉列兹兵工厂，管理人员从那里狼狈逃窜，几天都没有露面，从而实际上工厂和生产的全部管理事宜都落入了工人自己手中。

工人们怎样决定了呢？

——直到全部社会经济——国家的和私人的——尚未彻底社会化之前，工人在生产上不担负技术责任和经营管理责任，并且拒绝“参加组织生产的工作”。

彼得格勒的先进工人何以作出这种决定呢？他们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

——还在旧专制制度下造成的整个经济生活的破坏，运输业的紊乱，以及由之而来的生产材料上的欠缺，唤起工人推卸在生产上的技术责任和组织管理的责任。可是，有关劳资关系的全部问题，对付厂方而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对厂方的活动施行监督等方面，工人代表会议全部自己担当起来。

这样就十分明显：工人们利用了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来创立“宪政工厂”，监督厂方对待工人的全部活动，但却有意地避开分段“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

只有最坏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把“宪政工厂”，即内部工作制度的全盘民主化，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或是当作趋向社会主义的行动。在推卸组织生产的责任时，工人们十分了解，社

会主义不是通过部分地夺取工厂，不是通过分散的公社，而是通过夺取国家经济生活的集中机构，即通过将银行、铁路、全国范围内的粮食管理事宜，转到做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而取得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完全同意炮兵部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议——而反对列宁同志。

国内的情况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苏维埃必不可免地要担当起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责任。无论在交通事业或粮食事业方面，它都应当最坚决地干预其事，假如它不希望在经济破坏的混乱中使革命遭到灭亡。但是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这项工作同“推翻资本的决定性步骤”混淆起来，无论是从科学观点抑或策略观点来说都是不许可的。

我们的文章已经拖得很长。所以对列宁同志的《提纲》不做详尽分析了。

姑且指出一点。列宁同志大力宣传要划清界限。我们也主张划清界限，但是我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中划清的唯一界限，应为历史所证实，在实践上又是必需的，这是以国际主义为标准划定的界限。我们主张所有愿意同革命护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国际主义者团结起来。

(译自1917年4月25日《真理报》第30号。徐平译)

附录 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1917年3月27日)

加米涅夫

革命所造成的临时政府远比产生它的那个势力温顺得多。身

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革命。但在形式上政权却没有转入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手中，而是落到有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所涌现出来的人们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军队，只有当革命完全充分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当旧制度的一切残余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彻底根除的时候，才能认为业已开始的革命算是完成了。充分满足——工人、农民和军队的——要求，只有在全部政权转入他们自己的手中时，才有可能。既然革命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它也就会走到这一步，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与此相反，临时政府按照借以产生它的各阶层的社会性质来说，趋向于在革命的初期就扼阻革命的发展。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还无力来这样做。在革命人民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违反着意愿，执拗地向前走去。而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无须提到这一点，既然这个临时政府同旧制度的残余进行着真正的斗争，那么，它也就能取得革命无产阶级的坚决支持。不论何时何处，只要临时政府听从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革命民主派的呼声，而同反动势力或反革命力量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准备给予支持。

但这是对事而不是对人的支持；不是对临时政府现有成员的支持，而是对临时政府不得不采取、而且也正因为它采取了的那些客观革命步骤的支持。

所以我们的支持丝毫也不应当束缚我们的手足。

我们在支持临时政府彻底消灭旧的制度、君主专制，实现自由等等方面是坚决的；我们将以同样的坚决态度来批评和揭露临时政府每一次的不彻底性，每种使它脱离坚决斗争的倾向，每个旨在束缚人民的手足或扑灭燎原的革命烈火的企图。

我们号召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民主派，对于中央及地方当局的一切活动进行最严格的监督。

我们要知道，民主道路和临时政府的道路是要分开的；醒悟过来的资产阶级定会力图遏制革命运动，不让它发展到足以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基本要求的地步。

我们应该时刻警惕着、准备着。冷静地、平心静气地权衡一下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集合、组织和团结革命的无产阶级。我们无须督促事件！事件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提出更换临时政府的问题就必然是政治上的错误。

伟大革命的推动力量是跟着我们走的，这种力量将揭露用妥协方法谋求解决革命任务的一切企图的不充分性和局限性。

只有当自由主义者的临时政府在俄国民主力量面前暴露无遗的时候，政权转归民主力量手中的问题，才会作为一个实践问题而出现在它的面前。

目前的口号仍然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代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力量团结起来，绝对不信任自由主义者的任何诺言，对于实现我们的要求进行最严格的监督，对于为根除沙皇地主制度一切残余的每个步骤给以坚决的支持。

(译自1917年3月27日《真理报》第8号。徐平译)

苏维埃关于对外政策的决议^①

(1917年5月17日)

由工人、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最衷心地祝贺彼得格勒革

^① 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关于1917年5月1日发表了要求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它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群众于5月4、5两天举行了10万人的抗议集会。

命民主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的会议及其决议和声明着重注意对外政策问题，以避免对外政策可能步老牌帝国主义的后尘。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已经向临时政府和世界各国表明他们的心愿：俄罗斯革命民主政权永远不会重蹈沙皇的对外政策，它（俄罗斯民主政权）正在而且要继续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基于上述这些要求，临时政府通过公报发表了新的声明，声明已由外交部长递交各协约国的部长们。声明使原先不顾革命民主政权的要求和利益的5月1日照会失去效力。放弃以暴力掠夺领土的问题已提交国际上考虑，这一事实是为争取民主而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苏维埃决心遵循这条路线，继续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并号召苏维埃的一切革命民主力量，日益紧密团结在苏维埃周围。苏维埃坚信，各交战国的人民将冲破他们政府的阻挠，迫使他们在不得侵占他国领土、不要战争赔款的基础上开始举行和谈。

（译自《俄国史文献，1914—1917》，世纪公司1927年英文版，第336—337页。高燕译，高放校）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 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

（1917年5月7日〈旧历4月24日〉上午）

加米涅夫

同志们，党在热烈的革命气氛中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后聚集在一起，在它估计目前局势的时候，自然应当考虑到党在这一时

期所开展的那些工作的经验，也应当查明它所犯的那些错误。我认为，对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不应当闭眼不看。应当指出，我党在这几个月中的行动路线有一些极其严重的动摇。

我把从革命开始我党所经过的时期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是猛烈的革命风暴时期，这时党遭到极大的削弱，而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却对自己的力量有些估计过高。如果看看这个时期的中央机关报，那你们就可以看到它在直接号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这实际上毫无结果。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权落到了我们的政敌手里，换句话说，落到了社会沙文主义分子手中。

第二个时期是与全俄苏维埃会议联系着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国际主义者集团正式脱离了那些持革命护国主义观点的人。诚然，在战争问题上同我们有分歧的全俄苏维埃会议的 16 名布尔什维克代表，离开了我们而转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了策烈铁里和齐赫泽的观点。^①然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获得了清楚准确的表现。我们反对革命护国主义，也反对临时政府，但同时我们也反对立即推翻临时政府，反对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此后是新的动摇。在最近的一号《真理报》上我不得不指出我与下述路线的分歧，列宁同志的提纲就是从这条路线得出的一

^① 指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的沃伊廷斯基、谢弗鲁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这个集团 1917 年 3 月出席了与全俄苏维埃会议同时举行的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参加该集团的主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组织的代表。沃伊廷斯基、谢弗鲁克及其同伙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主张支持临时政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夺得政权是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局，而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权则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毁灭。沃伊廷斯基、谢弗鲁克积极主张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联合。

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和全俄苏维埃会议以后沃伊廷斯基、谢弗鲁克完全转到孟什维克一边去了。——原编者注

般结论。^① 这里存在分歧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觉得，中央委员会在昨天的决议^②中不得不承认，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是冒险主义性质的口号之后，——据我看来，这是大大夸大了，其原因是以前没有注意我所说的，“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会起瓦解的作用——我们不得不立即猛然后退，我们错过了时机去警告群众这个口号具有瓦解的作用，并且在说了这个口号具有冒险主义性质之后，就把自己置于小资产阶级的攻击之下。从这时起，开始了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和策略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同志们，我向你们发出一个号召。你们是最有威望的会议。你们是要对我党的整个未来负责的会议，因此我要求你们制定一条严格、准确的我们的行动路线，以免再发生动摇，避免全力前进，随后又猛然后退。为了制定我们的清楚明确的策略路线，我们应当在我们的会议上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列宁同志的报告从技术上来说我是不大满意的。我不明白，怎么能把临时政府的问题、战争的问题、工人运动的国际形势问题这样三个重要的问题放在一个报告里，混在一起，揉成一团，从而

① 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反对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文中他反对弗·伊·列宁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且企图把工人阶级的任务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加米涅夫坚持半孟什维主义的“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要求，而在对战争的估计上陷入护国主义立场。列宁在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前在《论策略书》（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3—35页）这本小册子里以及在四月会议上，在关于目前局势的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中（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99—214页和第215—217页）都批评了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的言论，批评了他的投降主义立场。——原编者注

②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7年4月22日（5月5日）早晨通过的决议，它登载在1917年4月23日（5月6日）《真理报》第39号上。——原编者注

使全体代表陷入困境，无法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此，我必须极概括地阐明我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老传统，首先应当对所发生的事件作一阶级分析。据我看，列宁同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个革命没有结束，我们的分歧就在于此。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结束了，但由于我们无疑是革命的政党，而一切都处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因此，革命在继续，所以我们就应当清楚明确地说明，帝国主义局势造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我们正处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之中。这样我们的策略自然就获得了明确的含意。但是我认为，我们过高估计了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困难还没有暴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所有的地主土地还掌握在地主手中。要承认，在形式上和事实上的典型的封建主义残余——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所以我们应当说，上述判断还为时过早。

另一个理由是，国家还没有改造成民主社会，而既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结束，那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经发挥尽了自己的全部潜力就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指的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十八世纪的那种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二十世纪进行的革命，因此它就具有这个世纪的一切特征，也就是说，它是在战争时期进行的，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但是如果由此作出过早的结论，说这个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它已经接近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把工兵代表苏维埃看作是我们力量的组织中心和政权中心。我们应当承认，它们是革命的中心环节。光是它们的名称就表明它们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盟，在它面前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存在，在它

面前就没有任何明确的任务，而无产阶级就要进行反对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革命斗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既然把这些苏维埃看作是组织力量的中心，自然也就是承认还有工农联盟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过时，我想，你们都应当承认，这个革命彻底结束时，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手里。那时，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决裂，无产阶级独立实现无产阶级本身的目标的时刻就到来了。我认为，应当从两个策略中任择其一：或者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实现、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不能帮助它实现的任务，那时，我们就中断联盟，去实现应由无产阶级实现的那些思想；或者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联盟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有前途的，那么，我们就要加入这个联盟，我们制订的策略就要使这个联盟不致破裂。因此，我说，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联盟中应当保持独立，并且确定自己明确清楚的纯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目标。我们同联盟一道走，并且还能够在它们一起走几步。我希望，无产阶级政党确实能这样行事。

我主张修改党纲。我不怕用共产党来代替社会民主党这一旧名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家都将走得很远并将做到：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过程中明确无误地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行事。但这只是一个任务。

另一个任务是同联盟一起工作，支持它，在制定我们的策略时不使这个联盟破裂。我觉得，列宁同志的报告对第一部分很注意，也就是把党的任务从一般的革命任务中划分出来，但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这种联盟的环境下工作，对此他没有予以注意。然而，在每一实际步骤中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实际上，当列宁同志说，推翻临时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得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这就是承认那种无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联系去发展无产阶级的积极策略是不行的。而当列宁

同志说，临时政府依靠苏维埃的信任，因此不能推翻它，这就是把无产阶级的目前任务作了限制。

因此，我们在制定自己的策略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具体的情况——存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他们只有一部分跟无产阶级走。我们应当指出，临时政府不仅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情绪的阶级发生冲突，而且它作为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还会同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发生冲突。列宁同志不喜欢“革命民主派”这个词，因为它掩盖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面貌。但是实际上我们应当说，资产阶级与全体革命民主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无论在战争问题上，在土地问题上，还是在自由问题上，我们都不应该低估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在战争问题上，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临时政府之间有矛盾，而且所有小资产阶级士兵群众都同临时政府发生着冲突，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同样如此，不是因为所有这些群众都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而是因为我们的临时政府所继续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他们面临粮食危机的问题。在自由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继续战争是与现在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所享受到的自由的程度不相容的；在现在存在这些组织的情况下作战，在到处举行群众大会的气氛中作战，这是前所未有的，是必然要失败的。因此，出现了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存在充分的自由，存在任何地方都没见到过的组织，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分子又企图继续战争。这就必然促使临时政府去同这种小资产阶级士兵群众组织的自由进行斗争，同各种各样的自由进行斗争。因此，我们而临的危机，我们在彼得格勒这儿看到的危机的开端，就是显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发展的危机。因为，或者是革命中止战争，或者是战争毁灭革命的成果。象现在这种打法再打下去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呢？既然这一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帝国主义政府和小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将产生冲突，那么策略就只能有一个。我们正迎向这样一种局面：在一次危机中，并且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将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政权问题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表明，我们无法加速这一过程。因此，当列宁同志反对过分突然地转向“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的时候，我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的，但是我认为本应早一点指出这一点的。

在列宁同志的决议中接着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信任临时政府。我们知道，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组织发生冲突后，必然要交出自己的政权，而苏维埃将被迫掌握政权，而不管那时候它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在这个政权转入联盟之手以前我们是否有某种策略呢？如果通过列宁的决议，那么我们在指明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的条文上就会看到两个指示：必须在群众中做长期的解释工作和必须在苏维埃中做长期的工作。但我认为，这不是实际指令。这不是你们应当带到地方去的答复。当然，我们的全部活动都是解释，但是如果这样，那就只要起草决议和说明就行了。但这是不够的。应该采取具体的积极的步骤，借助这些步骤我们能够把群众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要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使群众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领会对待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莫斯科同志们和我拟定的对临时政府实行监督的思想之中。列宁同志慷慨激昂地反对这种监督。你们说，没有政权能有什么样的监督？当然，没有政权的监督是空洞的儿戏。但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不是真的无权呢？可能，列宁同志承认，苏维埃是一种力量，它的监督是一种政权的监督。事实上，步枪和大炮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在米留可夫之流手里，因此，他们不能派兵去制止农民暴动，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

民。他们缺乏这种力量。然而这种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士兵不去呢？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不同意这样做，掌管这些步枪和大炮的权力在苏维埃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监督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当军人应当按照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出动的时候，苏维埃宣布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武装力量只受苏维埃的调遣，因而军队没有服从科尔尼洛夫的命令，这时候这种监督就实现了。实际上，这胜于雄辩。当苏维埃表示愿望，不要军队出动的时候，它就行使了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科尔尼洛夫的命令是存在的。至于说到莫斯科和外省，比起彼得格勒来苏维埃更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

如果是这样，那么，列宁同志所挖苦的那种监督，无论如何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我们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它们会成为实现苏维埃所具有的那种政权的一个阶段。现在这种政权是偶然出现的。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政权，而明天科尔尼洛夫就会从我们这儿把它夺去。但是如果我们把监督看作是向政权过渡的一个阶段，并把组织监督看作一个开端，一个阶段，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要求，它将会真正引导我们前进，因为政权应当归苏维埃，而苏维埃却不去掌握政权。而我们只限于解释并且一直坐等，直到越过我们，从言词转向行动，苏维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止。

我们仍然没有政治工作，我们仍然是理论家，宣传家，能写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出色的学术著作，但是我们作为政治活动家，作为一个政党却回避目前所处的时期。相反地，如果我们采取一系列政治行动，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在执行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们向苏维埃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知道不能仅限于解释工作。这是一个应当取消或者颁布命令的机关，因此，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应当有一条政治路线。如果你们到执行委员会里去，有人问你们，你们关于临时政府作出了什么决定，而你们

说，现在还不是更换它的时候，然而它是应当更换的，因此我们将等待，直到政权转入苏维埃之手，而暂时我们将进行解释工作。——这样，你们就把政权交到我们的敌人手中去了，把阵地交给他们了。这样你们就处在敌人股掌之中，等待客观条件把政权奉送给我们。由此可见，实行监督是必要的，应当写进我们的决议，如果我们不想仅仅带着我们必须只限于解释的一般的指示去到地方上去的话。

现在，谈谈关于战争的决议。总的说我是同意这个决议的。现在十分清楚，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它只能以社会主义革命告终。应当摒弃护国主义，这是对的。我拥护认为这次战争只能以世界革命结束，而联欢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但是，我们除了前线联欢这一政策外，在国内我们作为一个政党还应当为和平而斗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别的政党就会这样做。当然，联欢是一件大事，但它并不能使我们放弃其他任务；不妨想一下，还有幅员辽阔的后方，而它要求我们回答和领导。同志们，你们知道，现在没有一个会议作出要求公布秘密条约的决议。我们作为一个政党是否应当提出公布秘密条约的要求，声明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党的政治要求？但有人对我说：对不起，您是在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我的要求不是建立在等待米留可夫给我回答并公布条约的基础上的。我提出的包含这一要求的政策是发动群众的鼓动手段，是揭露米留可夫、古契柯夫不能做到这一点，揭露他们不想公布秘密条约，揭露他们反对和平政策的方法。这是向群众指出，如果他们真想制定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政策，那么政权就应转入苏维埃之手。

决议没有谈到这一点。哪种政策好一些——是我所分析的那种政策，还是那种要求责成政党团结群众的力量，不仅团结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而且也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团结这些群众的必要性已作为实践要求提出来了，这是因为清楚地

认识到，一旦这些群众真正看清了政府的政策，这就会使得他们同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在他们面前提出推翻临时政府的问题，而推翻临时政府是进行长期的组织力量过程的结果。由于小资产阶级同临时政府的这些冲突的结果，“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就会失去布朗基主义的性质。那时它就会使得这些群众努力建立一个能真正满足他们要求的政府。

因此，列宁同志的理论和决议有一个缺点：它们总的说来完全正确地描述了俄国革命前景，但是它们没有给我们这些积极的政治家提供最低纲领，没有我们现在应该为之工作，应该团结在其周围的东西。这是一个宏伟的发展革命的纲领，但没有给我们这些政党的积极领导者以具体的指示。我认为，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左右摇摆和犹豫不决削弱了我们的地位，当然我们每摆脱一次危机都应当变得强大十倍，我们之所以左右摇摆和犹豫不决，是因为在一般社会学公式中缺乏具体的政治内容。只有解释，而没有行动——动摇即由此而来。因此，我完全理解并且同意这种工人群众的主张：他们听说他们的领导者们只建议进行解释工作，他们就决定，如果什么也不能改变的话，还是推翻临时政府的好。^①他们越过了纲领的界限，之所这样做是因为政党没有向他们指出任何实际出路。

我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曾建议向群众提出警告，“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是瓦解性的口号，我这是建议打预防针。为什么

^① 在这里，加米涅夫为了败坏弗·伊·列宁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企图利用以巴格达季也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中的小集团的冒险主义和瓦解性言论这一事实。弗·伊·列宁在关于目前局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反驳了加米涅夫的煽动性攻击（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5—216页）。——原编者注

这个时候需要打预防针呢？因为当时还不清楚具体措施何在。而群众本应按这些具体措施的轨道前进的。

如果你们不想出现这些误会的话，那么一个政党就不能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解释，必须向群众发出具体的政治行动的指示，否则群众就总是以一般的估计出发作出过于直接的结论来（“打倒临时政府”）。

在战争问题上同样如此。在决议中有关于战争的一般公式，但没有在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的时期为和平而斗争的具体措施。如果你们知道，为和平而斗争事实上只有在革命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同时你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那么为什么不具体指出这一点，而只是要求消灭战争呢。向大多数人，向群众回答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因为由党的决议提供一般的公式，一般地指出应当怎样结束战争，而不指出为结束这场战争需要做什么，这是最容易不过的。我们应该向群众指出在政权转入我们手中之前的具体的斗争方法，并且应该在考虑到进行的战争的条件下，尽力使列宁同志的这个写得很出色的一般的最高纲领变成现实。

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应当成为工贼。我们是国际主义者，现在还处于少数，但是我们将发展起来。

我要求你们认识到目前的责任，认识到不能继续动摇下去，我们这批正确地把国际主义路线贯彻到底的人，应该为了国际，也为了真正最大限度地进行我们的革命而承担起政治责任，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指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为决议提出一系列有关实际措施的指示。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78—86页。郑桥译，郑异凡校）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 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关于 目前形势的副报告的总结发言

（1917年5月7日〈旧历4月24日〉）

加米涅夫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误会。布勃诺夫同志宣读了莫斯科省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谈到了监督临时政府，事情很清楚，这是监督，但这种监督是同我提出的监督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监督。而如果布勃诺夫同志愿意把这种监督解释为组织游行和群众大会来批评临时政府，那就用不着进行更正了。

另一个误会是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当人们说到应当以社会主义变革来结束战争的时候，指的是只有用社会主义变革来结束这场战争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中所有备受压迫的阶级最为有利。对这一点是无可反驳的。另一回事是预见到，在准备这样来结束战争的过程中，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将会从战争转成联盟来武装反对红色危险，这种危险的幽灵正遍及整个欧洲。所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是用社会主义革命来取代战争。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搬出考茨基主义的重炮来反对我，把这解释成，我由于住在西伯利亚而不了解情况，我必须反驳这种指责，理由是我并没有读过考茨基的著作。但是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列宁同志能以我个人生活所处的不利环境作为理由的话，那么我应该说，尽管如此，我把考茨基的立场看作是民族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立场，看作是社会国际主义者与之毫无共同之处之中派立场，我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当有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那么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会否认这一方针。我们大家都持这一方针。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可以使航船巧妙地直接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航行，也可以使航船左右摇摆，把它开向泥潭。而我断定，已经犯了错误。在第19号《真理报》上，一些同志最初提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在最近这次危机之前刊登出来了^①，然后这个口号被当作瓦解性的、冒险主义口号而被摒弃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次危机期间学会了一些东西。提出的决议案重复了这一错误：人们向我们提出这次危机之前通过的决议，其中把一切都归结为向群众进行解释。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没有把这次危机考虑进去。这个决议是如此抽象，如此缺乏积极的政治内容，它只能在危机以前提出来。在危机之后提出这种决议是不行的。其中没有实践性指示，而只有一般公式。同志们说得对，由于这种不明确的决议我们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并且会重演我们刚刚亲眼看见的事件。该意识到责任了。决议应当是具体的。其中应当有对临时政府的正确积极态度。但是你们在提出的决议案中只能找到这样的指示：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难道你们不懂得，进行这种促使群众觉悟的长期解释工作——这就意味着使他们有可能离开我们？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你们就无权说你们在走世界革命的道路。而如果“打倒临时政府”的号召是一个积极的口号的话，那你们为什么把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称做冒险主义的步骤呢？这样就应当明确地指出，在我们俄国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就是开始推翻临时政府的战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这个口号是冒险主义的口号。我可以不同意你们，但我会说，你们给了一个实际回答。而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还不具备客观条件，那就请你

^① 在1917年3月28日（4月10日）第19号《真理报》上没有刊登过任何“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原编者注

们指出具体步骤，而不要只说一些泛泛的词句，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应当实行的活动形式。在你们的决议里没有这一点，因为你们没有考虑到整个具体局势，你们推卸责任，放弃自己的职责，抵制革命的进程。不能每两天变一次政策，不能抵制革命进程。

我们谈论监督，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监督，而是因为你们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临时政府是按照同苏维埃的协议行事的，它目前依靠苏维埃的信任，因此协议是存在的。这就是应当作为出发点的地方。斯大林同志说，监督本身是以协议为前提的。为什么你们要以隐蔽的形式反对苏维埃呢？如果你们拒绝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应当直接写道：你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议苏维埃中断这一协议；要不然我们就要发动反对苏维埃的运动。但是你们自己并没有开始这一运动，并且你们也没有建议进行这一运动。但是既然你们在决议中没有提到中断协议，如果你们承认这一协议，那就意味着你们也承认监督。就是说，这不是政治影响，而是排除政治影响。这样，你们就使每个人都去各自执行自己的路线，各自承担责任。决议案中没有指出我们的代表在这一或那一机构内应做什么，没有指出在任何一个工厂内应怎样具体行事。你们没有作出具体指示，其后果就是4月22日事件。如果在这里我认为有责任告诉你们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我认为，危机应当教会我们一些东西。我认为，群众从决议的第一部分应当得出一个结论：“打倒临时政府”。从这个将会多次重现的可怕教训中应当作出某种结论。如果你们不给群众这种政治结论，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唯一可以理解的结论：必须推翻这个策划反动企图和政府。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条；但是如果有人建议我乘飞机走这条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话，那我就要拒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一个人到达，而我想要同群众一起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当指出道路。在刺刀对着我们的时候，仅仅做一个宣传家是不够的。如果那些说

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业已成熟，说那里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运动的人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发动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群众运动。依我看，达到这一点的直接道路就是推翻临时政府。一旦西方的人们得知我们这儿既没有米留可夫也没有古契柯夫，那时群众就会奋起。一旦新政府公布秘密条约，这就将是解放群众的第一步。

如果你们承认还不能把政权从临时政府手里转到苏维埃自己手里，那就不要过早丢掉这个口号。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108—110页。郑桥译，郑异凡校）

莫斯科的柯兹洛夫厂、库兹涅佐夫 厂、军事部门工厂和氧气厂 工人全体会议决议

（1917年5月19日）

5月6日柯兹洛夫厂工人和库兹涅佐夫厂、军事部门工厂、氧气厂的代表全体会议决议如下：

丝毫不能信任充满假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政府！全部国家政权只能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同志们！工人们！重新选举自己的代表并派到坚强的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苏维埃中去！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9页。方钢译）

里加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

(1917年5月24日)

1. 5月5日成立的临时政府，是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同温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达成协议的结果。

2. 这种协议证明：（一）英国、法国及其他同我们“联盟的”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相信，再也无法强迫俄国革命军队捍卫赤裸裸的侵略政策，而不得不仅仅局限于在适当情况下能够变成进攻并用于同样掠夺政策目的的“积极防御”；（二）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相信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会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经济政策，并站在民主立场上。

3. 我们的意见和上述意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积极防御”不变成积极进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它不会变成积极进攻，终究也完全是帝国主义积极防御的手段，因为英国、法国及其他同我们“联盟的”国家的政府不会放弃掠夺政策，并且他们的军队为了征服和粉碎敌人在不断地进攻；难道我们用我们的“积极防御”去支持他们的政策，去帮助他们掠夺？难道俄国军队应当为了“同盟者”和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去流血？

4. 但是我们要强调指出，德奥联合政府不会放弃征服和粉碎敌人的意图。我们相信，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适宜的时刻，德奥掠夺政策的执掌者会驱使他们的军队反对俄国。

5. 在这个战略时刻，按照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和革命人民的策略只能是这样：必须鼓励同我们“联盟的”和“敌对的”国家的民主派采取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和平立场，拥护“不割地，不赔款”的、允许民族自决的媾和，推翻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如果它们不采取和平民主的立场，就迫使革命俄国的政府与“盟

国”完全绝交。为了使德国军队革命化和传播和平思想，必须使交战国双方士兵继续联欢，并且是应当在军队各级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组织，使双方任何一方的司令部都不能利用士兵联欢达到卑鄙的目的。

6. 只有在革命民主派坚决与本国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并受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和平政策才能实现。

7. 其次我们深信，加入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的代表，将要阻挠实现革命民主派的以下内外政策：摧毁旧政权的残余，建立新制度，巩固革命确立下来的农民的经济地位，实行工人立法，对有产阶级进行征税，整顿好对工业企业、银行等等监督的机构，以及预防威胁全国的饥馑。因为这些改革和新办法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的私利的，所以他们将阻挠它们的实现。

8. 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内阁既不能把我们的军队从为了资本家、银行家，总之是一切贪婪掠夺者的利益而必须流血牺牲中解放出来，也无法利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手段把俄国从经济崩溃和反革命威胁中拯救出来。

9. 参加本届临时政府的社会党人，直接和间接地都在促进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并拖延解放和拯救俄国的时间。

10. 我们的口号现在还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号召：全部政权属于工兵农苏维埃。

11.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在工人、农民和军队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尤其要指出，只有当我们同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同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时，革命成果才能巩固和发展，只有通过革命，世界各国的无产者来反对世界各国的资本家，战争才能制止。

情报局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9—31页。方钢
译)

喀山省农民代表苏维埃决议

(1917年5月26日)

1. 在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之前，为了革命的成功，和为了能向全国提供粮食，在乡和村委员会组织起来之后，农民代表苏维埃认为必须把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寺院的、教会的、阁部的和城市的耕地和牧场交给乡委员会支配。

附注：私人占有者从独家农庄户那里收买到自己手里的土地（以及森林和牧场）称作地主的土地。

土地只交给照章组织起来的乡委员会支配。

怎样照章组织乡委员会呢？

为了照章组织乡委员会，应当在每个村庄召集年满18岁的男女举行村会并选出代表。如果村庄较大，应当按每200个18岁以上的人选出代表1人。每一个村庄无论多小，也应有自己的代表。所有当选代表都要带着选民团体的决议去参加乡代表大会。乡代表大会选举乡委员会。乡委员会不应少于3人：主席1人（他执行乡长的一切职责）和副主席2人。如果委员会为3人以上，那么除了主席和副主席以外，应有乡委员会委员若干人。本乡之内一切地主的、国家的、寺院的、皇族的、教会的、阁部的及其他的土地都交给乡委员会支配。

2. 一切牧场和森林均受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监督。

乡委员会不得自行砍伐林木，如经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许可，也不得禁止砍伐。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有批准和监视合理砍伐林木

之权。

3. 地主的全部农具、全部牲畜和财产都应按登记清单交给乡委员会支配。

农具、牲畜和财产清单应当编制详尽，编制时要有地主或他的代表在场，并有作证人在场。清单应由上述人员签字。清单交给地主保存，证明副本留在乡委员会保存。

4. 省农民代表大会规定，归乡委员会支配的全部土地，可以分别交给一切愿意得到的人，或规定土地的耕种费用和收获量，乡委员会则应按此安排耕种和收获。一切粮食和干草都应交给国家支配。

喀山农民代表苏维埃规定并通知应当耕种多少土地。如果一个乡的力量不能耕种全部土地，则可由他乡愿在同样条件下耕种者耕种一部分。任何分地行动均属不得允许。超过应得份额的全部粮食通过乡委员会转交给国家。农民代表苏维埃坚决认为：如果不等立宪会议决定，委员会现在就要分地，那就会引起许多纠纷、埋怨和谬误。并且前线的士兵会如何设想呢？他们会设想，不愿分给他们土地，而是把他们撇在一边。因此，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谁也不得分地，而只能通过乡委员会使用。

5. 在缺少土地的非常情况下，乡委员会应当关心为地少的人提供粮食。即使谁的土地很少，难以维持生活，也决不要分地，而要通过乡委员会张罗，从新收粮食中给他拨出一些粮食。

农民同志们，农民代表苏维埃对于土地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要暂时这样办理。以后将会颁布新的法律。现在只是叫别人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选出的乡委员会来支配。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5—37页。方钢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决议

（1917年6月13日）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声明

1. 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为回答俄国临时政府的呼吁而在星期日发表的正式声明，一再证实“联盟”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愿站在根据民族自决权不割地不赔款而媾和的立场上。从这些声明可以清楚地看出，一方面，是力图继续战争，直到实现其侵略目的，另一方面，是企图与俄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把俄国军队变成这种拖延世界大屠杀、国际掠夺和对各国人民施加暴力的政策的消极工具。

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

2. 因而临时联合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它原来希望通过与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并劝说这些政府放弃其侵略野心而把国家引向和平。“盟国”的帝国主义者关于其侵略野心的厚颜无耻的声明，撕下了联合政府抓住“进攻”口号不放的伪装。

什么是进攻？

今后俄国方面对进攻的鼓吹，在全体人民看来，是同实际支

持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的，和为了俄国与“盟国”的资产阶级利益而拖延战争密不可分地明显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政策所以更加有害，因为它是拿千百万俄国公民的生命和俄国劳动阶级的整个前途为了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目的来作赌注——它已经使暴力政策在军队中复活（把团队解散，因言论而逮捕，交付法庭，等等），在军队中间造成了纠纷，靠牺牲革命者而加强了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为波拿巴主义创造基础，并且实际上在用一切办法反对军队中最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分子。

必须检查苏维埃的全部政策

3. 应当立即检查苏维埃迄今所执行的政策，以消除临时政府及支持它的党派——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同帝国主义政府妥协的政策给俄国革命造成的致命恶果，和进攻政策造成的更加致命的恶果。

居民应当注意

4. 这种政策破产的事实，应当引起最广大的劳动居民群众的注意，并迫使他们承认，如果不采取以下策略便毫无出路：

（一）苏维埃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发出呼吁，在呼吁书中指出：

（甲）它驳斥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及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战争目的，认为它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在这次战争期间所攫取的地区、殖民地以及强行列入本国版图或未经自愿同意强行划入本国的一切没有全权的国家；

（乙）它认为俄国劳动人民群众对于沙皇同各帝国主义政府缔结的秘密条约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并请大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

法来揭露一切外交秘密和公布条约，认为公布条约是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群众不受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的欺骗和挣脱其枷锁的步骤之一；

（丙）它号召世界各国的一切被压迫阶级，要（在各自的国家）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政府，以帮助俄国工人既反对德国帝国主义阴谋，又反对盟国和俄国帝国主义用拖延战争葬送革命的野心。

苏维埃要抓住政权

（二）为了有可能真正实现上述任务，苏维埃为了拯救自由，为了和平，为了拯救许多国家的因饥荒和经济崩溃而站在死亡边缘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要把政权抓在自己手中，以便最迅速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向交战者呼吁和平

（三）这样成立起来的俄国政府立刻对一切交战国政府并单独地对这些国家的一切劳动阶级完全阐明和平条件，同时建议立即开始进行和平谈判。只有采取这一步骤，才能使俄国劳动阶级摆脱因其同俄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联系而陷入的困惑不安和政治上难以忍受的境地。要揭露所有这些政府，使它们不能维持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从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苏维埃对军队的呼吁

（四）苏维埃要向军队呼吁，要说明德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使俄国所处的地位，要求军队集中全副力

量把自己坚决组织起来，建立革命纪律，以便在交战国政府和工人阶级对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答复时的过渡时期贡献巨大力量。

苏维埃的革命措施

苏维埃撤销近来发布的一切旨在反对军队中国际主义分子的命令。苏维埃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以便遏制资本家，剥夺他们现在也还享有的空前可耻的利润，把他们的企业置于真正工人监督之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并从而保证给军队送到他们必需的一切消费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0—43页。方钢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 军事局决议

（1917年6月19日）^①

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看，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地主、富翁等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掠夺市场（掠夺在别国的贸易权）和殖民地、为了使弱小民族服从金融资本的压制而进行的战争。战争每天都在使一切交战国与中立国（非交战国）的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银行家、厂主和地主）发财致富，使农民破产，使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力量消耗殆尽。拖延战争只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银行家、工业

^① 系公布日期。

家、资本家)有利;在俄国,除此以外,它还会给革命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

资产阶级政府关于放弃掠夺别国领土和放弃对本国境内受奴役民族暴力控制的官方诺言,是丝毫不值得信任的。

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只能是通过革命,通过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国家政权转到反对资本压迫的革命民主制(人民)代表的手里。

根据这一点,本军事组织全体会议认为,一方面:

1. 只有一方的士兵拒绝继续作战,前线组织纪律的破坏(混乱),和交战国的某一方停止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2. 对于革命民主的俄国来说,单独媾和(某一个交战国同一个、几个或全部敌国),以及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签订的任何别的和约那样不民主的和约,我们不允许并且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要记住,新的联合内阁拒绝执行革命民主派的公布沙皇专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的要求,而仅只同意采取审查这些条约的准备步骤,并且实际上在审查之前承担继续先前帝国主义战争的责任,会议提议:

1. 只有当政权转入革命民主派手中——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当革命民主派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对待一切交战国媾和建议的时候,进攻的号召,对革命民主派来说才能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种建议会造成一切交战国工人的相互信任,并且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反对一切不赞成这样媾和的帝国主义政府。

只有这样的进攻能够成为争取和平与普遍自由的直接斗争。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军事组织会议认为,进攻是绝对有害的,会妨碍革命人民力量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国际团结,会拖延战争。

2. 会议认为向民主群众广泛地不断地说明这些理由是自己的任务,同时认为,关于发动或不发动进攻的问题,只能由前

线上的、战壕里的同志们自己来解决，但不是由单个人自发地来解决，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士兵普遍参加表决的办法来解决。

与此相联系，会议认为迫切的需要是必须有一切军队司令部、军、师、等等的士兵代表出席，以便每一次进攻，不论其规模如何，都要通过士兵选出的代表征得士兵本人的同意。

一致同意通过。

各社会民主组织的成员：伊兹马伊尔营、谢苗诺夫连、彼得格勒连、叶格尔连、开克斯果耳姆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连、巴甫洛夫连、沃伦连、立陶宛连、格列纳杰尔连、芬兰连、第180步兵连、第1步兵连、第3步兵连、第171步兵连、第172步兵连、第176步兵连、第177步兵连、第9骑兵连、第1机枪连、第2机枪连、莫斯科连、第3射击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全体人员、第6工兵连、电工技术连、第1预备汽车连（若干部分）、波罗的海舰队第2舰只全体人员、格瓦尔迭依斯克舰全体人员、海军学校全体人员、布朗涅夫大队、布朗涅夫大队工作场、第6后方汽车工作场、汽球部队、摩托浮桥连、米哈依洛夫砲兵学校全体人员、彼得格勒护送队全体人员、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赫尔森法斯、维堡外国堡垒人员、奥拉尼延巴乌姆、加特奇纳堡垒人员、来自前线的几名代表和彼尔姆的代表、布雷连、化学连、军需管理处、绥芬河摩托机手学校、普梯洛夫厂全体士兵、第134砲队、第134后方运输配给站、第134航空站、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维堡第1团、工程部队准尉学校。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5—57页。方钢
译）

五十四个工厂的代表在工人士兵代表 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 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上的声明

(1917年7月17日)

第1名代表说：这里是54个工厂的代表。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必说了。真奇怪，什么时候不得不宣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书：工人和士兵叫做反革命分子。我们的要求——工人的共同要求是：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个要求也向你们提出。这是个既成的事实。要考虑这一点。

第2名代表的声明：我也是54个工厂的代表。你们看布告上写着什么。同一个问题在所有工厂都讨论了。工人作出的决定是什么？

你们知道这些决议。在工厂里我们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们要求解除10名资本家部长的职务，我们相信苏维埃，但是不相信苏维埃相信的那些人。我们的社会党人部长同志们，和资本家妥协了，但是这些资本家是我们的死敌。我们要求立刻把土地掌握起来，立刻对工业进行监督，我们要求与威胁我们的饥饿进行斗争。

第3名代表说：问题不在于言论，而在于行动。我们这里正在行动，遗憾的是苏维埃还没有注意到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们要求苏维埃立刻掌握住政权。土地应当不经任何立宪会议立刻进行转交。话讲够了。我请问呼吁书的作者们，是谁企图加害于苏维埃政权？又是谁赞成俄国革命？现在我们就需要立刻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

工人的第4名代表：书斋里的思想家企图从理论上弄清楚的东西，群众只靠自己的辨别力来解决。群众看到了现在国家的处境是困难的。摆在你们面前的不是暴动，而是非常有组织的行动。我们要求全部土地转到人民手中。我们要求撤销一切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结束厂主和资本家怠工和同盟歇业的局面。必须对生产实行监督。只要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继续存在，国内就不可能平静。这个混蛋在我们怀里已经暖和够了！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工作，我们问你们，你们还要同谁讨价还价。我们要求，全部政权转到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这是唯一的出路。

彼得格勒矿厂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声明：在彼得格勒矿厂有2万人，现在我代表他们发言。现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基础开始动摇了。革命放松了。群众不想叫资产阶级部长们掌权。群众越出了组织范围。例如，今天在彼得格勒未经苏维埃同意就出现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军第三团。你们自己知道，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现在不接受民主要求，革命就会覆灭。民主的意志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把政权转交到苏维埃手中。我们的苏维埃完全同意就这个问题作出非常明确的决议。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65—66页。方钢译）

号召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 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 举行游行示威的呼吁书^①

(1917年6月30日<旧历6月17日>)

致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士兵

同志们！

俄国正经受严峻的考验。

带来无数牺牲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发战争财的掠夺者、残酷无情的剥削者——银行家故意拖延战争。

战争造成工业瘫痪，使得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宣布同盟歇业的资本家贪婪得象神话里的少爷一样，故意使战争更加激化。

战争引起的食品不足渐渐成为严重的威胁。物价昂贵使城市贫民感到窒息。为了填满强盗般投机奸商贪得无厌的欲壑，物价在日益飞涨。

饥饿和破产的幽灵笼罩着我们……

同时，反革命的乌云正在临近。

帮助过沙皇压迫人民的6月3日杜马要求前线现在立刻进攻，为什么呢？为了在血泊中践踏人民获得的自由，以迎合“盟国的”和俄国的掠夺者。

曾经给沙皇提供部长一绞吏的旧政府，正在悄悄地编织变节的绞索，为什么呢？为了在适当时机把它套在人民的脖子上，以

① 标题是本书编者改加的。

迎合“盟国的”和俄国的压迫者。

临时政府介于沙皇杜马和代表苏维埃之间，其成员中有10个资产者。它明显地受到地主、资本家的影响。

不保障士兵的权利，而要那剥夺士兵权利的克伦斯基的《宣言》。^①

不巩固士兵在革命岁月里争得的自由，而要那可能使士兵过苦役般生活和溃散的新“命令”。

不保证俄罗斯公民争得的自由，而要在工人集体宿舍进行反动的政治秘密侦探、不经法院和审讯而进行逮捕以及关于第129条有服苦役规定的新设想。

不武装人民，而要威胁工人和士兵解除武装。

不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责备芬兰、乌克兰，害怕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由。

不对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而纵容公开武装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向革命发起猖狂进攻。

战争仍在进行，没有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重要措施制止战争并给予全体人民以正义的和平。

经济被破坏得越来越严重，没有任何防止它的措施。

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也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它。

反革命分子越来越厚颜无耻，他们怂恿政府对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进行新的镇压。对此你们感到惊奇吗？

^① 指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颁布的第8号命令《军人权利条例》。这一命令剥夺了士兵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争得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命令的第3条规定士兵在服役期间才有权自由地说明自己的政治、宗教及其他观点。命令第18条取消了士兵选举指挥人员的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5月16日把这个《士兵权利宣言》叫做《无权利宣言》。——原编者注

同志们！不能再默默地容忍这样的局面了！对于这一切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你们——自由的公民，你们有权利、并且你们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利加以抵制，还为时不晚。

让明天（6月18日），发布和平宣言的一天变成革命的彼得格勒强烈反抗压迫和专横的一天吧！

让明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让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发抖去吧！

让你们，革命战士的呼唤传遍全世界，让所有被压迫、被奴役的人高兴吧！

在西方，在进行战斗的国家里，已经出现新生活的朝霞，伟大工人革命的朝霞。让你们西方的弟兄们明天都知道：你们在你们的旗帜上带给他们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不是奴役，而是解放！

工人们！士兵们！象兄弟一样携起手来，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前进！

同志们！大家都要走向街头！

紧紧地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周围！

排成整齐的队伍，庄严地行进在首都的大街上！

沉着、坚定地宣布自己的要求：

打倒反革命！

打倒沙皇杜马！

打倒旧政府！

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

全部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修订《士兵权利宣言》！

撤消反对士兵和水兵的《命令》！

誓不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装！

人民的民警部队万岁！

消灭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打倒宣布同盟歇业的资本家！

对生产、分配的监督和组织万岁！

反对进攻政策！

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了！让代表苏维埃宣布和平的公正条件！

不要和威廉单方面讲和！不要和英、法资本家秘密谈判！

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

局

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

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布尔

什维克党团

《真理报》编辑部

《士兵真理报》编辑部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08—210页。葛纪娥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彼得堡委员会传单

(1917年7月19日晚间)

俄国社会民主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7月3日、4日两天在整个彼得堡举行了工人、士

兵和水兵的游行示威。未经任何党派号召而开始的一切游行示威，是要表明广大的工人士兵群众拥护把国家的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当时已经显示出来，游行示威包括了非常广泛的工人、士兵阶层。他们是自发地、不约而同地进行游行示威的。我们的党中央与党的其他机构共同决定把运动组织起来，并号召在7月4日举行一天和平示威。在5日的《真理报》上中央已经刊载号召工人、士兵回到工厂和兵营，保持安静的决议。

7月5日这一天《真理报》报社被捣毁，报纸的广泛传播受到了干扰。7月6日中央作出了决议来证实前一天作出的决议。同时，我们党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完全不留后患地结束游行示威。如果这些天发生流血事件，那不是由于我们党的过失。

早已准备向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向那些对布尔什维克怀有好感的群众进攻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野心得逞了。经济生活的全面崩溃、战争的沉重负担迫使群众不得不为排除资产阶级代表的权力而进行坚决斗争。资产阶级早已准备用其同盟歇业和挑拨工人进行个别行动来制造屠杀。我们丝毫都不怀疑，对游行示威者的射击也带有纯粹挑拨的性质。

为了瓦解工人和士兵，资产阶级在反对自己的敌人时是不择手段的，无论直接告密，无论造谣中伤，也无论逮捕和枪毙，这些手段它都要使用。对我们党的领袖、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它提出了关于间谍活动的非常卑鄙、非常惊人、非常荒谬的指责。成年、或十年过着监狱、流放和流亡生活的人们，往往遭到有意诽谤者无端的攻击。同时还剥夺他们对这种卑鄙陷害给予充分回答的任何权利。

一开始就捍卫革命成果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人怀疑。从前线召唤回来一部分战士，我们的报纸到不了他们那里，而我们的敌人总对他们乱讲布尔什维克的坏话，把我们描绘成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捍卫者，他们说三道四撒谎诽谤不以为耻。

反革命力图彻底粉碎革命。

在工人阶级先进部队被粉碎之后，一切革命成果要遭到粉碎。

工人阶级和革命战士们应当清楚地理解所经历的这一时刻的全部严重性。他们应当认清陷害我们的原因。他们应当懂得，这种陷害是针对那些彻底捍卫其利益的人们的。他们应当懂得，要摆脱已经造成的这种状况，除了使全部政权转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里，除了对生产实行监督，立刻把土地转到农民手里，除了尽快结束战争，除了发生世界社会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同志们！他们想尽办法迫害我们，他们在教唆愚昧无知的群众反对我们。我们的任务是要向这些群众说明陷害的真象。我们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旗帜周围。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党能够光荣地摆脱近日来造成的困难状况。要振作起来并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以鼓舞全体党员和一切同情党的人。不要忘记，生活本身将迫使群众走我们所指出的道路。那些觉悟还不够高的群众，人们今天还能唆使他们反对我们，但是明天他们就会懂得，只有我们在真正地捍卫他们的利益，并且会走到我们这里来。

愿全体党员象先前那样坚韧不拔地执行自己的工作；提高工人群众和农村贫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向他们解释清楚，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73—75页。方钢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 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七月事件 致地方党组织的通报

（1917年7月28日）

敬爱的同志们！

趁发生这桩意外坏事的机会，向你们报告一下关于彼得格勒发生的最重要事件的一般情况，其中也包括我们党的情况。

7月3—4日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由于无视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各党中心的号召在7月3日晚开始的。在3日夜間，当查明工人、士兵群众都参加了游行示威，并且第二天还要参加游行示威以后，中央委员会决定号召举行一次和平示威。这次和平示威的规模很大，有4、50万人参加。7月4日夜間，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决议。如果不是夜间就开始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运动的话，5日就是平安无事的了。《真理报》遭到破坏，从清晨起桥就被拉开了，我们的印刷厂也遭到了破坏，等等。后来，就是逮捕、屠杀等等。尽管所有这些挑衅活动都是怂恿工人和士兵上街游行示威，中央委员会仍然继续号召要安静、忍耐和沉着。为了用武力抑制上街的群众，中央委员会曾借助从前线调来的一批士兵的力量。这些士兵不知道，也不考虑让他们去反对谁。

有组织的反革命公开进行活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进行反对它的斗争，而完全对我们的组织进行打击。

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我们暂时看不到报纸。我们希望近几天内一切都能够就绪。彼得格勒的情绪是高昂的，没有张惶失

措。组织没有被击溃：在前几次的局部选举中，我们一直占优势。我们赢得了一些席位：在普梯洛夫区 2 个席位，在法苏区的 7 个席位（过去只有 2 个席位是布尔什维克的）都是我们的，等等。

代表大会不延期。开会的代表 25 日集中。我们请你们把代表派往彼得格勒。地址如下：萨姆波索尼也夫斯基大街 62 号，区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 1961 年俄文版，第 221 页。葛纪娥译）

附录 陆海军部长命令〔节录〕

（1917 年 7 月 29 日）

在自前线召回的部队协助下，彼得格勒的叛变已被镇压下去，原来拒不服从并擅自拿起武器行动的一部分战士，他们已经服从，被解除武装，其中的一部分已被解散。被揭发有教唆行为者则予以逮捕。那些不断号召不要盲从、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出版机关（如《真理报》、《士兵真理报》、《战地真理报》等等），无论是在后方或在前线，一律予以封闭。在作战地区设立革命军事法庭^①，对于犯有特别重大军事罪行者，要尽速审讯，应予处死者，则执行枪决。对于公开号召杀人、抢劫、掠夺、施加暴力和犯有其他严重罪行，以及对某一部分居民有暴力行为和不执行政权机关的法令指示而处以 3 年和 3 年以下徒刑者，应在教养

① 所谓革命军事法庭是临时政府为了在前线上执行死刑而成立的。

——原编者注

所、监狱或要塞内执行。军官和其他有军衔者因号召不执行民主新制度下的现行法律和军事当局发布与其相符合的命令而犯罪之人，则处以叛国罪；在军队后方禁止召开大会。武装力量暂时有责任用来反对不服从作战命令的个别人或一部分人。

……要用适当办法使法国战线上的俄国第一旅服从命令，并在这一旅中执行铁的纪律，利用集会自由而不服从指挥员命令的部队，不许集会。对于涣散军心的犯罪分子要立即交付法庭，成立革命军事法庭，并且不禁止根据法庭判决而处以死刑。鉴于整个国际和战争情况，临时政府决定：把第一特别师从法国战线调至第二特别师正在那里作战的萨罗尼加战线上，命令恢复第一旅的秩序。详细指示将由最高统帅发出。

克伦斯基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75—76页。方钢
译）

(二) 准备起义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
作的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报告〔节录〕**

（1917年8月9日〔旧历7月27日〕）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已经充分地阐明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情

况。我只是谈谈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这个狭小的领域。让我来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我们组织的发展情况。在四月代表会议时，出席的组织有78个，共有党员8万人。现在我们有162个组织，共有党员20万人。按地区来说，力量的分布情况为：莫斯科同莫斯科区约有5万党员，并且还有一些组织这次没有派出代表；彼得格勒约有41,000党员，其中属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的有36,000，属于区间组织的有4,000，属于军事组织的约有1,000；乌拉尔有24,000至25,000党员（在乌拉尔地区代表会议上代表了22,000党员）；现在顿涅茨区有1万党员（在地区代表会议上代表的是14,000至15,000党员）；基辅同基辅区有1万党员。这都是最低数字；高加索（巴库、梯弗里斯、格罗兹内依）合计约9,000人，但这个数字显然是被压低了；芬兰区达到12,000党员；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达到14,000党员；伏尔加河流域达到13,000党员；奥德萨同奥德萨区（赫尔松、塞瓦斯托波尔）约7,000党员。在这个区，护国主义潮流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力量都更加强大，并且同志们常常同护国分子联合在一起。在西伯利亚我们牢牢联系着的只有两三个地点，但是党在那里有党员达到1万；明斯克同明斯克区约有4,000党员；参加大约在一个月前举行的军事组织代表会议的俄罗斯军事组织约有26,000党员。在做总结时我算出约有24万党员。除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外，北部地区同我们的联系较少。在这个地区有1,500党员。在四月代表会议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央书记处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发出移民证147个，会员证明55个，各种内容的公文135件；寄出信件171封，印刷品邮件1,138件，调查表197份（收到的调查回答仅有6、7份），包裹17件，电报53件，由中央担负费用向38个组织（其中有16个军事组织）寄出价值合计2,071卢布30戈比的书籍。中央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从未中断过。近来，同中央进行联系的组织增加了一倍半。这些粗略的数字向同志们表明，中央同地方组织的联系是牢

固的。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已经说明，一系列组织是有联合倾向的。在我们关于联合的决议中充分肯定地指出了，中央认为同那些实际上与护国派断绝关系的一切国际主义者联合是必要的。如果有些同志曾说目前还不能同护国派断绝关系，那么我们毕竟也曾向他们指出甚至在日常工作中也必须站在阶级立场上。我们还从许多地方收到关于在某些场合怎样行动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说，中央没有充分完成对我们党的组织领导工作，那么从我上面已经讲的就应当清楚，中央委员会完成了多么巨大的组织工作。当同志们对斯大林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强调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只是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时候，我真奇怪怎么没有听见关于《真理报》在地方上具有什么意义的指示。中央委员会是通过《真理报》来实现对全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从《真理报》中同志们曾找到对一切理论问题的回答。在处于地下状态的时期，绕弯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当你请同志们回答具体指出的责难，问他们党同中央的联系应当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回答通常总是归结为：中央不管谁……都应当到地方上来并作报告……在中央支配之下可供派出去的工作人员非常之少。著名的工作人员被请到中央了，但是他们宁愿留在一定的地点工作。诚然，从国外回来几十名同志，但是他们之中只有5、6个人归中央支配，中央把他们首先交给彼得格勒委员会支配了。彼得格勒的工作人员较少。在执行委员会只剩下两个人了，因为一部分人病了，一部分人被捕了。可是，这里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坏。中央最积极地参加了彼得堡的工作，但是不应忘记，彼得堡对于我们革命的发展有着最大的意义。我相信，不论把什么样的成员和多少成员选进中央，彼得堡也会是中央注意的中心。那些想让中央和彼得堡分离的同志们是不对的。中央曾把工作人员分别派往各地。上次代表会议，只有北部地区和乌拉尔地区两个地区派出了代表。现在，由于中央的努力，我们又多了一个地区——顿涅茨

区。曾往那里派出几位同志，起先是为了办报，后来是为了召开地区代表会议。中央曾向许多地方派出工作人员，数目不下3、40人，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到了他们自己挑选的各个地方，只有10至12人由中央委员会支配。当然，这个数字非常微不足道，但是工作人员很少。对工作人员的需求很大，并且我们已经尽力而为。最近只剩下6个人工作了，因为总共9个人中有3个人已经不在这里。如果这时候我们还能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广大党员团结在一起，那就会再一次证明中央委员会同地方组织有牢固的联系。我想，不值得让大家回忆我们过去的工作所处的条件了。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7—259页。方钢译）

布哈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

（1917年8月12日〈旧历7月30日〉）

今日的议程是关于国际局势和战争。布哈林同志作报告。他说，战争在目前所以继续进行是由于两个原因：北美合众国和中国的参战，在无产阶级革命怪影日益增大的条件下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政策。

俄国的革命是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中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因素。资产阶级根据它对世界局势的估计执行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俄国的革命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注意。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1905年的革命不同，它不仅规模大，而且是在战争环境中发生

的。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派的中心论据(说战时必须推迟改革),实际上已被俄国的革命无情地粉碎了。从这个观点来看,资产阶级也觉得极端重要的是扑灭俄国革命的策源地。代表盟国资本的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俄国帝国主义的正统政党)强迫临时政府采取了使现今的革命、因而也使国际的革命发生转折的步骤。

这个步骤就是进攻。它破坏了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已经搞好的团结。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积极支持下,资产阶级十分顺利地执行了它的计划:在前线举行进攻,以加强在俄国建立军事保皇独裁的倾向;我国的农民虽然还没有象德国农民一样站在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但由于是一群私有者,未能采取有原则的、反对护国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已用保护土地的办法把农民拉到自己方面来。

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当然是跟我国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并支持他们自己在起初曾经抗议过的那种侵略政策。从这时起,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俄国,暂时已不存在。

但是,一方面由于社会上的积极活动随着战争日益加强,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正在从两个极端准备工人革命。

此外,必须指出各国社会爱国派和平政策的破产,以及对本国政府保持压力的道路。在我们俄国,这条道路已使小资产阶级政党服从了大资产阶级。目前情况的唯一出路就是国际工人革命。

(译自1917年8月8日《工人与士兵报》第14号。徐平译)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 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1917年9月9日)

反革命正向彼得格勒进逼。革命的叛徒、人民的敌人科尔尼洛夫正率领着受他欺骗的部队向彼得格勒前进。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曾经不断散布诽谤工人和士兵的谣言，现在正在欢迎变节者和叛徒，并且准备全心全意地鼓掌欢呼科尔尼洛夫用工人和革命士兵的鲜血洒遍大街，欢呼他利用愚昧无知、受他欺骗的人们之手扼杀无产阶级、农民和士兵的革命。为了使科尔尼洛夫易于枪杀无产者，资产阶级造谣说，在彼得格勒是工人叛乱得胜了。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叛乱不是工人挑起的，而是资产阶级和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将军们挑起的。科尔尼洛夫得胜就是愿望的毁灭，土地的丧失，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将军对士兵的胜利和完全控制。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一开始活动，临时政府就垮台了。一部分民主派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之表示自己信任并把自己全部权力托付予它的那个政府，原来竟不能执行其首要的直接的任务：彻底把将军-资产阶级等反革命镇压下去。寻求同资产阶级的妥协，这就削弱了民主，助长了资产阶级的野心，使它敢于下决心去公开反对革命、反对人民。

拯救人民、拯救革命要靠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本身的革命毅力。我们可以信赖的只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纪律性、自己的组织性。我们相信为拯救整个革命、革命成果和未来政权而坚决斗争的领导。这个未来政权绝对地、忘我地、完全地肩负着实现无

产阶级、士兵和农民群众的要求的重任。只有这个政权才能拯救革命，拯救它摆脱掉反革命的进攻，尽管有一部分动摇的民主派会有些摇摆不定、意志薄弱。

彼得格勒的居民们！我们号召你们向反革命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整个革命的俄罗斯都来保卫彼得格勒！

士兵们！为了革命——向科尔尼洛夫将军冲啊！

工人们！让我们挽起手来齐心协力保护革命城市，打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进攻！

士兵们和工人们！在二月的日子里用鲜血凝结成兄弟同盟的同志们，让科尔尼洛夫们瞧着，不是科尔尼洛夫们镇压下去革命，而是革命粉碎并从地球上扫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野心。

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获得解放的俄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权，让我们象亲弟兄一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大家象一个人一样来迎击人民的公敌、革命的叛徒、自由的刽子手！

你们能够推翻沙皇制度，——请你们证明，你们不能忍受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走卒科尔尼洛夫的统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所属军事组织
工厂委员会中央苏维埃
工人士兵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
中央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派^①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93—95页。方钢
译）

^①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而言。——原编者注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部分代表会议决议

(1917年9月10日)

反革命，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多数派领袖们的妥协政策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成了稳固的组织。它在巩固自己的阵地中一步一步地造成了现在的“科尔尼洛夫进攻”事件。

这种进攻使一切曾经受到反革命政策迷惑的人头脑清醒了，并且“革命在危急中”这个口号成了民主派广大群众的口号。

在充分认清所发生事件的重要性之后，为了加强和整顿革命阵线，也为了使革命队伍作好战斗准备，使其鼓起勇气并增强实力，8月28日举行的代表会议特决定如下：

1. 临时政府加紧对一切反革命要求实行让步、妥协和宽容的图意，是资产阶级实现有组织的深思熟虑的反革命阴谋的背景。

必须建立人民的即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权，并且赋予它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充分全权。

2. 为了使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多数派领袖们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彻底决裂实际表现出来，必须：

(甲) 释放在7月3—5日事件后被捕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士兵、水兵和工人；

(乙) 逮捕军队中的全部反革命指挥员，把这方面的决定权交给士兵组织；

(丙) 无论在管理上和领导上都要实行士兵广泛选举的原则以及指挥员的选举制。

3. 立即将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扩充为战斗队，立即同士兵组织代表一起讨论防卫、镇压反革命进攻以及保护彼得格勒一切革命据点的计划。

4. 武装工人并在教官指导下组织工人近卫队。

5. 抗议在前线上的死刑（科尔尼洛夫将军主张把它也推广到后方），要求立即废除它。代表会议认为，应当用使资产阶级畏惧的、将死刑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也就是说，以变节者和人民的叛徒科尔尼洛夫将军为首的前线上的反革命指挥员的死亡来结束死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代表会议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95—96页。方钢
译）

彼得格勒五金厂职工大会决议

（1917年9月10日）

总数为8,000人的彼得格勒五金厂职工全体大会于本年8月28日讨论了有关当前的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1. 对社会主义者部长表示不信任，要求建立统一的坚决革命的政权，以加强对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是围绕着受到革命的叛徒——自命为“人民自由党”的立宪民主党鼓舞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大本营而组织起来的。

2. 为了顺利地同反革命运动进行斗争，必须由工厂委员会负责武装工人，而由全权的革命民主机关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领导。

3. 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征用曾为叛卖祖国和革命的叛徒服务的报纸印刷厂。

4. 从监狱释放被反革命分子诽谤和监禁的革命民主派的真正代表人物。

决议一致通过。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97页。方钢译)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大会决议

(1917年9月11日)

1. 革命国家的政府只应由革命阶级的代表组成，只有无产阶级和支持它的贫苦农民是这样的阶级。

我们认为今后，在资产阶级及其走卒科尔尼洛夫反对人民的条件下，任何有关联合政权的谈判都是对自由事业的背叛。

2. 应当立即禁止政府中的小资产阶级党派同将军们关于把最高指挥权转交到这些叛徒手里的交易。

3. 应当立即实现革命人民的一切要求，即：给农民分地，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实现公民应有的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和结束卑鄙的大屠杀。

4. 立即逮捕一切阴谋家、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司令部人员——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解散国家杜马并逮捕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5. 立即释放因7月3—5日行动而被捕的一切政治犯，并立即停止对无产阶级领袖们的造谣中伤，这些人们在这些严酷的日子里是应当站在我们行列之前的。

6. 对那些宣布死刑的反革命执行死刑。

7. 为了实现各国人民光荣媾和的建议，立即在所有各个战场上实行停战。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99页。方钢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同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 作斗争致地方党组织的通报^①

（1917年9月13日）

敬爱的同志们！

在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军队严重威胁着彼得格勒的时刻，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各5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各3人、全俄工会委员会2人、彼得格勒工会委员会1人、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1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2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代表1人。我们抱着搜集情报的目的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后来，当委员会为了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从喀琅施塔得市调回3,000名水兵和士兵时，喀琅施塔得市的1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后来，从维堡市卫戍部队调回的1,500人中的1名代表、赫尔辛基执行委员会的1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这3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在芬兰的多数驻军几乎完全听从我们指挥。参加上述委员会以后，我们完全保持着我们政治路线的独立性。

在彼得格勒出现了工人武装。不论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

① 在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文本上登记着：“8月31日，关于当前形势的70份呼吁书。”显然，此通报发至70个党组织。——原编者注

还是在其他场合的一切演说中，我们都坚决要求：首先把我们的同志解放出来，彻底消灭反革命，实现军队民主化，取消任何镇压手段，恢复用革命赢得的自由。我们党从一获得自由起就为之实现而斗争的所有那些要求，后来我们都提出来了。

同时，我们揭露真正的反革命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和军队指挥人员的政策，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策略会导致什么结果，并指出：在与资产阶级完全断绝关系的基础之上，组成政权、并把政权转到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手中是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

你们可以从我们邮寄去的近几期《工人报》上看到对时事、对我们的策略所作的比较详细的阐述。

请你们马上告诉我们，在你们城市里所发生的情况。地址如下：斯莫尔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74—275页。葛纪娥译）

前线部队的情况

（陆军关于1917年10月2—13日的军事情报）〔节录〕

北方前线——军队的局面迄今没有变化，并且可以作这样的描述：在军官和比较高级的指挥人员中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在士兵中却不断滋长了一种信念，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受到

惩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影响迅速扩大。此外，还加上了普遍的厌战情绪，愤怒的心情和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和平的愿望。

一部分军官想去纠正军队生活的任何企图都被士兵看做是反革命……并把它打上了“科尔尼洛夫”活动的烙印。士兵们似乎都深信，逮捕科尔尼洛夫使得他所发布的所有恢复纪律的命令都归于无效。军队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力左右暴徒，并且经常被迫跟着他们走，以免完全丧失掉群众的信任……

后方士兵们把所通过的各种各样的和平决议都视为具有法律的力量……德国人非常积极地利用报纸、传单，提倡和睦友爱……相当多的士兵……假装生病，离开前线躲进医院里去……

第十二军——……各种政党的报刊已经不再有能力影响士兵群众了。人们不断地听到临时政府的命令遭到严厉的批评。第95军团委员会……宣布克伦斯基是叛徒。

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没有哪一个（政治）运动会取得普遍的信誉。那些阅读温和派的报纸的人都被当做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和“反革命”。人们在紧张地策动着一种运动，以利于在所有前线迅速停止军事活动。不论在什么时候，整个联队或者大队拒绝执行军事命令，这一行动就会马上由专业的鼓动家传遍军队的其他部分……

西部前线——……由于普遍厌战，食品粗劣以及不信任军官等等，失败主义者强烈的骚动已经在士兵中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威胁指挥人员，以及渴望和德国人友好等情况。号召立即实现和平的呼声传遍了各地，因为他们说没有人愿意在冬季还呆在战壕里……士兵当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实现和平的正确途径就是和敌人友爱提携……

战士们态度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在军队的报纸上……经常辩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间派的报纸……企图警告他们的读者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各党派的中央

联合政权并不完全倾心于给俄国无产阶级伸出友谊之手。

直接反对上述报纸的见解是《消息报》（属于明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青年报》。它们公开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把政治和军事的权力移交给无产阶级，马上实行土地社会化，并且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作无情的斗争。它们提出的争论的方法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既简单又明白易懂的。它的梗概是：临时政府所有的部长都对资产阶级极尽卑躬屈节之能事，他们是一群反革命；他们继续挑动战争，向协约国和俄国资本家讨好卖乖；他们的政府为着想消灭掉士兵、工人和农民而不惜采用死刑……

在西部前线的后方生活中，最足以说明发展趋势的许多现象之一莫过于最近在戈麦尔新兵补充站的几次骚动了。10月1日，8,000多就要被送往前线的士兵要求把他们送回家去。……由于受到煽动者的鼓励，他们捣毁了军需库，拿走了冬季装备大约1,500套衣服，殴打了部长助理和一个前线委员会的委员。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斯摩棱斯克……

西南前线——……失败主义者的骚动有增无已，军队的瓦解也愈来愈迅速。后方的分崩离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的消失，以及装备与供应的竭蹶，都促使了布尔什维克的浪潮不断稳步地掀起。和平成为通常谈话中压制一切的主题，不管它在何种条件之下或者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论来自何方的命令都遭到敌视。暗淡忧郁的士兵群众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并在无数党派的标语口号和纲领中不知所措，这就导致了他们对所有的人和事都失去了信任。甚至他们以前的领导者……——委员们——也失去了他们的信心……人民委员说，士兵们对于什么是公理、正义和做人的价值的一切起码的观念都丧失殆尽了。指挥人员所处的地位非常困难。军官自杀的不乏其人……

第二军的骑兵警卫团通过了一项对他们大多数的军官表示不信任的决议。士兵们都投入了有组织的武装侵犯近郊的庄园和劫

掠粮食的行动……而粮食在军队里是短缺的。没有一种东西能够用来扭转这种不安……因为任何加强秩序的愿望都缺乏可资倚靠的力量。法庭的活动瘫痪了，这是士兵们的敌对态度所造成的。

……

从人民委员的报告中可以作出下列总的结论：即将来临的冬季战役加速了军队的解体，同时也加强了对和平的追求。只要能够供给士兵以粮食、鞋子和冬衣，则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都是必要的；同时有必要看到军队成员的减少；还有必要改进后备联队的军风纪。不然的话，这个队伍就会充满着重大的因素，以至于导致军队的道德完全败坏，并走上毁灭的道路……

（报告的其余部分涉及到罗马尼亚和高加索前线，它描绘了同样的情况。）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4—26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后方部队的情况

（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官方报告）〔节录〕

赫尔辛基，9月14日。昨晚……“彼得罗帕夫罗夫斯克”号战斗舰上的4个军官被水兵枪杀了……军官们拒绝宣誓效忠于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军事处收到了关于在维堡发生的一些情况的消息，……一群士兵暴徒把3个将军和1个上校从禁闭室里劫走，并把他们从桥上扔进水里去。这4个人是由于所谓参与了科尔尼洛夫事件而被……第42军团军事委员会拘留在那里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还有一些别的联队的指挥官和军官也遭到了袭击，被扔到水里去。那些企图拯救他们自己的人也被

杀害了。总之，大约有15个军官死了，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死亡的确数。

依利沙维格勒，9月21日……一群士官生和士兵发生了流血冲突……1个士官生，1个士兵和3名身份不明的人死亡；21人受伤……士官生被逮捕了。在监狱里，士兵想对这些士官生施加私刑，其中有一个自杀了……

斯塔夫卡^①，10月11日斯塔夫卡当局收到了关于周围情况的官方消息，根据这些消息，邓尼金、爱尔斯勒、马尔可夫3个将军和另外一些人被从别尔季吉切夫转移列布科夫去。一群士兵歹徒包围了将军所在的大楼，并要求囚犯必须徒步走到火车站去。为着避免事情复杂化，士兵的要求得到满足。但为着囚犯的安全起见，西南前线总司令莫洛钦柯将军一直走在囚犯旁边把他们送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士兵们要求将军要坐囚犯的车厢，而不得乘二等车。只是由于没有囚车可以调度，这才不得不改用货车……

埃迪夫·亚梅，10月5日。10月3日一群士兵……在杜布诺城捣毁了法院，因为这个法院的陪审团判处了最近煽动暴乱的其中一个人。陪审团和法院的人员也受到了暴力的袭击……

伊尔库次克，10月5日。（鉴于最近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动乱，于是就在士兵和地方警备队中实行大逮捕）昨天早上……神枪手联队被煽动他们的人带到军械库去把步枪搬走了，他们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军队指挥官克拉柯维斯基中尉遭到逮捕……一个仍然忠于革命的分队成功地营救了他……叛乱分子被解除了武装，并逮捕起来……

斯塔夫卡，10月11日。这里收到了官方的报告：里铁契夫斯基县发生了几起骚乱。在马柯夫策村，一个酒坊受到袭击，然后

^① 在莫吉廖夫省的全军总司令大本营。——原编者注

又被放了一把火……在布勒伊诺夫卡，士兵抢劫了一处庄园，拥进一个酒窖里去。他们喝醉酒后就滋扰生事，枪杀被派到酒窖里站岗的同伴。在巴里镇，不少酒窖都被士兵冲了进去……（在卡拉基夫策，情况也是这样）在波多尔斯克省的里铁契夫斯基、莫吉列夫斯基和乌切特斯基县，士兵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从大庄园里掠夺面包、粮秣、马匹和公牛……对于体力劳动者的财产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

萨拉托夫，10月13日……在巴拉绍夫，地方警备队发生叛变，占领了邮局。在里亚森—乌拉尔斯克铁路沿线旅行的士兵使用强力夺取了面粉和其他的供应品。

费奥多西亚（克里米亚），10月26日。鉴于士兵的越轨行为，费奥多西亚宣布了戒严令……

……20,000桶饮料和300桶酒被（当局）毁坏了……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6—27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农村骚乱

（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官方报告）〔节录〕

基什尼奥夫，9月26日：地方的报告证实了在所有的县里农村骚乱正在日益增长着。人们表示担心，播种工作将不可能及时地或适当地完成。

坦波夫，9月27日。关于科兹罗夫县骚乱的确切消息迄今尚未收到。但已经明确地知道有一处庄园被劫掠，25处被焚毁。此外，许多分散住在各自的农庄里的农民都在受苦受难。

坦波夫，9月27日。莫斯科派出一个远征的分队来镇压暴

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们也来了。根据他们的消息，科兹罗夫县的骚乱仍在继续中。在他们离开科兹罗夫的那个时刻，骚乱又在离科兹罗夫40俄里的一个新的地方爆发。雅罗斯拉夫斯克村在燃烧着。

坦波夫，9月29日。在基尔沙诺夫县索非斯卡亚乡，农村的骚乱也开始了。

塔甘罗格，10月2日。在塔甘罗格县的一些乡里已经发生了农村骚乱。县政府的代表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都到县里去。

萨拉托夫，10月8日。在塞多贝斯基县；塞卡索夫男爵夫人和亚查勒维奇的庄园被农民捣毁了。塞多贝斯基的驻军指挥官奉命调动一个分队到县里去恢复秩序。

萨拉托夫，10月10日。塞多贝斯基县的农村骚乱包括一大片的地区。农民偷窃了牲畜，私分了土地和森林，并运走了谷物。县里的官员请求派军队支援。人们担心政府所贮藏的大批饮料会被劫走。县常务委员会建议把所有私人的土地都转移给土地委员会。骚乱已经蔓延到亚特卡斯基县那里去了。

基辛涅夫，10月10日。受到宣传影响的贝里迪斯基县梅格拉村的农民开始在他们之间瓜分波切尔和斯洛博达的毗邻庄园的土地和草原。

奥德萨，10月12日。已经收到了关于阿库曼和奥格尔耶夫局势严重的信息，同时也收到了在别列佐夫卡愚昧分子有增无已的骚乱的消息。在索罗柯夫斯基县，农村骚乱仍在继续中。

日托米尔，10月12日。省人民委员收到了一批关于在省里各地发生骚乱的告急电。森林和庄稼继续遭到破坏。部队已经派去镇压那些骚乱者。

莫洛涅兹赫，10月20日。在札顿斯基县，在杰莫丁斯基村的地区，塞特柯夫和其他地主的庄园有一部分被农民破坏了。6万多俄担小麦和其他的谷物遭到焚毁。贵重的古老的家俱也被破坏

殆尽……

日托米尔，10月23日。人民委员助理去莫尔亥尼亚作一次旅行回来之后写了一份关于那里的形势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莫尔亥尼亚已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在很多县里，森林普遍都遭到毁坏，私人的土地也被夺走。在斯塔罗—康士坦丁诺夫斯基县，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了政权。

尼古拉耶夫斯克（萨马拉省），10月24日。常务委员会由于忧心这个县的无数骚乱会破坏有价值的财产，于是就宣布把私有的产业归公，并立即开始没收……

切尼尔戈夫，10月26日。骚乱在省里继续发生。在索斯涅斯克和苏拉杰斯克县，森林和庄稼正在遭到破坏。

奔萨，10月26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县，8个庄园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派出骑兵前往制止骚乱。在克拉斯诺斯洛波斯基县利比得叶夫夫人的庄园，和在印沙斯基县安东诺夫的庄园都被洗劫了。

斯帕斯克，10月27日。毁灭性的风浪横扫了整个县。砍伐树木和盗窃树木不断地发生。楚尼德的庄园被抢劫后又放了一把火。格拉比伯爵的庄园也遭到了破坏，其中包括他的珍贵的图书馆。

下诺夫戈罗德，11月1日。根据最近的报导，暴乱遍布6个县，在那里很多庄园遭到劫掠和焚毁。最大的骚乱发生在鲁奇安诺夫斯基县，根据人民委员的报告，在那里一切贵重的东西都被无情地捣毁了……。①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31—33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① 临时政府对于农民从1917年3—9月触犯法律行为的次数，作了正式统计。它们以此来估量农民的不安情绪，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据报告，他们革命行动的次数分布如下：3月17次；4月204次；5月259次；

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关于政权的决议

(1917年9月13日)

面对科尔尼洛夫将军策划的、并由参加临时政府各党派（其首领为立宪民主党）支持的反革命叛乱，彼得格勒苏维埃认为有义务宣布，从今以后在组织政权问题上应该坚决停止一切动摇。不仅应该把公开插手叛乱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和一般凭资格的分子的代表排除在外，而且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一切妥协性的和不负责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最有可能把国家政权的上层领导和机关变为反对革命的阴谋基地和工具。

今后，不管是对临时政府的特别权力，或是对它的不负责任态度都不能再容忍了。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由革命无产者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活动基础如下：

1. 宣布民主共和国；
2. 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在立宪会议决议之前，未经农民委员会通知不得出卖和转让土地，保证贫农得到农具；
3. 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对主要工业部门，如石油、煤炭、冶金实行国有化，对大资本和财产征收重税，没收战争期间捞取的利润，以挽救国家经济免于崩溃；
4. 宣布秘密条约无效，向各交战国人民建议尽快签订普遍

6月577次；7月1,122次；8月691次；9月629次。这些触犯法律的行为包括纵火事件，夺取士绅的土地、粮食和农业机器，砍伐木材等。请参看克·格·柯特勒尼科夫和维·勒·梅勒编：《1917年的农民运动》，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原编者注

民主和约。

作为紧急措施应立即宣布：

1. 停止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一切迫害，立即废除前线上
的死刑，并在军队中恢复宣传和建立一切民主组织的完全自由。

在军队领导中清除反革命分子。

2. 在地方组织中实行政委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制。

3. 对居住在俄国的各民族实行事实上的自治权，首先满足
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

4. 解散国家委员会和国家杜马。

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5. 消除一切等级(贵族及其他等级)的特权，公民完全平等。

(译自《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
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57年俄文
版，第85—86页。刘宇端译)

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费姆县比谢尔特厂 工人群众大会关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 和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

(1917年9月14日)

我们，克拉斯诺乌费姆县比谢尔特厂工人和厂教学示范车间
工人于1917年9月1日罢工期间举行了约300人的群众集会，听取了
乌拉尔地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并对日
益迫近的反革命讨论之后，做出决定：反对日益迫近的反革命。

打倒关闭工厂的资本家！

废除苦役法和死刑！

打倒反革命巢穴——莫斯科会议！

要求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工人和劳动农民的政权万岁！

各国劳动人民签订的和约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要求重新审查家庭日用品的固定价格！

此外，会议决定：比谢尔特厂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厂俄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图书馆阅览室于9月1日罢工日开放。

（译自《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87页。刘宇端译）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

（1917年9月18日）^①

1. 科尔尼洛夫反对革命和人民，无疑暴露了支持这种阴谋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公开夺取政权的野心。

2. 妥协和不负责任的政策，使最高统帅部和国家政权机关变成了反革命阴谋的工具。

3. 在妥协和退让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在消除暴动过程中暴露出来了它不仅非常张惶失措，而且不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却走上与之妥协的道路。比较坚决反对阴谋活动的唯一力量是革命民主派。但因它采取了反对阴谋活动的坚决措施，它同临时政府发生了冲突。

4.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不坚决和妥协的态度，又导致以克

^① 系保存日期。

伦斯基为首的不负责任内阁的建立。^①虽然反对阴谋活动的斗争动摇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但是整个国家机器迄今还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里。镇压和非常法的制度仍然不受任何限制。不仅没有从监狱里释放备受折磨的革命者，没有废除关于封闭工人出版机关的命令，而且临时政府又封闭了彼得格勒的社会民主党报纸《新生活报》和《工人报》。

对于这种政策的唯一回答，只能是为获得无产阶级与革命农民的代表组成的政权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9月12日计划在彼得格勒召开的会议^②，或者其他任何的民主会议和代表大会，而首先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革命民主派都应当用来夺取政权，这个政权的活动基础应当如下：

1. 建立民主共和国；

2. 立即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不付赎金，并且在立宪会议决定供给贫苦农民农具之前，土地一直归农民委员会管理；

3. 由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全国规模的监督。对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工业、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实行国有化；对于大资本和巨额财产毫不留情地征税，并没收战争利润以便挽救国家免于经济崩溃，对生活必需品实行固定价格；

4. 宣布秘密条约无效，并立即向所有各交战国的人民提议实行普遍的民主和平。

^① 指1917年6月24日成立的政府而言，政府的领导，实际上是立宪民主党人。——原编者注

^② 会议于1917年9月14日召开，9月22日结束。这是所谓的民主会议。会议成员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领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赞成联合政府。民主会议曾号召成立一个常设咨询机关来“监督”政权。而对在会议上成立的民主委员会的“监督者”的职能，临时政府不予承认。临时政府利用了会议主席团的让步，使它同意了联合和成立共和国临时国会（预备国会）。——原编者注

作为紧急措施应当颁布以下命令：

1. 立即武装工人并组织赤卫队。
2. 严禁一切旨在反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镇压。立即废除前线上的死刑，恢复一切民主组织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完全自由。从军队中清除反革命的指挥人员。
3. 由地方组织选举委员和其他公职人员。
4. 真正实现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民族的自决权，而首先要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
5. 解散国会和国家杜马。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6. 废除一切等级的（贵族的及其他的）特权，公民权利完全平等。

只有与妥协政策一刀两断并且广大人民群众去为夺取政权而坚决斗争，上述纲领才能实现。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02—103页。方钢译）

托木斯克警备部队士兵代表苏维埃要求 立即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电报

（1917年9月21日）

政权应该交给苏维埃，应立即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本苏维埃反对根据策烈铁里的建议以各个社会组织的代表大会取代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企图。

（译自《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100页。刘宇端译）

彼尔姆省下乌发列伊厂工人群众大会决议

要求签订和约，把政权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
对生产实行监督，没收土地及其他^①

(1917年9月22日)

直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在下乌发列伊工厂一直起着首要的作用。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现已经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转变。譬如9月9日群众大会一致通过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提出的如下内容的决议：

我们，下乌发列伊工厂工人和公民于1917年9月9日举行了约有500人参加的集会，在讨论了当前的问题后决定：

1. 用我们现有的一切办法把政权拿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手中。

2. 立即实现革命人民的一切要求：

(一) 立宪会议前把土地交还人民。

(二) 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三) 对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煤炭、冶金)实行国有化。

(四) 对大资本和财产征收重税。

(五) 没收战争中捞取的利润，以挽救国家经济免于崩溃。

3. 立即释放7月3—5日被逮捕的所有政治犯，并且停止对无产阶级领袖们的迫害，在这危难的日子里，他们应站在我们队

^① 摘引自《工人之路报》关于彼尔姆省下乌发列伊工厂工人集会的报导。——原编者注

伍的前列。

4. 坚持对反革命分子科尔尼洛夫之流和立宪民主党中央采取对社会民主党前线士兵和革命者同样的措施。

5. 立即解散妇女敢死队并解除她们的武器并武装工人。

6. 要求公布秘密条约并宣布它们无效，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签订普遍民主和约。

最近数日内有一大批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组织，不仅是新加人，而且是由社会革命党转入社会民主党（布）的。最近4天内由社会革命党转入49人，其中有新成立的乡自治会的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革命党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和书记。

（译自《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100—101页。刘宇端译）

莫斯科纺织工人和工厂委员会代表 共同举行的代表会议关于要求 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

（1917年10月22日）

由于资产阶级和临时政府的过失，以及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妥协政策，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灭亡的边缘。只有从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间产生的政权，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摆脱这种非常恶劣的处境。因此，代表会议向莫斯科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20万有组织的纺织工人随时准备在苏维埃一号召就立刻出发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代表会议还号召苏维埃在反

对工业家怠工和临时政府叛卖活动时要采取坚决行动。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75页。方钢译)

爱沙尼亚边疆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1917年10月25—27日)

关于政权

爱沙尼亚边疆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同国家整个状况有关的政权问题之后，认为，国家和革命处在危险中。这是因为：

1. 9月间成立的反民主的科尔尼洛夫联合政府，是一个出卖革命、破坏立宪会议、要把帝国主义战争拖延到革命完全垮台、国家彻底破坏的政府。

2. 由脱离了革命群众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制造出来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即“预备国会”，是对人民代表制的丑恶歪曲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支柱，是对临时政府叛卖政策的掩饰；代表大会宣布：

①无论临时政府，也无论它掩护的那个“预备国会”，都既不能赢得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信任，也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②只有把全部政权转到革命的民主派即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手里，才能建立得以挽救国家和革命的、真正革命和人

民的政府。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75页。方钢译)

北部地区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 代表大会关于通知召开全俄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1917年10月26日)

**致1—12军团，特种军团，北方战线各军中央委员会，
西方战线执行委员会，罗马尼亚战线、黑海舰队和奥
德萨地区中央执行委员会
致所有各个团的、师的委员会。致士兵工人和农民代表
苏维埃。致全体水兵、工人和农民们**

定于11月2日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使所有各条战线立刻停火。把土地交给农民并保证在既定期限内召开立宪会议。整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对它俯首听命的妥协派都在想方设法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它们恐吓人们，说什么代表大会要破坏立宪会议。这纯粹是诽谤！有彼得格勒、莫斯科、芬兰、波罗的海舰队、喀琅施塔得、雷维尔及其他各地苏维埃最强大组织参加的北部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申明：拖延战争和攻击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分子正在破坏立宪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保证召开立宪会议并立即提出和平。对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破坏者则正在损害军队和革命。表示反对代表大会的个别组织，违反全俄代表大会的决议，超出自己的权限并且应当立即进行改造。

士兵们，水兵们，农民们，工人们，你们的责任是通过团的、师的和军的委员会扫除一切障碍，保证你们在11月2日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权。我们建议你们把本通知立即传达到同你们有联系的一切组织。

北部地区士兵、工人和农民
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76页。方钢译)

弗拉基米尔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局势的决议

(1917年10月29日)

听过关于当前局势的报告之后，弗拉基米尔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

1. 宣布临时政府、一切政党以及临时政府的支持者，是用政府和政党来背叛革命和出卖人民的。

2. 认为弗拉基米尔省所有各个苏维埃及其省的核心（省执行委员会）都处于同临时政府公开和无情斗争的状态。

根据这一点：

3. 规定无论是对待临时政府本身的指示，也无论是对待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的指示，都有行动的充分自由，并要立即着手用自己的权力调整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的生活，同时要严格符合各个地区劳动群众的利益。

4. 号召农民代表苏维埃同背叛人民的政府积极进行革命

斗争，以帮助工人和士兵挽救国家和革命。

最后，弗拉基米尔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同志们致以热烈的敬礼，并保证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和士兵在为革命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决不忘记他们。

打倒临时政府！

革命万岁！

全世界劳动人民之间的和平万岁！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77—378页。方钢译）

（三）夺取政权

附录 论发动〔节录〕

（1917年10月24日〈旧历10月11日〉）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在工人阶层内部正在发展和滋长着一种只看得见马上宣布武装起义的成果的思想。目前各种条件互相影响，如果我们说要进行这一起义，那就必须在今后几天之内制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一切报纸和工人集会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讨论着这个问题，党的优秀工作者们正在想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和权利对此问题十分坦率地表示我们的看法。

我们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单是拿我们党的命运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

掷。

毫无疑问，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即被压迫阶级必须认识到，宁可前进去打败对手，也比不打一仗而投降要好些。俄国工人阶级目前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呢？

不是的，一千个不是！！！！

由于我们党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影响愈来愈大，资产阶级要想阻挠立宪会议已经愈来愈不可能。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脑袋；资产阶级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如果它企图阻挠立宪会议，它将又一次把小资产阶级政党推向一边，这时子弹就将出膛。

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的党处于优势。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衰退等等的说法，我们认为那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出自于我们的政治反对者的嘴里的这种断言仅是一种政治游戏的行为，目的在于使布尔什维克在有利于我们的敌人的条件下举行起义。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增长，各阶层人民都被这种影响所吸引。只要策略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席位。那时在立宪会议中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不可能同它现在的态度一样。首先，他们将抛弃自己提出的“为了土地，为了自由，等待立宪会议”的口号。愈来愈严重的贫困、饥饿和农民运动将对他们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寻求同无产阶级联盟，反对由士官生政党所代表的地主和资本家。

立宪会议本身自然不能消除现有的这些内部关系的假象。苏维埃已经站稳了脚跟，不可能被消灭。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只能从苏维埃那里得到帮助。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联合型的国家体制。我们的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才获得了取得真正胜利的极大可能性。

我们从未说过俄国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把这场革命引向胜利。我们没有忘记，现在更不能忘记，在我们同资产阶

级之间存在着庞大的第三阵营：小资产阶级。这个阵营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时和我们在一起，使我们取得了胜利。以后它会更多次地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绝不能迷恋于目前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个阵营离资产阶级比离无产阶级近得多。但目前的情况不是永恒的，甚至也不是持久的。只要我们一不小心，采取了有些仓促的行动，致使整个革命命运系于即将爆发的起义，无产阶级政党就将会把小资产阶级长时期地推向米留可夫^①的怀抱。

有人对我们说：1.俄国多数的人民已经同我们在一起，2.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已经同我们在一起。天啊！这种说法那种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这是全部情况的症结所在。

俄国的大多数工人和相当多的士兵都同我们在一起。可是，其他人的态度是暧昧的。譬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那么，大多数农民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偶然的吗？士兵群众不是因为战争的口号支持我们，而是因为和平的口号才支持我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要是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因为现在夺得了政权，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整个世界局势），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将立刻离开我们。

工人政党在夺得政权后，无疑地打击了威廉。对他来说，要继续进行一场反对革命俄国的战争，提出立即实现民主的和平，是更困难了。情况的确如此。可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在里加和其他地方陷落以后这一打击，足以把德国帝国主义赶出俄国吗？……那么，那里有材料能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小资产阶级民主还在顶牛时，必须对于这种局势以及对它本身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

^① 米留可夫在1917年3—4月间是立宪民主党领袖和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原编者注

果负责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论断——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确实已和我们一起。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德国海军的暴动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意大利出现了将要发生重大变动的预兆。但是这离积极支持宣布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开战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很大的距离。过高估计力量是十分有害的。毫无疑问，我们得到了很多，对我们的要求也将更多。但是，如果我们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仍遭到失败，我们将给发展极慢的但仍在发展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无情的打击。此外，欧洲革命的发展将要求我们毫不犹豫地立即把权力夺到自己的手中。这是俄国无产阶级起义胜利的唯一保证。胜利一定会到来，但现在还没有到来……。

面对历史，面对国际无产阶级，面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我们没有权利把整个前途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来作赌注。那种认为如果武装起义不能取胜，也只不过会导致象7月16—18日那样结果的看法是错误的。问题并不那样简单，这是一场决战，这场战斗的失败将意味着革命的失败。……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13—117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由来

（托洛茨基的记事）^①

我开始回忆起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的一次会议……在那里我

^① 《回忆十月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第10页及其后诸页。——原编者注

们得悉彼得格勒军区参谋部已经下令把彼得格勒驻军的三分之一调到前线去……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明白这种做法的思想背景是想把布尔什维克和比较革命的部队从首都调离开去。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发动一次已经预定好了的暴动。我们说我们应该同意这个命令，假使这样做表明了它在军事上有此必要的话。我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先断定一下这样做是不是科尔尼洛夫活动。因此，我们决定请某种机构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有个名叫拉京米尔的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支持我们，我们也就利用了他。这样一来，要求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显然是来自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来自我们……究竟他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是一个阴谋，或者只是单纯地表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模模糊糊的革命心情，这点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同意了，而其余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却是怀疑的……当他提出他的建议的时候，我们把它修饰了一下，尽可能掩盖住计划中的革命起义的性质。第二天晚上，这个计划被提交给彼得堡苏维埃，通过了……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68页。黄宗汉译，高
放校)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1917年11月5日(旧历10月23日))

兹通知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全体公民如下：

为了保卫革命及其成果不被反革命篡夺，在各个部队和首都及其四郊的特别重要地点，我们指派了一些委员。今后凡涉及这些地点的命令和指示，须经我们委派到那里的委员批准才能执

行。这些委员作为苏维埃的代表不得侵犯。反对委员就是反对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已采取一切措施维护革命秩序，以免遭到反革命的蹂躏和破坏。请全体公民大力支持我们的委员。在发生混乱现象时，他们必须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邻近的部队报告。

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所属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16页。方钢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彼得格勒委员会决议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

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一切革命力量的必要任务是无论在中央或地方立即推翻政府并把政权转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为了执行这项任务，彼得格勒委员会认为必须使一切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转入进攻，丝毫不能迟缓，不能等待，而反革命的猖狂活动无法减少我们得到胜利的希望。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23页。方钢译）

维堡区的赤卫军司令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和工人士兵 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

维堡区赤卫军司令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区委员会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知所有各个工厂委员会、全体工人和赤卫军部队：所有各个工厂已经立即进入全面战斗准备。全体工人要在工厂里等候苏维埃、司令部和区委员会的指示。该决定全体人员必须遵守。

维堡区赤卫军司令部

维堡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维堡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18页。方钢译）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①

士兵们！工人们！公民们！

人民的敌人昨天夜里已经转入进攻。司令部里的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从四郊调来士官生和突击队。奥拉年堡的士官生和皇村

① 系保存日期。——原编者注

的突击队队员拒绝出动。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叛卖性攻击正在策划之中。《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已被取缔，印刷厂已被查封。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针对即将开幕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针对立宪会议、针对人民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正在保卫革命。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在指挥，以击退阴谋分子的进攻。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和整个无产阶级准备给人民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1. 一切团、连和队的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的委员，一切革命组织都必须不断举行会议，把有关阴谋分子的计划和行动的一切情报集中在自己手里。

2. 任何士兵不经本部队委员会的许可不得擅自离队。

3. 每个部队必须立即派 2 名代表，每个区苏维埃必须立即派 5 名代表到斯莫尔尼学院。

4. 应将阴谋分子的一切行动立即通知斯莫尔尼学院。

5. 请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成员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立即赴斯莫尔尼学院出席紧急会议。

反革命势力已经抬起它的罪恶的头。

士兵、工人和农民的全部成果和希望受到了巨大威胁。但是，革命力量无可比拟地超过了敌人的力量。

人民的事业掌握在坚强有力的手中。阴谋分子必将被粉碎。

不要有任何犹豫和动摇。要坚决、镇定、沉着、果断。革命万岁！

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23—124页。方钢
译)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书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

反革命阴谋分子昨天夜间已经转入进攻。对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叛卖性攻击正在策划之中。《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已被取缔，印刷厂已被查封。反革命阴谋分子的活动是针对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立宪会议、针对人民的。

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正在保卫革命。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在指挥，以击退阴谋分子的进攻。彼得格勒的全部卫戍部队和整个无产阶级准备给人民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阴谋分子正在从四郊召唤士官生和突击队员。奥拉年堡学校的士官生和皇村的突击队员拒绝出动。同时阴谋分子企图把一些团队调到彼得格勒去反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1. 扼守通往彼得格勒之要冲的全体卫戍部队，一律进入全面战斗准备。

2. 火车站要加强放哨。

3. 事先未以忠于革命而闻名的任何战斗部队不得进入彼得格勒。向梯队派去几十名鼓动员向开赴彼得格勒的部队讲清有人想要把他们变成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工具。未受到影响的梯队，要用力防止受到影响。行动要坚决而慎重，而在需要行动的地方，则毫不留情。关于军队的一切调动须立即通知革命军事委员会。

4. 地方苏维埃和团队委员会要派代表去斯莫尔尼，以便进行联系。它们本身则应不断召开会议。

革命在危险中，但是革命力量无可比拟地超过了敌人的力

量。

胜利是有保证的。

人民万岁！

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24—125页。方钢
译)

给彼得格勒驻军的命令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危险中。晚上，反革命的阴谋家企图把士官生引来，从四郊袭击部队。《士兵报》和《工人之路报》都被封闭了。

兹命令你们，所有的联队都要处于戒备状态，并听候进一步的命令。对于执行本命令的任何贻误或失职都将被视为对革命的反叛。

主席 波莫伊斯基

秘书 安东诺夫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86页。黄宗汉译，高
放校)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

(1917年11月6日〈旧历10月24日〉)

两种革命报纸《士兵报》和《工人之路报》被参谋本部的阴

谋家关闭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容忍绞杀言论自由。人们从事击退黑暗势力的进攻必须有忠实的报纸作为保证。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1.重开被关闭的报纸的印刷所；2.敦促编辑部和印刷人员继续他们的工作；3.保卫革命的印刷所，以反对反革命的企图的这一光荣任务将由左翼联队的英勇士兵和第六工兵营担当起来。

波莫伊斯基（主席）

安东诺夫（秘书）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86页。黄宗汉译，高
放校）

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武装 起义和推翻临时政府经过的通告

（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

一切车站、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都已经占领。冬宫和大本营的电话线已经切断。国家银行已经拿到手里。冬宫、大本营和邻近的各点已经包围起来。突击大队已经驱散。士官生失掉活动能力。装甲汽车转到了革命委员会一边。哥萨克拒绝服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手里。

在彼得格勒，政权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手里。一致举行起义的士兵和工人没有流血就取得了胜利。克伦斯基政府倒台了。委员会号召前线 and 后方的人们不要受人挑拨离间，而要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的新政权。新政权立即就要

提出正义的和平，把土地交给农民，召集立宪会议。各地的政权都已转到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手里。

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385页。方钢译)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 代表大会关于行使政权的声明

(1917年11月8日)

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们：

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开幕了。大会代表了大多数的苏维埃，其中还包括了若干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作为妥协产物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特权随即终止。

由于受到占压倒多数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并立足于工人和彼得格勒驻军的胜利起义，大会兹决定将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临时政府已被解散，其中大多数成员已被逮捕。

苏维埃权力机关将立即提出建议：对所有国家实现民主的和平，并立即在所有前线实行停战。它保护地主的、皇室的和寺院的全部土地，将它无偿地转移给农民委员会；它将保卫士兵的权利，引导军队实现完全民主化；它将创立工人监督工业生产制度；它将保证在规定日期召开立宪会议；它将面包供给城市，以首要必需品供给农村；它将保证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

大会决定将地方权力转移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由它们负责加强革命秩序的任务。

大会号召在战壕里的士兵要保持警惕与坚定。苏维埃大会深信革命的军队一定会知道如何捍卫革命，以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直到新政府把正在直接向各国提出的民主的和平条约缔结为止。

新政府将借助于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要他们纳税的坚定的政策，采取一切办法把所有的必需品供给革命的军队。对于士兵的家庭也要加以照顾，以改善家属们的处境。

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卡列金和其他人——正在竭力带领部队反对彼得格勒。有几个联队受到克伦斯基的蒙蔽，已经参加了暴动。

士兵们！击退克伦斯基，他是一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坚守岗位！

铁路员工们！不要把克伦斯基派去攻打彼得格勒的部队运出去！

士兵们，工人们，雇员们！革命的命运，民主和平的命运在你们的手中！

革命万岁！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

农民苏维埃特派代表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21—122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国际 社会党委员会呼吁支持新 苏维埃政府的联合声明

（1917年11月8日）

致世界无产者！

男女工人们！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们于11月7日战胜了资本家和容克政府。政权掌握在工兵苏维埃手中。在你们读到这份呼吁书时，一切劳工运动的中心都将发生类似的事件。波罗的海舰队、驻芬兰的军队以及前方和后方的绝大部分士兵们无疑会忠实于工人士兵政府的旗帜。

政府已被推翻；这个政府是人民在沙皇制度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践踏人民的利益提高面包的价格以帮助容克们掠夺战争投机者还未动用的东西，它给予人民的是军事管制而不是自由，这个政府作为协约资本的人质，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士兵们驱向战争，甚至从来不试图开始和平谈判。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和士兵们就象他们赶走沙皇那样已逐走了这个政府。他们的第一个字就是和平。他们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这一和平谈判将导致没有吞并和没有赔款的在各民族自决权基础上的真正的和平。

男女工人们！红色彼得格勒在向你们呼喊！第四次冬季战役的幽灵正在看着你们的眼睛，它把它那冰凉的手伸向你们的儿子、父亲和兄弟。现在你们必须讲话。虽然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士兵都是英雄好汉，但他们不能单独赢得面包、自由或和平。资本

家、容克以及俄国的将军们——所有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力量——都将竭尽全力窒息工农革命生命。他们将力图切断城镇的粮食供应，挑唆哥萨克起来反对革命。如果他们镇压革命得逞，他们将继续进行战争。可是，不仅是他们在用死亡威胁俄国革命，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政府都是它的敌人，因为它是它开创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的事业。同盟国可以乘俄国内战之机以新的胜利重新振作其人民已消失的战斗意志，而协约国将以金钱支援俄国的反革命。

各国的无产者，你们的根本利益和你们的生命正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俄国革命被外国资本家的联合力量所击败，那么，资本家将要把你们从一个战场拉向另一个战场，直到你们流尽鲜血。参加俄国革命吧！

我们并不是要求你们同情，而是要求你们起来斗争。起来吧，走上街头，离开工厂，用各种手段和力量施加你们的影响。不要第四次冬季战役，不再打另一枪。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不要相信和平主义的词句。判断每个政府是要看它是否接受全线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看它是否愿意立即举行和谈和实现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没有吞并和赔款的和平。在各个地方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作为你们和平斗争的机构吧！

我们邀请那些愿意领导这场斗争的各党代表到斯德哥尔摩来。坚决要求给代表们发下护照；要求释放享有国际无产阶级威信的被监禁的同志，以便使他們能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

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万岁！

不再打另一枪！

走向和平谈判！

争取没有吞并和赔款的和平！由人民自由的意志来缔结和平！

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国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美国1960年英文版，第691—692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四) 巩固苏维埃政权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关于 士官生的暴动的发言〔节录〕

(1917年11月11日)

在彼得格勒我们轻易地赢得了胜利，感谢宣传工作……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统治阶级绝不会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就交出他们的权力。他们已经开始聚集力量，正在对我们发动进攻。

在彼得格勒，他们占据了电话交换台，米海洛夫斯基马术学校……工程学校……我们的彼得和保罗要塞的人民委员逮捕了一个军官，在他身上搜查到文件，从而揭露了他们反对我们的一项军事阴谋。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这位所谓“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军队指挥官给各个部队任命了人民委员……（这些文件）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前的一个成员叫做戈茨签署的……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帕夫诺夫斯基士官学校被摧毁了；士官生被解除了武装……他们将要被送到喀琅施塔得去。第二士官学校也投降了。我们把士官生当做囚犯和人质。要是我们的人落到敌人手里，那就让他知道我们要为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士兵索取5个士官生作为代价。今天我们已经明白

指出……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记得他们（资本家）是怎样对待造反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他们以为我们会无所作为，但是我们告诉他们，一旦问题涉及要保住革命的成果时，我们也会不讲什么仁慈的……为保卫群众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无需加以辩护的……让我们的敌人懂得他们要对每一个工人和士兵的生命付出高昂的代价。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3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车列米索夫撤销克伦斯基 命令的电话〔节录〕

（1917年11月7日深夜至8日晨杜鹤宁将军
与北方战线司令部的直接通话记录）

北方战线司令部参谋长留柯尔斯基将军来电话：……今晚10点，北方战线总司令车列米索夫将军撤销了最高统帅关于调动部队去彼得格勒的一切命令。这些最新指示的副本已送交给你。我不知是什么理由作出这种变动……命令涉及的部队单位或已被扣留在他们乘火车的地点或已被赶回。第三骑兵队的司令员……对这项新命令迷惑不解。他在同我的通话中说他得到最高统帅的直接命令，要他率领顿河第一（哥萨克师）去彼得格勒。我们决定，他应在今晚1时到普斯科夫来见北方战线总司令……

（杜鹤宁）：我不能理解这样一种变动的理由。我将等待北方战线总司令澄清此事。自行车营现在在哪里？

(车列米索夫来到电话机前)

(车列米索夫)：你好，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你说什么呀？

(杜鹤宁)：留柯尔斯基将军刚才通知我说你已经撤销了派遣部队去彼得格勒的命令……你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车列米索夫)：这是最高统帅同意的。……你知道彼得格勒的情况吗？

(杜鹤宁)：请详细告诉我有什么情况，最高统帅现在在哪里？

(车列米索夫)：前临时政府已不再存在；政权现在在革命委员会手中；哥萨克团态度仍然消极……而装甲车班则已投向革命委员会。今天晚上有人……任命基什金为彼得格勒总督。基什金支持立宪民主党是这里前线的人们所知道的，他的任命在前线各军队组织中（在态度上）造成了尖锐的分裂，不利于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放弃了他的岗位并表示愿意把最高统帅的职务移交给我。这问题很可能在今天得到解决。请你召回从其他战线派往彼得格勒的一切部队。最高统帅现在和我在一起。你有话要告诉他吗？

(杜鹤宁)：是否可能请他接电话？

(车列米索夫)：不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40—141页。张毅君
译)

附录 克伦斯基关于继续向彼得格勒进军的命令〔节录〕

（北方战线临时政府委员沃伊廷斯基
1917年11月8日给大本营的电报）

我谨转达一份最高统帅发给北方战线总司令的命令的副本……

“兹命令你继续派第三骑兵队开往彼得格勒。最高统帅克伦斯基。11月8日上午5时30分。”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43—144页。张毅君译）

附录 克伦斯基给北方战线司令的电报

（1917年11月9日）

加特契纳已不经流血而被忠于政府的部队占领。克朗斯达特、谢苗诺夫斯基和伊兹迈洛夫斯基诸团队和水兵们已经无抵抗地交出武器并参加政府军。现命令你加速派遣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士兵已接到退却的命令。

克伦斯基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44页。张毅君译）

附录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节录〕

(1917年11月11日上午8时30分)

致彼得格勒的人民和士兵：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士兵已经成功地解放所有的士官学校……他们占领了电话大楼，正在收集部队……去夺取彼得—保罗要塞和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堡垒斯莫尔尼官。……奉劝列位……千方百计地协助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军队司令员波尔科夫尼科夫上校指挥下的委员和军官……并逮捕所谓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兹特命令一切军事单位在尼古拉也夫斯基工程学校集合。

任何耽搁延误都将成为对革命的背叛并对犯罪者造成严重的后果。

预备议会主席 阿夫克森齐也夫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主席 郭茨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1页。张毅君译)

附录 卢契尔斯基就克伦斯基 失踪致杜鹤宁〔节录〕

(1917年11月14日)

……克伦斯基大约在下午1点钟失踪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谈判包括有逮捕他的条款。对此哥萨克明白地表示同意……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72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全俄铁路工会 的最后通牒的记录〔节录〕

（1917年11月11日下午5时的会议）

……一位全俄铁路工会的代表宣布如下：

“全俄铁路工会无意卷入各政党之间的政治争斗，但是最近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使人们必需有所作为。我们收到消息说内战正在莫斯科猛烈展开；11月10日夜，人们冲入了两个酒库，喝醉了的群众正在全城抢劫……”（他接着宣读了全俄铁路工会的最后通牒并继续说）：“我必需声明……尽管莫斯科被政府军所包围……但是我们将不允许他们进入莫斯科或彼得格勒。我们正在向克伦斯基派出一个代表团，让他知道我们的决定，即使克伦斯基设法进入了彼得格勒，他也必须投降，否则铁路工会将封锁一切通向彼得格勒的道路……”

加米涅夫在答复全俄铁路工会的代表时宣称，他欢迎铁路工会的决议中承认联合政府破产这个事实……在组织一个完全由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政府问题上，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政府的成分……而在于接受（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原则。

我们愿意（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起参加会议。……因此，我提议，我们无需再进行讨论就可以接受全俄铁路工会提出的要我们派代表参加该会议的邀请。

加米涅夫的建议被通过了……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6—157页。张毅君
译）

附录 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关于停止内战和成立社会主义 联合政府的最后通牒

致：各铁路工会；士兵、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莫斯科铁路工会；彼得格勒人民委员会；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海军中央委员会；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各政党中央委员会；邮电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各军事革命委员会；一切军事组织和委员会：

致：一切、一切、一切人！

国家已经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激烈的争权斗争正在进行。争夺的各方都力图以武力创造政府，（其结果是）兄弟们正在互相残杀。当此外国敌人正在威胁着全体人民的自由的时候，民主力量却以铁和血解决内部分歧。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已被证明过于软弱，不能维持政权。在彼得格勒的仅仅由一个党组成的人民委员苏维埃政府不可能指望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会得到全体民主群众的信任并有足以在立宪会议开会之前掌握政权的威信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只能由民主群众的一致意见而决不能由武力产生。内战从来没有、也决不可能产生一个得到全国支持的政府。一个民族既然反对以死刑作为法律手段，又拒绝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它就不可能同意以内战作为结束内部争吵的手段。一切内战都直接通向反革命，只能对人民的敌人有利。为了保卫人民的自由和拯救革命，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从争斗开始之日起就一贯采取严格中立的态度，并且公开宣称求得内部和平的唯一途径是成立一个

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从布尔什维克派到社会主义民粹派都包括在内）组成的统一政府。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许多公众团体和政党都接受和赞同我们的立场。（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一再宣布，现在再一次宣布，它将把整个铁路系统交给那些接受它的纲领的人们支配。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公民、工人、士兵和农民清楚地表示它的坚决立场并且明确地要求停止内战和成立统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政府。铁路工会声明，它将使用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包括完全停止一切火车运行在内——来实现它的决定。如果今日，即11月11日到12日午夜之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战斗仍未停止，火车届时就将暂停运行。一切铁路工人团体都应采取必要步骤准备罢工并成立罢工委员会。铁路工会谴责一切继续以武力解决内部纠纷的人，认为他们都是民主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马立茨基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5—156页。张毅君
译）

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 取得协议的条件

（1917年11月24日）

愿意依下列条款同其他社会主义党派达成协议：

1. 承认苏维埃政府的纲领。这个纲领在土地与和平法令，以及关于工人监督的两个计划里已作了阐明。

2. 与反革命（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卡列金）作无情的斗

争。

3. 承认有农民参加的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作为唯一的根本性的权力机关。

4. 这个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5. 在苏维埃中还没有代表的机构不得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6. 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下列机构加入：工、兵、农（尚未出席）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组织，诸如工会评议会，工厂—商店苏维埃委员会；全俄铁路员工同盟执行委员会和邮电工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其条件是只有在举行了一次新的选举之后。（这一条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所有那些在过去三个月中还没有举行过选举的军队组织。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97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中断谈判的决议〔节录〕

（1917年11月15日）

社会革命党一向明确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计划。这些计划导致国家走上内战，引起立宪会议分裂，给经济生活和军队供应带来紊乱，促使军队士气败坏，并使国家趋向瓦解。

在立宪会议就要召开的一个月内，在苏维埃大会的前夜，当布尔什维克依靠军事叛乱夺取了政府，并且无耻地破坏了民主意志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让阴谋篡夺者听凭自己命运的支配；决定从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

克所依靠的所有政治机构里召回他们的人员；决定在社会主义政府中（布尔什维克除外）创建纯粹的民主政治，以反对他们。这个政府的纲领将是：迅速清算布尔什维克的冒险行径；订立一项法律，将土地转移给土地委员会；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便早日缔结和平条约；及时地召集立宪会议。

但是当全面内战在这个国家爆发……兄弟阋墙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接受全俄铁路员工工会的建议，并与其他党派和组织一道开始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作为谈判的条件，中央委员会坚持立刻停战，并结束一切敌对行动。中央委员会还提出了下列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

1. 新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无关。
2. 新政府将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不要布尔什维克的代表。
3. 遴选部长的时候，必须随时考虑到候选人的品格和政府的目的，特别是结束内战的必要性，因为内战目前很有可能蔓延到全国。

中央委员会在从事谈判中对于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它仍然决心利用一切有效的手段尽量去避免内战……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但拒绝停战，而且还继续进行内战。在莫斯科他们破坏了停战，企图把这个城市变成为自相残杀的战场。现在，他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它不是结束而是延长内战。有鉴于此。……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讨论结果认为：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中断谈判，并从全俄铁路员工工会所召开的会议上召回它的代表。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98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达成协议的条件决议〔节录〕

(1917年11月15日)

鉴于下面这一事实：在为达成协议而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对立即实行休战的要求顽固地拒绝让步，顽固地拒绝停止使用政治恐怖的方式，顽固地拒绝撤销逮捕正在与他们谈判的各党派和组织的人员的命令。又鉴于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1月14日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认为有责任声明：与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要对将来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然而，中央委员会……决心将恪尽一切努力去结束内战……并且已经作好了重开谈判的准备……倘若布尔什维克接受下列起码的条件……

1. 释放一切政治犯……
2. 停止使用政治恐怖的方式，恢复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恢复人身和住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3. 在所有内战仍在进行的地方宣布停战。
4. 给市政当局配置足够的军事力量，便于它维持秩序……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99—200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布尔什维克给反对派的最后通牒^①

(1917年11月18日)

中央委员会已经向你们的政策的主要辩护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纲领，停止对委员会的工作实行怠工，放弃任何方式的卑鄙活动。

尽管他们已经和中央委员会决裂了，但你们的政纲的拥护者还留在党的队伍里，为此，他们承担有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义务。在这同时，你们不满足于在党内散布非难，你们还在队伍中促使一些正在为一种尚未达到其最终目的的事业而斗争的人走上分裂的道路；在破坏党纪方面，你们继续在党外——在苏维埃里，在市政机关、工会里，等等——挖中央委员会各项决议的墙脚，这样就使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无法进行。

有鉴于此，中央委员会被迫重申它的最后通牒，并且建议你们要么写一个书面保证，保证你们服从中央委员会，并信守它的纲领；要么放弃所有公开的和党内的活动，交出在劳工运动中一切负责的职务，直到党代会开会为止。

上述的两种保证如果一个也做不到，中央委员会就认为有必要考虑立即驱逐你们出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06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① 标题是本书编者改加的。

附录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宣言〔节录〕

(1917年11月9日)

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在竭尽全力造成一场血腥的内战。他们借助于大炮夺取了政权，现在他们看到只有依赖大炮才能暂时保持政权。

今天他们已经宣布，报界是“同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同样危险的”。他们逮捕了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他们的权力是短命的。他们不过是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的创造是个肥皂泡……。他们说他们的政府是苏维埃的政府。这是不真实的。

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尚未表示他们的意见……

伟大的俄国革命比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彼得格勒冒险更大、更崇高，规模更广泛。我们的革命是一场民族革命。……代表劳苦农民的社会革命党已经同布尔什维克党分道扬镳。诚然，布尔什维克党人给自己涂上了一层社会革命党人的色彩；他们接过了我们的土地纲领。但是，那也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农民们将只跟他们所了解和信任的那些人走。

俄国的劳苦大众将夺得土地、和平和自由，……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决不能有内战。必须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不应该发生流血。他们的冒险将自取灭亡……

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实行总罢工！抵制他们！

我们应当立即组织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有产阶级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党政府。其纲领如下：

1. 扑灭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冒险，这场冒险只要一接触到无可动摇的事实就会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2. 把一切农业用地交给土地委员会。

3. 努力争取在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早日实现和平。

4. 毫不迟延地召集立宪会议。

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有机会阻止内战并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住不受布尔什维克煽动和能够识破布尔什维克诺言的真实价值的劳苦大众的民主力量。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47—148页。张毅君
译)

附录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成立 革命统一战线的呼吁书〔节录〕

(1917年11月11日)

工人们、士兵们和农民们！革命正处在危险中！

在彼得格勒政变之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一派所建立的政府是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它只得到一个政党的承认，因而不可能得到全体民主群众的支持。

民主群众队伍中的分裂正在把反动分子推向……同有产阶级结成同盟。这将有利于反革命的事业，他们正在镇压布尔什维克暴动的借口下动员力量以枪杀革命。行将带来空前的破坏和流血的内战正在威胁着全国，这场内战势必削弱民主力量和导致革命的覆灭……。

我们强烈呼吁革命民主力量的两大派寻求达成协议的途径并建立一个能够抵抗有产阶级反革命联盟的联合一致的民主力量。

我们呼吁民主力量的两大派重新建立革命阵线的团结，以便

革命不至于被淹没在士兵、工人和农民的鲜血之中。

(签名者) 孟什维克国际派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联合社会民主党国际派
波兰社会党
犹太社会民主工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4页。张毅君译)

附录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纲领〔节录〕

(1917年11月12日公布)

为着建立革命的秩序和防止爆发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内战，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决定：

1. 开始和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谈……主题是，依照下列纲领组成一个民主的政府：(一) 迅速清算布尔什维克的冒险，以此作为保卫民主利益的一个途径。(二) 不遗余力地粉碎反革命的企图和有组织的屠杀。(三) 尽一切可能，努力促使立宪会议及时召开。(四) 采取一项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把政府所作的准备通知协约国，这些准备是：立即开始会谈，以便实现一种对任何交战国来说都不会是勒紧经济和政治锁链的和平；只要受到外敌威胁就起来保卫国家。(五) 促使将地主的地产交给土地委员会的法律付诸实施。

2. 要求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放下武器，放弃所攫取的权力，并在它的指挥下指导部队接受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152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中央执行
委员会上宣读的辞职声明〔节录〕

（1917年11月17日）

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保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为着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并从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和其他负责的岗位上撤回他们的代表。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03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
诺根、米柳亭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声明^①

（1917年11月17日）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1月14日的决议实际上是等于拒绝与构成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各党派就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这一问题所取得的协议。我们相信只有沿着我们所指出的路线达成一个

① 标题是本书编者改加的。

协议，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军队加强他们十月革命所赢得的势力，才有可能巩固他们新的地位，才有可能聚集力量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们相信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政府就必须制止进一步的流血，就必须消灭面临的饥馑，就必须粉碎卡列金，就必须及时召开立宪会议，就必须使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所通过的和平纲领得到实施。

经过空前的努力，我们成功地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得到重新考虑，并成功地提出了一项新的决议，以作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但是这个新决议在中央委员会领导层的一部分人中所引起的一系列做法相当清楚地说明：那个领导层决心不让在苏维埃中组成一个包括有各党派和政府，他们坚持组成一个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而不惜牺牲工人和士兵。

我们不能替中央委员会的这一破坏性的政策承担责任。实行这种政策是违背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的，他们最热切地希望早日停止各民主派别之间的相互杀戮。

我们放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其目的在于能够自由公开地对工人和士兵说话，并要求他们支持我们的口号：苏维埃中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就各党派的合作达成直接协议！

我们是在胜利的时刻，是在我们党占优势的时刻离开中央委员会。不过，我们这样做无非是由于当中央委员会中的领导层糟蹋了这个胜利果实并把无产阶级引到毁灭的时候，我们不能漠然置之。

由于我们仍然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里，我们希望无产阶级会排除一切障碍，会了解到我们的行动是受我们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职责的感情激发而来的。

尤·加米涅夫 格·季诺维也夫
阿·伊·李可夫 维·诺根

弗·米柳亭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03—204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附录 反对派辞去人民委员会 委员职务的声明^①

(1917年11月18日)

我们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所有政党都参加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我们认为只有组成这样一个政府，才有可能巩固10月和11月工人阶级和革命军队英勇斗争的成果。

我们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剩下的只有一条道路：即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是我们不能也决不愿意接受的。我们认为这将导致取代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导致建立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权及毁灭革命和国家的结果。我们不能对这一政策负责，因此我们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30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① 诺根本人以及人民委员会委员李可夫、米柳亭、特奥多罗维奇、施里亚普尼可夫、梁赞诺夫、尤烈涅夫和拉林等人提出的这个声明，时间应为1917年11月17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节录〕

(1917年11月20日)

全体公民们！

有产阶级正在给苏维埃政府制造麻烦。这个政府是工人、士兵和农民政府。（有产阶级）的党羽们煽起国家和市政的雇员罢工；他们号召雇员离开银行；他们正在设法使铁路、电报和邮政等，处于瘫痪状态。

我们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玩火。国家和军队都受到饥荒的威胁。要与饥馑作斗争就必须非常细心地在粮食机关、铁路、银行和邮政方面做好所有的工作。工农政府一直都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国家供应必需品。反对这些措施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警告有产阶级和他们的党羽，要是他们不停止怠工，要是因怠工而使粮食产品的运输遭到停滞，他们就会是最先感到自食其果的人。有产阶级和他们的党羽就会被剥夺享受粮食的权利。已经拿到手的任何供应品都要被收回。罪恶较大的人的财产将要被没收。

我们已经尽到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们不要玩火。

我们确信，一旦这种警告必须兑现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切忠于革命的人，所有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全力支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
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28—229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节录〕

(1917年12月8日)

从事罢工的国家 and 公共机关的公务人员……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他们的名字从现在起将登在所有的苏维埃出版物上……并将张贴在所有公共场所。

加剧经济混乱和阻滞军队与国家的粮食供应的人只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他们没有受保护的权力。他们是处于社会范围以外。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所有属于人民的组织机构都应该密切注视着这些反革命的公务人员……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没有资格取得任何支持。不与人民一道工作的人在人民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地位的。

将一切怠工者列入黑名单！

抵制犯罪分子——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的工具！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30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附录 彼得格勒国家雇员工会联合会 关于雇员举行罢工的决定

(1917年11月10日)

在与全俄国家雇员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讨论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一个月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的布尔什维克集团篡夺了权

力这一问题之后；在考虑了那种犯罪行为有破坏俄国和所有的革命成果的危险之后，彼得格勒国家雇员工会联合会与由（彼得格勒）中央杜马，共和国临时议会，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前线小组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主义民粹党，第二届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统一”派，以及其他关心祖国的安全与荣誉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们构成的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取得一致之后，作出了下列的决定：

1. 国家所有行政部门的工作要立即停止；

2. 对军队和居民的粮食供应问题，以及涉及维持公共秩序的机关的活动问题，统由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与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共同作出决定；

3. 行政部门已经停止了他们工作的举动受到嘉许。

彼得格勒国家雇员工会联合会委员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225页。黄宗汉译，高
放校）

关于逮捕亚历山大·费多罗 维奇·克伦斯基的命令

（1917年11月8日）

原部长柯诺瓦洛夫、基什金、捷烈申柯、马利扬托维奇、尼基廷等人已被革命委员会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命令所有部队组织采取措施立刻逮捕克伦斯基，并把他押往彼得格勒。对克伦斯基的任何包庇行为都将是对国家的重大犯罪。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译自《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组织者(文献与史料)》，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402页。葛纪娥译)

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

(1917年11月9日)

在革命的重大决定时刻和紧接着的那些日子里，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

霎时间狂噪四起，说新的社会主义当局企图反对新闻自由，违背了它的纲领的基本原则。

工人士兵政府提请公众注意这个事实，在我国自由的盾牌后面，实际上是隐藏着富有阶级有夺取整个新闻界最大一份的自由，并以此来毒害群众的心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造成混乱。

人人知道资产阶级报刊是资产阶级的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特别是在这关键时刻，当新的工农当局还处在巩固的过程中时，它不可能当这个武器的威力不亚于炸弹和机关枪时，把这一武器留给敌人。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临时和特别措施来截断充满了肮脏和诽谤的浊流的原因，黄色和绿色的报刊想在这一浊流中吞噬掉人民刚刚得到的胜利。

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根据这方面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法律责任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

可是要记住，即使在紧急时刻，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要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如下：

报刊发行总规则。

1. 下列报刊机构应予关闭：（一）凡煽动公开反抗和不服从工农政府的报刊；（二）凡用明显的诬蔑、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制造混乱的报刊；（三）凡煽动带有犯罪性质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的报刊。

2. 只有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才能临时或长期封闭任何一家报刊机构。

3. 本法令是临时性的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撤销。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23—124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关于逮捕 立宪民主党领袖的命令^①

（1917年12月11日）

立宪民主党是人民的敌人，逮捕其领袖并交给革命法庭。兹命令地方苏维埃密切注视立宪民主党的行动，因为它是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反对革命的内战勾结在一起的。

本命令一经签署立即生效。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① 12月11日的命令导致了下列立宪民主党员的被捕：伯爵夫人斯·维潘尼亚，亚·伊·辛加廖夫，弗·弗·柯科施金，大公普·德·多尔哥鲁科夫，纳·纳·卡特勒，莫·莫·米那威，弗·伊·罗狄切夫。——原编者注

尼·阿维洛夫（格列博夫），
波·斯塔契卡，
维·明仁斯基，
约·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格·彼得罗夫斯基，
亚·施利希特尔，
杜宾科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359—360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 给各级党委员会的通告信

（不晚于1917年12月28日）

敬爱的同志们！

兹送去莫斯科省委员会制定的一件指令，因为我们认为该指令正好提供了实际工作所需的指示。 顺致

同志的敬礼

中央委员会秘书 叶列娜·斯塔索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员会 致中央工业部门各个党组织

同志们，从各地方在省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

告，以及从省的不同组织得到的消息已经清楚，在许多地方，组织新革命政权的工作尚未完成，人民委员会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贯彻。因此，首先绝对必须的，是在各个地方把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最高当局、变成主持整个地方管理事宜的机构。

为此，首先必须使苏维埃直接说明，它们是否支持新的革命政权，因为只有真正革命的苏维埃才能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凡是说明支持新革命政权的苏维埃，都应当改选。对于从上到下的一切苏维埃组织，从工厂委员会、团委员会和连委员会起，从农民代表苏维埃直到省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都要采取这种措施。这些经过改革的组织应当执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本身应在地方上建立新的制度。从各地的报告可以明白，在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时，本指令中所列举的措施是最适宜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省委员会

一、革命军事措施

1. 将一切军械库、武器库和枪炮弹药制造厂置于苏维埃保护之下，从苏维埃中任命委员负责。

2. 统计武装力量、武器和弹药（并将这些有关情报呈交莫斯科军区司令部）。

3. 在团委员会和连委员会监督之下，从各团队仓库发给全体士兵数量充足的武器，来武装忠于苏维埃政权的部队。

4. 在工厂委员会和党委员会监督之下，组织和武装赤卫军。

5. 在农村成立赤卫军并通过党组织进行武装。

6. 解除一切不可靠部队的武装。在它们反对解除武装时要采取坚决措施。

7. 对于受反革命军队进攻威胁的地区，组织外部防御（修筑

防御工事，监视反革命军队的调动，监督铁路沿线的来往）。

8. 为了实现省的总防御计划，使它不受革命的敌人的破坏，要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保持经常的联系。

二、掌握地方国家机关的措施

1. 立刻组织进行卫戍部队一切指挥人员的选举。在选举结束之前，任命临时委员代替卫戍司令、要塞司令和领导军队军需和粮秣事宜的长官。

2. 由苏维埃的临时委员代替原先政府的省府委员和县府委员。

3. 解散那些实际上已经表明其反革命性质的市自治政府和地方自治局。同时必须告诉居民进行新的选举时间，（在选举之前）任命临时委员，并且不许已被解散的机构举行任何集会。

4. 向邮电机构和铁路派出委员，向职员、尤其是低级职员发出鼓励号召书，并且在他们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把管理事宜委托给他们的选举委员会。

5. 向税务局、金库、国家银行分行和私人银行选派委员。

6. 地方上的财政措施。

首先把税务局和金库置于苏维埃监督之下。给予一个人的薪金、优抚金和补助金，按全部拨款单看总数不得超过当地熟练工人的平均报酬（一个月大约为400—500卢布），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则完全转入国家银行的往来帐户。

从国家储金局和从普通或专用往来帐户的支付要按上述定额。对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各种费用、职工薪金、原材料费用及其他生产费用的支付不加限制，但须由地方职工委员会批准并由其亲自或书面证明负责。同时工厂委员会应当建立对成品换得的货币的监督，并且根据这些所得批准从银行支付的货币额。

按证明成交文件购买食品应付金额的超出部分，准许粮食委员会和私人支付。准许按规定手续开立新的往来帐户、实行自由的票据贴现，但是必须将贴现金额转入往来帐户。

军事革命中心和苏维埃作为国家机构应当用国库的款项支付自己的费用（国库应当指示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以苏维埃的名字开立往来帐户）。

为了准备实行银行国有化，关于对银行进行监督的各项措施，将在有关生产调整的指令中说明。本指令将在莫斯科工人士兵苏维埃经济科对这些问题研究决定后通知各个地方。

7.立刻完全消除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一切政治和土地问题。逮捕在人民代表苏维埃土地法公布后因侵占土地进行司法追究中有罪的一切法官。

三、反对官吏怠工的措施

1.清除一切主管部门中的反革命分子。从人民中间培养自己的各个不同管理部门和各种技术的专家。同时进行邮电和铁路事业方面的训练，并利用通讯兵和铁道兵来工作。

既然官吏不是作为主管部门的反革命分子，而是由于误会而不开始工作，那末就必须通过书面东西或通过谈判号召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下层，号召关心官吏工作的居民，并在机关附近举行群众大会，在会上促使官吏开始工作。

如有顽固坚持怠工情况，就要逮捕其最活跃的领导者，尤其是来自高级职员中的领导者；解雇他们，宣布他们的名单并预先通知其他机构不许接收他们。

四、对反革命出版物的措施

1. 执行出版和广告专营的法令。
2. 封闭一切宣传种族歧视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出版物。
3. 关闭私营广告事务所。在苏维埃下设立国营广告总事务所，并把已经关闭的事务所的职员调到那里。扩大苏维埃的报纸以便刊登广告。

五、关于整顿粮食供应的措施

1. 规定城乡产品交换是一项基本任务，因此必须通过土地委员会和工业委员会（或工场手工业委员会等）对城市和乡村的全部粮食和全部成品进行全面计算。

2. 铁路卸货应当是第一个问题。军需品的卸车可由军队无偿地承担，私人货物的卸车也可这样，但费用须由货主负担。

3. 征用仓库和与其类似房屋（因车站附近卸货工作繁重）。

已经改进的空车厢按照苏维埃粮食机构的指示调到需要地点。

4. 为了换取粮食而将农民消费品调往市场的工作要进行监督。

工厂一部分复员，一部分去农村工作。

5. 派遣代表团和鼓动员，特别是农民和士兵，从发生饥荒的开设工厂的省份到粮食丰产的省份，带上商品的样品，并建议农民和哥萨克带上粮食乘直达货运列车去进行交换，一部分换成工厂产品，一部分换成货币。接收粮食货物并将它运交粮食分配中心（货币支付应交给企业的出纳处），并装上工厂货物。

6. 属于兵站仓库的货物，经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意，也可由兵

站部卸下，因为其中有日用品，并且须留下一定的储备。

7. 通过工厂委员会、乡委员会和铁路委员会对一切铁路线上的货物运输、货车调拨进行监督，反对铁路上的贿赂行为。

8. 通过群众性查询和征用超出消费定额的全部粮食，来统计潜在的粮食储备。

9. 普遍实行配给制。

10. 上述全部政策应由在莫斯科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之下组织起来的中央分配机构执行。

11. 一切不愿执行新政权粮食措施的地方粮食委员会，都应由苏维埃粮食局取代。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45—149页。方钢
译)

契卡关于逮捕切尔诺夫和其他人的命令

(1918年1月13日)

立即逮捕下列各人，并将其交给革命法庭：伊·格·策烈铁里，维·米·切尔诺夫，费·伊·唐恩（古里维契），莫·姆·勃兰姆逊，马·伊·斯柯别列夫，阿·拉·郭茨，维·纳·罗沙诺夫，莫·宾那西克，格·门捷诺夫，维·维·伊万诺夫斯基，罗·甘标诺夫，维·赫尔曼—卡曼斯基。

全俄与反革命和怠工
作斗争非常委员会主席 费·捷尔任斯基

彼得格勒1917年12月31日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366页。黄宗汉译，高
放校)

契卡关于逮捕、枪毙反革命 分子的命令〔节录〕

(1918年2月22日)

致各地苏维埃

……全俄肃清反革命、阴谋破坏、投机倒把分子特别委员会要求(地方)苏维埃,立即对一切以各种不同方式与反革命组织保持联系的人……,进行清查、逮捕并立即枪毙。……1. 敌特人员, 2. 反革命煽动者, 3. 投机倒把分子, 4. 颠覆苏维埃政府的组织者, 5. 那些到顿河地区参加卡列金-科尔尼洛夫集团和波兰反革命军团的人, 6. 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军火买卖的人——上述各种人如果被当场抓住,要就地枪决……。

全俄“契卡”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576—577页。高燕译,
高放校)

全俄肃反委员会命令〔节录〕

(1918年3月27日)

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要求罗曼诺夫家族居住莫斯科的全体成员,于1918年3月29日到卢边卡大街11号委员会处登记。

违者将以反革命分子论处、逮捕并送交法庭审判。

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罗维奇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576页。高燕译，高放
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书

(1918年8月30日晚10点40分)

致各工人、农民、红军代表苏维埃，

致各军，致一切、一切、一切

几小时之前有人对列宁同志行刺。列宁同志的作用，他对俄国工人运动、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意义是各国最广大的工人群众都知道的。

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没有失掉同阶级的紧密联系，几十年来他总是捍卫阶级的利益，以阶级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

列宁同志经常出席工人大会，星期五还出现在莫斯科市扎莫斯克沃列茨区米海尔松工厂工人面前。从大会会场出来后，列宁同志被刺受伤。拘捕了几个人，他们的身分已经弄清。

我们并不怀疑，在这里也将找到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痕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奴仆的痕迹。

我们号召全体同志们要保持最大的镇静，加紧自己关于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工作。

对其领袖的行刺，工人阶级将以更加团结自己的力量、以对革命的一切敌人进行大量残酷无情的恐怖行动来回答。

同志们！要牢记，要用你们自己的手来保护你们的领袖。要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得更紧，并且要给予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坚决的致命的打击。战胜资产阶级，是对十月革命一切成果最好的保障、最好的巩固，是工人阶级领袖们安全的最好的保障。

要镇静和有组织性！大家都要坚守各自的岗位。让我们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斯维尔德洛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28—229页。方钢

译)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

(1917年11月15日)

工农十月革命已在解放的总旗帜下开始了。

农民已从地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因为再也没有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已被废除了。士兵和水兵已从专横的将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将军今后要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更换。工人已从资本家的暴虐专横下解放出来，因为今后要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一切生气勃勃的、有生活能力的人都从可恨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了。

现在就剩下过去曾经忍受过、现在还在忍受压迫和虐待的俄国各族人民了。应当立刻去解放他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去解放他们。

在沙皇专制时代，俄国各族人民不断地被唆使互相残杀。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屠杀和蹂躏，另一方面是各族人民受奴役。

这种唆使互相残杀的卑鄙政策已不存在，并且也不应当再恢复了。今后，它应当代之以俄国各民族自愿和真诚联盟的政策。

在帝国主义时期，在二月革命以后，当政权转到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手里的时候，公开唆使互相残杀的政策让位于对俄国各

民族暗暗不信任的政策，让位于口头上声称各民族“自由”和“平等”，而实际上挑拨离间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它加剧了民族仇恨，破坏了相互信任。

这种虚伪、不信任、挑拨离间的卑鄙政策应当结束了。今后它应当代之以使俄国各民族相互充分信任的光明正大和诚实的政策。

只有由于这种信任，才能建立起来俄国各民族诚心诚意而巩固的联盟。

只有由于这种联盟，俄国各族工人和农民才能结成一支革命力量。这支力量顶得住吞并成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切阴谋破坏。

根据以上各点，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今年6月宣布了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权。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今年10月更加坚决肯定地确认了俄国各民族这一不能剥夺的权利。

为了贯彻这两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人民委员会将以下原则作为自己在俄国民族问题方面活动的基础：

1. 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主权。
 2. 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直至分立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3. 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
 4. 居住在俄国领土内的各少数民族与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
- 与此有关的具体法令，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后将立即制定。

俄罗斯共和国全权代表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41—142页。方
钢译)

全俄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 废除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

(1917年11月23日)

1. 俄国现有的一切等级和对公民的等级划分、等级特权和限制、等级组织和机构，以及一切文官官衔全部废除。

2. 一切身分（贵族、商人、市民、农民等），一切封号（公爵、伯爵等）和文官官衔（二等文官、五等文官等）均予废除，并规定全体俄国居民都用一个共同称呼即“俄罗斯共和国公民”。

3. 贵族等级机构的财产立即转归有关的地方自治局。

4. 商人协会和市民协会的财产立即归有关市自治政府支配。

5. 一切等级的机构、工作、生产和档案立即转归有关市自治政府和地方自治局管理。

6. 现行法令中的一切有关条文全部废除。

7. 本法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并立即通知各地方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

8. 本法令由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11月10日会议批准。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人民委员会秘书 尼·哥尔布诺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53—154页。方钢译)

苏维埃政府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节录〕

(1917年11月27日)

1.为了很好地控制国民经济，在一切雇用他人为自己的车间工作或是把工作带回家去做的工业、商业、农业（以及类似的）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种监督要扩大到一切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生产、储藏、购买和出售以及企业的财政方面。

2.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组织，例如工厂和车间委员会、老工人苏维埃等组织，实行这种监督。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在这些委员会中也应有自己的代表。

3.每个大城市、省和工业区要有它自己的工人监督苏维埃。他们作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一个机构，必须有工会、工厂、车间、其他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参加。……

6.工人监督机构有权监督生产，规定最低产量和决定生产费用。

7.工人监督机构有权监督企业的全部业务往来。企业主在法律上要对一切保密的往来负责。废除商业上的秘密。企业主必须让工人监督机构检查今年和往年的一切帐簿和帐单。

8.工人监督机构对企业主进行管制，只有接到上级工人监督机构的决定时才能取消这种管制。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人民委员 亚·施略普尼柯夫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30—131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关于法院的法令

(1917年12月5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

1. 撤销现有的一般审判机关，例如：州法院、高等法院、参议院及其所属各厅、各种名称的军事法院、海事法院以及商事法院，代之以根据民主选举制产生的法院。

关于未结案件的继续办理和进行程序，将颁布专门法令加以规定。

从10月25日起直至上述专门法令颁布之时止，所有关于期限的规定一律停止执行。

2. 现有的调解法官制度停止发生效力，迄今通过间接选举制产生的调解法官，由地方法院，即常设的地方审判员1人和每次按照轮值审判员特别名单邀请出庭的轮值陪审员2人来代替。今后地方审判员根据直接民主选举制选举产生。而在该选举制实行之前，暂时由区、乡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选举，在没有区、乡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地方，暂时由县、市、省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选举。

轮值陪审员名单和出庭顺序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编制确定。

原有的调解法官，如果他们表示愿意，并不丧失暂时由苏维埃和最后根据民主选举制选为地方审判员的权利。

诉讼价额在3,000卢布以下的民事案件，和判刑不超过2年的剥夺自由并附带民事诉讼，其诉讼价额不超过3,000卢布的刑事案件一律由地方法院审理判决。地方法院的判决就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由于某个案件或某种原因而处以罚款100卢布以上或剥夺自由7天以上者，准予提出上诉要求。上诉审级是县法

院，而在首都，则是首都地方审判员代表大会。

为了解决前线上的刑事案件，地方法院由团苏维埃按照同样程序选出，而在没有团苏维埃的地方，则由团委员会选出。

关于其他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将颁布专门法令加以规定。

3. 撤销现有的法院侦查员制度、检察监督制度、律师制度和私人代理制度。

在整个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前，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地方审判员一人负责处理，而关于逮捕人犯和交付法院的决定书则须由地方法院全体议决批准。

一切享有公民权利的品行端正的男女公民（即使在侦查阶段）均可作为控诉人或辩护人，而在民事案件中可作为代理人。

4. 为了接收和继续处理审判机关、侦查人员、检察监督人员以及律师公会的案卷，各个相应的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选出专门委员会来接管这些机关的档案和财产。

已被撤销机关的一切低级官员和文牍人员，应当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有关委员的总的领导下执行关于未结案件的一切必要工作，并在指定日期答复利害有关者对于案情的询问。

5. 地方法院用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判决案件，并在判决中遵循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时，只能以未经革命所废除、同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法律意识不相违背者为限。

附注 凡是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农政府的法令以及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最低纲领相抵触的法律，都认为是已经废除的法律。

6. 关于一切民事纠纷案件以及自诉的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法院解决。仲裁法院的仲裁程序，将颁布专门法令加以规定。

7. 司法机关有权赦免因刑事案件被判刑的人，并有权恢复因刑事案件被判刑的人的权利。

8.为了反对反革命势力，为了采取措施来保护革命和革命成果，为了解决关于反对商人、厂主、官吏及其他人的抢劫、盗窃、怠工和其他舞弊行为的案件，成立工农革命法庭。该法庭由庭长1人和省或市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选举的轮值陪审员6人组成。

为了对上述案件进行侦查，特在这些苏维埃之下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现有的侦查委员会一律撤销，其案卷移交给在苏维埃之下新设立的侦查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54—156页。方钢
译)

关于设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1917年12月14日)

1.设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隶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是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为此，它要为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制订总的计划和标准，它还要调整和统一地方的和中央的管理机构（燃料、金属、运输、粮食供应各委员会和其他）的活动，这些机构均附属于人民委员部（贸易与工业、粮食、农业、财政、陆海军等部）、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工厂商店委员会和工会。

3.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权没收、征用和扣押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并把其各分支机构在生产、分配和国家财政方面联合成为统一的整体。

4.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对现存的调节经济生活的机构加以监督，并有权改组它们。

5.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包括这些代表：（一）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二）各人民委员部，和（三）以顾问资格被邀请的专家。

6.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分为区和部（燃料、金属、〔工业〕改组、财政等）。区和部的数目，以及它们相应的业务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

7.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个部从事调节国民经济的各个专门分支单位，并替相应的人民委员部提供办法。

8.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从它本身挑选一个有15人的局协助各个区和部工作，并做好急需办理的业务。

9.所有立法措施和重要的、在总的方面与调节经济生活有关的计划都要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送交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1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调整并指导地方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经济部门的活动，其中包括地方的工人监督机关，以及地方的劳工、贸易、工业、粮食等各人民委员部的代理处。

在缺少上述地方代理处的情况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自行组织之。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所属机构有权把地方苏维埃的各经济部门当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理处而加以管辖。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斯维尔德洛夫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 列·托洛茨基，
斯大林，
阿维洛夫（格列博夫）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314—315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建立肃清反革命分子全俄非常 委员会的法令〔节录〕

(1917年12月20日)

该委员会将命名为全俄非常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向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作斗争的……。

委员会的职责是：

1. 肃清和粉碎全俄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不管这些活动的起因如何。

2. 把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审判，并制订出一个作战计划。

3. 仅仅作出初步调查——足以粉碎〔反革命分子的行动〕。
委员会分成以下几个部门：（一）情报处，（二）组织处（负责在全俄境内组织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及其分处，和（三）作战处。

委员会将在明日（12月21日）成立。……委员会将密切注视报纸、破坏分子、罢工者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将采取〕没收、拘留、剥夺〔粮食〕卡、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措施。

人民委员会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32—133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关于银行国有化的法令

(1917年12月27日)

为着适当地组织国民经济，为着彻底根除银行的投机，为着使劳动群众完全摆脱金融资本家的剥削，为着替俄罗斯共和国创办一个符合人民和贫苦阶级利益的单纯的、统一的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如下：

1. 兹宣布银行归国家垄断。
2. 现有的一切私人合资银行和其他银行商号均纳入国家银行。
3. 企业清算出的资产和债务由国家银行承受。
4. 私人银行同国家银行合并的办法将另以特别法令规定之。
5. 私人银行的暂时处理事务委托给国家银行理事会。
6. 充分保障小额存款户的利益。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323页。黄宗汉译，
高放校)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①

(1918年1月25日)

一

1. 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 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为全民财产并根据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不收任何赎金而交给劳动人民。

宣布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矿藏和水流，以及全部耕畜、农具、模范大地产和农业企业均为国家财产。

^① 这个《宣言》是列宁1918年1月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的。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后，一致通过。1918年1月12日（25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宣言》。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404—406页。

2. 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所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关于取消（废除）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签订的债务条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同时表示深信苏维埃政权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至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3. 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 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和把经济工作组织起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实行劳动人民武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解除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

三

1. 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这次罪大恶极的战争使整个地球都淹没在血泊中，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表示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这些政策，即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使劳动人民获得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

2. 为了同一目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张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完全断绝关系，因为这种政策是奴役亚洲和一

切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数万万劳动人民，而为少数特殊民族的剥削者谋福利的。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退军队、宣布阿尔明尼亚有实行自决自由的政策。

四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竭力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全面和巩固的联盟，它的任务只是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至于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这应当由他们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57—160页。方钢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

（1918年1月28日）

旧军队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随着政权转入劳动和被剥削阶级手中，便产生了建立新军队的必要性。新的军队现在是苏维埃政权的堡垒，最近的将来是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的基础，并且将成为日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柱。

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组织名叫“工农红军”的新军队，根据的原则是：

1.工农红军由劳动群众中觉悟程度最高和最有组织性的分子组成。

2.凡是年满18岁、准备把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用来保护十月革命成果、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共和国公民，都可加入工农红军。加入红军必须经过军队委员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民主团体、党组织、工会组织或至少这些组织的2名成员的介绍。在加入时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实行连环保和进行记名投票。

二

1.工农红军战士的衣食完全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发给50卢布。

2.原先由红军战士赡养的其家庭中无劳动能力的成员，根据当地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决定，按当地消费标准供给一切必需品。

三

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是人民委员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和管理集中于军事人民委员，在他之下设专门的全俄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最高总司令 尼·克雷连柯

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 普罗相

扎东斯基

施泰因贝尔格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拉基米尔·邦契-布鲁也维奇
人民委员会秘书 尼·哥尔布诺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0—161页。方钢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信仰自由、 宗教和宗教团体的法令

（1918年2月2日）

1. 宗教与国家分离。
2. 在共和国境内禁止颁布任何排斥或限制信仰自由、或以公民的宗教信仰为理由而规定任何优先权或特权的地方性法律和决议。
3. 每个公民都可以信仰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一切因有无某种信仰而剥夺权利的规定都要废除。
附注 从一切正式文件中撤销任何有关说明公民是否信奉宗教的指示。
4. 国家机关和其他公开的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活动时，不得举行任何宗教礼节或仪式。
5. 保证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但以不破坏社会秩序、不侵犯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为限。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地方政权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
6. 任何人都不得以自己的宗教观点为借口而不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在个别情况下，根据法院规定，以一项公民义务代替另一项公民义务为条件，才准许例外。

7. 废除宗教宣誓。

在必要场合只作庄严的承诺。

8. 户籍工作完全由民政机关的结婚和出生登记处办理。

9. 学校与教会分离。

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和公立以及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

公民可以私人教授或学习宗教教义。

10. 一切教会和宗教团体均须遵守关于私人社团的一般条例；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不给予任何特权和资助。

11. 不得为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利益强制征收捐款或课税，这些教会或宗教团体不得对本组织的成员采取强制手段或惩罚措施。

12. 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无权占有财产。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权利。

13. 凡在俄国属于教会和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都宣布为人民财产。

专供祈祷用的建筑物和物品，根据地方或中央国家政权机关的特别决定，转交有关宗教团体无偿使用。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 尼·波德沃依斯基、弗·阿尔加索夫、弗·特鲁托夫斯基、亚·施利希特尔、普·普罗相、维·明仁斯基、亚·施略普尼柯夫、格·彼得罗夫斯基

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秘书 尼·哥尔布诺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1—162页。方钢
译)

全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决议^①

(1918年1月23日)

1.工人和贫苦农民战胜了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同时又战胜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始了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由工人、农民、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已经成为政府机关，工农政府的政策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

2.十月革命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这就为一切工人团体、包括工会的活动创造了全新的条件。

3.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会仅仅是无产阶级为改善工人阶级条件而进行经济斗争的工具。他们一直认为，工会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阶级的其他革命团体并肩战斗的组织。当阶级斗争使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实现一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规划时，工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4.关于工会“中立”的思想，始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其敌人进行的伟大历史斗争中，是没有中立、也不可能有的，在公开声称中立的背后，几乎总是隐藏

^① 决议明确确定工会从属于苏维埃政府。所谓工会“中立”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口号。

着资产阶级政治及其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出卖。欧洲工会运动在三年半的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两种主要倾向的斗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处可以看到，昨天的“中立分子”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仆役和卫道士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早应彻底放弃关于工会“中立”的思想了。

5. 在俄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摆脱资产阶级束缚的国家里，“中立”的工会运动就更加是不可能的。立宪会议，银行国有化，镇压资产阶级报刊，废除资产阶级贷款，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最直接地涉及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也涉及到工会运动的利益。在这些问题上，工会必须全心全意支持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领导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政策。

6. 目前，工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组织领域。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会必须承担组织生产及恢复国家遭到破坏的生产力的任务。它的目标在于最有力地参加一切调节生产中枢的工作，组织工人管理，登记和分配工人，组织一种城乡之间的交换（使之成为制度），积极参加恢复工业，同颠覆活动做斗争，推行普遍义务劳动制等等。应该特别注意全国范围工会运动的集中性，注意组织农业工人的强大联合。

7. 经历了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会到成熟阶段时，它将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将同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工具一样工作，在组织经济生活中实现新原则。

8.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实现全部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尤其是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工会应同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首先是同工人、农民、士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进行最紧密的合作，并保持不受干扰的组织联系。

9. 代表大会相信，由于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工会将不可避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政府将管辖在各种工业中雇用的所

有工会成员。

俄国工会运动若不与国际工会运动建立紧密联系，就不可能完成其伟大任务。代表大会认为，它有义务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复兴国际工会运动，并拟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一些国际工会会议。

代表大会决定于2月15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国际工会会议，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639—641页。高燕
译，高放校)

关于没收私人银行股本的法令〔节录〕

(1918年1月26日)

1. 属于私人银行的股本，从现在起要毫无保留地转到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
2. 宣布一切银行股份无效，绝对停止支付一切股息。
3. 现在拥有银行股票的人，必须将其股票交给国家银行地方分行。
4. 股票不在身边的银行股东，必须呈交……备忘录，写明其股票存放的准确地点。
5. 从颁布此法令起两星期内，没有交出股份或没有呈交备忘录的银行股东，其全部财产将被没收。
6. 严禁买卖、转换银行股份。犯有此罪者将被判处3年监禁。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伊·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601页。高燕译，高
放校)

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决议

(1918年2月16日)

1. 没收工业或其他企业，要按照明确规定的国家经济计划执行。经济计划由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制定。

2. 从现在起，除了第一条中指出的机构外，其他任何机构无权没收企业。那些已经没收的机构，必须向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呈报全部情况。

3. 任何部门、机构和个人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提请没收某个企业时，必须持有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证明。

4. 一切有关没收企业的问题，必须呈交负责组织生产的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办公厅，办公厅的决定必须呈交常务委员会^①批准。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612页。高燕译，高
放校)

① 1918年4月27日，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向一切地方苏维埃政权和地方经济委员会发出下列通知：

“鉴于地方苏维埃机构和地方经济委员会没有得到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许可，擅自没收企业，使之国有化，特此提请注意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1918年2月16日做出的决议(决议正文如下)。

“如果非法没收企业的情况继续发生，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将不拨款给予已没收的企业。”(S. D. 1817—1918, 第203—204页)

——原编者注

托洛茨基1918年3月27日在俄共（布） 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①〔节录〕

在政治和直接斗争方面，十月革命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无与伦比的胜利。被压迫阶级发起的这样一种强大进攻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个阶级如此从容而迅速地推翻有产阶级在全国各地的统治，并把它的统治扩大到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到俄国遥远的每一个角落。

十月起义的这个胜利已表现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其软弱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有环境下形成的……

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的旧机器，但这完全不是说没有那些构成国家政权的旧机器的因素也行。

工人阶级的不幸在于他们总处在一种被剥削的地位。这表现在一切方面：既表现在它的文化水平上，也表现在它没有统治的习惯上，这种习惯是统治阶级具有的，并由他们的学校、大学等机构遗传下来的。这一切工人阶级都没有，但必须掌握它。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必须把旧的国家机器看作是阶级压迫的机器。但是同时从技术上的需要来看，它又必须从这部机器里吸收所有有技术的人，把他们安置到需要的地方去，利用这些人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要全面发展所面临的任务。

① 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托洛茨基就辞去外交委员的职务，担任了军事委员的职务，受命组建红军。在这个讲话里谈到有关组建红军的若干原则问题：吸收旧的军事专家、军官选举等问题。

这里我要谈谈大家都认为是我党生活中最重要而又很棘手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组织军队的问题，特别是吸收军事专家的问题，坦率地说，就是吸收以前的军官和将军来建立军队和管理军队的问题。现在成立的所有的军队基本指导机构都包括一个军事专家和两个政治委员。这就是目前军队领导机构的基本体制。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的会议上说过，在指挥和作战方面我们要使军事专家负起全部的责任。为此，我们要给他们必要的权利。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害怕这样做，其理由可在某些党组织的决议中找到……这里，党的任务仍是要在我们中间毫不留情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会毁灭国家，给我们党脸上抹黑甚至瓦解我们的党……。

在组织军队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所谓选举原则问题。总的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想要同旧军官队伍作斗争，控制指挥人员。

只要政权还在敌视我们的阶级手中，当指挥人员是这个政权手中的一个工具时，我们应该努力用选举原则的方法粉碎指挥人员中的阶级反抗，但是现在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我们是从工人中间招兵的。

在现政权的军队里——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它已被法令所抛弃……

建立军队的问题对于我们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你们大家和我一样都了解这一点。但是，单靠至今仍极其可怜的行政机器，我们是不能建立军队的。如果说我们有强大的机器的话，那就是一部思想机器，那个机器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将建立军队。同志们，请尽力铲除我所说到的那种偏见；党将帮助我们将有战斗力和献身精神的工人和农民充实到革命军队干部队伍中来，并将在车间、工厂和农村进行义务军事训练，只有这样，才

能建立起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机器。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44—146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关于大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节录〕

(1918年6月28日)

为了果断地解决经济上的无组织状态和粮食供应上的混乱，更坚定地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村穷人的专政，人民委员苏维埃决定：

1. 兹宣布凡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以下的一切工商企业，他们所有的资本和财产，不管是些什么财产，都是俄国社会主义联盟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

2. 国有化工业应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组织……

3.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各个企业发布特别规定以前，由本法令宣布财产已归俄国社会主义联盟苏维埃共和国所有的企业被看作是免息租借给他们的前产业主；理事会和前产业主将继续向企业提供资金……并且也从企业那里得到收入……

4. 自发布这项法令起，国有化企业的管理人员、理事及其他负责官员将向苏维埃共和国负责；企业的完整无损、维修和它的正常运转。那些没有得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可擅离自己岗位的人……或发现是玩忽职守的人要受到共和国民法和刑法的处分。

5. 企业的全体人员——技术员、工人、理事会理事和工头——都被看成是俄国社会主义联盟苏维埃共和国的职工；他们的工资数根据国有化时已定的级别定，工资由各个企业资金支付。那些擅离自己岗位的人……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处分和受到法律严

厉的惩罚。

6. 属于理事会会员、股票持有者和国有化企业所有者的一切私有资本，在决定这种资本所属关系以前并入转换资本或有争议的财产中。

7. 一切国有化企业的理事会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在1918年7月1日前交出一份各自企业的财务报告。

8.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受权立即制订并向一切国有化工厂送去有关实施本法令的详细指示。

9. 属于消费合作社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

10. 本法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 瞿鲁巴、诺根、李可夫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58—160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定

（1918年12月8日）

革命的一年，苏维埃俄国组织起来并已得到巩固。国内的反革命已经被粉碎。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已经停止。坚决捍卫俄国统一和独立的红军已经建立起来。工厂已经开工。运输机构和粮食机构都已经安排就绪。苏维埃政权机构正在不停地发挥作用。

但是，只有上述这些还是不够的。世界帝国主义新的进攻和把俄国变成军营的企图，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要求我们大家努力工作。为了把我国的国防能力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必须使苏维埃的力量非常团结，行动非常集中，完成任务十分迅速而准确；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机构达到完善的程度。

否则，就无法设想战胜帝国主义。

虽然如此，可是有一些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机构，还不完全清楚当前局势对自己提出要求的全部重要性和迫切性。一些省的机构至今还在继续颁布往往与中央政权法令相矛盾的自己的法律和法令，给苏维埃共和国总的立法工作造成了混乱。一些地方和省正在设置许多关卡和障碍，妨害中央关于从丰收地区向缺粮地区运送粮食的工作，限制产品和人员在共和国境内的调动。一些地方和省作出许多阻碍中央支配共和国财产的决定：设税卡、开工厂、疏散货物、留各种储备。最后，文件满天飞，办事拖拉，苏维埃机关拥塞，使苏维埃生气勃勃的工作有淹没在废纸堆中的危险。

这一切都在阻碍完善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工作，有害于迅速而令人满意地向军队和居民供应一切必需品。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国防委员会决定：

1.各省和地方苏维埃机构妨碍中央政权调动人员和产品的决议和命令，均须根据有关人民委员的指示立即废除。

2.各省和地方苏维埃机构妨碍中央政权支配全民财产（关税、国有化企业、疏散的货物、军事和非军事主管部门仓库中的财产）的决议和命令，均须根据有关人民委员的指示立即废除。

3.各省和地方苏维埃机构有责任准确地绝对地执行中央政权的决议和命令。

4.要根除中央和地方文件满天飞、办事拖拉的现象。中央政权的命令要迅速地、毫不拖延地执行，把传抄文件改成电话洽谈，把公文旅行改成电传，同时一定要检查每一个命令、每一项指示的执行情况。

5.犯有破坏本决定的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党龄长短，都要追究责任并按革命法律严加处理。

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5—167页。方钢
译)

(五) 摆脱帝国主义战争

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停 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建议”

(1917年11月8日)

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所支持的在10月24—25日(11月6—7日)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工农政府，敦请一切交战国和他们的政府，立即开始谈判，以实现公正的民主和平。

这种公正的民主和平是一切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怨声载道和苦恼万分的交战国的绝大多数工人劳动阶级早就盼望着的；这种和平是推翻了沙皇王朝以后的俄国工人、农民最明确坚决的要求——本政府认为这种和平必须是一种不割地(即不夺取外国领土、不合并外国民族)和不赔款的直接的和平。

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平，并表示愿意立即采取一切决定性步骤，直至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全权人民代表大会最后确认这种和平的一切条件为止。

本政府认为，按照一般民主的合乎法律的判断，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判断，吞并和征服外国领土就是把一个弱小国家联合到一

个强大国家中去，而不管这个强行合并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同样也不管已被强行合并或被强行留在这大国领土内的国家是如何先进和落后；最后，也不管这个国家是在欧洲，或是在遥远的海外。

如果一个国家被强行留在大国的领土之内，如果违背它所表示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由报纸、国民大会、党的决议或是由反抗这种压迫的起义所表示，如果不允许自由选举和不全部撤退合并国的军队或较强大国家的军队，使其不能自由地决定其民族生存的权利，那么，它的合并就是一种吞并，换句话说，也就是征服和暴行。

继续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使强大的较富有的国家在他们之间瓜分已被他们征服的弱国。本政府认为这是滔天大罪，并庄严宣布它愿在上述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同样公平的条件下签署结束这一战争的和平条款。

同时，本政府宣布它不认为上述条件就是最后的条件，也就是说，它在同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款，只是要求这些条款应尽快地由交战国的任何一方提出，而且这些和平条款应是非常明确，绝无任何含糊或任何秘密。

本政府废除一切秘密外交，坚决表示希望公开进行一切谈判，立即开始全文公布自1917年2月至10月25日（11月7日）的由地主、资本家政府所批准和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废除这些秘密条约，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条约都把利益和特权让给了俄国的地主、资本家，继续进行或扩大大俄罗斯的吞并。

在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进行公开谈判以缔结和平时，本政府表示愿意进行这些谈判，无论是用书信或电报形式进行，或是不同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或是由这些代表召开会议进行都可以。为了促使谈判进行，本政府邀请了中立国的全权代表。

本政府建议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立即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同时，期望停战协定在三个月内达成。——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以内，一切卷入或被迫参加战争的国家 and 民族的代表完成和平谈判是十分可能的，并且也有可能完成召开各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和平条款。

俄国临时工农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和平的建议时，还特别向世界上三个主要的国家，即参加这次战争最大的三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有知识的工人们呼吁。

这些国家的工人们，曾经为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英国工人曾进行过宪章运动，法国无产阶级曾进行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德国工人曾为反对德国的特别法律而进行过英勇斗争，并为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组织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创造力的事实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会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关于使人类摆脱战争恐怖及其后果的问题，工人们普遍的决心和他们无限的活动能力将帮助我们顺利地地完成这项和平事业，并同样地帮助我们解放那些受束缚和受剥削的劳动群众。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獻。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81—84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人民委员会给最高总司令杜鹤宁的命令

（1917年11月20日）

公民最高总司令：

人民委员会已经受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的委

托掌握政权，同时负责向所有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要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火，并且为了在民主基础上缔结和约立即举行谈判。现在，当苏维埃政权已在国内所有各个重要地点确立下来之后，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各交战国——无论是盟国，或者是仍然同我们处于敌对行动中的国家——正式提议停战。外交人民委员已向在彼得格勒的盟国所有全权代表发出相应的通知。

人民委员会囑你，公民最高总司令，在接到这个通知以后，立刻去执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的决定，向敌军军事当局提议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以便举行和平谈判。因为让你负责进行这些预备谈判，人民委员会命令你：1：将你同敌军代表进行谈判的情况不断地用直通电讯向委员会报告；2：只有在人民委员会事先同意后，方能签署停战文件。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人民委员 托洛茨基

军事人民委员 克雷连柯

秘书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8—169页。方钢
译）

苏维埃政府给美国大使的照会^①

(1917年11月21日)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大使先生，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于10月26日（11月8日）组成了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即人民委员会。这个政府的主席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委托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来领导对外政策。

请您注意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所赞同的、建议停战和在民族自决基础上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的条文，我很荣幸地请您将上述文件视为在一切战线上立即停火并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建议，视为具有全权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同时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出的建议。

大使先生，请接受苏维埃政府向合众国人民表示的深切敬意。合众国人民不会不致力于和平的，正如其他一切被空前的大屠杀弄得筋疲力竭、一蹶不振的人民那样。^②

外交人民委员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69页。方钢译)

① 苏维埃政府同时也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等国的大使或公使发出了同样的照会。

② 1917年11月21日，驻彼得格勒的盟国的大使和公使，在外交使团领袖美国大使A·弗兰西斯的倡议下，采取了不答复苏维埃政府照会的决定。——原编者注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声明

(1917年11月22日)

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党处于在野地位时落在肩上的义务，着手公布沙皇统治时期和革命头7个月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对外政策方面的秘密外交文件。秘密外交是有产者少数人手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他们为了使多数人服从自己，不得不欺骗多数人。具有世界侵略计划和掠夺同盟与交易的帝国主义，使秘密外交达到高度发展。反对使欧洲各国人民一蹶不振并四分五裂的帝国主义，同时就意味着反对那种非常畏惧白昼光亮的资本主义外交。俄国人民以及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当知道，金融家、工业家及其议会和外交代理人共同秘密炮制的那些计划的确凿真象。为了取得了解这种真象的权利，欧洲各国人民曾经付出代价，遭到巨大牺牲和经济上的普遍破产。

废止秘密外交是忠实执行真正民主的人民外交政策的首要条件。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把执行这种政策作为自己的任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公开建议立即停战，同时公布那些对于掌握政权的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已经失去任何约束力的条约和协定。

德国和奥匈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报界人士，可能会企图利用已经公布的文件，使中央帝国的外交工作获得胜利。但是，这方面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彻底破产的。其原因有二。第一，我们打算把那些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央帝国外交活动的秘密文件很快诉诸社会舆论。第二，——并且这是主要的——秘密条约的方法也是国际性的，正如帝国主义掠夺一样。当德国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接触到本国政府各办公厅的秘密时，它就会从那里得到一些无

论如何也不会放过的文件，而我们要公布的也正是它们。剩下的事情只是希望公布得尽量快些。

工农政府要废除秘密外交，不搞阴谋、密码和谎言。我们什么也不隐藏。我们的纲领是表达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热烈愿望的。我们希望各国人民在诚心诚意共处与合作基础上最快地缔结和约。我们希望最快地推翻资本的统治。当我们把统治阶级的工作，象它在秘密外交文件中所表现的那样，向全世界进行揭露的时候，我们向劳动人民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且把这一号召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基础。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73—175页。方钢
译）

苏维埃政府致彼得堡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

（1917年12月5日）

致彼得堡各国外交代表的通告如下：

大使先生们：

我荣幸地向你们宣布，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1月8日成立了全俄共和国新政府。

我被任命为本政府的外交委员，请阁下注意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下面的提议，其中包括基于各国独立和有权决定他们自己发展道路的原则所提出的停战和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的建议。我荣幸地建议你们本着在全部战场上立即停战的正式建议的精神来考虑这个文件^①，并立即采取步骤，着手和平谈判。本政府将

^① 指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建议”这个文件。

以全俄共和国的名义，向所有的国家和他们的政府提出这一建议。请接受苏维埃政府的保证，保证完全尊重至今仍无和平愿望的〔法国〕人民和一切由于长期互相残杀以致流尽鲜血和疲惫不堪的各国人民。

（签名）列·托洛茨基

11月22日于彼得格勒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 的文献，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
文版，第80—81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托洛茨基致各同盟国政府使馆的照会

（1917年12月20日）

以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为一方同以俄国代表为另一方的谈判业已开始进行。为了使我们有机会把谈判情况及其发展趋向告诉各同盟国人民和政府，在我国代表团的提议下，谈判中断了将近一星期。俄国建议：1. 宣布所设想的停战是为了按照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所制订的民主原则缔结和平；2. 保证双方在停战时期不再把军队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战场；3. 从莫昂宗德群岛撤退。关于战争目的的问题，双方代表借口只要求他们涉及停战的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回避直接给予回答。在普遍停战的问题上，双方代表以同样的方式借口在权威缺席的情况下不讨论同那些没有派代表参加谈判的大国的停战问题。双方代表都提出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范围停战28天的建议，并保证同时把俄国代表关于立即通知一切交战国——即除俄国以外的一切同盟国参加谈判的建议转交给他们各自的政府。我国代表团不愿意在目前谈判阶段签订一项正式停战协议，我们再

次决定停止军事行动一星期，还决定在同一时期中断停战谈判。这样，在苏联政府制订出第一个和平法令到重新和平谈判之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一段时间，即使在目前国际通讯联系混乱的状况下，也能使各同盟国政府有充分时间决定他们对待和平谈判的态度，即宣布他们愿意或者拒绝参加停战和和平谈判的预备谈判。如果公开拒绝参加，那就应明确肯定地说明欧洲国家在第四个年头的战争流血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 的文献，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
文版，第99—100页。黄裁桃译，王毓琳校)

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发表的声明

(1918年1月4日)

在12月22日的会上，俄国代表团就已经宣布，它从俄国人民清楚表达的愿望出发，争取尽快地缔结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普遍的公正的和平。俄国代表团在呼吁注意全俄工兵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指出它认为继续进行以吞并为目的的战争是一种罪行。

从这些方针出发，俄国代表团建议和平谈判应基于以下六点进行：

1. 绝不容许强行合并战时侵占的领土；占领这些领土的军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撤出。
2. 必须全部恢复战时丧失独立的人民们的政治独立。
3. 必须保证战前政治上不独立的民族集团有可能用公民投票

方式决定属于哪个国家和享有政治独立的问题。在公民投票中必须保证有争议的地区的全体人民，包括移民和难民，能够完全独立地进行。

4. 在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权利应由特别法令加以保护，给予民族文化的独立，如果实际可行，可自治管理。

5. 交战国的任何一方都无须付另一国家所谓的战争损失费。已经征收的款项必须退还。私人由于战争所遭受的损失将由一项特殊的基金予以解决，这项基金将由交战国平均分担。

6. 殖民地问题应按照第1点至第4点中规定的原则决定。

作为上述的补充，俄国代表团建议缔约各方把强国公开反对弱国的自由当作不能容许的行为，例如：用经济封锁、在强制性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一国对另一国实行经济控制、用特殊的关税条约限制同第三国贸易的自由，或者采用并非出于战争目的的海上封锁等等。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献，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
文版，第100—101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附录 康特·采尔宁以四同盟国代表团的名义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发表的声明

（1918年1月7日）

各同盟国代表团从他们的政府和人民所明确表示的愿望出发，争取尽快缔结普遍和公正的和平。各同盟国代表团（按照他们的政府一再声明的立场）认为俄国人提出的主要方针是缔结这种和平的讨论基础。四同盟国代表团同意立即实现不强行占有领

土和不要战争赔款的普遍的和平。在俄国代表团谴责征服而进行的战争时，同盟国代表团一致同意俄国所持的观点。同盟国政府发言人在他们的纲领中一再强调同盟国不会为了达到征服的目的，而将战争多延续一天。各同盟国政府将严格遵守这一立场。他们庄严地宣布决心毫无例外地在上述基础上并以对交战各国都公正的条件尽快缔结旨在结束战争的和平。然而，如果要实现俄国所陈述的设想，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一切目前参加战争的大国在适当时期内，必须无例外、无保留地遵守所有国家必须遵守的条件；因为如果俄国的同盟者不保证承认和忠实地履行这些条件，并且无保留地对待四同盟国的话，正在同俄国进行谈判的四同盟大国将不会单方面使自己受这些条件的束缚。

这一点前面已说过，对俄国代表团提出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六点建议，以下方面必须予以注意。

1. 同盟国政府不想强行侵吞目前已被占领的土地，必须本着撤出各地军队的精神来解决占领地的军队问题。

2. 同盟国不打算剥夺任何一个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政治独立的国家的独立。

3. 四同盟国认为，那些不享有国家独立的民族集团对国家的忠诚问题，不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如果需要解决的话，应由每个国家同它本国人民按宪法形式来独立地解决。

4. 同样地，根据四同盟国发言人的声明，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是人民自治的宪法权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凡是这一原则实际上能付诸实现的地方，同盟国政府都同意运用这一原则。

5. 同盟大国屡次强调双方不仅可能放弃战争费用的赔偿，而且可能放弃战争损失的赔偿。所以，每个交战大国必须为它的已成为战俘的国民的开支予以补偿，还得赔偿他们在本国为反对敌国民众采取的非法武力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俄国政府提议为此目的建立一项特别基金，这一建议只有当其他交战大国在适当时期

内参加和平谈判时，才能得到考虑。

6. 德国是四同盟大国中的唯一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德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俄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提议，并作如下声明：归还在战时强行占领和征服的殖民地领土，是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人要求迅速撤出被敌方占领的领土，这同样符合德国人的想法。鉴于德国殖民地领土的特点，代表团在以前讨论过的原则基础上建议的形式，似乎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德国殖民地的本地居民反对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困难很大，而胜利的希望很小，加上敌人不断得到大量的海外增援，然而他们还是无比忠于他们的德国朋友，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对德国是有感情的，也显示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德国站在一起的决心，这是用投票方式无法表现出来的事实。俄国代表团建议的刚讨论过的包括在6点建议中的经济交流的原则，得到同盟国代表团的无条件的赞同，这些原则一贯主张排除一切经济压迫，注意恢复正常的经济交流，并对有关各方面的利益予以充分考虑，这是巩固目前交战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①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的文獻，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
文版，第101—103页。黄栽桃译，王毓琳校）

^① 对于同盟国的声明，俄国代表团团长回答说：“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代表团接受了没有吞并的普遍民主和平这一原则。俄国代表团看到了这一进展对于走向普遍和平的极端重要性。然而，必须看到答复中对第3点有很大的保留。俄国代表团还满意地注意到四同盟大国的声明中有关第5点的承认不赔款的原则，可是又对赔偿战俘的损失有保留。”

托洛茨基向各同盟国人民 和政府发出的邀请

(1918年1月11日)

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到1月8日已中断了10天，其目的在于给各同盟国最后的机会参加以后的谈判和使他们有可能避免承担俄国同敌国之间达成一项单独和平的一切后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制定了两个纲领。第一个表达了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观点。第二个是为德国政府及其盟国制定的。

俄国政府的纲领是一个实现最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这个纲领旨在创造这样的条件：1. 每个民族不论它的力量大小和总的发展水平高低都应享有民族进步的完全的自由；2. 全体人民应当在经济和文化的合作中团结起来。

同我们交战的各国政府的纲领则不同，他们申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并不想强行吞并在战争中已被占领的领土；也就是说，敌国正准备根据和平条约从现在占领的比利时、法国北部、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和库尔的领土上撤出，以便使有争议的领土的命运问题和政府的性质问题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敌国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主要是本国劳动阶级的压力，才采用了这个步骤，以满足对民主的要求，这一步骤也包括放弃新的暴力吞并和赔款。

可是，当放弃新的吞并时，敌国政府认为过去对人民的吞并和暴力是历史的习惯作法。这就意味着以阿尔萨斯-洛林、特兰

西瓦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为一方的命运和以爱尔兰、埃及、印度、印度支那等地为另一方的命运都不应当再更改。这样的一种纲领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它意味着帝国主义的野心同工人主要求之间所作的无原则妥协。尽管如此，提交这样一种纲领仍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各同盟国人民的政府（指那些同俄国联盟的政府。——原编者注）至今没有参加和平谈判，他们硬是拒绝阐明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现在还不能说战争是为了解放比利时、法国北部和塞尔维亚等地，因为德国及其盟国都已作了表示，如果缔结了普遍和平，他们愿意从这些领土上撤退。既然敌人已宣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仅仅一般地表示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不可能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的。必须明确地说明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和平纲领是什么。他们不也象我们一样在请求把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决定权交给阿尔萨斯-洛林、加里西亚、波兹南、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人民吗？如果他们在这样做，他们是否也愿意承认爱尔兰、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其他国家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呢？就象在俄国革命的保护下，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都有了这种权利一样。很清楚，如果只是要求把自决权给敌国人民，而不给本国人民或自己殖民地的人民；那无异是提出了一个最玩世不恭的帝国主义纲领。

如果各同盟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俄国政府一起，在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的自决原则上建立和平，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把这个权利交给本国被压迫人民的话，那么将创造出这样的国际条件，即当德国的，特别是奥匈帝国的本来就有矛盾的纲领表现出它全部的弱点时，有关方面的人民的压力将会使反对的意见无法得逞。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同盟国政府，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愿意接受真正民主的和平。他们对于民族自治权的方针的怀疑和仇视丝毫不亚于德国和奥匈帝

国。在这一点上，觉醒了的各同盟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一样很少抱有幻想。鉴于各国政府实际所持的态度，一切可能做到的是，作为德国和平条件基础的帝国主义妥协纲领应与另一个帝国主义妥协纲领同时存在，否则战争会继续下去。而现在当我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面临两种纲领时，我们有必要作出明白无误的回答。和平谈判还能继续10天。俄国并不指望在这些谈判中和各同盟国政府达成协议。即使普遍和平继续遭到反对，俄国代表团也还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由俄国单独签字的和平，无疑地将给各同盟国家，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以严重打击。单独讲和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肯定将不仅决定俄国，而且还决定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同盟国家的政策。俄国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实现普遍的和平。没有人可以否认在这方面得到的成果的重要意义，但是对将来来说，一切都取决于同盟国人民自己。强迫他们自己的政府立即阐述他们的和平纲领和参加和谈已成为各同盟国人民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斗争的一件大事。俄国革命为在协议基础上立即开始一般性谈判。在这些应以完全公开为条件的谈判中，俄国代表团将继续维护国际社会主义民主纲领，反对同盟国政府和敌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纲领。我们的纲领的胜利将取决于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努力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意志所削弱的程度。如果带有腐朽没落阶级特点的盲目固执的各同盟国政府再一次拒绝参加和平谈判，那么工人阶级就要从那些不能给人民和平或不打算给人民和平的人的手中夺过权力。

这10天将决定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命运问题。如果现在不能在法国和意大利前线缔结停战协议，一场毫无理性的、无情的和无益的新的攻势，象过去进行过的一样，将使双方作出新的不可估量的牺牲。由统治阶级发动的这场战争，必然要导致欧洲国家的全部毁灭，但人民将活着，他们有权活下去。他们必须推翻所有那些不允许他们自由生活的人。在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参加和

平谈判的同时，我们保证在和平、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旗帜下尽全力支援那些将要起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各国工人阶级。

(译自《关于和平建议和战争目的 的文献，
1916年12月—1918年11月》，伦敦1919年英
文版，第104—107页。黄裁桃译，王毓琳校)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

(1918年2月10日)

据我们的理解，小组委员会的任务是回答如下问题：对方所提出的边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俄国人民哪怕最低限度的自决权。我们听取了参加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我方代表的报告，我们认为，在对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辩论和全面研究以后，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了。各国人民在焦急地等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结果。各国人民在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由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的自私和贪权所引起的空前的人类自相残杀？如果在某个时候战争曾经是为了自卫而进行的，那么它对交战的两个阵营来说早就不再是这种战争了。如果大不列颠攫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那么这就不是自卫战争；如果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和罗马尼亚以及攫取莫昂群岛，那么，这也不是自卫战争。这是分割世界的斗争。现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

我们再不愿意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满足有产阶级的贪欲，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我们

对两个阵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我们不再同意用我国士兵的鲜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

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即将到来的时刻，那时，世界各国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将象俄国的劳动人民那样把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农民士兵应当回到自己的耕地上去，就在今春和平地耕种革命从地主那里夺来转交给农民的土地。我们的工人士兵应当回到工厂去，在那里生产不是进行破坏的工具，而是建设的工具，同农民一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退出战争。我们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我们向目前正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军队的我国军队发出了全而复员的命令。我们等待并且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按照我们的榜样去做。同时我们声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这些条件遭到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和德国人民的拒绝。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爾兰、爱斯兰的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强好他们的意志；而对俄国人民来说，这些条件则意味着经常的威胁。全世界人民群众根据政治认识或道德本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正在等待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阶级制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准则的那一天到来。我们拒绝认可德国和奥匈帝国主义用利剑写在各国人民身体上的那些条件。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下签字。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军事占领权统治各国土地和人民。让他们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根据上述声明，我向同盟国联合代表团递交如下业已签署的

书面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谨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以及中立国的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兼并的条约上签字，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托洛茨基、越飞、波克罗夫斯

基、比岑科、卡列林

（译自《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1918年8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282—283页。郑异凡译）

附录 布哈林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录〕^①

（1918年3月7日）

在和平的条件中有……把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贬为零的几点。当然，我们已经说过，而且还要说，整个事业有待于国际革命能否胜利。国际革命——也只有国际革命——才是我们的救星。列宁同志也同意这点。在这点上如果我们不放手进行国际宣传，我们就是交出了自己能支配的最锐利的武器。国际宣传是一个能响遍全世界的大钟，如果我们不放手使用它，就等于是在割掉自己的舌头。……迄今为止，俄国革命的全部巨大力量，它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极大影响体现在它所制订的一个完全清楚、

^① 布哈林在报告里要求拒绝接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在经过同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系列问题的辩论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退出政府，以示抗议。

准确、肯定的行动纲领中，这个纲领不仅刊登在报纸和出版物上，而且是在用行动加以贯彻执行。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和它所执行的明确肯定的纲领，使它成了最有吸引力的力量。可是现在，我们将要向全世界、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无产阶级宣布，它〔苏维埃共和国〕不再大量进行宣传，而是负起了保护德国利益、反对英国在殖民地国家〔波斯和阿富汗〕资本的神圣任务，我们曾认为这些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权利是一个斗争的口号——请原谅，但我认为这一点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给了苏维埃政权以全面的破坏——我们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两天的喘息时间。两天的喘息时间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因为这样做不仅是向资本主义妥协，而且毁坏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

……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列宁不同意这一出路，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唯一的出路，即是进行反抗德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机会主义者从不考虑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增长组织斗争的能力……。

我们不必指出那种认为在几天的喘息时间内就能够建立起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并稳住铁路、生产以及供应的说法纯属幻想。根本不存在这种前景，我们必须反对这一看法。我们目前能做的是在斗争过程中把广大人民引导到斗争中去……。

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我们必须接受的真正的前景，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说，这是唯一的前景，即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前景，它将具有国内战争反对这个资本主义的特点……

……我们现在说，我们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指列宁和他的支持者）——是使工人们为迎接即将来临的不可避免的时刻和可怕的冲突随时准备献出他们的一切。这一点对于俄国革命的命运和国际革命的命运关系甚大。

因此，我们建议放弃迄今为止一直执行的政策，废除对我们

毫无益处的标志着投降的和平条约，着手建立一支随时准备进行战斗的红军……。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41—143页。黄裁桃译，王毓琳校）

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①

（1918年3月15日）

代表大会批准我国代表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和平条约。

由于我国军队不足，由于我国人民被战争消耗得筋疲力竭，并且不仅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不能得到行动上的支持，而且还受他们掣肘，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缔结这项极端痛苦、异常屈辱和带强制性的和约。代表大会认为它们的行动方式是正确的。

和谈代表团拒绝详细讨论德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是要用明显的最后通牒和露骨的暴力强迫我们接受。代表大会认为和谈代表团的这种行动方式也是绝对正确的。

代表大会最坚决地向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向全体劳动者和被压迫大众提出当前最主要、最迫切、最必须的任务：提高劳动者的活动能力和自觉纪律，在四面八方都建立尽可能包括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的巩固严密的组织，同混乱、无组织、完全破坏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混乱、无组织和完全破坏状态，作为惨

^① 这次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这就使得苏维埃政权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还决定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都迁至莫斯科。

痛战争的遗产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和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巩固来说又是首当其冲的障碍。

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推翻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绝交并由我们公布帝国主义的一切秘密条约以后，在宣告外债无效以后，在工农政府毫无例外地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公正的和约以后，俄国挣脱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枷锁，首先声明它不参与对别国的掠夺和压迫。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今后一致谴责掠夺战争，认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来自帝国主义强国的一切可能的进攻，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集中全力以社会主义民兵制为基础，并对全体青年和成年男女公民普遍进行军事知识和军事工作的训练，来恢复和提高我国国防能力，来恢复我国军事威力，是全体劳动群众不可推卸的责任。代表大会始终不渝地相信，苏维埃政权过去曾经坚决履行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国际团结方面的一切义务，今后也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促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保证和加速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各国人民之间持久公正和平的进程。

代表大会深信，国际工人革命已为期不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完全胜利已有保证，尽管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野蛮的镇压。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176—177页。方钢
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①

(1918年11月13日)

致俄国各族人民、一切被占领地区的居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庄严宣告：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条件已经失去其效力和意义。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以及1918年8月27日在柏林签订并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9月6日批准的补充协定）的全部和各部分均宣告废除。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所载有关赔款或割地的一切义务均宣告无效。指责苏维埃大使馆从事于推翻德国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活动而将其逐出柏林，是威廉二世政府（它曾以暴力促成这个和约，以便削弱和逐渐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对共和国周围的各族人民无限地进行剥削）的最后一着。苏维埃共和国大使馆的号召，是德国工人和士兵起来推翻君主制度的第一个行动。

这样一来，代表暴力和掠夺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就在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联合打击下被摧毁了。由于德国革命而从德国军阀强迫签订的掠夺性条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里夫兰地、爱斯兰地、波兰、立陶宛、乌克兰、芬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劳动群众现在被认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社会主义的和平，即由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的俄罗斯、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各民族的劳动群众所缔结的

^① 宣布废除1918年3月3日同德国帝国主义签订的野蛮的布列斯特和约。

和平应该出来代替帝国主义的和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德国和前奥地利-匈牙利的兄弟民族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建议立即着手讨论有关废止布列斯特条约的各项问题。在真正人民的和平基础之上，只能有符合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工人之间关系的以及十月革命所宣布和俄国代表在布列斯特所坚持的原则。所有被占领区将予以肃清。对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应承认其有充分的自决权。一切损失将由真正的战犯、由资产阶级负责。

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士兵，目前正在被占领地区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同当地的工农苏维埃进行联系，他们将成为劳动人民在实现这些任务方面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他们与俄国农民和工人结成兄弟同盟，来医治那些维护反革命利益的德国和英国将军们给被占领地区居民带来的创伤。

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和平的关系，而且将成为各国劳动群众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役制度的废墟上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同盟关系。

以苏维埃政府为代表的俄国劳动群众正在向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人民建议建立这一同盟关系。

他们希望，尚未挣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能加入俄国、波兰、芬兰、乌克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高加索、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被解放人民的这一强大同盟。直至这一时刻到来之前，这一人民的同盟都将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压迫强加于各国人民的任何企图。

由于德国革命而从德国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俄国各族人民，再也不会屈服于英美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了。

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曾向它的一切交战国建议缔结和平协定。直到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迫使自己的政府接受同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好的时刻到来之前，俄国都要依靠目前整个中欧和东

欧的革命力量，反对重新使俄国受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奴役的企图。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谨向从德国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所有各个地区的居民致意，号召那里的劳动群众同俄国工农结成兄弟同盟，并答应充分地彻底地支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工农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由于暴力而缔结的和约应予废除。

真正的和平——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同盟万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 乌里扬诺夫（列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瓦·阿瓦涅索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37—238页。方钢
译）

（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

罗马尼亚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宣言〔节录〕

（1917年底）

从波罗地海到多瑙河口，在长达几千公里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停止了互相残杀——订立了停战协定。新成立的俄国政府为工人和千百万士兵开始和平谈判。

工人们！

不论是罗马教皇或帝国主义者，不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工厂主都不能使各国人民得到他们渴望的和平，和平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在俄国城市的街垒用工农革命者的鲜血争得的。

俄国工人的毅力、正直和信念，革命的社会主义挽救人类免于毁灭，从此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工人们！现在在俄国既没有皇帝、贵族又没有工厂主和剥削者，也没有警察和贫困。在俄国，农民得到了土地，工厂也被没收。

工人们！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本身，我们能够并且应该自己解放自己。罗马尼亚的城乡工人不能再让统治阶级掌管我们的命运。因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罗马尼亚两千家贵族和工厂主的利益根本对立。

我们在斗争中并不孤立。我们同全世界无产者齐心协力并且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协助下一定会取得胜利。请把你们的目光集中到那红旗飘扬的地方。国际无产阶级万岁！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列宁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80年俄文版，第39—40页。黎扬译）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党小组宣言

（1918年11月7日）

工人们！同志们！

我们解放的唯一道路就是革命，因为只有按照俄国工、农的榜样拿起武器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万岁！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0页。黎扬译）

不列颠社会党执行委员会 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的决议

（1918年1月30日）

不列颠社会党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衷心地祝贺它在十月初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

不列颠社会党热烈祝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认为这是争取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国际社会主义迅速胜利创造条件的伟大成就。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0—21页。黎扬译）

英国社会党1918年10月24日《号角》报 关于俄国事件的论文〔节录〕

有人把我们不列颠社会党人称为英国布尔什维克。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简直无从想象还有比这更高的荣誉和尊称。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伟人，他们将作为造福人类的伟大战士，新纪元

的宣告者载入史册。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1页。黎扬译)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第 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节录〕

(1920年9月根据史麦拉里^①的提议通过)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第十三次例行代表大会的代表向俄国无产阶级表示热烈祝贺，祝贺它备遭世界大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痛苦磨难之后，在世界上首先打碎了专制制度的锁链，消灭了资产阶级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没有奴隶也没有统治者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

男女无产者同志们！我们曾怀着激动不安的紧张心情，注视着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消灭了那把你们无数优秀同志断送在监狱、绞刑架、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铅矿的沙皇制度，你们摧毁了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富丽堂皇的大厦。你们通过当时还处处都有大量士兵互相厮杀的前线，首先向全世界发出“和平属于人民”的呼声，你们首先向全世界无产者伸出手来，倡议签订和约，接着就开始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大业……

俄国男女无产者同志们！我们确信你们必定取得胜利。真理和道义在你们那边。你们定能争得顺利完成宏伟的国内改造事业

① 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原编者注

所需的和平和安定。过去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扼杀你们的时候，没有消极、观望、无动于衷，而是竭尽全力抵抗也想拖我国工人下水公然与你们对抗的资产阶级罪犯，那么将来，我们也必然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义务。谁要向你们发动新的进攻，那就让他们试试吧！

我们向你们致以发自千百万无产者内心的亲切真诚的问候，向你们和你们的事业表示祝贺，我们渴望和你们齐心协力一致行动，并衷心希望尽快和你们建立紧密的、兄弟般的无产阶级的联系。

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6—37页。黎扬译）

《10月28日和11月7日》〔节录〕

（1941年11月）

尤·伏契克

我们在争取各民族生存和自由的伟大斗争时期来回忆能照亮我们走向未来的两个过去的伟大节日：1917年11月7日——俄国各族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和1918年10月28日——我国民族解放纪念日。

这不是偶然的日期比较。在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合乎规律的历史联系。如果没有11月7日，也不可能有我们的10月28日。1917年11月在可怕的震撼全世界的战争轰隆声中，从东方发出了自由的呼声：消灭战争，消灭民族奴役和导致战争的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在创立体现人类崇高理想的自由和公正的新

制度。各国的劳动者们，我们在为你们作出榜样！

这种呼声震撼了全世界，动摇了欧洲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解放了欧洲各国革命力量，并指出了斗争的前途。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实现的民族自决权是欧洲许多被奴役民族的榜样，少数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欧洲南部和中部斯拉夫各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从中吸取了力量，俄国人民争得的权利引导我们走向10月28日……。

如果说1914年捷克人曾经指望维也纳当局在不脱离奥地利王国的范围内做某些让步的话，那么在1917年11月7日以后他们决不会有同奥地利进行任何妥协的想法。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使我们的10月28日充满着新的内容——即不是要求部分让步，而是坚决要求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独立。

红军和全体苏联人民无限英勇的气概，渴望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获得自由的不可摧毁的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必将在我国各族人民过去的伟大日子中增添一个新的，共同的，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即褐色野兽^①遭受失败和灭亡的日子，新的、自由和公正的欧洲诞生的日子。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7—38页。黎扬译）

① 即德国法西斯分子。——原编者注

印度代表在俄罗斯联邦 会议上的发言^①〔节录〕

(1918年11月)

同志们和兄弟们，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印度从遥远的地方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为世界进步和全体无产者取得的胜利。印度对俄罗斯承担的崇高使命表示敬佩。印度向上苍祈祷和请求，求它赐给你们力量把你们已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让你们的思想传遍全球。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46页。黎扬译)

(七) 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

一个士兵对红军国际营的回忆〔节录〕

赛里尔·多尔察克^②

1916年6月，俄国人在加里西亚发起一次进攻，我在这次战

① 1918年11月中旬印度两名穆斯林代表、德里市居民和学者萨塔尔和扎巴尔抵达莫斯科，受到列宁的接见。他们向列宁谈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东方的情况。他们并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② 是斯洛伐克人，原为奥匈帝国陆军士兵。1918年，他加入了红军并成为俄共（布）党员。

役中被俘。我当时只有19岁，但是对战争已经厌烦透了，对于被俘十分高兴……

我们被送到设在弗拉基米尔省木罗姆城的战俘营……

不久，在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被推翻了，利沃夫亲王之类的劳动人民的敌人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冒险家克伦斯基又继之而起。同时，我们也看到工人和农民，还有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创造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克伦斯基号召士兵们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但是士兵们不听他的话。然后，发生了十月革命。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之下，劳动人民在俄国掌了权。

这个时候，我正在莫斯科的苏哈列夫卡市场拐角和萨多沃耶柯尔索街的一家医院里工作。在苏哈列夫卡的著名市场是全市的黑市分子和窃贼的集合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卖一切东西，包括不成对的单只靴子或手套。

在莫斯科市革命战斗进行期间，一切通往苏哈列夫卡市场的街道都被街垒封锁住了。街垒是用市场上的木架子构筑的。

前进的赤卫队分队占领了城郊的工厂和房屋，逐渐攻入市中心。争夺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军事学校的战斗特别激烈。在这个军官和士官生的据点被清除之后，赤卫队分队就开始冲入市中心。资产阶级子弟盘踞的萨多沃耶柯尔索是第二个障碍。在我们医院的房顶上就有赤卫队战士，在战斗期间，我们把弹药、粮食和水送上房顶。血腥的巷战猛烈进行了6天，炮火在我们附近轰鸣。驻扎在我们医院房顶的赤卫队分队的指挥员阵亡了。

1917年11月上半月激战的结果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取得了胜利。街道上的敌人逐渐肃清了，生活恢复了正常状态。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埋葬了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数百名忠诚的战士——士兵、赤卫队员和莫斯科工厂的工人们。

对我们这些原来是战俘的人们说来，这些激战的日子是最重

要的日子。虽然并没有人要求我们拿起武器，但是我们自己却不得不作出抉择：是象一些人那样骑墙观望，还是走上街垒，参加这一边或那一边。我的同志们和我参加了革命方面。

解放一切被压迫者的时刻已经到了。自由现在也降临到我们战俘们身上。

苏维埃政府牢牢地掌握着新国家的舵柄。但是，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还需要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们的活动，这些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干扰着新社会的建设。

在苏维埃政权草创之际，我和俄国同志们一起在一支赤卫队分队战斗，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镇压这些顽固分子。

1918年的5月1日是我一生中度过最奇妙的五一节。当时还没有后来在红场举行的那种盛大的检阅（这种检阅一年比一年更壮观了）。但是，解放了的俄国劳动人民过的这第一个五一节是令人忘记不了的。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高唱着革命歌曲，通过了红场。后来我参加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第一次阅兵式。这一切和俄国无产阶级为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斗争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志愿参加红军。

我遇见了几位当时在莫斯科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有一份捷克文报纸《先驱报》向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战俘们宣传革命的成果。数以百计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参加了在莫斯科的红军部队，这也包括了我的几位同志。后来，我们发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莫斯科工业区的核心红普列斯尼亚区组织一支独立的分队，我们就调转过去了。我们的司令员马尔夏克是一个捷克人。我们受了一段紧张的短期军事训练，同时还参加巡逻、搜索市内资产阶级区域和守卫奥地利领事馆的工作。奥地利领事有时也和我们交谈，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自愿参加红军而不回我们的“祖国”去。也许，在这个“祖国”——奥匈帝国——随着“约瑟夫老爷”皇帝而崩溃和消逝之后，他会

理解我们。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我们亲眼看到了俄国革命不断壮大。有一次在红场的集会上，我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讲话。我阅读了《消息报》上登载的所有由列宁和邦契-布鲁也维奇签署的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新道路在劳动人民面前显现了。但是，反革命分子却把这条道路变成了一条使全体苏维埃人民经受新的牺牲和激烈斗争的道路。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四面围攻，南方的肥沃地区被切断了，中部地区发生了饥荒。

在肃清莫斯科的许多反革命战争残余据点之后，我们被派到了南方战线。1918年8月，我们分队到达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增援第二十三苏维埃团。来自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团和我们同时开赴前线。

我们同一个营驻扎在一起，这个营由一个捷克连、一个俄国连和一个中国连组成。我们的司令员是一个捷克同志，他原来是一个奥地利步兵团的下士。他是一个谦逊而说话和气的人，时刻关心同志们的需要，又是一位无畏的战士。我们的战斗有时类似游击队的战斗。他在这些战斗中表现出确有一个真正的指挥员的才能，几次率领士兵冲出重围。

有一段时期，我们捷克分队补充了一批被红军俘虏的原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①第一团的士兵们。这些俘虏兵可以自己选择继

^① 这个军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组建的，其成员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战俘。1918年5月，法国、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在社会革命党徒和孟什维克派的积极支持下，在伏尔加地区和西伯利亚组织了一场捷克人部队的叛乱，被苏维埃军队所镇压。但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战俘的多数是同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红军的队伍里作战。——原编者注

续留在战俘营里或者参加我们的队伍。那些参加了我们分队的人的表现证明他们是有纪律的战士，他们参加了对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在这些俘虏兵中，还有一些原来的军官，他们也参加了红军。他们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对敌作战很勇敢，只有两个人逃跑到白卫军方面。

我们的营参加了争夺巴拉绍夫、博里索格列勃斯克、新霍彼尔斯克等地的战役和顿河沿岸的其他许多战役。我们并非总是打胜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这一点经常鼓舞着我们。

1918年末，我和几位捷克和斯洛伐克同志在前线作战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并得到了党证。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61—64页。张毅君译》

我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录〕

鲁多尔夫·加拉信^①

……对于匈牙利战俘来说，1915至1916年是最黑暗的年头。在全俄国，这两年也是最残酷的专制暴政下的一段可怕的时期。我们每天要干12个小时沉重的体力劳动，而食物却少到最低限度，不足以维持生命。各种传染病和伤寒大为流行。

只是由于普通俄国人民的关心，数以千计的匈牙利战俘才勉强度过了这些困难的岁月而活了下来。俄国工人也食不果腹，但是经常从自己的孩子口边拿走最后一片面包来救活由于饥饿和疾

^① 是一个匈牙利工人，1915年成为俄国的战俘。十月革命期间，他曾参加过镇压雅罗斯拉夫里地方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叛乱，还在乌克兰参加了清剿反革命匪徒的战斗。

病而即将死亡的匈牙利人。在二月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种非法的救济越来越公开。我们开始互相友好。俄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沙皇已经不再在位了，但是部长们还是原来的那些为他服务的资产者。因此，人民对革命的结果并不满意。

时过不久，在我们的战俘营里也感觉到了革命的影响。有一些看守被撤换了，剩下的看守对我们变得更加宽大。1917年7月，看守长建议我们选举一个自治委员会，我的同志们选举我当了委员会的主席。

看守们签署了一份根据这些情况起草的正式文件，声明放弃对战俘营的一切责任，然后就离开了。他们不仅把给养仓库，而且把武器和弹药也留给我们支配。

看来我们似乎只好自谋活路。但是很快，俄国共产党人就来战俘营拜访了。

他们告诉我们说，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正在准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武装起义。他们要在他们的国家里一举永远废除令人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在战俘营里又看到了许多曾经在伤寒病流行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偷送药品和食物的人们的熟悉和友好的面孔。他们都是工人。正是他们曾经拯救了饥饿和疾病交加的战俘们免于死亡。

这一次又是布尔什维克党把他们派到我们这里来。

战俘们组建了自己的警卫连，其中80%的人是匈牙利人。他们接受了战斗训练，命令是用匈牙利语下这的。

警卫连组成之后，我们就控制住了军官们，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且取消了糟蹋人的勤务兵制度。从那以后，这些军官先生们就得自己擦皮鞋和打扫厕所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官们切齿痛恨自治委员会。起初，他们抵制我们的委员会，但是

在看到这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之后，他们又选举了自己的委员会。

军官们同我们的委员会进行了谈判，他们说我们的行动是无法无天的，我们违背了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忠诚誓言。然后他们又进行威胁说，回到匈牙利之后，他们一定要使我们受到军法裁判。

于是，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特权，断绝了同他们的“外交关系”。

1917年11月7日，拉也夫斯基同志来到了战俘营。他原是附近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木匠，我们对他很了解。许多匈牙利战俘都受过他的救命之恩。他说他是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他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已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全俄国开始。工人和农民已经拿起武器起来推翻旧政权。

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在全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统治，正在组织赤卫队，并且邀请一切愿意帮助俄国工人和农民、站在他们一边的人签名登记。

几分钟之内，一支拥有60个人的赤卫队分队就组成了，我被选为指挥员。

我们列队行进，前去参加在附近修筑铁路的俄国工人的一个集会。我们排好队，高唱马赛曲。

集会在一个广场上举行，广场上贴满了“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给农民土地”、“给工人面包”、“打倒战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标语。

在这个热烈的集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和以拉也夫斯基同志为首的俄国朋友们一起开往县中心去缴那里的驻军的枪。

拉也夫斯基同志坚决地对一个惊愕万分的沙皇军队的上校说：“移交你们的职务吧！”

这个上校是一个留着西伯利亚式长胡子的大个子，他从桌子

后面神气地站起来，装作把握十足地说：

“我们承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有权把我们，沙皇的正规军军官们，当作俘虏对待。但是，谁让你们这些匈牙利战俘有权到这里来？这件事和你们绝对不相干。”

我们不客气地逮捕了他，让他去捉摸我们同革命有什么相干。

我们解除了那些进行抵抗的士兵们的武装。后来他们当中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分队。

后来，我们又占领了驻军的给养、弹药和武器库，派出了警卫并采取了措施维持法律和秩序。然后，我们又逮捕了县里所有的警察和宪兵。

我们的行动依赖当地群众的支持。甚至市场上的女贩子和小商人也站在我们一边。有一次我们在市场上缴了一排宪兵的枪。群众围上来打他们，我们不得不七手八脚地把这些吓得要死的宪兵从群众的义愤中解救出来。但是后来我们释放了一些解除了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因而犯了第一个错误，并且很快就由于我们的宽大无边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地的富农、商人、神父和躲起来的沙皇军官们共同策动了一次反革命叛乱，那些没有扣押起来的宪兵和警察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当地的革命团体处境困难，工人们不得不以流血的代价来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温床。

十月革命的最初一批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这些昨日的战俘也能在赤卫队里手拿武器同我们的兄弟们——俄国工人们并肩战斗。

我们不再是“奥国人”，而是国际主义者，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的战俘们在赤卫队分队中同俄罗斯人一起战斗。他们穿不同的制服，说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为了一个相同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战斗。

我们撕掉了军帽上旧奥匈军队的帽徽而换上了一条红带子。

但是敌人并没有睡觉并且竭力破坏我们的士气。

一大批被俘的军官参加了反革命并且继续以军法审判威胁我们。

反动分子还利用教会的影响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访问我们营房的神父们在做祷告时祈祷说全能的上帝要我们离开俄国。富有的商人们扬言，除非战俘们交出武器，他们就将罢市。他们要求“奥国人”回到战俘营。

尽管革命的敌人作了这种种努力，我们分队的人数却增加了，力量不断发展，我们还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大力援助。不久，我们的分队便被拨交契卡（肃反委员会）指挥，契卡这个机构的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驻扎在省中心的部队是库德尔卡同志指挥的雅罗斯拉夫里国际营，库德尔卡原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矿工。这个营的几乎70%的士兵是匈牙利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护他们这位能讲一口道地的匈牙利语的捷克指挥官。这个营在镇压雅罗斯拉夫里的反革命叛乱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持续数天的激战中，我们分队同库德尔卡的营密切配合，协助粉碎了雅罗斯拉夫里省的反革命力量。

1918年1月15日，列宁签署了成立工农红军的法令，组建国际队伍的工作也在同一天开始。

1918年4月17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举行了一个战俘代表大会，参加者有来自全俄国各地战俘营和红军中各个国际分队的1,000名代表……

在代表们住宿的波克罗夫斯基兵营（后来改名为捷尔任斯基兵营），我认识了费伦兹·扬西克，一个意志坚强的指挥员和亲切和蔼的东道主，他原来是布达佩斯的钳工，是匈牙利工人运动中一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

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设在德累斯登旅馆，匈牙利语报纸《社会

革命》的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在那里见到过贝拉·库恩、迪波·萨缪里和其他同志。

当我身佩一把长长的哥萨克马刀和一把左轮枪来到组织委员会登记时，贝拉·库恩同志问我：“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从哪里来的？什么职业？”

我神气地回答说：“雅罗斯拉夫里契卡营指挥员加拉信。本营士兵80%是匈牙利志愿人员，其中40%曾在赤卫队中服务过。至于我的职业，我是一个排字工。”

贝拉·库恩说：“同志，请坐，我们正在讨论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程序。请你参加我们的讨论。”

大会的议程包括一项由贝拉·库恩作的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意义和政治形势的报告。

他阐述了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包括匈牙利人民在内的世界劳动人民前途的影响。在说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之后，贝拉·库恩提出了一个行动纲领。

在讨论中，不同国籍的代表们都一致表示赞成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怀着深仇大苦诉说了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困难并且保证要为神圣的革命事业而献出他们的生命。

前奥匈军队中的一位军官、捷克的国际主义者沙斯特克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表现出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广泛的知识，他述说了是什么促使他踊跃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拿起武器，因为在这里，在俄国，正在决定着几世纪以来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的结局。”

代表们的热情与时俱增。语言问题证明不能成为障碍，职衔的差别在开始时使代表们有点紧张，但很快也就被人们忘记了。

大会决定，代表们回到原来单位时应当报告大会的情况并推动他们战俘营中的同志选举自治委员会。

在大会决议的影响下，各国的战俘大批自愿参加红军。大约

100,000匈牙利国际主义者表示愿意参加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大会之后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斯科。

我在市北车站得到通知要尽快赶到目的地，因为莫斯科市内爆发了一场反革命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夺取了邮电大楼和小德米特洛夫卡大街上的一些建筑。我在市内经过一番困难的跋涉，终于找到了莫斯科国际营的指挥官扬西克。

这天傍晚，已经有几个人集合在扬西克的房间里。一个穿着长大衣的瘦高个子的人十分突然地走了进来。他的小胡子卷得紧紧的，显得精力充沛。

他说他是捷尔任斯基，询问我们谁是指挥员。

当时，捷尔任斯基同志是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他打开一幅莫斯科市的详图，转向费伦茨·扬西克。

捷尔任斯基指着图上的一个地点说：“在营房附近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夺取了的邮电大楼。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把他们赶出去。这是极其重要的。”

房间里完全沉默了一刹那，然后仿佛听到了一声命令似的，我们全都站起身来，伸手抓起武器。

捷尔任斯基同志低声说：“同志们，谢谢你们。我理解你们的支持的意义。”

在扬西克指挥下，国际营迅速地集合了，我们加入了一支由俄国的工人、水兵和士兵组成的支队，他们正在兵营内的操场上等待着捷尔任斯基同志。

捷尔任斯基同志指挥着这场迅速地、出人意料地进行的战斗。否则，只要反革命分子听到我们要进攻的风声，感到自己崩溃在即，他们就可能砸烂电话和电报设备，在那个时候这样一个损失会是难以弥补的。

我们迅速占领了同邮电大楼邻接的各条街道，然后向大楼的

所有人口同时发起冲锋。我们的突击队一下子就解除了戴着沙皇军队帽徽的军官和士官生的武装，迅速占领了整个大楼。

突然袭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切设备都安然无损。

捷尔任斯基留下扬西克的营牢牢地守卫着邮电大楼，整个支队则开始在小德米特洛夫卡大街上进行扫荡。

因为反革命分子已经占领了若干所民房、一些要地和现为列宁共青团剧院的原商人俱乐部的楼房，所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两天激战后，白卫恐怖分子匪帮全被消灭了。

在巷战中，赤卫队员从邻近的建筑物的房顶冲入敌人占领的房屋，然后一层楼一层楼地打下去。

在那些日子里，敌人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革命的袭击，但是，包括扬斯基的国际营在内的赤卫队队伍协助控制住了首都的局势，使反革命分子难以采取任何象样的大规模的行动……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79—86页。张毅君译）

在一个国际支队中〔节录〕

德索·赫马罗特科^①

在俄国的第一年，我从一个地方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但是1916年6月，我被送到雷夫达工厂劳动，在那里呆了一个长时间。正是在那里，我开始对俄国工人真正有所了解。我同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巴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尔盖也夫相处得特别好。

^① 是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1915年5月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国际支队，1918年8月，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他在红军中参加了反白卫军的战斗。

虽然我的俄语很不好，但是我们互相很了解。

这原因是不难了解的。我在布达佩斯大学上学时，就已经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深为关切。而在俄国，我看到了人民不但在受苦，而且在斗争。

谢尔盖也夫同志逐渐地吸引了我参加革命活动。首先，他向我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观点，后来又让我在战俘中做工作。这件事一直继续到1917年。我坚定地决定同俄国兄弟们一起为自由而战斗。

我们听说在叶卡特林堡有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正在为反对沙皇统治而积极斗争。当雷夫达的当局开始监视我们以后，谢尔盖也夫同我便跑到了叶卡特林堡。他在那里把我介绍给一个地下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兄弟接受了……

二月革命之后，在战俘中进行工作比较容易，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的大部分活动也必须秘密进行。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叶卡特林堡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支队，我参加了这个支队。我们的支队大约200人，有匈牙利人、中国人和朝鲜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反革命分子战斗。

1918年3月1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我被接受为布尔什维克党员。这是对我在战俘中进行的工作的最高奖赏。

春天，我们被派往秋明方向的前线。我们同人做众多的白卫军队进行了激战。我们被迫后撤。我们也撤出了叶卡特林堡，我们是同吉林斯基的支队一起最后撤出的。我们的火车开过了布拉哥达特和楚索瓦亚，来到了彼尔姆。自然，我们在那里都有工作。

1918年9月，再次决定成立国际支队，我们都来到了集合地点，同志们选举我担任指挥员。

我们的支队现在由匈牙利人、中国人、朝鲜人和奥地利人所组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集体。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士兵

们中间，毫无民族不和的现象。

在支队成立时，我们被告知说，苏维埃俄罗斯对人们是根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国籍进行判断的，如果一个人为劳动者的事业服务，他就是一个朋友并且会得到朋友的待遇，而敌人也将得到他们应有的下场，不论他们的国籍如何。我们不仅理解这一点，而且从心里感受到这一点。任何一个手持武器为苏维埃政权战斗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

由于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核心，支队的团结大大加强了。在俄国同志们（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活动家）的帮助下，我们总是能够相当迅速地解决一切出现的问题。

后来我们的支队并入了以贝拉·库恩同志为政委的一个旅。

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粉碎一伙富农匪帮，他们藏身于科尔莫维希契村庄附近的森林中，经常出来骚扰村民和杀害苏维埃工作人员。

我们这个有200把刺刀的支队立即出发，很快就到达这个备受匪徒蹂躏的村庄宿营。我们力求抓住敌人，但他们总是躲开了我们。显然，有人给他们通消息。我们决定搜山。这可不是个容易的任务，因为要在陌生的森林中跋涉，爬山坡，在冰冷的河流中涉水而渡，但是我们终于消灭了这批匪徒，一个也没有漏网。

我们刚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接到了如下的命令：“立即出发到来亚格齐金，赶走高尔察克的军队。”

作为革命的军人，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出发，迅速前进，猛攻高尔察克的军队，而他们由于相信自己的优势力量，未作准备，措手不及，被迫后撤。

但是，敌人很快又恢复过来，扭转了形势，这是毫不为奇的，因为他们有大炮和机关枪，人数有1,000之多，而我们却只有200人。这回是我们向后撤了。

我们并没有因为受挫折而灰心，我们重新集结力量，再度进

攻。当然，正面推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采取了钳形运动去夹击敌人。

敌人不惜子弹，有一挺机关枪特别厉害，它的弹雨造成了许多伤亡。显然，这个机枪组是很内行的。

我们被迫俯伏在地面，只要一动或一抬头，就会有一梭子子弹从头上飞过，使你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把脸紧贴在地上。

当我正在考虑我们的情况时，加布斯·伊姆雷已经抓起一些手榴弹，向敌人的机枪爬去。他贴在地上，曲折前进，不仅利用几乎看不见的土堆，而且也利用每一丛霜后干枯的杂草作为掩护。

当加布斯爬行前进的时候，我们的士兵纷纷举起帽子或衣服或猛烈开火，企图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我不知道加布斯同志过了多久才接近了目标，我觉得时间就象是凝固了。最后，他到达了机枪跟前，跃身而起，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命中目标爆炸。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

我们奋起冲锋，逼使敌人放弃了阵地。但是加布斯同志牺牲了，他倒毙在地，中弹累累。这使我们胜利的欢乐蒙上了乌云。

但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哀悼死者，因为敌人又回来进攻了。从此惨酷的战斗持续不断，阵地易手达9次之多。

但是敌人的优势兵力终于占得上风。敌人得到了增援，把我们赶出了米亚格齐金。

我们撤回到金恩车站。在一场顽强抵抗之后，我们又被迫再次撤退。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敌人的炮火从高处轰击我们，一列装甲火车在我们的一侧前进，而敌人的步兵又从另一侧包围我们。我们的支队似乎是陷入绝境了，但是我们设法沿着金恩河后撤了。自然谁也不愿意在11月寒冬跳进冰凉的水里，但是我们实在是别无出路。投降是不能考虑的，我们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转过。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9个同志的命运。他们离开了大队，企图抄小路。他们都被敌人俘获，未经审判就被绞死了。

我们在金恩车站和金恩河附近继续顽强战斗。12月份在一次战斗中，我被敌人的装甲列车上发射的一梭子机枪扫倒了。

但是，我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出院以后，我又回到了支队。俄罗斯人民和匈牙利人民是不可分离的战友。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91—94页。张毅君译）

记执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项任务〔节录〕

弗朗西塞克·柯托斯-扬科夫斯基^①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们动员了工厂工人同科尔尼洛夫进行战斗。……我当时同位于该市的瓦西里岛区的克勃克工厂的工人们在一起。拿起步枪和铁锹上前线去阻击敌人的不仅有赤卫队分队，而且还有其他工人们。成百名宣传员被派到科尔尼洛夫的团队中去对正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部队做宣传工作。科尔尼洛夫的进攻被打退了。科尔尼洛夫部下的许多单位拒绝参加进攻，还有许多单位举行起义参加了革命。科尔尼洛夫本人被捕了。

列宁当时隐蔽在维堡区，指导着彼得格勒和全国的革命活动。决战的日子——武装暴动、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力移交给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日子——正在逼近。双重政权再也不能

^① 他是一位波兰革命者。俄国二月革命前，他到了莫斯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把他派往彼得格勒做党的工作。二月革命后他被选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存在下去了。

成立了一个革命指挥部来起草同时夺取火车站、政府机构、邮电大楼、桥梁、国家银行、彼得-保罗要塞和其他关键目标的战略计划。这是一件庞大的任务。必须同各个军事单位、海军舰艇和工厂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以便一旦信号发出时，他们能够按照总的计划协调行动。

我记得我曾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的身份参加过一次会议。这是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应列入夺权后的人民委员会的同志的名单。

列宁认识到为了阻止克伦斯基政府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中，有必要不等待第二次全俄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把武装起义的日期定在10月24日晚间。

彼得-保罗要塞的排炮是起义开始的信号。《曙光号》巡洋舰上的大炮也放了一炮。冲击冬宫的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在苦战几小时之后冲开了它的大门。到了25日早晨，已经完全肃清了冬宫的敌人并逮捕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都被押到了彼得-保罗要塞，而不久以前那里还是关押革命者的监狱。

列宁于炮火轰鸣中在斯莫尔尼宫开始了他著名的演说，宣布俄国的政权已经转移到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列宁受到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这是七月事件以来他第一次在斯莫尔尼宫演讲。

我们全都记得以“请大家注意”字样开端的无线电报，它告诉全俄国和全世界，革命已经胜利，政权已经转移到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手中。

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列宁提出的关于和平与土地的法令，并且选举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尼古拉也夫桥(皇宫桥)被拆,我无法到达彼得格勒区,而回到了涅瓦大街。自从科尔尼洛夫进攻彼得格勒以后就成为《保险问题》杂志编辑部所在地的一座有两扇厚实的大门的大楼这时仍被一个来自前线的军事单位占用着。这个单位有将近100名白卫军官,还拥有4部至6部装甲车、汽油库和其他军事装备。我曾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斯莫尔尼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于这个单位尚未被解除武装,我又直接去找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向他说明了情况的危险性。由于我对这个装甲单位的所在了解很详细,又知道它的军官们住在那里,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便命令我去解除它的武装。

同我简短谈话之后,捷尔任斯基同志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了一页,写了一个命令,授权我率领100名赤卫队员和3辆卡车。我们在半夜开到那所大楼,分成几个小组,缴了驻守在装甲车上的哨兵们的枪。于是我们就冲入了大楼,不发一枪就解除了那些熟睡的士兵们的武装。然后,我们就开着装甲车回到了斯莫尔尼宫。

我也记得斯莫尔尼宫的一个士兵代表团同驻扎在彼得格勒区兵营的第16机枪团的谈判。这个团在10月的战斗中保持中立。它的暧昧态度对武装起义构成相当的威胁。

斯莫尔尼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选派了一组6名至8名水兵和士兵去同这些机枪手谈判。我们到达兵营,就走到团部,一大群士兵马上在那里把我们包围起来,斯莫尔尼宫的代表就向他们演讲。接着,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大多数的机枪手们都表态赞成参加彼得格勒的革命部队。他们的建议被交付表决。成千的人举手赞成,高呼“革命万岁!”说明全团都站到革命一边了。在达以后,又有许多装备精良、纪律严格的部队跟着起义。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100—103页。张毅君译)

我当过列宁的警卫员

李富清^①

十月革命之后，我参加的那个曾在俄国南部进行战斗的游击队，编入了红军。1918年初，包括70多个中国人的一支有200人的分队被派往彼得格勒。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被派去保卫列宁工作的地方斯莫尔尼宫。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最难忘的一段时期。

在斯莫尔尼宫有几个岗哨。我和几位同志驻在3号哨。我们的任务是检查所有出入人员的证件。

在这以前，我们曾听到俄国同志们十分热情爱戴地谈到列宁。我们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大人物会那样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因此，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列宁的时候，我们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也许是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值班几天之后，看见一个人身穿黑外套，头戴羊皮帽，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快步走进房子。我们挡住了他，他和气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这时一个警卫军官走了过来，命令我们举枪致敬，这个人点了点头、笑了笑，走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军官告诉了我们他是谁，原来他就是列宁。

列宁在那些日子里是非常忙碌的，他书房里的灯光总是亮到

^① 李富清是一名中国工人，于1916年来到俄国。1917年，他参加了一支游击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反革命作战。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后来又到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当警卫员。于1932年返回中国。

深夜。虽然他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对周围同志的生活、学习和成就总是由衷地关切。

列宁第二次看见我们时询问我们是那里人。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列宁原来以为我们是蒙古人。他问我们：“你们对这里的情况习惯吗？吃的怎样？你们的生活条件令人满意吗？”

我们回答说：“一切都很好。我们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列宁说，情况当然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消灭了白卫军和干涉者，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国家，生活就会真正美好了。他告诉我们，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革命，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赶走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到那时，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还有一次，列宁说我们的俄语还不算太坏，但是要真正掌握俄语，还得学习。第二天，就给每个中国士兵都发了一支钢笔和一本教科书。显然，除了列宁，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

有时候，列宁也走进我们的食堂和宿舍，了解我们住的和吃的怎么样。有一次，他来到了我们的宿舍，摸了摸垫子和毯子，问我们晚上冷不冷。当然，我们都说不冷。但是，有一个士兵回答说：“冷是不冷，但是我们不敢脱衣服。”列宁笑了。不久以后，就给我们发了一大捆劈柴。那个时候，劈柴是很难得的，我们后来了解到，这捆劈柴是俄国农民们特地送给列宁的。他把这捆柴转送给了我们，而他自己却多次穿着大衣在书房里工作。列宁对我们的关心使我们深为感动，因而我们对他的生活也很关心。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109—111页。张毅君译）

在十月的日子里〔节录〕

别特科·斯米洛夫^①

直到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一直在离喀山150公里左右的奇斯托波尔的战俘营。我们听到这个划时代的事件的消息时，都欢欣鼓舞，认为这是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即将获得自由的信号。我们听说在遥远的彼得格勒市，政权已经落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之手。我们都很高兴并立即着手组织我们自己的战俘苏维埃。

我的同胞们派我到彼得格勒去安排有关我们遣返的事宜。

.....

我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反革命正在蠢蠢欲动。斯莫尔尼宫日夜不息地开着各种会议。反动派还没有认输，他们的反抗形式之一是组织宗教游行。

我正在沿着涅瓦大街一路寻找被派出同新政府谈判的保加利亚代表团，突然碰上了一支宗教游行的队伍。走在队伍前头的是戴着法冠的高级教士和神父们，跟在后面的是沙皇的将军们、军官们、高举着十字架和旗幡的虔诚的老人、妇女和服饰华丽的贵妇人们。

有几个人从队伍中走出来气势汹汹地喊叫道：“你为什么在圣象和灵旗面前不脱帽？”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要不是来了一些赤卫队帮忙，我很可能被他们踩坏了。赤卫队员们迅速地轰散了这些“示威者”……我才能继续赶路来到保加利亚代表团所住的

^① 是一个保加利亚的机械工人。十月革命后，他在叶卡特林堡市工人士兵苏维埃工作，曾参加过反对高尔察克的战争。

旅馆。

团长查普拉希柯夫马上接见了，他告诉我说，由于尚未同布尔什维克党达成协议，现在想要遣返保加利亚战俘还为时过早。

我身边带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由于在彼得格勒找不到工作，我决心往东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向鄂木斯克出发，但是过了叶卡特林堡不远，我就不能再走了，因为铁道已被高尔察克的军队和捷克白卫军炸毁。

我到了叶卡特林堡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听由他们差遣。他们听说我是机械工人之后，就要求我办一个修理农具的工厂。局势虽然动荡，布尔什维克党人们却已经在考虑明年春天继续农事了。我对这个建议十分高兴，欣然接受。当地苏维埃的农业局长要求我安排生产2万付新犁和11,000付耙……

我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大院子做厂房，剩下的事就是寻找熟练工人，最重要的是寻找设备和原料，因为在战后，这些东西很短缺。市苏维埃给了我一部很好的汽车，于是我就着手进行工作……

实际上，我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工人，还发现了一个有我们所需的设备和原料的仓库……我们先办起了铁匠作坊，不久，就把其他作坊也办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高尔察克已向红军发动进攻，目的是夺取叶卡特林堡，放出被监禁在那里的沙皇尼古拉和他的一家。这就又需要拿起武器了。我离开这个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正要着手生产和平的劳动工具的工厂时的感情是不难想象的。我被编入看守沙皇、他的一家和他们4、50个随从人员的赤卫队分队。我们驻在一所学校，面对着这些显贵的犯人们所住的阿巴季也夫大厦。

红军力量不足，无法制止高尔察克军队前进，敌军开始包围叶卡特林堡市。我们的司令员决定消灭沙皇及其家族，暂不迎战

而撤出市区。在撤出之前，我们向市民们发了一个通告，解释我们暂时撤退的原因。通告的结束语是：“我们现在要走了，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们确实是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在彼尔姆停了一个短时间，兵力得到了足够的加强，随即对高尔察克发动了强大的反攻。我们所向披靡，收复了叶卡特林堡。

但是我由于其他公务被派往莫斯科而不能回到我心爱的工厂。我在莫斯科成为当地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这一项工作使我同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见了一次面。

1918年秋天，在我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而出发去保加利亚时，我又一次见到了列宁。

现在，同所有进步的人类一起，我为苏维埃人民的伟大成就和了不起的全面进步而欢欣鼓舞。每当我想起，我曾在叶卡特林堡办起那间小工厂，并曾同叶卡特林堡市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共同努力在革命初期为该市的和平生活打下一个基础，从而也作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时，我总是喜不自禁。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219—222页。张毅君译）

我是红军在中亚细亚的特别信使〔节录〕

汉斯·泽布罗夫斯基^①

……十月革命的时候，我在中亚细亚。十月革命是我的革

^① 是德国的一位冶金工人，在战争中被俄军俘虏。后来，他参加了红军进行革命战争。1919年加入了俄共（布），1920年回到德国。1921年起是德共党员。

命，是我的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为了保卫它，我参加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它的最后胜利对我说来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第一步……

我是1915年3月15日在格罗德诺城附近被俄国人俘虏的。我们走了10天才最后到达华沙，在那里安排了一列军队专车，我被押送上了这趟车。我们途经莫斯科、萨马拉和奥伦堡而到达塔什干，来到最大的战俘集结点之一。我先得派到“森林兵营”，备尝闷热、干渴和（由于食物很差）饥饿之苦。

……

1916年底，我们受到军法审判，我由于不服从命令和散发传单而被判在要塞监禁2年。

在奇姆肯特监狱里，沿着走廊，一边是战俘们的囚室，另一边则是政治犯的囚室。我们无法建立联系。但是我们虽然与世隔绝，还是听到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我们以为一定会获得自由，但是除了换掉看守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有一个新看守来自当时属于俄国领土的波兰。他会讲德语，有时把报上的消息翻译给我们听。由于他的帮助，我们了解到前线和俄国国内的形势。他也把当地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的命运同中亚细亚劳动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他们的胜利能使我们重获自由。

……

后来，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在彼得格勒的冬宫被攻克之后不久，首先在塔什干，然后在中亚细亚的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决定性的战斗。

我们这些关在奇姆肯特监狱里的犯人注意到，若干天来，反动的卫兵和看守们不那么神气十足了，他们显然紧张了起来。警卫队的军官们无影无踪了。看来监狱生活只是由于习惯的力量才维持不变。纪律变得松弛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听见了枪声和炮声。突然，一批武装的工人冲进了监狱。他们把政治犯和战俘都释放了，而把反革命军官押了进来。

给我们带来自由的工人和士兵们兄弟般地问候我们。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沙皇暴政的受害者。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急于同他们一起保卫新获得的自由。我们确实也是如此。我们接受了革命者给予我们的武器，变成了赤卫队员。

在奇姆肯特，胜利尚未到手。接连打了几天仗，双方互有胜负，直到中亚细亚其他城市的武装分队同我们会合之后才取得胜利。这些分队，特别是铁路工人的分队，在胜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7年，在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巩固胜利。全俄非常委员会（契卡）派我到在塔什干市和比希别克（即现在的伏龙芝）市之间的铁路线上巡逻的一列装甲火车的车头上当兵。但是由于反革命匪帮不敢袭击装甲火车，我们没有仗可打，所以我要求调动工作，开始在塔什干市的契卡服务……

在我们的分队里，有100多名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我们守卫着土耳其斯坦苏维埃政府、市苏维埃、银行、印刷厂和红军司令部的房屋。我们也有一部装甲火车，于晚上在市中心和郊区之间的铁路线上巡逻。

下述事件是当时进行的战斗的典型例子。

一个晚上，我们被警报惊醒了，把装甲火车开到塔什干郊外奥伦堡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四面八方都向我们开火。我们以机枪火力封锁了铁路线两侧的果园，严防任何人接近装甲列车。到了凌晨，事态逐渐平息。天亮以后，战斗就停止了。一个白卫兵也看不见。那些反革命分子沿着曲折复杂的大街小巷，同他们出现时同样突然地消失了。那天晚上，我们有3名同志阵亡。

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志在塔什干郊区参加了一次突击行动。有大约20个反革命军官在郊区的一所大院里秘密开会。我们的包围行动迅速异常，把他们一网打尽。

1918年春天，外国干涉者发动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第一次进攻。到了8月份，土耳其斯坦的苏维埃政权已经缩小到局限于塔什干、浩罕和撒马尔罕市区附近。在阿姆河以南的附近，红军扼守着桥头。外国帝国主义者向白卫分子提供了军队、武器和装备。

后来我们接到命令，经过布哈拉地区冲出包围，拨归土耳其斯坦第一团指挥……

(译自《十月革命中的外国同志》，莫斯科
1967年英文版，第282—286页。张毅君译)

三，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苏维埃政府公告

(1918年4月5日)

从西伯利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两个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得到报告说：日本舰队司令加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并通知当地居民由日本负责维持当地秩序。据报告说，作为登陆的借口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两个不知其名的日本人被杀害。

关于这次杀害，其原因、情况及肇事者，目前苏维埃政府还毫无所知。但是它知道，正如举世皆知一样，几个月来日本帝国

主义者就已准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日本政府出版的报刊上写道：日本呼吁恢复西伯利亚到伊尔库茨克、甚至到乌拉尔的秩序。日本当局曾为它侵犯俄国领土寻找适当借口。日本大本营内曾编造关于西伯利亚的状况、关于德国战俘的作用等等等等耸人听闻的消息。几周以前日本大使在罗马声称，似乎被俘的德国人已武装起来并准备占领西伯利亚铁路。这则消息刊登在全世界的报刊上。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当局曾使英国和美国军官来往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使他们有充分可能相信日本官方的消息是虚假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论据被粉碎之后，他们不得不另找借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日本人的被杀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4月4日这两个日本人被杀，4月5日日本海军上将末等进行任何调查，就已自行登陆了。

从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经过事先准备的，并且两个日本人被挑拨性的杀害是这种准备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于是，早已预谋的帝国主义的打击便从东方发展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想要扼杀苏维埃革命，割断俄国与太平洋的联系，强占富饶的西伯利亚，并奴役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

资产阶级的日本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死敌。

其余协约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府，它们的行动纲领怎样呢？

它们对待日本侵略野心的政策早已动摇，而且至今仍然如此。美国政府在表面上看是反对日本进犯的^①，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再对美国的表面动作模糊不清了。在对俄国进行破坏上，英国打算与日本携手并进。

^① 美日的矛盾在十月革命以后，就退居第二位，消灭苏维埃政权就成了帝国主义美国的主要任务。

这个问题应当非常坚决地向英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也应当向美国和其他协约国政府提出。就其必要性来说，盟国的某一种回答，主要地是某一种行动，对于苏维埃政权最近的国际政策将会有巨大意义。

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适当的外交步骤，同时命令西伯利亚的各苏维埃要对一切侵犯俄国领土的人进行抵抗。

工人们和农民们！光荣的公民们！

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来自东方。国内的黑暗势力正在抬头。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向异国暴徒伸出了手。由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杜马，作出了欢迎日本武装进犯的决议。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扼杀俄国革命，夺取工农的政权和土地，废除工农对生产的监督，而正在与日本强盗一致行动。反抗日本的进犯，同国内的代理人 and 帮凶的残酷斗争，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对于整个俄国的劳动群众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12—213页。方钢
译）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照会

（1918年4月24日）

外交人民委员部兹寄上已经公布的关于西伯利亚若干日本领事代理人和官方人员的官方文件，并请将以下各点通知东京政府：

在彼得格勒的日本大使馆和在莫斯科的日本官方代表，其中包括领事上田三太郎先生，已经再三作出关于日本政府无意干涉

俄国内政的保证性表示。

我们也再三向日本代表指出，尽管有这些保证性表示，仍然有大量的日本公民，甚至官方人员直接参加我国内战，站在反革命分子一边来反对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最后一次，我们使日本代表注意日本炮兵出现在臭名昭著的谢苗诺夫大尉匪帮和在此匪帮中发现有日本武器。我们还指出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领事对革命法庭活动的不能容许的干涉。^①

已经公布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肯定了日本政府的代表广泛地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反革命斗争。日本的这些行动现在就促使我们要毫无怀疑地弄清东京内阁对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并且包括日本政府将来是否有意支持俄国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它立刻就指示公开调查它的若干代理人的活动，无条件地召回被揭穿的人并教给其余的人一定的工作细则。

否则，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就要用对付俄国本国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来对付这类代理人。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14—215页。方钢
译)

^① 日本人的干涉在于，1918年4月4日他们利用日本臣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被杀进行挑衅，并向苏维埃地方当局声称，为了保护日本公民，他们不能相信地方法院，而应当让自己的军队登陆。4月5日一早日本军队便开始登陆了。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谢苗诺夫阿达曼匪帮这时开始了又一次从满洲向苏联外贝加尔的侵袭。——原编者注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政府给大不列颠、法国、意大利、 美国和日本的照会

(1919年2月4日)

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从包含报刊评论^①的无线电报中获悉，仿佛协约国已经向目前在俄国实际存在的一切政府发出请柬，邀请它们派遣代表参加在太子岛召开的会议。

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尚未收到寄给它的任何这类请柬，而且仍然是从无线电播送的报刊评论中知道，把没有从它这方面得到回答解释成拒绝这一邀请，因此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希望消除对于它的行动方式的任何虚伪的解释。另一方面，鉴于外国报刊不断对它的行动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说明，俄罗斯苏维埃政府需要借此机会充分清楚而坦率地明确它所处的地位。

无论从军事方面或从国内情况方面来说，尽管苏维埃俄国的状况都越来越好，但是，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仍然非常愿意签订结束军事行动的协定，准备为此目的立刻进行谈判，并且象它一再声明的，为了能够签订这一协定，它甚至可以作出重大的让步，只要这些让步不会有影响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发展的危险。鉴于它不得不反对的敌人完全是从协约国给予他们的帮助中汲取力量，因而协约国才是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唯一真正的敌人。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正是要向协约国申明几点，为了不再与这些国家发生冲突，根据这几点，作出一些让步是有可能的。

① 指西方报刊。

鉴于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协约国政府代表的许多声明中认为关于俄国债务问题具有特殊意义，苏维埃政府首先声明它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对协约国的要求作出让步。它不否认自己对属于协约国债权人的财政义务，并且要明确规定怎样实现这一点，还要签订专门的条约。制定这种条约是提出的谈判的一项任务。

第二，鉴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困难并且不能从国外得到充分贷款，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提议用一定数量的原材料来保证支付其债务利息，至于用什么原材料，当另订专门协定。

第三，鉴于外国资本对于开发俄国自然资源经常表现出巨大兴趣，苏维埃政府准备向协约国人民提供矿山、森林等等的租让权，其条件当另行明确规定，以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不会受到这些租让权内部管理的妨碍。

第四点，按照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意见，可以是提出涉及领土上让步的谈判，因为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是要从这些谈判中排除审核关于协约国任何割让俄国领土的问题。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补充申明：在它看来，对于割让应当理解为保留除了波兰和芬兰以外的前俄罗斯帝国的某一部分领土、协约国的武器力量或者协约国政府保持的或享有其财政、技术、军事或其他援助的领土。

至于第二、三、四点，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将要作出多大的让步，这将以它在军事状况上与协约国的对比为转移，并且现在它的军事状况正日益好转。

在北线，苏维埃军队刚刚占领申库尔斯克。在东线，他们暂时失掉了彼尔姆，反而占领了乌法、斯捷尔科塔马克、别列别依、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顺便提一下，中亚细亚的交通现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南线，不久前他们占领了一些重要的火车站，如，波沃林诺、阿列克西沃科、乌柳皮诺、塔洛瓦亚、卡拉契、鲍古恰尔，因而这个地区的铁路又由他们掌握，而从西南方、从

卢甘斯克方面推进的乌克兰当地的苏维埃军队，正威胁着克拉斯诺夫的后方。乌克兰当地的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切尔尼戈夫、奥弗鲁奇以及许多次要城市。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几乎完全转入这些共和国的苏维埃军队手中，同时还有一些大城市——明斯克、维尔诺、里加、德文斯克、米塔夫、文达夫等等也转入他们手中。

前立宪会议议员方面开始同苏维埃政府谈判的这一事实证明苏维埃俄国的内部状况有了显著加强。立宪会议议员的代表，即全部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代表大会主席拉基特尼科夫、秘书斯维亚季茨基，以及沃尔斯基、什麦列夫、布列沃依、切尔年科夫、安东诺夫，他们于昨天，2月3日抵达莫斯科。社会革命党的这些享有盛名的代表并且曾强烈反对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

孟什维克态度的改变（他们的代表会议同样反对协约国的干涉，并且他们的机关刊物《前进》现在可以在莫斯科自由出版）证明苏维埃政府与俄国社会上迄今曾经敌视它的分子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县非常委员会的撤销证明俄国国内原先的紧张状况有了总的缓和。最后，外国报刊关于似乎在彼得格勒及其他地方发生混乱的谎言，彻头彻尾整个都是一种捏造。

再一次强调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状况不能不反映到作出让步程度的大小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仍将按上述问题进行谈判。

至于协约国报刊上常常对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国际革命宣传的抱怨，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在指出不能限制它的革命报刊的自由时，曾声明自己准备在必要的场合把承担不干涉协约国内政的义务包括在同协约国的总协定中。

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根据上述原则，准备或者在太子岛，或者

在其他任何地方同各协约国一起，或者同其中的个别国家或者同协约国同意的俄国任何政治集团立刻开始谈判。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请协约国把这一点尽快通知它，并通知它把自己的代表派往何地，在何时和以什么方式进行谈判。

外交人民委员 契切林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57—260页。方钢
译)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 《捍卫十月革命》呼吁书^①

(1918年8月2日)

这次不幸的战争，至今总算做了一件大好事：促使了俄国革命的爆发。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不仅标志着俄国民主的和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也标志着整个欧洲进行这类改造的开始。不仅是无产阶级及其亲如手足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还有被奴役的各民族，都将随着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胜利而获得自己的解放……

我把俄国革命看作全人类的共同成果，所以认为，每一个民主党人道义上的责任，是为维护这伟大的成果而劳动。从这个观

① 《捍卫十月革命》呼吁书是由塞尔维亚国会（人民议会）社会民主党代表、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特里莎·卡茨列罗维奇撰稿。当时该呼吁书与苏维埃政府的《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呼吁书一起，以小册子形式在日内瓦出版。——原编者注

念出发，我呼吁塞尔维亚人民议会和属协约国政治阵营的塞尔维亚政府，对协约国各大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促使他们停止对俄国革命和共和国事务的一切干涉，并且撤出俄国领土。这样，共和国就有较多的力量和可能性来阻挡中央强国的侵略和顺利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如果协约国成员还没有感到自己应该感激在战争中和他们站在一起，并且血流成河的俄国人民，从而对他们当前为争取本身的和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神圣的英勇斗争，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不应该妨碍俄国人民的复兴，不应该打算把它重又拖回到可怕的战争中来。

当我向塞尔维亚人民议会和政府呼吁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我还有下列的一些考虑。塞尔维亚民族是一个民主的民族，它依靠了自己的力量进行了革命，打败了敌人，获得了解放^①，因此，它只能希望俄国革命胜利，而决不可能希望它失败。如果它参加俄国革命的敌对阵线，那就是对自己民族传统的背叛。在争取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中，塞尔维亚人民只有依靠民主；而决不能依靠民主的敌人。俄国革命是必然的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塞尔维亚人民要获得自己的完全解放，只有依靠俄国革命的胜利，而决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的帮助。因为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幸福，对他们来说，是无关重要的。俄国革命用自己的事实表明，贯彻人民自决的伟大原则，是何等的意义。塞尔维亚人民如果与俄国革命的敌人讲团结，那他就是在犯了十恶不赦之罪，从而他就要失去最民主最强大的世界组织——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同情，而国际无产阶级最终是要掌握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命运的。

在向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的胜利表示我全部喜悦之

① 作者指的是十九世纪初塞尔维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原编者注

情的时候，我以最火热的心情，向交战国的所有社会党呼吁，呼吁他们对本国政府施以最大的压力，使他们不仅不干预俄国革命的事务，而且要尽速结束这场不明智的流血战争，并进而签订各国人民如此热切期望的和约。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它在议会内外不采取各种措施来捍卫俄国革命和促使尽速签订和约的话，那真是极大的耻辱。

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6—47页。章永勇译）

英国工党索恩波特代表会议 关于制止干涉俄国内政 的决议〔节录〕

（1919年6月27日）

代表会议抗议盟国继续武装干涉俄国内政，反对提供军事物资和财政援助，反对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要求立刻停止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代表会议建议执行委员会和工联议会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采取断然措施使上述要求得到圆满答复……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1页。黎扬译）

各工业部门的工人、各社会党和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各委员 会代表大会的决议^①〔节录〕

(1920年3月中旬)

第一项决议

不列颠工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对苏维埃建树的共产主义创举表示极大的赞扬。代表大会祝贺红军在抗击资本主义各国联军战斗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并表示同俄罗斯工人苏维埃共和国，同为推翻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全世界其他各国工人站在一起。

第一项决议甲款

代表大会对议会委员会未把干涉俄国问题列入工联非常代表

① 1919年英国劳动人民掀起了一场号称“不许干涉俄国！”的群众运动。在协约国准备与实行第三次进攻期间运动的声势特别浩大。1920年3月中旬在伦敦召开了各工人组织及各政党的代表大会，有来自各主要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200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谴责武装干涉，号召对干涉的发起者进行斗争等项决议。大会的各项决议使英国工人捍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1920年夏成立的在这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各行动委员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原编者注

大会的议事日程表示遗憾。

代表大会要求全面报告议会委员会和政府之间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详细内容，另外，委员会是否得到政府立即与苏俄媾和的诺言，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出答复。

第二项决议

代表大会对英国工人直到现在对世界资本主义向苏维埃俄国进军仍如此漠不关心，表示遗憾。大会坚决要求参加工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坚持下述主张，即各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应该通过总罢工迫使政府全面停止任何形式的武装干涉：陆海空方面的军事行动和封锁，对苏维埃政权敌人的财政援助，国际联盟的政策以及唆使战败国和弱小国家侵犯苏俄等等；其次，工业各部门的工人组织还应该迫使政府迅速消除妨碍同俄国进行贸易的一切障碍，并根据民族自决权和决不干涉俄国内政的原则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如果工联全国代表大会采取与这些要求相反的决定，非常代表大会应该讨论如何采取必要措施，同时各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也应就这一问题给自己的代表以相应指示。）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1—23页。黎扬译）

马赛·加香在下议院会议反对 干涉俄国内政的发言〔节录〕

（1919年3月24日）

……你们应该立刻从俄国的欧、亚两部分地区撤回所有部

队。你们应该撕毁与俄国的邻国签订的各项协议，不再指派他们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你们应该承认苏维埃政权，同俄国恢复国际关系，并让它参加和平会议。

你们应立即解除封锁，因为这种封锁不仅使俄国人挨饿，不让他们得到食品和原料，而且可能很快就使他们做出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决定。所以你们应该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同它签署包括可能有利于法国的条款的经济协定。

你们派到那里去的不应该是部队和士兵，而应该是技师、工程师和工人，派他们去帮助这个国家恢复经济。这就是我们想要你们实行的对俄政策。……

部长先生，为了我们本国的利益，你们没有权利在俄国继续推行你们的政策。如果你们认为不断往那里增派强大部队，就可用暴力制止威胁欧洲和全世界的革命，那你们想的未免过于不切实际……

现在人民除自己本身以外，任何人都不信赖。他们掀起了一场运动，你们对这场运动的非难极端不公。不管你们对俄国革命的感情如何，都要赶快撤出你们的部队，你们留在那里的部队，即使现在还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杆菌”所感染，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染上，而且一旦回来，就要像最近几年受到这种感染的德国部队那样采取行动。

今后，对人民施加暴力的一切尝试都会如此告终，结果必将是各国人民逐步觉醒，认识到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反对贫困并同我们进行斗争。

正是因为你们不肯执行我们宣告的开明的人道主义政策，所以现在社会革命才大受欢迎。

我请求你们为了法兰西共和国，最好不要干涉俄国革命，听任其随本国“气候”尽量发展。就我们而言，干涉俄国革命，我

们没有这个权利。

以上是我发言结束时扼要列举的几点意见。此外，我们还要向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内容如下：你们现在还有数万名法国士兵留在俄国，他们即将陷入绝境；我坚决主张把他们调回，并希望全体议员支持我们的意见，和我们一起要求政府下达正式调令。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4—25页。黎扬译）

法国劳动总同盟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1919年5月26日）

劳动总同盟全国委员会得知停泊黑海的法国舰队水兵拒绝同俄国革命者作战，使政府不得不把这支舰队调回法国的消息之后，对水兵们勇敢果断的行动表示赞扬和祝贺。并宣布，本委员会决定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法国政府将要对他们施加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迫害。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5页。黎扬译）

法国社会党公告^①

（1919年6月24日）

法国工人和农民们！

① 这篇公告表达了对俄国革命怀着深厚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捍卫这一革命的许多普通社会党党员群众的心情，号召奋起反对法国反动当局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行径。

尽管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多次提出抗议，不顾我党的报刊每天都在进行抨击以及我党国会代表接连不断地提出质询，法国政府仍继续同盟国一起进行反对工人和反对革命的战争。我国士兵和水兵以及我国的资财被用来扼杀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已达两年之久。我国统治者们已同拥护旧制度并因其被推翻而心怀不满的冒险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用我们的资财去援助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布林、库班的邓尼金和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

法军和盟国部队驻紮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英国舰队不断向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开火。法国舰队也在黑海水域活动。虽然法国海军陆战队未能守住敖德萨，但仍有大片俄国领土被盟国军队不宣而战并毫无根据地占领。新的“神圣同盟”把俄国和匈牙利严密地封锁起来，使千百万妇孺老幼成了这种令人难堪的卑劣行径的受害者，让他们忍饥挨饿渐渐毙命，而原因仅仅在于他生活在劳动者试图求得自身解放并取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代之以劳动者自行管理的国度。协约国不肯饶恕俄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之处就在于，他们砸碎了自己身上的枷锁并且要实现早在75年前国际社会主义就曾宣告过的新制度。盟国知道，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本国也会敲起丧钟，宣告资本主义统治的末日就要临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战时状态迟迟不能结束，复员工作一再拖延下去。现在正开展着的是一场维护阶级利益的斗争。我们知道，1739年法国曾同企图扼杀她的君主同盟动过干戈，而一个法国现在竟忘却了自己的革命传统，也忘了俄国沙皇制度的叛卖行径，居然充当起反动同盟的魁首！社会党恳求法国人民制止摧残工人和扼杀革命的行径。如果再用流血牺牲的代价使工人受到摧残并把革命镇压下去，反动浪潮就会连我们争取解放的希望也淹没下去，使法国和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日期大大推迟，同时也会取消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并使已经为新凡尔赛分子

付出代价的共和国再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蒙羞。

法国工人和农民们！

难道你们能让这种犯罪行为得逞吗？社会党现在向你们发出号召，希望你们起来斗争，英国工联已经声明，如果不立即把英国军队从俄国撤回，就要罢工。意大利社会党也建议英法意三国无产阶级同时采取行动。

社会党工人党员同志们，随时准备响应我们阶级组织的号召去反对（连没有追随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党人也表示谴责的）罪恶的干涉活动，鼓足力量进行宣传工作，散发我们的公告、我们编写的小册子和报纸并参加群众大会！

法国人民，你们过去一直站在战斗的前列，现在你们仍能挽救工人革命，从而使你们自身的解放得到保证。切莫保持沉默和袖手旁观，免得成为杀人犯和绞杀革命的刽子手们的帮凶！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63—364页。黎扬译）

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通过的 第三国际委员会和加香派提出的 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节录〕

（1920年12月29日）

党声明无产阶级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于迫使各资产阶级政府同苏维埃共和国立即缔结和约。

对3年来所采取的对革命的俄国的各种军事措施实行怠工是神圣的职责。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使供苏维埃的敌人用的各种武

器、装备以及供给品的生产和运输陷于瘫痪状态。应该用国际无产阶级的无限团结制止无尽无休地侵犯俄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使其硕果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日后享用。

这项基本任务应凌驾于其他各项任务之上。党的报刊和演讲员应该使这项任务在宣传工作中占首要地位，并且要加强宣传工作，鼓励群众采取行动。社会党人应该要求每个工会都召开会员大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当前急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加以讨论，让每个工人小组都作出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行径采取有效措施的规定。

要向无产阶级解释清楚，使它明白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为进行反革命战争创造必要的物质资料也要承担罪责，但这种宣传工作不应只在生产武器、装备、火药、运输工具等各种工厂的工作人员当中进行，因为如果没有工人组织的积极支持，单凭他们本身抵制不了那些侵略苏维埃俄国的豺狼。全体工人阶级应该以意大利工人阶级为榜样，鼓舞自己不断怠工使我国统治者无法给屠杀俄国人民的凶手以物质援助。

社会党议会党团应该站在议院的崇高讲台上揭露反革命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惨祸，社会党报刊应该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掀起舆论浪潮对蓄意侵犯180,000,000人民的空前罪行进行抨击，表示抗议和不满。党的各个支部和总支要不倦地进行宣传，应该利用各种方式表示抗议，为的是造成一种局面，便于开展行动，使法国政府——摧残俄国的主要刽子手停止行凶。

党不仅要用一切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军事物资的生产和运输陷于瘫痪，同时也要定出其他具体表现工人阶级渴望和平心愿的各项措施，例如集体抗税及拒绝交纳根据当时情况认为不应交纳的其他杂费等等。

党公开宣布自己的决心：一定要同蹂躏大半个欧洲，并且不把大半个欧洲毁掉不肯罢休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进行不调和

的斗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6—27页。黎扬译)

意大利北方社会党人会议决议^①

(1918年12月29日)

12月29日在米兰举行的由伦巴第、诺瓦腊和波亚琴察等地代表参加的各区社会党人会议,经社会党、劳工联盟、各社会党社团联盟、邮电职工联合会等各方面的领导同意,为执行在罗马和波伦亚通过的决议提出下列要求:

- 1.复员军队。
- 2.立即从俄国撤军并反对任何其他类似的远征。
- 3.公民应享有各项基本自由权。
- 4.对所有政治犯和军事犯实行大赦。

经过详尽讨论之后,会议充满信心,定要采取一切极为有效的坚决措施立即实现上述要求,并根据同志们发表的意见,委托党的领导采取相应措施。

另外还通过了下述决议:

“会议着重指出,应尽力开展宣传工作,以便把各族自由人民团结起来,使新的战争不致重演,使劳动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

^① 1918至1919年期间,意大利劳动人民曾奋起捍卫苏维埃俄国。铁路员工、码头工人、海员及其他工人抵制武器生产和往俄国运送,很多人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立即从俄国撤出外国军队,首先是意大利军队。意大利劳动人民保卫苏维埃俄国的斗争阻止了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对俄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并于1919年迫使政府把意大利军队撤出俄国。——原编者注

会议声明，不论发起任何行动，目的应始终如一，都是要早日实现我们的主要目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8—29页。黎扬译）

意大利劳工总联盟与社会党 及铁路员工联合会领导共同 召开的联席会议的决议

（1919年7月6日）

由劳工总联盟与社会党及各工会组织领导机关的代表在铁路员工联合会代表参加和支持下共同召开的这次会议，听取了劳工联盟书记达拉刚关于在英法两国召开会议的情况之后，重申：

意大利无产阶级决不动摇，一定要团结起来全力以赴，以便迫使我国执政者改弦更张，不再同协约国一起执行其反对苏维埃

① 支持苏维埃俄罗斯和匈牙利的国际总同盟大罢工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19年提出的，它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和工会，包括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的支持。冶金工人联合会——意大利工会的先锋队参加罢工具有特殊意义。定于1919年7月20—21日举行的支持俄国和匈牙利的罢工遭到了破坏，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因为在罢工前夕西欧各国社会党和工会的首领们，迫于本国资产阶级的压力，改变了主意没有举行罢工。但是许多国家还是举行了单独罢工。在意大利支持俄国和匈牙利的罢工变成了总同盟罢工，并且在两天（7月20—21日）之内就席卷全国许多工农业中心，罢工运动声势十分浩大，意大利政府惊恐万分，不得不在1919年中就开始从苏维埃俄国撤军。——原编者注

共和国，反对由于战争的结果而产生的新制度的凶险的侵略政策，因为我国目前也正在备尝这种战争的恶果。

认为，这种政策正在破坏业已庄严宣告的民族自决权并蹂躏着一切人道心肠和正义感，而冒险家高尔察克的自供就是这种极其有害的罪恶政策的具体写照，难怪反对他的不仅是全体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有俄国的一切有识之士。

确信，协约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条约毫无公允之处。

指出，驻匈牙利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协约国代表团团长对匈牙利共和国镇压反革命暴动进行干涉，再次证明协约国和国联统治者心灵深处是多么反动。

可见，正是由于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意大利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面复员和裁军。

认为，根据战争造成的这些后果可以得出结论：统治阶级不可能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恢复问题，也不可能采取根本措施来缓和使居民负担越来越重并使生产和消费陷入绝境的物价昂贵局面。

得知，意大利社会党和意大利劳工联盟约定协约国无产阶级在同一时间普遍开展示威行动的建议已被英法两国工会和政治组织采纳。

决定于7月20—21日同时举行总罢工。

因此，意大利全体无产阶级，除医务工作者外，务必严格执行上述决定，使罢工具有第一次轰轰烈烈地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作用，证明自己与国际金融寡头窒息一切自由的政策背道而驰，对俄国和匈牙利劳动人民毫无保留地支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9—30页。黎扬译）

意大利五金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关于不给苏维埃俄国的敌人 制造武器的决议〔节录〕

(1920年5月21日)

五金工人代表大会重申自己的决心，表示一定要全面停止军工生产，使五金工人只从事有益的生产活动，即制造有益于劳动和集体的生产工具。同时也考虑到必须立即支援俄国同志，所以作出如下决定：

建议意大利五金工人不再给任何国家生产军用物资，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运送准备好的物资。考虑到有些地方和工厂可能已停止生产机枪、步枪和备件……，因此（大会）指示仍未停止生产的那些地方的工会组织采取相应措施。代表大会呼吁最大的经济工作组织（指全意劳工总联盟）就具体地制定各项措施达成协议，防止制造任何杀人武器。大会向水陆运输工人的高尚行为致敬，号召他们要更加顽强。大会声明，它准备给予伟大的俄罗斯共和国以全面支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1页。黎扬译）

罗马尼亚工会总委员会和社会 党执行委员会宣言〔节录〕

(1920年8月24日)

同苏维埃俄国极其亲密友好的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应当奋起斗争，反对罗马尼亚政治寡头对欧洲反动派的援助……

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义务是，不许运输军队、军事器材并阻止罗马尼亚统治集团打算向反动的波兰或弗兰格尔提供的任何援助……

不准干涉！

打倒战争！

我们愿意同俄国和平相处！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60页。黎扬译)

苏联远东游击队所属朝鲜 支队司令给白党将军雅斯 特列波夫的回信^①〔节录〕

(1919年)

你们向我们朝鲜革命者说明了你们对共产党人的看法，还说

① 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劳动人民积极地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朝鲜志愿部队同苏联游击队同心协力共同战斗。朝鲜革命支队司令部对白卫分子雅斯特列波夫让朝鲜游击队归顺白党的答复，就是朝鲜劳动人民矢忠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明证。——原编者注

什么朝鲜人不应在俄国和反对共产党人的米尔古洛夫分子打仗，应该回到朝鲜去打日本争取自由解放。

共产党人是什么人，我们非常了解，世界大事的进程我们也很清楚……伟大的苏俄共和国是一切被奴役的弱小民族的朋友和强大的同盟者，因此我们相信，共产党人的伟大口号——全世界大联合和各民族兄弟般团结——虽然在实现过程中屡遭破坏，但不久就会实现。

我们知道西方各国的统治者已束手无策，不能诱使本国人民去反对苏俄。只剩下一个日本还和我们及苏俄作对。日本想要像奴役我们朝鲜那样奴役远东。而你们却在日本卵翼下，同保卫自己边疆免遭日本侵占的俄国人作战。我们朝鲜人从未，将来任何时候也不会与俄国人民为敌，我们永远是他们的朋友。你们——日本人的同伙，打着反对共产党人的旗号，替日本效劳，因此，你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知道，我们把你们赶跑得越快，日本获胜的希望就越小；俄罗斯共和国强大得越快，朝鲜自由之日就来得越快。

你们提出建议要消灭共产党人，难道思想能消灭吗？一两位共产党人倒下去，千百位共产党人站起来——他们的思想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威胁吓不倒我们：要打就打个样子看看。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83—684页。黎扬译）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向哥萨克 首领宣战的布告〔节录〕

（1917年12月9日）

全体居民们：

就在工兵农政府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缔结一项有价值的和平条件期间，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地主、银行家和他们的同盟者哥萨克将军们——却从事最后绝望的挣扎，企图破坏谈判，向苏维埃夺权，向农民夺取土地，企图迫使士兵、水兵和哥萨克去替俄国及其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流血。卡列金在顿河一带、杜托夫在乌拉尔一带都举起了叛变的旗帜，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给予他们以所需要的物质的支持……罗将科分子、古契科夫分子、米留科夫分子和柯诺瓦洛夫分子蠢蠢欲动，准备东山再起。他们在卡列金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杜托夫分子的帮助下，准备利用劳苦的哥萨克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卡列金已经把顿河一带变成了战线，他干扰我们给前方输送粮食，同时正在动员部队进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和莫斯科。他有一个在逃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作为他的助手。就是这个将军在6月间强行恢复了对士兵的死刑^①，并进犯革命的彼得格勒。在奥伦堡，杜托夫逮捕了行政官和革命军事委员，解除了士兵的武装，现在又准备占领切利雅宾斯克，这样他们就可以切断前线和城市同西伯利亚粮食的联系。卡鲁洛夫正在攻击高加索的居民。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是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在这次反人民、反政府的阴谋中以好几千万的卢布供给反革命的将领。乌克兰共和国资产阶级的中央议会一面打击乌克兰苏维埃，一面帮助卡列金在顿河一带收集部队，并且阻碍苏维埃政府准备派遣必需的部队通过兄弟的乌克兰人民的土地去和卡列金作战。

立宪民主党员，这些人民的凶恶的敌人和各国的资本家一起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屠杀。他们还想通过立宪会议去帮助卡列金、

^① 科尔尼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总司令后，他在军队中恢复了死刑，作为恢复纪律的手段。而死刑在革命的最初几星期就被废除了。——原编者注

科尔尼洛夫和杜托夫，并且与这些人合伙来压制人民。

工人们！士兵们！农民们！革命在危险中！我们必须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底；我们必须消灭人民的凶恶的敌人。我们必须给反革命的阴谋家——哥萨克将军和他们的立宪民主党的煽动家们——尝尝革命人民的铁拳。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调动必要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反革命叛乱将被镇压下去，罪犯将根据他们的罪行给予应得的惩罚。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宣告如下：

1.反革命势力已经抬头的乌拉尔、顿河和其他的区域处于战争状态。

2.当地革命的卫戍部队要立即投入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不必等待上面的命令。

3.禁止与反革命的策划者作任何谈判。

4.当地居民或铁路员工如给反革命分子以任何支持，都将受到革命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5.剥夺叛乱首领的公民权。

6.从事推翻卡列金分子、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杜托夫分子的统治的全体哥萨克劳动者将被当作兄弟而受到欢迎，苏维埃政府将给他们以必要援助。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407—409页。黄宗汉
译，高放校)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法令^①〔节录〕

(1917年12月17日)

被压迫群众要团结一致，全体工人要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基于这一原则立场……我们，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共和国的完全独立……。有关乌克兰人民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我们都……准备毫不犹豫、毫无条件地予以承认。

我们谴责拉达集团在民族主义的伪装下玩弄两面派。他们曾一度拒绝承认苏维埃和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拒绝召开……苏维埃地方委员会）。由于拉达集团玩弄两面派伎俩，我们不能承认拉达作为乌克兰共和国受剥削劳苦大众的全权代表。最近，拉达集团又进而采取了一些步骤，排除签订任何条约的可能性。

首先，拉达集团正在通过调动和召回乌克兰部队来瓦解前线……

其次，拉达集团解除了驻乌克兰苏维埃部队的武装。

第三，拉达集团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卡列金的密谋叛乱。……

由于拉达集团已经开始采取一项前所未闻的叛变革命的政策，一项帮助……苏维埃和受剥削劳苦大众最凶恶敌人的政策，我们理应向他们立即宣战，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然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拉达集团……提出下列问题：

① 这个法令是对乌克兰拉达集团的最后通牒。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1. 拉达集团是否愿意停止瓦解前线？
2. 若无最高司令的批准，拉达集团是否愿意阻止部队^①前往顿河、乌拉尔或其他地区？
3. 拉达集团是否愿意帮助革命队伍挫败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的反革命阴谋？
4. 拉达集团是否愿意停止解除苏维埃军团和乌克兰工人赤卫队的武装？……

如果在48小时之内得不到对上述问题的圆满答复，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将认为，拉达集团已处于向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公开宣战状态。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439—440页。高燕
译，高放校)

附录 阿列克谢也夫呼吁协约国援助给 驻基辅法国使团首席代表的信〔节录〕

(1918年1月27日)

亲爱的将军：

毫无疑问，驻新切尔卡斯科^②法国使团负责人……已经向您报告了目前顿河地区的形势，以及我个人对目前形势所提出的请求。

① 指当时征募的反苏维埃的部队。

② 属顿河州，系旧俄军屯区。——译者注

我是阿列克谢也夫将军。我选择了顿河地区作为组织志愿军的地方，因为这块土地看来能供应充足的面包，而且它构成了富足、强大的东南战线的一部分。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进攻，看来那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将不难保卫其独立。凭借哥萨克的帮助，我们也许能够成功地组织一支新的、强大的军队，以便在俄国恢复秩序，重新开展前线斗争。因此，我选择了顿河地区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基地。再则，我知道哥萨克人不愿意单独承担在俄国恢复秩序这一艰巨的政治任务，但是，我相信他们会为保卫自己的传统和领土而战，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安全地组织一支军队。在这一点上我犯了错误。来自前线的哥萨克军队完全处于一种士气涣散的状态，他们当中出现了大量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追随者，结果，他们甚至拒绝为保卫自己的领土而战。他们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只是直接打击富有阶级，……而不是针对整个这一地区，这个地区仍然秩序井然，面包、煤、铁和石油，供应不断。

12月7日，我们被迫派出400人攻打罗斯托夫。自从1月25日以来，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了战斗。由于哥萨克人不愿作战，保卫顿河地区的重担就落到为数不多的志愿军肩上。因此，我们没有机会组织、训练新的部队。由于处于优势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切断了通往罗马尼亚和西南战线的通道，我们无法获得战争供给。我们可以去库班，但是在仅有的几个志愿军支队的援助下，库班地区也在奋力抵抗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库班的哥萨克人同样军心涣散。

只要略看一下地图就会清楚，库班地区不能做我们将来行动的根据地。如果去那里，我们将被迫推迟向布尔什维克发起主动进攻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坚持力量悬殊的斗争以保卫顿河地区的原因。可是，我们的部队很少，如果没有援助，我们将被迫放弃顿河地区这一政治、战略要地，这将给俄罗斯和协约

国带来可怕的后果。

预料到这一后果，我一直极力争取得到批准，至少调遣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师到顿河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作战，继续组织志愿军。但是我没有成功。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正在失去顿河地区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却继续在基辅和波尔塔瓦附近无所事事……。如果有了它的援助，顿河地区就有可能摆脱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就可能遭到致命打击，这一地区的斗争就可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得知您对马赫^①将军和捷克人都有影响，请求您采纳我的计划。现在还来得及，如果再拖延几天，将无法改变顿河地区和俄罗斯的不利形势。志愿军离开顿河地区，肯定不利于我们战胜布尔什维克……。

阿·阿列克谢也夫将军

(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文献和材料)》，
伦敦1934年英文版，第425—427页。高燕
译，高放校)

红军中捷克中队的决议

(1918年5月24日)

我们，社会主义红军所属符拉迪沃斯托克捷克斯拉伐克革命部队的战士，欢迎以其苏维埃为代表的远东劳动居民，并且声明，我们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政权，我们准备保卫它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犯。我们声明，我们只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① 不是马赫将军，而是普罗柯普·马赫博士，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俄罗斯分会的成员。——原编者注

在当地执行工作的它的执行机关。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23页。方钢译）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清除 右派政党出苏维埃的法令〔节录〕

（1918年8月14日）

基于如下的考虑：

1. 苏维埃政府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在此同时，它还得顶住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俄罗斯共和国国内的那些国际帝国主义同盟军也在拼命反对工农政府，对其进行最无耻的诬蔑，大搞阴谋活动，直至发动武装暴动。

2. 各政党代表苏维埃组织明显地在大搞诋毁和推翻苏维埃政府的活动，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3. 从以前出版的文件以及在本次会议上所引用的那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们……犯了同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联合，组织反对工农的武装进攻罪……。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从党员中清除（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要求所有的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的代表苏维埃撤去这些政党代表的职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雅·斯维尔德洛夫

（译自《共产主义历史文件》，纽约1960年英文版，第157—158页。黄载桃译，王毓琳校）

苏维埃政府公告

(1918年7月6日)

今天，7月6日3点钟左右，有两个（坏蛋）俄—英—法帝国主义间谍潜入到德国大使米尔巴赫身旁，在伪造的证件上伪造了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签字，并且在这个文件的掩护之下炸死了米尔巴赫伯爵。执行这个挑拨事件（它是早已在苏维埃报刊上同俄国保皇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多次联系过的）的坏蛋之一，根据现有情报，是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成员，他从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背叛地转到或者象斯柯罗帕茨基，或者象撒马尔罕和西伯利亚的白卫军那样为那些希望把俄国拉入战争并以此来保证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的人们服务。

由于投靠萨文科夫一伙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坏蛋的过失，现在俄国处于战争边缘。

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主战派，早已在为进攻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察里津寻找理由，现在的理由对于这个政党来说则真是好得喜出望外。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来回答莫斯科苏维埃政权为捕捉杀人犯及其同谋者而采取的最初步骤。他们暂时占领了捷尔任斯基的人民委员部，逮捕了它的主席捷尔任斯基及其委员拉齐斯以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一些著名党员。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然后占领了电话局并开始一些军事行动，用武装力量占据莫斯科的一小部分，开始扣押苏维埃的汽车。

苏维埃政权则将过去曾在大剧院参加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扣留作为人质，同时采取一切

措施立即用武力镇压和消灭白卫军阴谋新走狗的叛乱以及斯柯罗帕茨基分子。

凡是认为现在把俄国引向战争就是丧失理智和犯罪的人，都支持苏维埃政权。叛变很快就会被消灭，这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都要坚守岗位！大家都要拿起武器！

打倒白卫军的走狗和斯柯罗帕茨基！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26页。方钢译）

保卫彼得格勒宣言

（1919年5月28日）

不久以前，彼得格勒战线仅有次要意义。近几天来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情况已经完全清楚。无疑，帝国主义者居心险恶地决定要夺取红色的彼得格勒。

他们收买了以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组成的白卫军，并教唆他们到彼得格勒去。

他们武装了尤登尼奇将军、博洛霍维奇上校和罗德姜科带领的俄国白卫军队伍，并把他们投向彼得格勒。

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给了白卫军一些驱逐舰，企图让陆战队登陆。芬兰政府给俄国政府发出虚伪的照会，其目的显然是为芬兰开始向俄国进攻准备社会舆论。

近几天来，白卫军在对彼得格勒作战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意外的打击曾动摇了我们的部队。从彼得格勒曾向其他战场调遣许多兵力。最初对白卫军的反击是很微弱的。

红色的彼得格勒受到严重的威胁。彼得格勒战线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线之一。

苏维埃俄国即使最短的时间也不能丢失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无论如何都应加以保卫。这个城市的意义太大了，是它第一个升起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帜，也是它第一个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彼得格勒的工人毫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向各条战线派出成千上万的战士。现在整个苏维埃俄国应当去支援彼得格勒。

中央委员会建议彼得格勒的组织动员全体工人和全体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就象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期一样。

中央委员会建议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特维尔省、奥洛涅茨省、北德维纳省、沃洛格达省（这两个省超过了它们应送往东线的数目）、切列波维茨省和维切布斯克省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尽可能快地把根据党委员会和工会的决议动员起来的全体人员派往西线，由西线支配以支援彼得格勒。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彼得格勒应当拥有保卫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所需的武装力量。

苏维埃俄国答应给它调遣大批武装力量！

快快保卫彼得格勒！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77—278页。方钢
译）

俄共（布）中央通告

（1919年5月28日）

党员的动员工作，总的说来，正在蓬蓬勃勃地进行。在许多

地方（彼得格勒、沃洛格达、切列波维茨、叶戈列夫斯克），好同志，党的和苏维埃的负责工作人员都被动员了。彼得格勒委员会同苏维埃主席团一起通过了动员各人民委员部和各机关很大一部分负责工作人员的决定。还决定在5天之内把社会保障、教育、内务各人民委员部，市公用事业和军委政治处所有职位上的男劳力换成女劳力。连各个中央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也撤掉了。在许多组织机构中找到不少志愿兵。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为了避免一些组织机构人员过少而不得不劝阻要奔赴前线的同志（特维尔县、奔萨省、小维谢尔县）并且确实在一些机构中动员进行得没有计划性：不去认真考虑每一个负责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在各组织之间调配力量，其中有一些是过度地轻率地动员了工作人员，例如在苏希尼奇、卡卢加省，执委会中只留下1人，其余所有负责同志都上前线了。在小维谢尔县的一些乡的组织各剩下了1人或者不过3人。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

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动员也有同样准备（在彼得格勒一个地方就动员了20%的团员）。一些地方报告：对共产党员的动员提高了我们党的威信，成了工人的良好榜样。许多城市都有关于专门把成队的共产党员（在彼得格勒、奔萨、萨马拉、卡卢加、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尼日涅、沃尔霍夫、斯摩棱斯克、博布鲁伊斯克、中库尔斯克、科斯特罗马、维里日、瑟兹兰），以及穆苏里姆共产主义营等等派往前线的报道。

动员起来的同志积极参加了在被动员的群众中进行宣传的工作。许多地方为出征者安排了红军战士和工人的隆重游行，举行了欢送出征者大会等等。

但是，并非没有发生自私自利分子离开组织逃跑和在动员时刻拒绝上前线的事。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梁赞、尤里耶夫、弗拉基米尔省、诺夫哥罗德县等等地方曾有过这种事情。因此，同时进行了整党，以清除不可靠分子。有一些组织就完全瓦解了

(斯塔罗-鲁斯克县)。

在各个组织机构中被动员人数的百分比是不同的：从3%到100%（在靠近前线地带）。暂时还不可能进行有关动员人数的什么总结，这部分地是由于缺少资料，部分地是由于还远远不是到处都已进行过动员。不过，下面的数字可以提供一点有关动员进行的情况：

在波克罗夫斯克，萨马拉省，党员100%全都动员了。在奥洛涅茨省也动员了全体党员和党的支持者，在利戈夫被动员的全体党员中的50%开赴前线。

决定动员50%的地方有：库尔斯克省委员会（虽然不多的一些报道说是25%），普加乔夫县委员会，希格雷、小维谢尔、叶戈列夫斯克、科斯特罗马的县委员会，弗拉基米尔火药厂所属的一个组织，梁赞、卡尔戈波尔的县委员会（诺夫哥罗德省所有各个县城的支持者为20%未计在内），维亚兹尼科夫省（在各城市为60%）和苏兹达利县，弗拉基米尔省。

动员了50%共产党员和50%党的支持者的地方有：切列波维茨省委员会，塞兹兰，斯塔罗-鲁斯克。

25%——麦迪恩委员会，科泽尔斯克委员会（卡卢加省），波利索格列勃斯克委员会，沃尔斯克委员会，在后两个组织中，此外还动员了50%党的支持者。

20%——在彼得格勒，萨兰斯克，在维切布斯克省，卡卢加，坦波夫，戈麦尔，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舒雅，捷伊科夫，科赫麦，奔萨。

15%——在日兹德拉和卡卢加的各个县的组织。

10%——在尤赫诺夫、图拉、尼日涅被宣布的动员数字（此外还有20%党的支持者）。

5%——在波谢杭斯科-沃洛达尔斯克市组织。

大量极为重要的工作落到留在地方上的同志们的身上。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队伍。有一些组织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它们赶快召集党的会议来制订条件改变后的工作计划。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78—280页。方钢
译)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议

(1919年9月24日)

工农国防委员会在9月24日的会议上决议如下：

1. 准备建立一个巩固的防御区，其周围界限为：莫斯科、维切布斯克、第聂伯河、切尔尼戈夫、沃罗涅日、坦波夫、沙茨克、莫斯科。

2. 宣布该区全部处于战争状态。

3. 在上述地区内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和县革命委员会，以及大居民点的、大火车站等等的革命委员会，均由地方苏维埃政权的三名代表组成，其中一人应为军事委员。

这些革命委员会负责组织各该地区的巩固的防御。

4. 本命令第一条中所说的地区隶属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5. 在整个地区内要为形成巩固防御创造有利条件，因此，要有防御本区的自己的军队，要调拨前线口粮和货币薪资。

6. 为了补充军马，必须在各地买马，应买之数以各地的马数多少为转移，但平均每乡为10匹。

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89页。方钢译)

工农国防委员会决议〔节录〕

(1919年10月17日)

第一，国防委员会1919年10月16日的决议，作为主要命令提出，无论如何要把彼得格勒保住，直到已经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

第二，因此，要寸土不让，在市内大街上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保卫彼得格勒。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294页。方钢译)

人民委员会声明

(1920年1月28日)

波兰正面临着一种决定，这种决定可以对两国人民的生活经年累月地发生最重大的影响。所有资料都证明，协约国极端的帝国主义者，邱吉尔-克里孟梭的拥护者和代理人，现在正竭尽全力推动波兰去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无端的、无意义的和罪恶的战争。

意识到对俄国劳动群众命运的责任，力图避免发生威胁两国人民的新的不幸的灾难、牺牲和破坏。

1. 人民委员会声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波兰的政策不是从偶然的暂时军事或外交的配合出发，而是从牢不可破的民族自决出发的，它过去和现在都无条件无保留地承认

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自主，并且从独立的波兰国成立的最初时刻起，这种承认就为它对波兰的一切关系奠定着基础。

2. 人民委员会认为12月22日外交人民委员部最后一次和平建议完全有效。它毫无任何侵略意图，并且声明红军部队将不越过白俄罗斯战场目前的防线，这条防线靠近以下各个地点：德里萨市、迪斯纳市、波洛茨克市、波利索夫市、帕里奇桥、普季奇车站、别洛科罗维奇车站。在乌克兰战场方面，人民代表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并以乌克兰临时政府的名义声明，联邦共和国的苏维埃军队将不从它目前占据的防线向西推进。这条防线经过之处靠近楚德诺夫桥、皮里亚瓦桥、杰拉弗尼桥、巴尔市。

3. 人民委员会声明，苏维埃政府既不同德国，也不同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直接或间接反对波兰的协定或条约，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意义是排除这类协定，以及利用波兰可能同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冲突以伤害波兰的独立及其领土不可侵犯的企图的。

4. 人民委员会声明，因为关系到波兰和俄国的实际利益，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如领土问题、经济问题或其他问题，是不能通过谈判、相互让步和协商而和平解决的，正如现在同爱沙尼亚的谈判那样。

人民委员会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请在最近即将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月常会，从共和国最高机关方面郑重追认上述苏维埃对波兰的政策原则，它从自己这一方面认为，自己的这一坚决声明是它在执行对俄国和波兰两国人民和平利益所负的责任，并且仍然希望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将用俄国和波兰睦邻协商的精神来解决。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04—305页。方钢
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

(1920年2月2日)

波兰和俄国劳动人民的敌人在5年战争期间血洗了世界，摧残了人类，可是他们对此仍不满足，现在还妄图促使波兰和俄国两国人民互相敌对。他们要用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之手扼杀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野心没有得逞；他们要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重担加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头上的妄想也没有得逞。现在他们只剩下了最后一线希望，那就是让波兰人民去妨碍俄国工人和农民进行和平建设和对自由平等生活的企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近百年来漠视沙皇制度残酷地折磨波兰人民，在战争时期，直至最后一刻，他们都在支持和掩饰沙皇政府对波兰的虚伪政策，现在他们则以这个国家的捍卫者而出现。他们要把波兰拉入新的冒险中的企图，是以虚情假义的推测为根据的，他们认为似乎俄国人民在长期艰苦斗争之后粉碎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反革命势力，正准备向波兰军队进攻以便占领波兰。

当这种阴谋有可能使新的灾难降临到俄国和波兰两国人民头上的时候，我们，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向你们进弟兄的一言，以便揭穿你们的和我们的敌人的谎话和诽谤，消除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之间的误解。我们向波兰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无意占领波兰，而是想同它保持和平。但是我们知道，沙皇政府长期的民族压迫激起了波兰人民对俄国人民的深刻怀疑，这一怀疑使和平事业和在你们与我们之间建立睦邻关系发生很大困难，并且它被世界交易所为谋自己的私利而加以利用。但是，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资产阶级对波兰犯下的罪行不能

记在俄国苏维埃新政府的帐上。俄国工人和农民不是在最后一分钟，不是作为临时外交上的配合，也不是在一时情况的压力下才承认波兰独立的；俄国工人是第一个很快地就承认了波兰人民的独立，无保留地永远承认这一独立，其所以这样做，是充分认识到波兰独立不仅符合你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俄国工人和农民挣脱了沙皇、资本家和工厂主套在他们颈上的枷锁，以使用自己双手和大脑的劳动使遭到破坏、沾满血污的俄罗斯大地能够摆脱满目疮痍的状态，以便种上田地，以便城市活跃起来，在恢复了的工厂和矿山为自己工作。俄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渴望有一个今后各国人民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和平环境。为了得到没有它便无法医治自身创伤的和平，俄国人民不仅拒绝任何侵略政策，而且试图通过对今天尚有力量的其他各国资本家的让步来保障自己的和平。为了避免战争，它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掷给了德国帝国主义野兽；它力求同英、法资本家保持和平。它正在不惜以重大让步来换取同象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这样的一切弱小民族的和平，因为它知道，现在，对于各国劳动人民来说，再没有比和平更加需要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深信，甚至波兰工人和农民，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任何俄国人都会压迫波兰人，最终也会了解，同波兰保持和平的意图是俄国工人和农民真诚的最长远的愿望。

不仅如此，而且俄国工人和农民根本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最后必然要变得反对他们本身的自由。沙皇在波兰的刽子手，在俄国也是沙皇最残暴的奴仆。对于沙皇的爪牙来说，对整个俄国的压迫是从对波兰的压迫学来的。在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驱逐劳动人民的敌人之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力图消灭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可能。俄国摆脱内战，是为了生长在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子孙后代能在为全体俄国人民的财富而工作中都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如果苏维埃俄国执行

侵略政策，它就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建立压迫的策源地，而这些策源地也必然会成为在俄国本国产生新压迫的根源。苏维埃俄国不能这样做，这是与它的愿望相反的，是与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反的。波兰的自由是俄国自由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出现的。我们深信，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都要走俄国劳动人民已经走上的道路。

但是；我们的和你们的敌人欺骗你们，说什么俄国政府想用俄国红军的武力在波兰安置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只有在大多数劳动群众非常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建立它的地方，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当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深深扎根时，共产主义才能巩固。俄国共产主义者目前仅仅是在竭力捍卫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和平的建设工作，他们不想，甚至也不能想在别国强制安置共产主义。波兰的符合波兰劳动群众利益的改造，是这些劳动人民自己的事情。

俄国劳动人民的最高代表机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重述了在人民代表会议1920年1月30日^①的通告中苏维埃政府对波兰人民提出的建议，并号召波兰人民丢掉对俄国劳动人民的怀疑，结束流血战争，使两国人民能够同压迫他们的灾难——同寒冷、饥饿、疫病和失业开战。

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波兰人民，因为他们曾受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资产阶级——我们的共同敌人的压迫，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多地受过资本家煽起的战争之苦；中央执行委员会深信，用和平方法和建立睦邻关系能够消除两国人民分裂的一切隔阂。它希望共同努力在波兰与苏维埃俄国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最和平最友好的关系。

① 1月30日是公布日期。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里宁

秘书 卢托维诺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05—308页。方钢
译)

第十二题 十月革命后欧亚 革命运动的高潮^①

① 本题还应参见第十四题《共产国际》第一部分的文献与史料。

一，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 和1923年汉堡起义

论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①

恩斯特·台尔曼

当时的形势究竟如何呢？正如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所述，客观情况与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所需的各项条件完全相符。由于在世界大战中吃了败仗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力量已经削弱，所以统治工具已不起作用，军队和警察已不能再抵御革命。要是将领和军官们做得了主，11月9日那天，机枪就会张开血口连续喷射无情的子弹，横扫柏林街头的无产阶级群众。其实机枪早已配备在各个机关、地下室和门道口，但却没有士兵肯使用这些机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方面，延续了4年半之久的战争造成了可怕的危机，使统治阶级阵营，首先是使中等阶层分崩离析，这又成了一个使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获胜的先决条件。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村居民、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已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靠同盟者，更不是容克地主和君主国的同盟者。他们已忍无

① 摘自恩·台尔曼著《1918年11月9日——德国革命纪念日》。

——原编者注

可忍，所以不仅不肯积极抵抗工人的斗争，反而要支持这一斗争。

那么，工人阶级本身的情况又怎么样呢？穿军大衣的无产者，在军工厂看管机床和在军事化工企业车间干活的无产者和工人的妻子绝大多数都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不仅要结束这场空前的大战，而且要消灭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土崩瓦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摆在广大群众眼前的任务，不过当时大多数德国工人还信心不足，认识不清，而且对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也心中无数。

可见，客观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使德国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

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到底还是窃取了德国无产阶级11月9日的果实。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重整旗鼓，又把德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淹没在无产阶级宝贵战士的血泊之中。而凶手就是嗜血成性的资产阶级仆从诺斯克和屠杀德国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其他刽子手。

从客观的革命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一切前提都已具备。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仍然得以重新确立其已被削弱的腐朽透顶的阶级统治、使它强固起来、并把无产阶级镇压下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918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1月的搏斗，1920年卡普叛乱之后的发动，从1921年3月一直延续到1923年10月的“三月发动”（革命形势尖锐化第一阶段的余波）等之所以成为悲剧，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是具备了客观上业已成熟的革命条件，另一方面是德国无产阶级由于没有意志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主观上软弱无力。

1919年新年前夕，群众准备进行斗争，但是缺少意志坚强的领导，未能把这场斗争组织起来并通过有计划的安排举行武装起义来击溃并消灭血腥走狗诺斯克及其帮凶艾伯特和谢德曼以及他

们的将军和白卫军同伙。

无论是“斯巴达克同盟”个别领袖即惨遭杀害的我党创始人的革命本能，还是他们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都不能代替在革命实践烈火中百炼成钢的坚强的先锋队。卡尔和罗莎之所以成为野蛮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派的牺牲品，即成为诺斯克、艾伯特、谢德曼和他们雇用凶手暗算的牺牲品，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为德国无产阶级锻炼出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那种武器——没能锻炼出布尔什维克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286—287页。黎扬译）

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节录〕

威廉·昆恩^①

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伟大农民战争以来德国的一次最为重要的群众运动。这是群众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的发动。

为了便于了解十一月革命的发生，我们必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讲起。在十九世纪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德国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德国由于自己经济的落后，未能参加对世界的分割。在十九世纪的最后10年内，德国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在经济方面赶上了英国和法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这时，德国帝国主义就企图通过重新分割世界，来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

^① 威廉·昆恩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参加者。本文写于1958年。

资产阶级为了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叛卖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容克地主阶级仍占据着国家和军队的重要职位。大地产和工业资本互相交织在一起。因此，列宁称德国帝国主义是最反动和最残暴的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在所有帝国主义强国中，是最残忍成性和贪求利润的，它是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祸首之一。稍后，德国之出现在帝国主义斗争的舞台上，也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激剧地尖锐起来。

德国的工人阶级一方面反对日益加重的剥削，反对反动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反对统治阶级所制订的反民族的、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好战政策。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表现在这样一些重要的罢工斗争中，如1903年克里米得肖的纺织工人的大罢工，1905年鲁尔工人的罢工，以及争取选举权的巨大斗争和反对扩充军备、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德国工人阶级热情地注视着俄国的革命斗争。他们激烈地抗议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发生的血腥屠杀。正如布留宁教授在柏林洪堡大学讲课时所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为保卫1905—1906年俄国革命而举行的大规模示威，阻止了德皇威廉二世和普鲁士反动势力去帮助尼古拉二世。对俄国革命已策划好了的武装干涉因而落空了。”

左翼力量组织反战斗争

还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社会民主党内就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在1907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曾迫使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否决为在非洲西南部反对赫勒罗部族进行殖民战争的军费预算。然而，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战争的边缘，这就使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国际

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战争危险和殖民地政策的问题。

在有五大洲的社会党人参加的这一次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和俄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阻止战争，如果战争一旦爆发，就用革命来结束战争的任务。这个决议是在和机会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中通过的。

在为庆祝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伟大的德国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用以下的话来欢迎1905年的俄国革命：

“在我们结束这个群众大会时，应该特别欢迎俄国的革命，这是当代最伟大的事件，是一系列革命的序曲，它将使各国无产阶级摆脱锁链和赢得和平。俄国革命万岁，战斗的国际万岁！”

1907年，卡尔·李卜克内西发表了他的英勇的和受到普遍注意的著作《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他在这里号召用阶级精神进行宣传和解散德皇的军队。但还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和李卜克内西的革命观点公开对立的多数派。后来，李卜克内西因发表这一小册子而被法庭判处了一年半徒刑。

1912年春，社会民主党成了国会中的最强有力的政党，这说明了广大德国人民的反对情绪。

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开始，成了召开“国际社会党人反战非常大会”的新的理由。大会是在巴塞尔召开的。大会在告各国无产者的宣言中说：“如果战争终究爆发，各国社会党人应尽力使战争迅速结束，并竭尽一切力量，利用由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政治鼓动，从而加速资本统治的复灭。”

克拉拉·蔡特金在巴塞尔发表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大规模屠杀的长篇的热情演说，她热情地号召妇女和母亲们为和平、自由和人类幸福而奋斗。克拉拉·蔡特金的这篇演说被著名的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收入在自己的小说《巴塞尔的钟声》里。

由此可见，真正的革命者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现

实危险和帝国主义的本质都告诉了德国无产阶级，并且号召他们立即采取行动。

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背叛

还在十九世纪末，修正主义的始祖爱德华·伯恩斯坦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侵略成性的德帝国主义既然面对着强大的革命工人运动，要实现其敌视人民的计划，只有指靠着麻痺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这种结果是借助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和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达到的。这也使得机会主义—沙文主义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了优势。统治阶级更是有意识地散布了“保卫祖国”的思想。

列宁揭露了“保卫祖国”这一思想的经济基础。他写道：

“各大国进行战争是为了进行掠夺，瓜分世界，争夺市场，奴役其他民族。这为资产阶级扩大了利润，使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依附’于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一小阶层能够从这些利润中得到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这个术语要比社会爱国主义确切，因为后者粉饰恶事）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都是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①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是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一种国际现象。但是，一直到表决战争预算以前，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仍然相信，党将争取实现斯图加特和巴塞尔的决议。修正主义领导考虑到普通党员的这种情绪，也不得不装出一副要采取这种立场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2页。

的姿态。

在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存在有三个政治派别：修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叛徒；以考茨基和哈阿兹为首的中派（他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尽力掩盖自己的叛卖行为而已）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弗朗茨·梅林所领导的革命左派。

在1914年8月战争开始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公开地投入了资产阶级阵营。这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分裂。不是去组织战斗性的反战活动，而是积极地支持为钢煤大王，军国主义者和容克贵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中意的战争。叛卖的领导与德国的统治集团签订了“国内和平”的协定，把掠夺战争称之为“保卫祖国”，在国会中投票赞成战争预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列宁曾写道：

“德国的正式社会民主党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党，它给了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极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①

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从世界大战的最初起，就在政治上采取了鲜明的立场，并痛斥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发动的。他们是完全按照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而行动的。

首先，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这种可耻的行动，使工人群众走入迷途和失去了方向。这一民族的和国际的叛卖活动，使得在国际工人运动当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震动。这种叛卖的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从西德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看到。

德国工会理事会的领导也走了同一条叛卖的道路。它们在1914年8月2日做出了决定：在战争时期不得为提高工资而采取任何行动，不得组织任何防御战或罢工。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4页。

卡尔·李卜克内西说“不要”战争

德国工人运动中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派，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口号是“主要敌人在自己国内”！

左派印发了各种传单。1914年12月2日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关于否决战争预算的发言，像闪电般地传遍了全国。李卜克内西在这篇声明中揭露了战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

“参战各国中没有一国人民愿意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不是为了德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民的幸福而进行的。这是一次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资本主义为统治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战争，是工业和银行资本为了从政治上统治其需要的地区而进行的战争。”

我们支持李卜克内西

从1911年起，我在哈勒担任党报《人民报》的编辑，同时还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区组织的主席和社会民主党德国中部重要工业区哈勒—米尔齐堡执行局的委员。现在这一地区对我们的苏联同志和朋友来说，是以最大的工业区而闻名的，因为在那里有“列纳”、“布纳”、“彼特非尔德-沃尔夫”和“维登堡-皮斯特里茨”这样一些巨大的化学企业。还在战前的一些年内，在我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发生过党内争论，这结果使我们更显著地向左转了。

1914年12月4日，在哈勒召开了党的专职干部的例会。我们得到了关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英勇发言的最初的一些消息。这对于我们已足够说明一切。我建议会议一致支持李卜克内西，并称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旗手”。我的提议为会议参加者的三分

之二多数所通过。我们邀请李卜克内西到哈勒来向我们阐明他的观点。各企业的工人无一例外地表示自己完全支持李卜克内西，只有工会的官僚分子却疯狂地吼叫起来。但是，在党的领导机构内反对右倾的斗争愈益有力地开展起来。我们按住区和企业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逐渐使斗争性强的左派的同志担任了所有的领导职位。这样，在我们这个重要的工业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支持卡尔·李卜克内西、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卡爾斯基-马尔霍列夫斯基和威廉·皮克的政治领导。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罗莎·卢森堡第一次在哈勒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她的演说对于开展群众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再不愿做出假激进的决议，而是号召党积极地行动起来，同时依靠各企业的支持，以便使工人们不再处于“纯工会的”影响之下。这样一来，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揭穿了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并领导了日益展开的反对饥饿、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

“斯巴达克派”进行斗争

1915年3月18日有几百名柏林妇女在国会门前示威，抗议物价高涨，要求和平。1915年3月28日已有1,500名妇女和男人参加了这种示威。警察逮捕了20余人，其中包括我们的威廉·皮克同志——现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在监禁期满以后，他们把威廉·皮克送往前线，以便使他和群众隔离开来。这是战争策划者们所中意的一种手段，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在德国是不断采取这种手段来反对我们的。

在德国，工人阶级没有俄国无产阶级那样鲜明的政治领导。俄国工人是在布尔什维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的影响下展开行动的。这一口号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纲领。而在德

国，革命派与“祖国保卫者”的划清界限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兵士们已经血流成河。

1916年1月1日，在此以前曾组织了“国际”派（这是根据罗莎·卢森堡出版的杂志命名的）的左派革命者，联合成了“斯巴达克派”并决定秘密地出版《斯巴达克信札》。

下面我们引用斯巴达克派会议上所制订的提纲中的一些论点：

“鉴于各主要国家社会党的正式代表之背叛工人阶级的目的和利益，鉴于他们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转向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立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最为迫切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应将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是工人阶级在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斗争中的两个不可分离的重要原则。没有一种社会主义是超越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也没有一种社会主义是超越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只要不是自杀，它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能拒绝阶级斗争和国际联合。

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其主要目的都应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防止战争。议会活动和工会工作与整个工人运动一样，应该从属于解决每个国家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的任务，从属于不断揭示他们之间政治的和思想的矛盾，以及推进和巩固各国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任务。

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只有团结一致各国无产阶级群众，才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各国支部的主要战略任务，是以政治的积极性和坚定的主动精神教育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保证群众运动在国际上的协调一致，建立这样的一种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借助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刻保证各支部迅速

的和有力的共同行动，因而，也可以把国际的意志贯彻到各国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行动中去。

社会主义的迫切任务，就是从精神上把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各国支部应在议会和报刊的宣传中，揭露民族主义的一贯的漂亮言辞，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现在，对真正民族自由的唯一的维护，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祖国，保卫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罗莎·卢森堡根据这一提纲的精神，在1916年（当时她尚在狱中）用“尤尼乌斯”的笔名，发表了她的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本书大大帮助我们所有的同志去正确认识革命者所面临的政治任务。

1916年5月1日青年的反战罢工

在布劳恩施魏克爆发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战罢工，证明了青年工人斗志的增长。这是德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罢工。

青年们成批地死在战场上，那些留在后方的，也由于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被夺去了一生中的最好的时光。在全国取消了战前实施的有关保护青年劳动的各种规定，剥削是不可计量地加重了。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强制“储蓄”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青年工人只能领到一部分工资，其余的都要“存入”国家的储蓄所和用于购买战时公债，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子女所领到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攫去进行战争了。

当汉诺威和布劳恩施魏克的人们听到颁布了一项更为严格的规定，禁止“未成年人”离开本地区去找工作时，青年工人们就决心表示抗议。在汉诺威和布劳恩施魏克的所有企业里，到处出现了：“我们不同意！”的口号。

在这两个城市中，有几千名工人，特别是冶金工人，停止了工作。这是在专制制度和战时法律条件下所宣布的第一次罢工。它是在1916年5月1日举行的，这一天正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波茨坦广场上发表了历史性演说的日子。

在汉诺威，右翼工会的官僚分子，借助一些微小的让步，破坏了强制“储蓄”的命令所引起的罢工。在布劳恩施魏克事件则有不同的发展。

罢工者的林中会议

布劳恩施魏克的青年要求取消关于强制“储蓄”的命令。在当地青年团的委员会中，左派的影响特别强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我们的奥托·格罗提渥同志曾领导“布劳恩施魏克青年工人教育协会”直到1916年4月他被征召入伍。从这个协会中分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小组”，它在实际上成了领导徒工罢工的第一个委员会。

1916年5月1日夜，在森林里召开了青年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00名男女青年。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开始罢工并成立了罢工的纠察队。很多工人都和这些青年站在一起。次日，在森林的另一个地方举行了罢工者的另一次会议，参加的已有800名青年工人和学生。5月3日白天，参加罢工会议的几达2,000人，其中约有300名女青年，后来又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各企业的120名女青年加入进来。

第二天，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了4,000人。他们决定分4路向该城的集市广场出发，按照预定计划在当日下午5点钟到达。示威的参加者驱逐了沿途布署好的警察。有很多工人加入了示威的队伍。广场上挤满了大约6,000名各种年龄的工人。当一大队警察开到广场的时候，示威者并不散去。第二天早晨，在市场附

近又举行了示威，示威进行当中，在卖马铃薯的店铺前面发生了骚乱。在广场及其附近的街道上，袭击人群的警察一部分被打退，一部分被示威的群众所包围。看当时情况，动用军队来反对罢工者的危险已迫在眼前。

在青年组织领导的要求之下，工会理事会便发表声明，说一旦军队被利用来反对青年工人，工会便要宣布总罢工。第二天，总司令部便取消了在汉诺威和布劳恩施魏克强制“储蓄”的命令。

尽管在布劳恩施魏克遭到了失败，但哈勒和马格德堡军区的总司令部仍企图从1916年6月1日起，再次在这些城市实行强制“储蓄”。作为对这一点的回答，从1916年5月27日起，各军火企业的青年工人开始举行罢工。罢工发展到街头示威，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罢工的青年的数目与日俱增。两天以后，该军区的指挥官被迫宣称，他的命令不是从6月1日起生效，而是“以后的事情”。虽然如此，罢工的青年工人并不受这些空话的欺骗。

将军们被迫投降

当时，只有由老党员伐特尔同志所领导的“斯巴达克派”支持工人。马格德堡地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投票支持战争预算并反对在战时举行任何形式的罢工。但是在各企业中，有愈益多的冶金工人协会的职员，决心支持罢工的青年。

根据哈勒青年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的要求，举行了该区党和工会组织（当时它们已经处在反对派的影响之下）的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被委托去要求该区司令官无条件地取消自己的命令，否则就要宣布同情罢工。反对以强制“储蓄”为名克扣工人工资用于军事目的的群众是如此有力，使得司

令官不得不向群众的压力实行让步。他在接见工人代表团时公开表示，打算“撤销自己的命令！”这样一来，在对侵吞工资给了一个反击以后，马格德堡的青年工人便于1916年6月2日宣布结束了将近一周的罢工运动。

几个月以后，国防部被迫发表了一项关于废除强制“储蓄”的特别命令。工人阶级和团结一致的青年工人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比将军们有力得多。

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上

“斯巴达克派”准备于5月1日在柏林发动一次战斗性的示威。当时散发了很多这样的秘密传单和声明：

“5月1日晚8点钟。

谁反对战争，请于5月1日晚8点钟在波茨坦广场（柏林）集合。

面包！自由！和平！”

在一张传单的结尾写道：

“5月1日，我们通过一切边境和战场，把我们的兄弟之手伸向法国、比利时、俄国、英国、塞尔维亚人民，伸向全世界人民！在5月1日我们代表千百万人号召：停止万恶的罪行，停止对各国人民的屠杀！打倒包藏祸心、煽惑人民和乘机发财的人！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或英国的人民，我们的敌人是德国容克地主、德国资本家和他们的管家委员会——德国政府！起来对一切自由的死敌进行斗争！……结束战争！我们渴望和平！社会主义万岁！工人国际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李卜克内西当时本已被征入伍并在前线，在此不久以前，因国会开会自军队休假回来（他是国会议员）。虽然他被禁

止在国会外参加政治活动，他仍然来到了波茨坦广场为了号召群众进行斗争。他在这里发表了以“打倒战争！打倒政府！”为结束语的热情演说。演说以后他立即被捕。几个月以后，他被判处了两年半徒刑，后来又改为四年。

当时，列宁对李卜克内西的英勇的演说极表赞扬。

“斯巴达克派”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举行罢工来抗议对李卜克内西的判决。就在5月1日李卜克内西被捕的波茨坦广场，就有25,000名男人和妇女举行示威，要求释放李卜克内西。当日稍晚一些时候，柏林、斯图加特和不来梅有很多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他们高呼：“被监禁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万岁！”“打倒政府！”

在布劳恩施魏克举行了一整天的总罢工。在斯图加特，工人们对于警察逮捕进行了抵抗，结果发生了冲突。在柏林，有很多重要军火生产企业的男女工人举行了罢工，如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托拉斯的三个大企业；柏林和威特瑙的军火工厂；“伯尔兹格”、“克诺尔—不列姆兹”、“别尔格曼”、“米克斯和海涅斯”等企业；“霍尔特茨”、“路德维希·列维”等股份公司和很多其他企业。在德累斯登、耶拿及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反战示威。

俄国二月革命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影响

当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说“不要战争”的时候，这是与机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凯撒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的第一步。列宁还在1916年1月写道：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①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4页。

除了政治上独立存在和彻底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斯巴达克派”以外，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地区领导中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派，它们的最近目的，是单独组织反对饥饿，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罢工和群众示威。哈勒—米尔齐堡、下莱茵、莱比锡各区的依靠革命群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柏林、鲁尔省、西南德国、斯图加特、不来梅、克尼兹堡、格但斯克、什泰特恩各选区组织，都因反对投票支持战争预算和反对“国内和平”的政策，而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局开除出党。

这是1916—1917年冬天的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是不可克服的。这就促使被开除出党的组织决定成立单独的政党。18名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在1916年以前曾服从多数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现在则追随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开始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战争预算了。当党的右翼领导将他们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后，他们便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结会”，作为国会中的一个独立党团而存在。

在举行了最初几次有利于和平的示威以后，自1915年9月5—8日，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了国际代表会议。德国参加这一会议的有代表“工人团结会”的格奥尔格·列捷堡和阿道尔夫·霍夫曼；代表“国际”派（即“斯巴达克派”）的艾仑斯特·墨埃尔和别尔塔·达列海麦尔。多数人“是那些虽然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策，但仍希望以一切代价来避免和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同志。他们对于国际上已出现过的惨痛教训没有深刻的认识，以致还希望有可能全部吸引这些党派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代表会议未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方法和阶级斗争的途径。但是，在代表会议所否决了的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决议草案当中，却正好提到了这一点。

1917年4月在“工人团结会”的领导下，在哥达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在当时还不像列宁那样明确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我们认为：可以借助群众罢工和国会斗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和以艾伯特-谢德曼为首的党的叛卖领导集团分裂的过程，由于俄国革命的发生而大大加快了。关于俄国革命，我们在德国中部时，由于军事情况仅仅从资产阶级电讯社的报道中知道一些。

关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消息。“斯巴达克派”的传单我们并不能全都看到。只是在十一月革命以后，我们在德国中部时才知道列宁在世界大战期间曾做了很大努力来帮助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并使革命工人相信与机会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的分裂，是革命者的首要义务。

现在，当青年一代研究德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和策略时，他们会根据列宁主义的准则对这些老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给以估价。而同时应该看到，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工作人员和普通党员并不知道列宁的思想。列宁的思想，特别是列宁的著作，在很多年内（差不多整整10年）是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理论家和政论家们故意隐瞒了的。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前，未曾翻译过列宁的任何一个册子。我们得到的最初的译文是在1918年从苏维埃俄国寄来的。俄国的共产党在最终取得了政权以后，就有可能着手向国外出版列宁的著作了。这样一来，列宁的著作也就为我们所看到。1918—1919年冬首先出版的是《国家与革命》，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1920年出版的著作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由此可见，只是在十一月革命遭受失败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列宁的天才和他的明确的学说。

在中部德国、秋林吉亚、柏林和莱茵省—维斯特伐里亚，绝大多数有斗争性的社会民主党专职干部和党员，都因不满领导的

叛卖行为，而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队伍。

独立社会民主党比较容易地聚积了革命力量，但是它不能用列宁的思想去领导他们，因为中派——考茨基、伯恩斯坦、哈阿兹和狄特曼，不仅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而且在事实上叛变了革命事业。关于这一点当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因而这也就使他们有可能阻碍我们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政党。中派曾打算控制那些不愿使自己的名誉在社会民主党内受到损害的普通党员群众，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威廉·皮克同志曾对此说道：

“在建立共产党方面的这种拖延态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和疏忽。它使得一直到凯撒的军事机器和凯撒帝国崩溃的时候为止，德国的无产阶级仍然没有一个能够引导自己战胜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政党。”

“斯巴达克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便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积极分子保持联系。“斯巴达克派”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优秀和最先进的分子的自由联合”，它正确地评价了二月革命及其国际意义。在斯巴达克派印发的有关二月革命的秘密传单中曾说过下面的话：

“在工人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德国本国，工人阶级及其世界上最好的组织成了政府的俘虏。这个工人阶级竟容许每一个军士和警官凭借书刊检查制度和特别戒严令对自己横加侮辱和嘲弄，将人的尊严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情愿将自己的父兄送给统治阶级去当炮灰，使自己的母亲和妻女忍饥挨饿而大批死亡。他像一只训练良好的狗，向主人摇尾乞怜，将手杖脚交主人，而时刻遭受痛殴。”

俄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首先是德国工人发出了呼吁，号召他们立即迫使本国政府在各民族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基础上，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只有德国革命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和自由！胜利的俄国革命和胜利的德国革命的联盟是不可被战胜的。德国政府和德国军国主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打击下遭到瓦解之日，就是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之时：从这时起，战争、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即将永远消除。”

不来梅的左派虽然拒绝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号召群众追随俄国工人和士兵的范例。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考茨基和哈阿兹，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欢迎二月革命。他们并没有根据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对这次革命做出足够的估价，也没有从这些巨大的革命事件中，为德国吸取任何教训。

四月罢工和最初的工人苏维埃

1916—1917年冬是战争时期的最艰苦和饥饿的冬天。人们只能靠蔓菁来充饥，到处都呈现着可怕的饥饿状态。在美国参战以后，由于德国采取了残酷的潜水战，迅速结束这种各民族的屠杀的一切希望都被葬送了。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行动，使德国工人增加了很大的勇气，他们在1917年4月15日展开了反对再次降低口粮标准的斗争。在这方面，莱比锡的妇女起了积极的作用，她们带头要求发给口粮。莱比锡的工人从“斯巴达克派”的秘密传单上，知道了在3月份仅基尔一地就有20,000名帝国造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在布劳恩施魏克、马格德堡、汉堡、纽伦堡和德国的其他城市，工人们正进行着要面包和和平的斗争。4月16日，在莱比锡的各企业中散发了有下列要求的传单：

“我们要面包，自由，和平！”

“我们反对进一步降低口粮标准！”

“午休后我们停止工作！”

数千名工人不顾工会领导的警告，都停止工作和参加了示威。有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指出要学习俄国工人的榜样。这时便决定派代表团去向国会提出以下要求：充分供应廉价的食物和煤炭；由政府声明准备签订不割地的和约；取消特别戒严令和书刊检查制度；取消对集会结社权利的限制；释放政治犯；停止一切政治迫害事件；在国家的所有代议机关和团体中，实行普遍的、平等的、不记名的和直接选举权。但是，莱比锡的右翼工会领导这时已经和军事当局进行了谈判，要迅速扑灭有席卷整个萨克森危险的罢工运动。结果，为了促使工人复工，对罢工者做了一些微小的让步。1917年4月18日，罢工便被宣布结束。

在柏林，有30万名工人停止了工作，4月16日，他们高呼着“和平，自由，面包！”和“结束战争！”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戒严令无论对谁也都不害怕了。有300个企业停止了生产。一些面包房被捣毁。在罢工者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和逮捕。因降低口粮标准而爆发的风潮，在“斯巴达克派”的影响下日益开展起来。在工厂中散发的传单，到处被人们传阅着，其中有一张写道：

“我们抗议人民正在挨饿！”

工人们！同志们！

人民已经忍饥挨饿和备尝痛苦，但他们的口粮标准从4月16日起将要再降低四分之一。我们的子弟正在战壕中和战场上流血牺牲或变成残废，我们也在忍饥挨饿，最后将失去劳动力和死于贫困。

这是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益所要求的，它仅仅符合于那个发动战争并因而使德国人民遭受痛苦的集团的利益。

工人们！我们的兄弟，俄国的无产阶级，在4个星期以前也处在同样的遭遇中。可是我们知道在俄国发生了什么：那里的工人挺身而出，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同时——这也是无比重要的

——他们已经取得了德国工人所不敢想像的自由。

俄国的工人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和人民的政府！

而我们呢？

我们还要继续忍受过去的贫困、剥削、饥饿和对各国人民的屠杀——所有我们的苦难的根源吗？

不！我们要说一千个不！

离开你们的工厂吧！

停止工作！

工人们，醒来！站起来！

认清自己的力量！

你们的有力的手，可以使所有车床停工！

打倒战争！打倒政府！

自由！和平！面包！”

但是，在柏林也像在莱比锡和其他地区一样，无耻的工会的官僚分子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企业主以及当局勾结在一起反对罢工者。由于看到罢工规模很大不能加以遏止，甚至连柏林的军用机场也席卷在内，柏林冶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也不得不出领导罢工。它在当局那里得到了几句有关粮食供应的诺言以后，便在第二天停止了罢工活动。一部分工人由于认清这是一个骗局，仍然继续坚持罢工。工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各项政治要求而展开斗争。企业工人所赋予罢工的这种政治性质，可以从巨大的冶金工业企业“克诺尔—布列姆兹”（现在是布列姆金维尔克人民企业）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中看出来。这些要求是：释放李卜克内西，释放被监禁的俄国侨民，取消对结社权利的限制，政治活动有完全自由，满足对粮食的需求，取消特别戒严令，在不割地不赔款的条件下停止战争。

此外，参加大会的工人还要求“由各大企业工人组成一个可

以与政府单独进行谈判的所谓工人委员会”。

在“克诺尔—布列姆兹”企业里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在罢工经过5天以后，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被征召入伍和送往前线了。右翼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们千方百计地要绞杀柏林各企业的罢工。这些叛徒对工人的斗争（这个斗争付出了很大牺牲）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可以从弗里德利赫·艾伯特写给他在前线的儿子格奥尔格的信中看出来：

“近两周来在柏林所发生的毫无意义的罢工并未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对这些罢工不应给以过分重视……当然，所有的人都愿很快取得和平。但类似的愚蠢行动对和平事业并无帮助……可是，正如我所说的，罢工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列纳”各企业中的第一次反战罢工

为了将俄国工农的革命活动报道给中部德国的工人，我们在哈勒出版的《人民报》上发表了电讯社的所有最重要消息。军事当局的书刊检查制度已经不能再禁止刊登有关俄国革命的一切消息了。

美联社的军事记者，一位“地道的目击者”在当时写道：

“在本月份俄国革命是这样一个因素，其影响和后果对于德国来说是很难估计过高的。

……德国人备尝严寒和贫困之苦，几乎每个家庭都由于流血牺牲，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学说……因而他们在考虑：是否也按照俄国人所走过的道路来解救自己。”

这时，罗莎·卢森堡从弗隆克监狱中写信给自己的同志时也谈到了俄国的革命：

“我衷心你对于在那里发生的，我们的切身事业所取得的胜

利并没有足够的估计，没有足够深刻的认识……”。

还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前，我们通过右翼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在中部德国的多数大企业中曾建立了一些外围组织。当听说政府要进一步压低口粮和马铃薯标准时，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家庭主妇的示威。我们还听到了在莱比锡和柏林举行罢工的消息。

借助罢工和群众行动来结束战争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同时，工人们也不屈服于各种威胁，例如，1917年4月26日，军事长官在讲话中曾说道：“要他们停止罢工！再也不许举行罢工，我们要严惩那些罢工的组织者！……”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意给德皇政府以新的数十亿军费，这样，他们就再次支持了进行战争和使战争胜利结束的宣传。但是，工人们已不再受沙文主义的狂热的影响了，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的反战反饥饿罢工就是这一点的证明。

当1917年8月16日政府企图再一次降低粮食供应时，由于我们在企业里建立了外围组织，就给了政府以应有的回击。我们召开了各重要企业的24名积极分子的代表会议（其中有新建的“列纳”工厂的12,000工人的2名代表）。我作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区委会的主席，在会上提议举行总罢工来回答政府，罢工是在1917年8月15日举行的。中部德国第一次反战罢工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和平。同时，还提出了废除各企业中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的要求。

8月15日，几乎哈勒城所有最大企业的工人，在几小时之内全走上了街头。在“列纳”的一些工厂中有12,000名男女工人停止了工作。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要求而举行了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向米兹堡的政府大厦挺进。参加这次罢工的总共有100,000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中部德国举行的第一次群众罢工的压力下，有关改革企业规章制度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

足。2天以后，罢工像开始时一样，有组织地宣布结束了。从此，工人群众对于有关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取得政权的所有消息，都更加关心了。

战时的青年秘密代表会议

1916年春在耶拿举行了由卡尔·李卜克内西所组织的、哈勒-米兹堡地区的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会议的主要报告人。会议的参加者在决议中表示支持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和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青年们坚决地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翼领导的叛卖政策划清了界限。建立了青年组织的临时中央机构，来联系青年运动的各个团体，并在它们当中交流情报和材料。这一中央机构应在新的青年代表会议上报告自己的工作。我们还从哈勒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1916—1917年冬举行的德国西北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反对派团体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在1917年7月召开全德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各反对派团体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1917年7月初在哈勒召开的。会议第一次决定在青年国际成立10周年的那一天——1917年9月2日举行街头示威。

在哈勒的代表会议上，有青年反对派的三个主要派别实行了合并：一个是在李卜克内西的倡议下联合起来的、被社会民主党所开除的一些团体（斯图加特、耶拿、德累斯顿、柏林）；其次，是团结在不来梅左派周围的、来自不来梅、汉堡和汉诺威-布劳恩施魏克的青年；最后，是处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影响下的哈勒-米兹堡、莱比锡、慕尼黑和莱茵省-维斯特伐利亚地区的青年。

虽然，各个派别对策略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代表会议的进行仍然比较顺利。会议的任务是对政府为使青年军事化而采取的

各种新措施给以政治上的回答。

除去强制“储蓄”外，军事司令部的将军们还采取了另外一些反对青年工人的措施，总称为“教育指令”。战争的挑拨者们竟如此厚颜无耻，把他们自己说成是“战时青年”道德的维护者，他们在讲话中和文章中硬说青年工人的道德正在败坏。为了迫使16—17岁的青年接受“青年军”的军事训练，他们还散布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谰言，说青年的犯罪率大为增长。他们的这种伪善首先表现为禁止少年出入娱乐场所，以及在公共场合吸烟和饮酒。此后，居然禁止青年夜间外出。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青年都被禁止在市内或市郊的人行道上，甚至在“所有公园中”做所谓“无益的逗留”。

饥饿的青年工人在军火工厂中和“进修学校”中从事着沉重的劳动。他们中间的左派进行反对“青年军”和反对兵役的鼓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使得司令部的长官和他们的右翼社会党从仆们大为恼怒。在这种反对战争政策的鼓动的基础上，提出了青年国际成立10周年时举行反战示威的口号。除去那些众所注目的问题外，在代表会议上还讨论了青年的各种切身要求，并重新提出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号召：“打倒政府！打倒战争！”在耶拿代表会议上最初通过的由李卜克内西所制订的提纲，再次被确认为在哈勒举行的、第二次全德无产阶级青年反对派团体代表会议的总的行动基础。

在严酷的非法条件下所召开的这一次代表会议，没有受到阻碍，也没有招致警察和法庭的迫害。

军事当局和警察当局为反战罢工所吓坏。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任何集会，印刷品的任何散发，现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追究。因青年国际成立10周年而印刷的秘密传单全被没收；散发传单的青年同志被判了8年徒刑。虽然如此，在许多德国城市——柏林、哈勒、莱比锡、汉堡、不来梅、汉诺威、德累斯顿——青年

们仍试图举行反战的示威。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示威还在开始时就被破坏了。

德国舰队上的起义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加速了德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水兵中反战运动的规模也扩大了。军官和水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水兵的供给情况每况愈下。一些在政治上最有觉悟的水兵，如“腓特烈大帝”号舰上的水兵马克斯·莱赫比奇，“摄政王子鲁易波尔德”号舰上的阿里宾·克比斯，以及司炉查克斯和老水兵维别尔，组织了水兵和司炉的代表会议。他们和独立社会民主工党以及造船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

6月6日“摄政王子鲁易波尔德”号的全体船员开始举行绝食罢工。马克斯·莱赫比奇宣称，水兵们所建立的“粮食委员会”是按照俄国榜样成立水兵苏维埃的第一步。他和他的同志们通过决议，要求缔结民主的和约并签署了支持俄国水兵的声明。他们离开了军舰，虽然当时已宣布取消假期。当莱赫比奇和其他水兵回到船上以后，指挥部就下令该舰离岸启航，以割断该舰水兵与其他军舰水兵间的联系。革命水兵的中央领导决定：如果不能得到“摄政王子鲁易波尔德”号靠岸的任何消息，就要在所有舰队上开始起义。当从广播中听到了开始逮捕的消息后，帝国舰队的很多舰船就开始了起义。

参加“摄政王子鲁易波尔德”号事件的一些水兵遭到了逮捕。50个人共被判处400年的徒刑。马克斯·莱赫比奇和阿里宾·克比斯于1917年9月5日被判处死刑。

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列宁当时在评价这一事件的国际意义时写道：

“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海军的起义。必须想到，在德国这样

一个国家里……革命遇到的困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德国 事件发展的影响

剥削者强盗和被剥削的、贫困的、渴望和平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了。俄国的工人、水兵和农民表明了怎样才能推翻野蛮的制度。这一事件在德国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众革命运动的新的有力的高涨。对迅速缔结和约的要求仍未停止。这时，在革命前夜的德国，令人特别感觉到的，是缺少一个能够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独立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的政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矛盾在德国已达到无比尖锐的程度，它们只有由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才能加以解决。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如饥似渴地注视着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消息。

在社会民主党分裂以后，我们在哈勒的左派多数保留有一种日报《人民报》。报纸是公开出版的，要经过军事当局的检查，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被检查的报纸上用“恭顺的语言”和读者见面。不言而喻，只有在秘密传单上才能够对工人讲出事实的全部真相。从1917年二月革命起，我们就始终不渝地向中部德国的工人指出应该模仿俄国阶级兄弟的先例，介绍了他们的新的政权机关——工兵代表苏维埃，但往往由于检查的原因，这一点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形式。检查官给我们所删掉的那些东西，工厂中外围组织的人员在《人民报》左派编辑人员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很快就知道了。

还在1917年3月22日，我们就摘要发表了彼得堡的俄国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2页。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和平宣言，同时指出说：

“这是向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它要求立即放下武器和停止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当然，这样的报道可以帮助革命的工人认清在德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1917年11月12日在《人民报》上一篇以《俄国和平》为标题的文章中，我们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在空前的血腥屠杀和破坏的世界战争的条件下争取和平的最强有力的行动。……无产阶级的事业成了普遍的革命事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是达到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原则应当是：立即建议媾和和立即停战，这是无产阶级政策的核心，而这一政策引导了人民……由此可见，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扫清走向和平的道路！”

1917年11月13日，我们向俄国的革命者表达了我们的热烈的无产阶级的感情。我们写道：

“各国工人将以非常的关切和热烈的同情注视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要知道，这是第一次一个欧洲大因为推翻资产阶级和把政权交给人民群众所采取的尝试。今天我们向俄国的战士表示我们最热情的祝愿！他们的如此英勇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打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们发表了弗朗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的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强调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对考茨基等叛徒向年青的苏维埃政权所发出的污蔑，进行了坚决的回击。稍后，我们又试图在我们的报纸上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蔡特金的一篇文章就叫做《通过专政走向民主》。

“斯巴达克派”在以《关键时刻》为题的秘密传单中，号召通过在德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办法，来支援苏维埃俄国，因为这时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和谈中正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着艰巨的

斗争：

“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群众试图掌握国家政权……德国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只是……加以卑鄙地掩盖了吞并而已……帝国主义的罪恶计划是否能遭到破产完全取决于我们。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毅力和我们的斗争，使德国政府极力追求的单独媾和变成为普遍的和平。……和平——这是俄国革命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没有和平，它就会被淹没在混乱和血泊之中……只有经过群众斗争，群众起义，群众罢工（它可以停止目前的经济活动和军火生产），只有经过革命和把德国变成人民共和才能结束对各国人民的这种屠杀和取得和平。……德国的男女工人们！不要再迟疑了！把握住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一关键时刻吧！……”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德国成了帝国主义战线的最薄弱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开展的决定性环节。列宁对当时的局势也正是这样估计的。他一直是从小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务活动家或政治家，像列宁那样好地通晓德国的历史和了解德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同样精心地研究过德国的哲学。他还精通德国的语言。

还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就对德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给以极大的注意。这并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这一点在了解列宁对德国的一贯的政治态度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首先使他感到兴趣的是从社会主义在欧洲中部发展的观点来看德国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任何人都没有列宁那样好地了解德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胜利。就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的艰苦岁月里，列宁也对德国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一直认为必须在俄国和德国之间建立联系。他并不局限于号召立即展开争取和平的斗争，但公开主张俄国的劳动人民应以最广泛的方式向德国和法国提出签

订和约的问题。列宁说道：

“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保证，即从筋疲力尽、大势已去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方面得到保证。”^①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的时候，他就实现了自己关于和平的思想。他对革命提出了以下的任务：

“苏维埃政权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马上缔结符合民主条件的全面和约，马上签订停战协定（哪怕停战三个月也好）。

民主和约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掠夺）……”^②

在11月7日胜利以后，这一个和平建议马上向各国政府和人民提了出来。建议中强调指出，苏联政府将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去中立国家，以便立即开始任何可能的谈判。在建议的结尾中说：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③

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任何幻想，这一点可从稍后他做的报告中看出来：

“这正像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而想劝猛虎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④

事实上，战争狂人鲁登道夫和威廉二世并没有从苏联的呼吁中看到德国有签订这一和约的历史可能性，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在德国威信不受特别损失的情况下来结束这一场已经输定了的战争。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

③ 同上，第2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2页。

争。他们把这个和平建议只不过当作是敌人的示弱表现，并且从那种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眼光出发，认为还有可能在讨得部分便宜的情况下来结束自己的掠夺战争。

在苏联提出了和平建议以后，德国仍在东方继续进行了几个月的战争，直到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把自己的强盗和约强迫苏维埃俄国接受了为止。根据这一和约，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和乌克兰都要脱离苏维埃俄国。他们还打算掠夺苏维埃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居民，一半的工业和90%的矿藏。苏维埃国家还应支出几十亿金马克，作为“战争的赔款”。由于这一强制的条约，列宁不得不和党内的托洛茨基派和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

在和缔结和约的敌人进行论战方面，列宁举出了以下的历史事例：

“凡是愿意思索或善于思索的人，都可以从提尔西特和约（这不过是那个时代中强迫德国人签订的许多苛刻而屈辱的和约之一而已）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那种以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签订极苛刻的和约都是陷入灭亡的深渊，而进行战争则是英勇行为和得救之路的想法是如何幼稚可笑。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在历史上起过不少喘息时机的作用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搏斗的作用。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变。”^①

“我们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从我们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较快了。”^②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8页。

② 同上，第70页。

列宁曾指望德国帝国主义在继续进行战争的过程中遭受失败，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二月革命加速了德国革命的发展，而结束战争的斗争在经过了俄国和德国的士兵在前线友好联欢以后，就有了新的、强有力的发展。

党员老战士罗伯特·基维尔特战前曾在瑞士当建筑工人，他在那里遇到过列宁并听过列宁的讲演。他讲述了自己在东部战线的一些经历：“我们向前推进，跟踪着退却的俄国士兵。有一天，当我们和俄国的队伍相遇时，他们就向我们喊话，说俄国发生了革命，沙皇被推翻了。这一消息激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德国和俄国的士兵都跑上前来互相迎接，他们都高兴地彼此祝贺和热烈拥抱。军队纪律的一切障碍都被打破。任何人这时都已没有开枪的念头。在此以前被驱使着作为‘敌人’互相攻击的人们，现在像兄弟一样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希望结束对各国人民的屠杀和最快地实现和平。在这些日子里，这样的联欢场面在整个东部战线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军官大伤脑筋，以致有时他们就干脆开枪射击，因此，双方都有一些人被打死和打伤。……我在瑞士所听到的列宁的话，成了我全部活动的准则。在我当兵以后，我特别遵循着列宁的指示，我组织了同情革命的士兵的秘密团体。例如，1916年夏，当我回家度假时，我从家里带到了东部战线一些秘密的鼓动材料，这是我从开姆尼兹一个同志那里得到的。这是‘斯巴达克派’的传单，其中包括《我们的主要敌人——在自己国内！》的传单和尤尼乌斯（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

在西部战线上，逃兵的数量大为增加。在东线，士兵联欢仍在继续进行，这一点就成了德军最高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在一则消息中谈到：

“在前线，步兵们到处都准备进行联欢和谈判。这种情况几

乎在所有双方士兵接近的地方都有发生。这种行动有时在军官的参与之下，有时在军官的许可之下发生。”

党员老兵戈尔同志叙述了联欢如何提高了他的政治思想：

“1917年底在奥尔金斯克运河附近沼地所度过的圣诞节，使人有着多么强烈的感受啊！我们的驻地与俄军阵线相距有300米远。在圣诞节前夜的俄军阵地上忽然出现了装饰得非常好看的新年枞树。

第二天，有一些传单在人们当中辗转传阅。从这些传单中我们知道俄国在11月初已成立了新政府，这个政府主张和平，号召我们结束这一场没有意义的流血冲突和返回祖国。当天，我们就开始交朋友了。我们交换了面包和肥皂。在我们和俄国士兵中间达成了衷心的互相了解。但是这种会见是被严加禁止的。”

回家度假的士兵们在本国讲述他们在前线联欢的情况，这就在人民当中进一步巩固了结束战争的信心。

德国帝国主义者由于知道年青的工农政权不想再进行战争，所以在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提出了许多极端苛刻的要求。虽然，当苏维埃俄国关于举行和谈的建议被接受时，德国人民的紧张心情有所缓和，但是德国政府的各项掠夺的要求仍激起了德国工人的愤慨。

“斯巴达克派”散发传单，号召举行群众性罢工，在各军火工厂中停止工作和依照俄国革命的榜样建立工人苏维埃。在柏林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各企业的罢工都是在革命领导者的帮助下准备和进行的。

“斯巴达克派”提出了以下的号召：

“1月28日星期一开始群众性的罢工！”

俄国的十月革命对奥匈帝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起了很大的影响。在维也纳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经过1918年1月的群众罢工以后，这个苏维埃便正式被承认为奥匈政府。

工人苏维埃也开始在德国出现。在柏林成立的工人苏维埃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1.在各国人民自决的基础上，根据俄国各族人民的全权代表在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所做出的决议，迅速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2.吸收各国工人代表参加和平谈判。

3.改善粮食的供应，为此必须对各企业和商业仓库中的粮食储备加以登记，以保证对全体居民的同等供应。

4.特别戒严令应立即解除。结社权利和在报刊上、会议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应立即予以充分恢复。保护女工和青年劳动的法令，应立即付诸实现。军事当局对工会活动的任何干涉都应停止并防止其重新发生。

5.企业军事化的制度应予以废除。所有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判罪或逮捕的人，应立即释放。在德国的各级国家机关中，必须实行广泛的民主，首先是在德国各地方自治代表会的选举中，对20岁以上的所有男人和女人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权。”

1918年1月28日开始了罢工。在柏林参加这一群众革命活动的有50万人，而在全德国则有100万以上的男女工人。在企业主和军事当局的严密勾结下，有几万名工人被征召入伍。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0人！资产阶级的报刊开始对罢工者进行肆无忌惮的、卑鄙的污蔑，称他们为“叛徒”。但是，罢工者的阵线是不可摧毁的。

在柏林，仍旧受到很多政治觉悟不高的工人群众所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重新用一切力量来扼杀规模巨大的罢工运动。在1924年谢德曼在法庭上曾说过如下的话：“为了回答凯塞尔将军的命令（关于加强戒严令和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威·昆恩注），工人们打算停止电站的工作，如果我们当时不参加罢工

委员会，那么，大概今天本法庭就不能开庭，而整个说来，在1月份的当时，战争和所有其他一切也就都结束了。这一点是我深信不疑的。”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哈阿兹和狄特曼被群众的声势巨大的发动所吓坏，他们主张与政府进行谈判，并提出及早用一定期限来限制罢工。他们主张吸收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谢德曼和布劳恩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这些叛徒在和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勾结下，又一次把罢工工人的行动核心抓到了自己手中。“斯巴达克派”此时在组织上和群众并未建立联系，虽然是它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一月的罢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现在和一些革命领导人一起，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其中也包括了“斯巴达克派”的代表。“战斗的工人们认为‘斯巴达克派’是独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最激进的一翼，但是并不把它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虽然如此，“斯巴达克派”的功绩在于，正是它准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次震撼了帝国制度的最大的群众政治罢工。威廉·皮克同志把德国军火企业工人的罢工称做对十月革命的响应。虽然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工人们对于必须争取停战的信心更为加强了。

列宁对于1918年1月罢工曾给了如下的评价：

“但是1918年1月德国的罢工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支持我们的，不仅有远在沙皇时代就敢于在讲台上把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称作强盗的李卜克内西，而且有相当巨大的工人力量。这次罢工是以工人流血和遭到镇压结束的。而在协约国各国，资产阶级自然是欺骗了工人；资产阶级对于我们的呼吁书不是诬蔑，就是根本不予公布，因此，1917年11月我们对各国人民的呼吁书没有获得直接效果。那些认为单靠这个呼吁书就会引起革命的人当时自然要大失所望了。但我们不是光指望着宣言的，我们指望着的

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动力。我们那时候说，不同国家的革命将走不同的道路，当然，问题不是仅仅在于推翻一个拉斯普庭的傀儡或者一个狂暴的地主，而在于同更发达、更文明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①

十月革命对于德国左派来说，是他们和机会主义多数最终分裂和向列宁主义转化过程中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用事实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并促进了独立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左派的斗争。

在德国，直接革命的危机成熟了。正如列宁所说，被压迫阶级不愿再按照旧的方式生活下去，而统治阶级也不能再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

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为了挽救君主制度和德帝国主义者的阶级国家，在叛卖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又做出了新的一步。

1918年10月在德国由“温和的”马克斯·巴登亲王的政府上台执政，代替了反动政府。这一届政府的“钦命”国务大臣中，包括了菲利普·谢德曼和工会领导人古斯塔夫·鲍威尔。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参加马克斯·巴登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关于准备停战和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其目的在于从上面来反对“自下的革命”的威胁。考茨基和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工党分子”——的右翼领导，用关于“民主”、“议会的”和“纯粹的”民主的蛊惑词句，来帮助统治集团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实质。他们以此使具有坚决革命情绪的工人群众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虽然，独立工党的基本党员群众都充满了革命精神。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列宁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必须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也不了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0—351页。

解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在1918年10月初列宁写道，德国的政治危机可能导致革命的爆发。1918年10月3日他又号召俄国的无产阶级帮助德国的工人，“因为德国工人面临最严重的考验，要经历从被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的艰难道路，要同本国的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进行最顽强的斗争……”

我们要规定每个大谷仓都有存粮，以便在德国工人同帝国主义恶魔和野兽作斗争的困难时刻支援他们”。^①

列宁还写信给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说：

“一周以来，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

不同威廉政府结成任何联盟，不同威廉二世政府+艾伯特和其他恶棍结成任何联盟。

但是，当德国工人群众，德国千百万劳动者，开始进行精神（目前还只是用精神）反抗的时候，我们便开始准备和他们结成兄弟联盟，给予他们粮食和军事援助。”^②

在这里可以说得稍远一些，我要痛斥谢德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对待苏维埃俄国和俄国无产阶级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几个星期以后，当俄国人民为了和饥饿的德国人民表示国际团结与联合，从俄国开来了送给德国工人的满载粮食的列车时，却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艾伯特政府对俄国送来的这些粮食礼物的回答，是发表了以下冷淡的毫无热情的声明：“美国共和国总统保证供应我们以居民必需的粮食和脂油。”德国就这样开始倒向了帝国主义力量。这一方针直到今天仍被西德的阿登纳和奥伦豪尔执行着。

但是，列宁及其战友们并不因这种粗暴的攻击而放弃自己对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6—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1—362页。

于德国政治情势所做的实事求是的估价。甚至，列宁还是唯一明确而毫不动摇地反对1919年掠夺的凡尔赛和约的大国首脑。

被人民的愤怒所吓坏了的最后一届凯撒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书报检查制度放松了，释放了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政治犯。

群众为释放李卜克内西进行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18年10月23日当时李卜克内西在柏林遇到了几千人，人们把他举到肩上。游行来到了1916年5月1日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捕的波茨坦广场。他又在这里发表了演说并再次号召：

“打倒战争！”

“打倒政府！”

警察在旁束手无策。当游行者们通过文捷尔·登·李顿大街去苏联大使馆表示与俄国兄弟团结一致的时候，纠集在这里的大批警察便手持军刀冲向了示威的人群。警察的暴行继续了很久，直到人群被驱散为止。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苏联大使馆向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威廉二世不得不停止了鲁登多夫的军事独裁，由格烈涅尔将军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此外还答应要修改宪法，这个宪法在此以前总地说来已由军事司令部的无限专制所取代了。很多人谈“议会化”，企图以此来迷惑群众。“斯巴达克派”则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它的纲领为工人阶级指出了道路与目的。

“斯巴达克派”举行帝国全国的代表会议

1918年10月7日，所有“斯巴达克派”的工作人员和左派激进主义者在柏林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第一次进行了合并。这次会议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代表会议分析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情况，还

制订了纲领。

会议在告人民书中说：“德国帝国主义的崩溃极为深刻地动摇了德国国家制度和经济的基础，从而造成了革命的局势，这种局势重新提出了1848年革命期间，德国资产阶级所未能解决的各项问题。

在这一历史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它在俄国开始而被企图称霸世界的资产阶级所扼杀）是否进行就取决于德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立场绝不容许有任何动摇不定。德国无产阶级应以1848年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为依据，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与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

我们在“斯巴达克派”与左派激进主义者所举行的帝国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读到以下的话：

“革命运动在一开始就遇到了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反革命正力图在规定各种虚伪权利的幌子下（因为暴力手段对它已不够用），削弱这一运动。巩固议会制度和实行普鲁士的选举法，会使无产阶级像过去一样地安于现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既然未能实现它向国外的掠夺计划，就要保证它对本国人民的掠夺，同时，也就是巩固威廉二世及德国其他最高统治者的摇摇欲坠的王位。

反革命分子的贪求，得到了一些社会党人的友好的支持，这些社会党人从1914年8月4日起就滥用他们还在和平时期所取得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并将其用来为地主和资本家强盗的利益服务，从而保证他们有可能肆无忌惮地欺骗和掠夺人民。这些社会党人在1914年8月4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要保卫‘祖国’（指资本家和地主的祖国——作者注）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现在则要保卫它不受无产者群众的进攻。他们把谢德曼和鲍威尔这些代理人送入政府，以便在马克斯·巴登亲王的领导下来拯救王位和资本家的保险柜。”

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要求无产阶级不管现行的法律和规定如何，而以一切手段争取达到：

“1.立即释放所有因拥护无产阶级事业而被监禁和服刑的人，不管他们正处于判决前的羁押或是已服满刑期；释放一切因政治罪被捕或遭禁闭的士兵；取消在政治方面所加于士兵的一切限制。

2.立即取消特别戒严令。

3.立即废除劳动义务法。

此外，无产阶级还应要求：

1.无偿地废除一切军事借款。

2.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矿场和冶金企业，大大缩短劳动日，规定工资的最低限额。

3.没收一切大中地产，将它们的领导权转交农业工人和少地农民的代表。

4.彻底改编军队，即：

（一）士兵有权结社和召集会议来讨论公务或非公务事宜。

（二）免除军事长官实施纪律处分的权力。纪律由士兵代表来维持。

（三）废除军事法庭。

（四）领导人员可根据其所属多数人员的决议加以罢免。

5.废除对政治罪和军事罪的死刑判决和服苦役。

6.食品的分配交由工人所委托的代表进行。

7.取消各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和王朝。”

代表会议还决议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感谢俄国同志对它所表示的团结和兄弟的同情，并表示“不是在口头上，而要在事实上依照俄国同志的榜样来实现这种团结”。当时，代表会议还没有决定在德国建立新的、革命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斯巴达克派”在组织上的弱点便保留下来，并在以后对德

国起了严重的影响。

这时，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中间，展开了对无产阶级专政途径的辩论。曾参加过这些辩论的波特霍夫同志说：

“在一月间军火工厂工人举行罢工时，我们的队伍被警察所驱散。我们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下一次我们应该开始武装斗争。我们成立了小组，讨论俄国革命和苏维埃的发展问题。以下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苏维埃应该怎样组织，才使它能够解决斗争的任务？苏维埃在俄国是怎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及后来怎样取得全部政权的？此后，我们就将我们的理论认识应用到实践中去。我们加强了革命骨干力量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把这一点看作是在我国建立苏维埃的基本条件。”

卡尔·李卜克内西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所散布的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运动应只限于进行秘密活动，并且应依靠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取得胜利。李卜克内西证明说，这是一种调和和叛卖的策略，只有不断采取前进的行动，才能加强群众的积极性。他在对柏林的革命骨干讲话时说道：“在这种斗争中，也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革命化，才能揭穿社会民主党的叛徒，划清阶级界限和使军队革命化。”

按照俄国的榜样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也被革命的工人掌握了。到11月8日，几乎到处都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斯巴达克派”在士兵和工人中间散发传单。其中提出了以下的口号：

**“在一切地方都选出你们所信任的代表吧！
士兵们，不要放下武器！
帮助人民武装起来！
工人们，从企业里走出来！
让统治阶级之间的休战成为你们斗争的信号吧！
全部政权归德国工兵代表苏维埃！”**

水兵起义——革命的开始

1918年10月29日，舰队司令部下令要所有舰船驶入公海，去和英国舰队进行“光荣的死战”。80,000名德国水兵的生命就这样被轻率地当做了赌注。水兵们拒绝服从命令。他们不愿为这个已经输了的战争去送死。与此相反，他们已在舰船上和营房里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到11月4日，这些苏维埃已经得到了20,000名武装士兵和水兵的支持。起义开始前，在一些船上已发生了无数次的冲突。水兵们开始准备起义，他们反对舰队司令部的这种狂妄的意图。

库尔特·蔡斯勒叙述说：在军舰上司炉们放了蒸汽并离开了船只，更多的水兵在上岸度假后都不返回军舰，同时留在船上的司炉也最终熄灭了锅炉和拒绝加煤，水兵们则拒绝执行起锚的命令，全部舰员在底舱中构筑了防栅，并破坏了电线等。这样，由于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水兵们终于阻止了船只开往公海。大多数的德国舰船上都飘起了红旗！

在“大侯爵”号主力舰上张贴了以下内容的号召书：

“停止你们的工作！我们要和平，还是不要和平？难道我们要去反对我们西线的同志吗？打倒战争！”

在“腓特烈大帝”号舰上出现了印刷的传单，其中说道：“德国妇女的丈夫和儿子的生命由于这种大屠杀连猪狗都不如了”。

军舰出海的时间原定在10月30日早晨3点钟。由于水兵和司炉们所采取的革命立场，出海的命令每次都被拖延几小时，最后则归于无效。当军事当局的力量加强以后，在很多船上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总共被捕的有千余人。德国军事当局再次阻碍革命的水兵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水兵们仍然达到了自己最低的要求：海军的战斗行动被停止了！

为停止这种战斗而进行的斗争，是水兵们的一次非常好的革命锻炼。这一斗争帮助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克服了资产阶级关于“保卫祖国”的蛊惑宣传，这种宣传特别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政策和煽动，在此以前一直影响着他们。1918年11月2日舰队司令宣称，各军舰上所发生的事件，应看作为“布尔什维克所策动的骚乱”。在大西洋舰队指挥部的命令中还指出说，这种骚乱的基础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倾向”。从上述事件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舰船上所提出的口号，以及水兵战斗策略的性质都是一致的。

事实上，舰队上所发生的骚动并不带有布尔什维克的性质，虽然，它们是由那些在1917年夏天已经领导过运动的觉悟的革命力量所组织的。骚动的参加者有2人被判处死刑，有很多人被判处多年的苦役。被怀疑在舰队上进行革命工作的水兵大部分都被调往陆军中服役。但组织终究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地又得到了巩固。革命的宣传工作又重新开始了，但这一次则吸取了第一次大发动的经验。此后，舰队上的几次发动，都是在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完全互相支持下举行的。同时也克服了在1917年时期带来了巨大损害的缺点。

水兵、工人和士兵们早已忍无可忍，现在只需要一个火花，就可以把集中在基尔的全部德皇和地主的机构化为粉碎。这最近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火花，是舰队军士和士官生所组成的巡逻队对参加工人群众示威的38名水兵实行血腥屠杀的事件。有8名示威参加者被打死，29名受重伤。

这一批革命斗士的牺牲使革命群众加速地了解到：德国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在武装的革命发动下，才能予以粉碎。武装起义就这样开始了。街头上响遍了“德国共和国万岁，打倒德皇！”，“国际万岁！”的口号。

聚集在驱逐舰第一舰队指挥部门前的水兵、司炉和工人，迫

使舰队司令听取了由司炉长阿尔捷里特宣读的他们以下的要求：

1. 要霍亨索伦家族退位。
2. 取消特别戒严令。
3. 释放第 3 分舰队被判刑的人。
4. 释放一切政治犯。
5. 男人和妇女享有同样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

水兵们表现出了无穷的革命精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和组织上坚强的领导，来把这种革命精力引向正确的道路。从1917年起成立的革命水兵的组织有足够力量来阻止指挥部的罪恶图谋——使舰队驶入公海——的实现，但是，它不能领导水兵群众们走上他们所发动的革命的道路上。在这方面这一个组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非常软弱的。

政府把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派到基尔去平息和镇压罢工。

诺斯克宣布自己为基尔的长官，同时在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治领导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以便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以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和将官们举行了会谈，并很快地和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同时，诺斯克建立了一支由军士和士官生组成的志愿队。虽然，他瘫痪了基尔的革命运动，但却不能遏止住革命的进程及其在整个德国的发展。很快地，德国北部所有其他城市也都掀起了革命运动。在律贝克、布龙斯比特耳和库克斯港的上空都竖起了红旗。

1918年11月6日当基尔的水兵占领了汉堡港以后，汉堡便开始了总罢工。在同一天，革命的水兵、工人和士兵们在不来梅、不来梅港、弗伦斯堡、罗斯托克及其他城市也都取得了胜利。

11月7日在慕尼黑举行了工人和士兵的声势浩大的示威。第二天，《慕尼黑邮报》（资产阶级报纸）写道：“这次示威产生了惊人的印象，参加示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正在决定自己

的命运；今天人民即将做主人。”士兵们已经从军帽上撕下了帽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所遭到的压力使它不得不与独立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号召群众参加示威。他们要求威廉二世和太子立即退位，结束战争，将军队调回本国，实行失业保险，规定8小时工作日等。

晚上，成立了有50人组成的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临时苏维埃，该苏维埃在当晚便决定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11月7日巴伐利亚王逃出了慕尼黑。巴伐利亚其他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也举行了起义。但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想像的革命并不是这样的。巴伐利亚的君主制度没有经过流血就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很快就了解到：以艾斯涅尔为首的新政府（它受到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并不打算去触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例如，《慕尼黑最新新闻报》在1918年11月9日写道：

“从最近消息看来，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临时政府对于一切专制主义的或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是一概反对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几乎在没有统一号令的情况下在全德国建立了起来。只是在柏林，由于这里集中了普鲁士的强大的军事机器和实现着德国帝国权利的官僚机器，此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局和工会的中央机构，事情发展到了大规模的冲突。那里的“斯巴达克派”和革命骨干分子号召在11月9日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

“工人、士兵同志们！决定性时刻来到了！我们应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任务。

当滨海地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将政权拿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在这里正进行着大规模的逮捕。

这是军事独裁的开始，这是进行毫无理性的屠杀的准备。

我们不是要求一个人的下台，而是要求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实现它的一切措施。

起来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吧！

从工厂走出来！

从兵营走出来！

让我们携起手来！

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工兵代表执行委员会：巴尔特、布留尔、

艾克尔特、弗兰克、哈阿兹、列捷布尔、

李卜克内西、聂茵多尔夫、皮克、魏格曼”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叛卖领导继续进行着关于德皇退位的谈判，要求工人们应该耐心等待。

1918年11月9日散发的“斯巴达克派”的传单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号召人们继续推进革命：

“红旗飘扬在柏林上空。这一次，柏林的工人没有站在德国革命战士的前列，但是，他们答应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纲领而担负起全部工作。一两个霍亨索伦的退位，对于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政府里虽有两名社会党人也仍然无济于事。身穿工作服和军装的柏林革命无产阶级在这里表明自己争取下列要求的坚定信念和不可动摇的意志：

1. 立即实现和平。
2. 取消特别戒严令。
3. 从监狱中释放政治犯！
4. 普遍解除那些不拥护本纲领的警察、军官和士兵们的武装。
5. 全部军事机器和民政当局都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委托的代表。
6. 将全部军事建筑与军火工厂转交苏维埃。
7. 将全部交通工具、工厂和银行转交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全权代表。
8. 取消军事法庭。

9.解散国会。

10.要总理和所有部长辞职，并辞退所有拒绝为社会主义人民服务的职员。由工人所选出的代表来代替他们。

11.废除王朝的权利和等级特权。

12.在全德进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以便将全部立法权和所有社会机构、阶级及其他国家财产的管理权都集中到苏维埃手中。城乡所有成年的劳动居民，不分性别均可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

13.与国外各社会主义兄弟党尽快建立联系。

14.迅速恢复俄国驻柏林的大使馆。

同志们！上述要求的实现将给我们开辟走向新世界的道路。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行动起来吧，权利在你们的手里！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数万名工人和士兵响应了这一号召。巨大的示威游行队伍通过了首都的街道。在有的军队中爆发了由军官所组织的抵抗行动。革命浪潮冲垮了君主制度。在全德国一顶又一顶的王冠从国王和公爵的头上被摘了下来。

李卜克内西在民众的无比欢跃之下，从皇宫的阳台上向人民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当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确信他们已不能阻止革命的时候，他们便放弃了君主制度，并在李卜克内西宣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2小时以后，由谢德曼宣布成立“自由德国共和国”。谢德曼“不愿使‘共和国’这一口号仅仅为极左分子所独有”。社会民主党人召回了自己在德皇政府中的代表，接着，马克斯·巴登也提出辞职，让位给社会民主党的书记弗·艾伯特，而艾伯特早已宣布过：他将在保留旧的帝国宪法的条件下管理国事。

1918年11月9日，代替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地方通讯》，从印刷厂印出了《红旗》报。在第一版上有一幅大字标题：

“柏林上空红旗飘扬”。

下面用大号铅字排着：

“警察局已被攻占，650名犯人已被释放，皇宫上面红旗飘扬。兵营被占领，战俘被释放。资产阶级的沃尔夫电报局已被工兵代表苏维埃占用，电报局拍发的一切电文均须经过事先检查。士兵和军官们在街头上撕掉了自己的黑白红三色的帽徽。”

什么事情发生了？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怎样进入了大的反动报刊的印刷厂呢？

请看这些事件的主要参加者戈尔曼·董克尔（现年83岁）关于这点是如何说的：

“在那一时刻，人民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柏林。红旗在空中迎风飘扬。满载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卡车疾驰面过。时此时彼地传出阵阵的欢呼声：这是一直渺无音信的老同志们的相遇。对胜利的向往已开始变为现实，啊，11月9日！而我们斯巴达克派从早晨起便着手工作了。革命在大踏步前进！现在需要向迅速集结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好奇的人群，解释目前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给游行者们一些指示。”

董克尔同志在登合尔广场看见了自己一位多年的革命战友，他正走在一支游行队伍的前面。他们两人当时便决定，必须为“斯巴达克派”占领《地方通讯》大楼。

“一辆卡车满载着革命的水兵和士兵从我们旁边驶过。车上飘扬着红旗。我们匆忙地向这些同志解释，不能再容许《地方通讯》这个战争挑拨者的卑鄙的宣传品继续毒害人民的意识。这样，我们就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进入了齐梅尔大街35/44号。我们来到了一所巨大建筑的前面，一直进到里面没有一个人想对我们进行抵抗。我们走上楼，来到了排字车间，红旗成了我们打开所有门户的钥匙。我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今后排字工人们不必再为霍亨索伦和大财主们的利益而拼命工作了，他们应该帮

助出版革命无产阶级的报纸。

排字工人们开始还感到有些惊奇，跟着就完全同意了。

‘说下去！编辑部在那里？’

‘编辑先生们在会议厅’。

‘那就再好没有了！我们去干吧！’

这就是那些可敬的先生们，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起，默默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

‘先生们！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你们的这个宣传机构该完蛋了！你们自己都懂得：胜利了的革命绝不能容许反革命的报刊存在！’

而这里就出现了最奇怪的事情——编辑先生们都摇起头来：自然，他们也懂得，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大致还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各种反动报刊的出版社，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机关和各主管机关。当武装的工人和士兵进入了帝国内阁的办公厅时，那里像德国许多其他主管部门一样早已空无一人。

在正午的时候，总指挥部的长官宣布说：在大多数部队中都已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说军队拒绝向行进中的工人队伍开枪。稍后，司令官又宣布说，士兵们就是为了保护政府机关，也未必会开枪射击。像是对历史事件的嘲弄一样，11月9日早晨人们从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第一版上读到了以下的话：

“士兵们！请你们安然返回兵营。没有秩序，人民政府之安全则不可思议！请读明日《前进报》上专门为你们所写的通讯！
新政府”

这时，艾伯特及其同僚们继续在马克斯·巴登亲王的邸宅中进行商谈，他们是避开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权代表，从帝国内阁躲到这里来的。和他们一起的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狄特曼。在这里签订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均等参加政府的协

定。后来据其中一个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所说：“如果当时我们不填上这个缺口，德国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了”。而谢德曼还补充说：“如果我们这些几乎每天都受到枪毙威胁的人还不能团结起来，那么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们就要统治柏林。”

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们高呼着欢迎李卜克内西和革命的口号走向莫阿比监狱并释放了政治犯人。

在午后1点钟，即革命胜利的几小时以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便使出了蛊惑的伎俩，被他们在办公处匆忙召集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工兵代表委员会竟宣布了总罢工。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使社会民主党以“革命党”的姿态出现，并保证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在过去的群众罢工中也曾顺利地采取过这样的策略。在这个社会民主党工兵代表委员会的一篇声明中说道：随着帝国内阁受艾伯特的掌管以后，“国家政权正转人民的手中”，因此，绝不应该使已取得的胜利“遭受损害和招致危险”。

但是，斯巴达克派、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志和革命骨干们所进行的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在11月初就已经击败了企图在革命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反革命机构。声势浩大的总罢工遍及柏林全市。革命群众整天地活动在街头。武装的工人和士兵乘卡车分赴全市各地，固守在街头和广场上。军官们都被解除了武装。

卡尔·李卜克内西从旧皇宫的阳台上对着广大的示威群众说：

“革命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取得了和平。和约在这时签订了。过去已经不再复返了。在这个皇宫里居住了几世纪的霍亨索伦的统治也就此结束……我们向4天前被以卑鄙的方式从这里赶走的俄国兄弟表示敬意。我们号召俄国的兄弟回到这里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事情的经过是：德皇政府不对它所仇恨

的苏维埃国家采取卑鄙无耻的手段，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11月5日，它尽力为了讨好战胜国而在伪造的、挑拨性的借口之下，将苏联大使约飞逐出了德国。列宁称这一次挑衅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卑躬屈节。艾伯特-哈阿兹的“社会党”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调节的行动，甚至都没有试图纠正这一野蛮的行为——驱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这是这一政府的罪行之一，也是它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当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前发表了演说以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大为恐慌，因为他们处于孤立状态了。因此，他们便力图这样来说服群众，即人民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胜利，所以各社会党必须实行团结和合作。他们已经和右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合作关系。现在，他们尽一切力量对李卜克内西施加压力，要他参加政府。威廉·皮克同志对他所目睹的这些卑鄙的企图曾经写道：

“过了不久，就不断有一些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团来进行激烈的威胁，说如果不能立即成立联合政府，他们就要自己组织政府。政府必须马上成立，因为没有政府就不能在前线上达成停战，也就不能停止继续流血。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的蛊惑宣传起了主要作用……”

士兵和工人的代表团不断出现在我们的屋子里，他们对李卜克内西同志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建议他参加政府，理由是他的名字可以促进迅速实现停战，而如果由于他坚持原则使停战拖延下来，从而再使一个士兵牺牲生命的话，那就无论用什么也都不能原谅了。看来，这一套论据也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所授意的了。当时李卜克内西的处境十分困难。最后，他决定提出一些有关成立联合政府（即使只成立3天也好，以便签订和约）的条件。这些共同拟定的条件是：1. 德国应当成为共和国；2. 共和国的所有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权只能交由全体劳动居民和士兵

所委托的人来行使；3. 将所有资产阶级代表从政府中排除出去；4. ‘独立派’参加政府是临时的，有效期为3天，并仅仅是为了成立一个能够签订和约的政府；5. 领导各部门的部长，仅仅是真正政府（只有它有权通过决议）的事务人员；6. 政府的两个领导人具有同等权利。”

卡尔·李卜克内西想对那些受了迷惑并向他施加压力的士兵和工人说明，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共同行动应该有怎样必要的前提，并使他们相信：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条件合作会成为对反革命势力的支持。艾伯特和谢德曼拒绝了“斯巴达克派”所提出的条件，因为他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承担了义务。还在革命发动以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制订了正确的革命策略：只有坚决一贯地从一次战斗的发动过渡到另一次发动；只有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革命的统一，才能撕掉叛徒的假面具和完成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

不同意与反动派的同盟者保持团结，而揭露他们和排除他们；不进行自我欺骗，而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尚需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就是李卜克内西所采取的立场。李卜克内西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提出了自己参加政府的条件，从而更加巩固了工人们的这种认识：应该建立的不是“普通的”政府，而是劳动者的国家，是苏维埃政府。

11月9日晚，在国会举行了苏维埃会议。会议的大多数参加者是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士兵。

有少数革命骨干和左派提议于第2天的10点钟在所有工厂和兵营中进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并委托这些苏维埃于同一天的17点钟在布沙马戏场举行会议，以成立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一提议被多数票所通过，这也说明了出席会议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情绪。

11月10日，“斯巴达克派”通过机关报《红旗》，对群众解释

了组织苏维埃的意义，并说明了下述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一纲领规定了保卫和推进革命所必要的各项措施：

“1.解除那些不拥护新制度的警察、军官和士兵的武装；武装人民；拥有武器的士兵和无产者不得交出武器。

2.所有军事、民政和机要部门交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所委托的人进行管理。

3.全部武器弹药和军火企业转交工兵代表苏维埃。

4.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一切交通工具进行监督。

5.废除军事法庭的管辖权；取消军队的盲从的纪律，代之以由工兵代表苏维埃监督的士兵的自觉的纪律。

6.解散国会和所有议会，以及帝国政府。

7.在全国举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完全交由工兵代表苏维埃行使。城乡所有成年的劳动居民不分性别，均可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

8.废除各皇朝和各德意志国家。我们的口号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

9.立即建立德国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国外各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的联系。

10.立即请俄国大使馆返回柏林。”

第二天早晨当报纸上公布了选举苏维埃的号召时，工人们和士兵们早已聚集在很多企业和部队中准备进行选举了。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用各种方法来影响选举和苏维埃的成分。从11月9日晚上起，社会民主党执行局为了在布沙马戏场举行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使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和“统一所有社会党！”的口号得到多数的支持而大卖力气。

“斯巴达克派”在组织上是很弱的，它的代表不能够在一个短时间内，像客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在很多会议上发言。他们

在一张传单中号召代表们不要把任何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者进行合作的人选人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去。这些传单是由“斯巴达克派”在布沙马戏场内散发。会议开得十分热烈。看来，事情几乎发展到互相交锋的地步。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艾伯特。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袖在自己的发言中，千方百计地歪曲“社会主义各派别实行统一”的口号，说是结束工人运动中“敌对兄弟之间的旧争论”的时候了，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支持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均等的政府。

李卜克内西同志指出说，“在艾伯特和谢德曼纲领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就是对革命的背叛”。他警告到会者说：“我不得不给你们泼一盆冷水，使你们不要过度兴奋：反革命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就在这里，在我们当中。成为革命危险的不是那些在昨天以前还执掌政权的人，而是那些今天混在革命中间，而前天还是革命的敌人的人。要万分慎重地选举参加你们政府的人。只有当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时候，只有当革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永远保障国民经济的公有化、幸福和和平的时候，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在李卜克内西发言的时候，特别是在辩论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守卫队”出来支持艾伯特。

一位会议的参加者，党的老战士保尔·布留明塔尔说道：“场内掀起了一阵狂暴的喧嚣。社会民主党人所招募来的士兵代表竟然向大会动武行凶。他们从座椅上跳起来，轰然冲向讲坛一同狂叫：‘统一，统一！均等，均等！’他们用武器威胁每一个主张做出另一种决议的人。那些被唆使攻击‘斯巴达克派’的士兵则用枪枝对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胸口进行威胁。”

改良主义者借助上述手段硬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中勾掉了一批革命的老战士，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

卢森堡、威廉·皮克及“斯巴达克派”的一些其他同志，并制造了一个“均等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代表的政府”由艾伯特、谢德曼、兰斯别尔格（代表社会民主党）、哈阿兹、狄特曼和巴尔塔（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所组成。“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参加了这个政府以后，就无条件地支持艾伯特和谢德曼的一切欺诈的手段，支持他们关于所有社会党实行统一的虚伪的口号以此来迷惑群众。

“斯巴达克派”的同志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的真正的左派都清楚地看到：革命开展时期所取得的一切民主成就，正处在危险之中。最初的一些真正革命的命令完全不是通过议会的道路，而是通过11月最初几周的强大群众发动才取得的。凯撒制度的崩溃和侵略战争的祸首，仇视人民的强盗们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如此明显，连1918年11月12日所实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人民代表苏维埃的第一批革命措施，都没有引起任何较大的抵抗。

11月的最初几周内所取得的成就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列举如下：

在德国各地，总共推翻了22个国王和公爵。

废除了普鲁士贵族院。

给了妇女以选举权。一切社会机构都实行自由选举。最后，废除了雇佣仆役的制度。

建立了对失业者的普遍的保障。

决定组织工厂委员会。

宣布了8小时工作制。

恢复了战前的劳动保护条件，保护在企业中劳动的妇女和少年。

宣布了出版、集会与结社的自由。

本来还可以实行其他一些更为激进的经济措施，像分配地主的地产，矿山和全部军事工业的国有化。工人苏维埃已经着手这

样做，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却挽救了地主和帝国主义者，使他们免遭剥夺，从而也挽救了他们的政权。同时，正是在11月初，艾伯特-哈阿兹政府才能较容易地实现一些最激进的措施来反对战争罪魁——地主和军火工业家，因为这个政府已得到了国际的承认，当时，协约国已准备和它进行和谈。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对于这种和谈并未派遣拥护和平的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出席，或是亲自前往参加，而是在11月11日派了天主教中心的代表艾尔茨别尔格和封建主外交家冯·布罗克多尔夫-朗曹伯爵前去。这些都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他们也许比别人早一年就知道了战争要失败。社会民主党政府既然派了他们去进行和谈，从而也就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活动中名誉扫地。这不能不给德国人民留下严重的后果，它甚至还影响到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从以后事件的发展中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宁愿和普鲁士的帝国主义者走一条道路，也不愿和革命的群众站在一起。他们对于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没有任何具体的考虑，他们对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表现得是那么毫无准备和毫无兴趣。

有着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则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是，缺乏经验和对战争的厌倦情绪，使他们落入了答应他们将“采矿业实行社会主义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圈套。正因为如此，虽然旧制度是彻底崩溃了，人民起义的声势又如此浩大，以致没有任何人能够加以阻挡，但实际上，在德国所改变了的只是国家的管理形式。总统代替了国王，但条件一如往昔，战争和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社会变革并未实现。

反革命很快地就懂得了这一点。他们马上就开始了自己的罪恶勾当。首先，他们需要消灭新的革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反革命分子懂得：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代替苏维埃是最容易达

到这一目的的。还在11月16日，艾伯特和谢德曼就答应了当时的国会主席，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议会来代替工兵代表苏维埃。

在11月9日以后，有很多直到当时仍是战斗的、革命的苏维埃，都发生了变化，在它们的成员中，除去“斯巴达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一些革命骨干以外，还包括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的分子。在这些苏维埃的活动中出现了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继续玩弄他们在布沙马戏场所举行的会议上已使用过的伎俩，对选举的进程施加压力并千方百计地歪曲选举的结果，以便能起更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另一方面，某些社会民主党工人随着事情的发展也认识到有必要在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是，在现实的危险情况下，他们则很少考虑要遵守党的纪律。这些社会民主党工人是如此深信在德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致在11月10日便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党员不顾自己党的领导的意图，而进入柏林的各国家机关，为了革命的利益来担任管理的工作和清除旧的官僚。艾伯特和他们相反，他决定和留用的旧“专家”一起，尽快地为自己建立一支卫队。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维尔斯建立了“共和士兵队”。资本家们则不惜用大量资财来把这些队伍变成反革命的工具，因为在开始时，这些队伍中包括了很多社会民主党甚至“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

在同一天，各部队都收到了普鲁士容克地主兴登堡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作为德军统帅说：

“军人应返回祖国，维护本身威力与秩序，虽布尔什维主义所燃起之内战危险正笼罩我国，凡我官兵均有道义之责任，摒弃彼等因对皇帝陛下所做军人誓言而正当经受之精神激动，并以往昔之奋发精神来履行自己对解放德国领土，排除万般危险之职责。

因此，我决定坚留职守，并根据皇帝陛下与我之训令，继续担任德军之最高统帅。

当建立士兵苏维埃之运动已深入军队之时，依我所见，将不予以阻挡，而应使此运动之领导转入军官之手。为此目的，凡步兵、炮兵及骑兵之连队中均应建立委托人员之委员会……

人将共知，最高统帅部愿与迄今仍为中庸社会民主党首脑之艾伯特总理在行动上协同一致，以便阻止恐怖主义之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之传播。”

艾伯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兴登堡的一位亲信——格列涅尔将军在“谋杀案”的供词中曾供认，11月10日在其和艾伯特之间签订的秘密协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苏维埃。

……“我们为了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而结成同盟。并没有想去恢复帝制。11月10日当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地建立一个经过整顿的政权和这一政权的支柱——军事实力和国民议会。开始时，我曾建议统帅不要和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因为据当时军队的情绪看来，这一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向他提议，要作战军的最高统帅部与占多数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保持联系，因为在目前没有任何另一个政党在人民中，特别是在群众中具有足够的影响，并能够与最高统帅部一起来复兴国家政权。各右翼政党已完全垮台，而与极左翼结成联盟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在总指挥部与帝国办公厅之间建立了秘密的电话联系，一般地，我们从夜里11点钟到1点钟通过直接通话来进行谈判。开始，谈话是关于剥夺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计划规定应调遣10个师到柏林去。艾伯特同意这样做，而为了进行更为详细的行动计划的谈判——还应该与国防部长达成协议——派了一名军官来到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军队不携带弹药入城，而艾伯特则同意供应军队弹药。我们制订了一个纲领要清洗柏林和解除“斯巴达克派”的武装。这一

点也是得到了艾伯特的同意的，为此，我对他表示特别感谢，感谢他对祖国的忘我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因此，我也就在一切地方尽可能地保护他”。

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这种背叛阶级的行动为无产阶级所公认的敌人中上层分子如此公开地和赤裸裸地加以证实，这在当时不能不是一桩稀有的事，而一个叛徒竟如此不折不扣地执行反革命军人的意志，也是很少见的。

新的革命领导的建立

“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同志于11月11日在柏林成立了包括13个人的中央组织，并从这时候起称为“斯巴达克同盟”。这一同盟还不是个政党组织。它的成员仍如过去一样，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工党。同盟乃是党内的一个闭塞的宣传组织，它有权独立进行活动。

在这一天，苏维埃政府从俄国向柏林发来了电报，号召德国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要放下武器：“否则，资本家在联合起来以后将击溃你们……请你们和我们通过广播联系……告诉我们德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最快地给你们运送粮食去。”

“斯巴达克派”的机关报《红旗》从11月9日起开始每日出报。但在艾伯特的支持下反动分子们用一切办法来阻挠《红旗》在《柏林地方通讯》的印刷厂中印刷。罗莎·卢森堡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中揭穿了对“斯巴达克派”所进行的污蔑的实质。她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指出他们要“伤害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反革命日益猖獗，很快就对《红旗》的编辑部进行了袭击，参加这一袭击的有200人。幸好，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当时都不在场。

《红旗》的出版和对它的保护，是准备建立德国共产党和成

立“斯巴达克同盟”的重要的一步。任务十分明确：“现在德国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足以担当目前伟大任务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

但是，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群众性的政党，是不能在几周之内建立起来的。

反动派的反扑和公开号召进行谋杀

此时，反革命重新转入了进攻。战斗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线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裂口，这就是1918年11月15日右翼工会领袖所签订的工会与企业主联合之间的“合作协定”。他们又一次花言巧语地宣称要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结社权，虽然工人们早在11月初就已经争得了这些权利。但在协定中关于各种更为广泛的经济措施，既使连大企业的国有化都只字未提。这个协定的唯一目的是阻碍革命和用“企业中的休战”来束缚工会。

老的反动分子也在蠢蠢欲动。12月5日在布沙马戏场举行了基干军士的大会，这些人宣称自愿保卫艾伯特的政府。他们前往国会大厦，企图宣布艾伯特为总统并向他做忠诚宣誓。艾伯特接受了宣誓，但在政治方面并未给以明确的回答。12月6日，工兵代表苏维埃揭露了一件反革命阴谋，按照汉堡大资本家们所拟订的计划，要建立反革命的专政和消灭汉堡的革命领导者。

在12月间，在柏林有人贴了一张巨大的红色的招贴画，教唆人们去杀害“斯巴达克派”！

“工人们，公民们！

祖国濒临死亡，赶快起来拯救！

威胁它的不是来自国外，而是在国内，是‘斯巴达克派’。

杀死他们的领袖！

杀死李卜克内西！

那时你们就会得到和平、工作和面包！”

对革命和它的卓越领袖所进行的卑鄙无耻的攻击，愈来愈采取各种齷齪的方式。从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到各种最反动的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叫嚣：“打倒‘斯巴达克派’！”在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城市中，反革命都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口号的掩护下行动了起来。

作为艾伯特政府反民族政策基础的就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政府指望依靠各战胜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格列涅尔宣称，每天都有军队从前线调回柏林。这些士兵被唆使去反对和屠杀“斯巴达克派”。被调回柏林的军队的使命，是要摧毁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12月6日，与企图宣布艾伯特为总统的同时，还打算借助保皇军队来逮捕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些军队包围了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军队的指挥官在闯入了会议厅以后，声明他们是奉艾伯特-哈阿兹政府的命令而来的。只有当人民代表哈阿兹和巴尔特证明说，政府并没有下逮捕执行委员会的任何命令时，这一骗局才被揭穿，而那些被反革命的军官引入歧途的士兵们，才开始退去。

但12月6日在柏林，当士兵的游行遭到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袭击的时候，工人们仍旧流了鲜血。“红色前线战士协会”召开了前线战士、休假士兵和逃兵（后者大多是失业者）的会议。根据会议决定，会议参加者们举行了游行，要求承认他们在士兵苏维埃中的代表的权利。在肖斯大街和因瓦利德大街的拐角处，游行的人群遭到了枪击，这是根据市卫戍司令部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维尔斯的指示，由一些反动军官下令的。很多游行的参加者都成了这一卑鄙袭击的牺牲者：14人被打死，有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红色士兵协会主席布迪赫同志。

第二天，在“斯巴达克同盟”的号召下，举行了抗议的示威

游行。劳动人民都上了街。12月6日的血腥屠杀擦亮了很多人和士兵的眼睛。12月7日在赫尼格斯多夫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各企业中，在职工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议罢工。罢工者们将一份决议递交给人民代表委员会，其中说道：

“在舒尔岑多夫森林中集会的赫尼格斯多夫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各企业的10,000名工人和职员一致停止工作，以抗议12月6日星期五和平游行者的流血事件。集会者坚决要求今后停止用任何武装力量和‘卫队’来反对游行者的。”

在许多其他企业里也举行了对12月6日血腥屠杀的抗议。

12月8日“斯巴达克同盟”号召人们在特列波托夫举行示威，并提出了以下的口号：

“全部政权归工兵苏维埃！

打倒血腥屠杀的祸首谢德曼政府！

立即解除军官和基干士官生的武装！

立即建立工人自卫队和赤卫队！

奥托·维尔斯——滚蛋！

国际万岁，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这是一次真正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斯巴达克同盟”的讲演人同时在十个讲台上发表了演说。然后，巨大的示威队伍走向了柏林市中心的警卫司令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奥托·维尔斯的住所。但奥托·维尔斯躲避了起来。而柏林警察长埃米尔·艾霍果仑（“左派社会独立民主党人”）的卫队则表示与示威者站在一起。

强大的罢工浪潮席卷整个德国

在11月底和12月初，在工人苏维埃和革命骨干的领导下，发生了很多起经济罢工和武装示威。工人们停止了生产齐集在饭厅

或车间里，工人苏维埃拟订了工人们对于工资问题的要求和政治要求。人们对过去状况的不满，表现在以下的声明中：“人民代表的行动不对，应该将革命推向前进……‘斯巴达克派’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工人的议会才是摆脱现状的出路！……”凡是群众已表现出了积极性的地方，也常常听到类似的说法和看到革命情绪的增长。在11月底，群众的积极性大为高涨，同时也开始了罢工斗争。在这一罢工运动中，工人表现得日益左倾。

例如，11月21日在马利昂非尔德的“达伊姆列尔”各企业里，开始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工人们首先争取废除了计件制。企业的职员也站在罢工者一边，支持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此后，运动很快地就包括了马利昂非尔德的摩托制造工厂和维尔涅尔工厂，柏林的伏洛尔和维腾纳乌的机械制造厂，也遍及了“西门子-舒克特”的一部分企业。一家资产阶级报刊就这次罢工写道：“工人们认为用不着等待社会主义化了，经常可以听到的意见是，要立刻把企业的管理权拿到自己手里。他们还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要使用暴力。”

在这个狂风暴雨时期，斗争所采取的巨大规模把罢工变成了政治发动。经济要求很快地便和政治要求联系起来。这些罢工几乎都是未经工会官僚分子的同意而组织起来的。参加了政府的“独立派分子”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都反对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借口这些罢工似乎在妨碍“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革命骨干和自己的同志——“斯巴达克派”一起组织了罢工；同时，政府中的“独立派分子”的领袖们则出面反对这些罢工。可是，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早已吞没了从鲁尔省到上西里西亚的整个德国。

这个所谓人民代表的假社会主义政府，为了给那些想借助罢工来推进革命的工人群众一点安慰，便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化

委员会”。当这个由学者和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刚着手“研究”矿山实行社会主义化的可能性时，政府立刻散发了“社会主义化在大步前进！”的大量传单。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又一次受了骗。工人们不知道，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领导人则不愿知道：社会主义的前提必须是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垄断资本和容克大地产。

此外，大多数的德国工人在几十年内深受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现在则将自己的希望寄托给国民议会，似乎它可以通过和平道路将人们引向社会主义。大多数工人因此也就确信革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化委员会”所进行的漫无边际的研究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康采恩、银行和大地产实行了社会主义化。可是苏维埃却以其压倒的多数，无条件地赞成社会主义化！

第一届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

1918年12月16日在柏林举行德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局势就是如此。

有25万名柏林工人在“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下与革命骨干们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他们要求代表大会：“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争取社会主义！……”可是，出席代表大会的半数以上的代表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则乘机来实现自己逐步消灭革命的计划。

代表大会决定将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转交给“人民代表的政府”和在1919年2月中旬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稍后，为了使群众措手不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1919年1月19日就举行了选举。

还决定在召开了国民会议以后，工兵代表苏维埃就要停止自己的活动。出席代表大会的“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很少，甚至

连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都没有参加它的工作。右派拒绝要他们参加大会，诡称他们不属于某一个企业的代表。代表大会的一个参加者关于这件事曾说道：

“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紧紧地控制了自己的支持者。在这一关键时刻，士兵代表们也根据他们的号令来行事，而资产阶级分子和军官们则与社会民主党人站在一起。”

在估价代表大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配置时，瓦·乌布利希指出，“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他们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争取社会主义！”等要求，但是这部分人只占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四分之一。

叶夫根尼·列维纳和弗里茨·盖克尔特是代表大会上“独立派”党团中“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弗里茨·盖克尔特在自己的讲话中彻底地发挥了左派的政策。他揭露了反革命及其在人民代表苏维埃中的改良主义帮凶的阴谋诡计，要求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自己为最高的立法和行政机关。他在一篇演说中着重指出国民议会在任何时刻都是一个反动的机构，绝不能期待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组织苏维埃意味着将建立新社会的直接责任交给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这一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学校。

第一届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反映了当时德国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软弱性，因为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政党的领导。

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警告，要反对把苏维埃与政治斗争的迫切任务相割裂，并把它看作为似乎是一种“偶像”，似乎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来说，在任何时间与地点都是需要的和足够的那种企图。列宁指出，不是苏维埃本身，不是这些机构的形式与名称具有决定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7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上，列宁曾强调指出，重要的是“看它代

表什么阶级”。^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同志在自己的《德国工人运动史纲》一书中，对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做了如下的论述：

“苏维埃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的决议，表明了在当时条件下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或者由苏维埃来消灭德帝国主义的，即德国康采恩、银行、大地产所有者的国家政权；或者以资产阶级议会形式将这一政权保留下来，而有利于旧的垄断资本的势力。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进行分裂活动，并在合作和联合政策的帮助下使德国工人阶级迷失方向。”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从斗争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再一次强调指出，只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才能对苏维埃的政策起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的政党在德国革命开始时是没有的。只是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左派才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团结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战斗政党。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是不能在几周之内完成的。

在哈勒，我们这些独立党的左翼利用我们的报纸《人民报》，吸引工人和士兵站到苏维埃方面来，不要跟着国民议会走。1918年12月16日我们写道：“如果它（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作者注）赞成国民议会……，那么它从而就对工人苏维埃宣判了死刑……苏维埃是革命的体现……因而它们的组织应该得到巩固，它们的权力应该加以扩大……我们期待代表大会将采取使生产资料迅速和无条件公有化的方针。工人阶级不能放弃自己的各项切身要求。”

但是，在组织方面，我们左派所做的远不能对代表大会的成员起更大的影响。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由于拥有训练良好的机构，由于从和平时起就受到了工人的较多的同情，所以对德国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1页。

大部地区的企业和士兵中代表的选举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拥有几百种党报，独立派拥有12种报纸，而“斯巴达克同盟”则仅有少量的报纸，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大多要用传单来进行。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缺少革命经验，他们对于资产阶级议会还存在着幻想以及国内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政党的情况未给以应有的估计。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小圈子，而没有注意是哪一些力量在决定着“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的方针。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反对斯巴达克派的斗争采取了更为残酷的形式。国内笼罩着内战的气氛，对谋杀和暴力行为的煽动不断加强。借助对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谋杀、恐怖手段和武装袭击，造成了对资本家和容克地主有利的“自由”和“民主”的选举条件。根据艾伯特-谢德曼和兰斯别尔格的命令，1918年12月24日列基将军的反动军队袭击了人民海军师的革命水兵并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虽然如此，他们的袭击仍被打退。由于反动军队遭到了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妇女的重重包围并陷于不能机动的处境，反动分子的大炮也就哑然无声了。柏林各区有很多工人前来支援水兵。这样，消灭水兵师的企图便告失败。

艾伯特-谢德曼和兰斯别尔格关于向人民海军师开炮的命令，最后成了“独立派”领袖哈阿兹、狄特曼和巴尔特退出政府的根据。他们的职位由鲁道尔夫·维塞尔和绰号叫做“嗜血狗”的古斯塔夫·诺斯克所代替了。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在这严重的时刻，德国共产党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斯巴达克同盟”根据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工人阶级革命群众斗争的经验了解到：最终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工党和成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战斗政党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党的创建者是：

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列奥·尤季赫斯、威廉·皮克、格尔曼·敦克尔、弗里茨·赫克特等人。

德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意义在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与机会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分裂，从而为德国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战斗政党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德国工人运动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对有关国家和革命的基本问题给以正确回答，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德国共产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优秀的革命传统和民族传统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

德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苏维埃工农政权及其光荣的共产党方面，并把它看作是**整个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榜样和领导力量**。保卫苏维埃国家，对于德国共产党来说，永远是首要的和最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列宁对于德国共产党建立的国际意义曾做了如下的评价：

当“……‘斯巴达克联盟’……改名为‘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①

但是，在1919年1月，反动派所组织起来的白卫匪徒，疯狂地展开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原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柏林警察局长艾赫戈仑被撤了职，以便于反革命来实现他们的罪恶计划。各企业里举行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回答这些挑衅活动，但是德国工人和士兵的这些行动已经只具有防御的性质。资产阶级在暴徒们的帮助下，在柏林的报刊区，把突如其来的武装战斗强加给了没有精神准备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的骨干对于革命政党在民主革命阶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7—408页。

段的策略是不明确的，他们同样地对于与农民联盟的问题和工会问题也认识不清。’因此，他们便不能争取同盟者和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来保卫工人阶级的革命成果，这一点是罗莎·卢森堡曾力求达到的。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被杀害

1919年1月15日，德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反革命队伍的凶杀。德国共产党，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失掉了自己的领袖。列宁当时写道：

“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显然，历史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尉官’的作用一定会达到野蛮、卑鄙和齷齪的‘顶点’。让考茨基之流的傻瓜们在自己的《自由报》上大谈其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来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东西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做社会主义者）！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纯粹民主’的赞美者考茨基辈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去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①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一月战斗中牺牲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安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2页。

葬，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开的示威。当稍后发现了罗莎·卢森堡的尸体时，革命的水兵和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怀着深刻的悲痛和无比的愤怒，将它一直护送到墓地！

反动派通过对一月起义的残酷的镇压，达到了自己的直接的目的。在1919年1月19日所举行的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在国内制造了白色恐怖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得到了多数票。

十一月革命遭受了失败。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反动政权的基础保留下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月革命以后，几乎在德国各地都展开了保卫革命成果的革命战斗，革命的先锋队力求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来梅和慕尼黑进行了反对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并一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国内各地的斗争，都是彼此隔绝和没有统一领导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怀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就将起义一个又一个地淹没在血泊之中了。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教训，台尔曼曾说道：

“承认党是无产阶级群众在组织革命中的唯一的领导者——这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和最革命分子从失败中所得出的教训。”

十一月革命的结果和性质

十一月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但是，半君主专制的政体被推翻了，22个君主被推下了宝座，成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争取了一些民主权利和自由：在企业里成立工厂委员会、包括妇女在内的普选权、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法律中第一次规定了工人阶级所渴望已久的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在农村中废除了半封建

的土地制度和反对农业工人的特别法令。对失业者规定了保障的措施。

十一月革命加速了东南欧各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促进了西欧革命运动的加强。

十一月革命给了年轻的苏维埃俄国以特别重大的支持，使它有可能消除布列斯特和约的掠夺的条件。

十一月革命阻止了德国帝国主义进一步参与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在德国本已成熟，但是，工人阶级甚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这原因有以下几点：1.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他们的多数人还处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之下；2. 缺少一个为“斯巴达克同盟”所不能代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3. 缺少一个工农联盟。结果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条件下解决了。

十一月革命的教训

尽管十一月革命遭到了失败，没有完成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但它仍然以重要的经验充实了工人阶级，用在德国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严重教训教育了它。

十一月革命非常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平和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不断斗争过程中，才有可能达到和得到保证。那些与反革命力量结成联盟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所执行的政策，必然会导致十一月革命的失败。正是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德国帝国主义才有可能复活实力，并

通过法西斯专政来试图重新分割世界，把德国人民和整个世界推入了空前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人民在30年内两次看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会给民族带来灾难，而整个民族的命运则取决于人民是否能完全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1945年，东德的工人阶级从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中吸取了教训。这些经验被载入了1945年6月11日通过的德国共产党的纲领之中。德国帝国主义强盗被战无不胜的苏军所摧毁，保证了全德国人民以真正民主的发展道路。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开始接近，这就成了希特勒制度被推翻后，工人阶级行动统一的前提。在东德成立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从而结束了导致十一月革命遭受失败的那种工人阶级的分裂状态。

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经验为依据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全德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阿登纳的联邦共和国中，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们至今仍在执行着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得到帝国主义占领当局的积极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东德我们则彻底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应完成的各项任务，并在1949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

在西德，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政党——德国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已有两年。共产党的活动家不断遭到迫害和监禁。帝国主义支持波恩的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官僚国家，这个国家在国内是镇压所有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的工具，在国际上它重新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虽然如此，现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要比1918年有利得多。国内外力量关系的对比都改变了：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群众对苏联人民充满了深厚的友好感情。

西德的工人和所有的爱国者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发展中看到，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该有着多么大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统一，十一月革命的战士们的遗言才得以实现。

我们的工农国家指出了在全德国实现十一月革命教训的道路。革命的牺牲不是白白付出的。1918—1919年的历史经验正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统一德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5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译自《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苏联1958年俄文版。刘赫文译）

柏林罢工工人的要求^①〔节录〕

（1918年1月29日）

1. 立即按俄国全权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述意见，根据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签定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2. 各国工人代表参加和平谈判……
4. 立即解除紧急戒严状态。恢复结社权及言论和出版自由。立即恢复保障妇女和少年权利的劳工法。
5. 立刻停止企业军事化。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1918年1月德国爆发了强大的反战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0多万工人。柏林罢工工人的下列各项要求清楚地表明十月革命的思想及列宁提出的和平纲领对参加罢工的工人起了巨大作用。

6. 释放一切政治犯。

7. 一切德国国家机构全部实现彻底民主化。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79页。黎扬译)

德国左派全国代表会议呼吁书^①

(1918年10月)

我们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进行了50个月，得到了我们料定它应得的结局：即双方对立，一方是大多数群众，他们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一直身在疆场风餐露宿，为保卫“祖国”负伤流血牺牲健康和生命，直到他们的家庭和经济生活基础这点儿祖国所赐，全都被战争毁灭为止。

另一方是一小撮，他们坐在家里养尊处优，借战争之机搞军事供应和粮食投机，把身处前线的无产者及其留在家乡的阶级兄弟统统榨取干净分文不剩。战争的这种结局不仅在世界各国扩大了革命的客观前提，而且使革命的时机迫在眉睫。

此外，德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这次战争是从编造世界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的谎言，胡说德国受到无理进攻开始的，而且这场战争在层出不穷的谎言掩盖下进行了4年之久，才终于真相大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18年秋，凯撒德国正处于革命前夜。当年10月初，在哥达举行了“斯巴达克派”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汉堡和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代表。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下述《呼吁书》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呼吁书表明团结在“斯巴达克派”周围的德国左派与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执行的分裂和叛卖路线针锋相对，彻底揭露了反动派为了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和防止革命玩弄的花招，并且提出了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革命口号。

白，使德国无产阶级看清一个事实，即德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遭到了无可挽回的失败。

但是，无产阶级遭受的极端痛苦和卑鄙无耻的欺骗却使在德国开展革命斗争的时机大大提前。

革命斗争已经在军队里开始了；大批士兵临阵脱逃，无数度假的士兵成群结伙长期超假或根本不返前线以及整营、整师的士兵投向敌方等等都证明士兵开始不服约束，作为反动派重要工具的军队正在瓦解。

但是革命刚一露头角，就发现反革命已经严阵以待。由于采用暴力无济于事，所以反动派就变换手法，赋予无产阶级某些有名无实的权利，妄图用这种办法阻止运动的发展。议会制和普鲁士的选举法都是用来劝诱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继续忍耐下去，而且一旦用强盗式的办法袭击他国不能得逞，还可通过这种议会制和选举法使无产阶级继续忍受，从而保障资产阶级掠夺本国人民的劳动果实并使威廉二世及德国其余各邦君主摇摇欲坠的宝座不致倒塌下去。

反革命分子要实现这一如意算盘，自有某些友好的社会党人士拔刀相助，因为这些人从1914年8月4日起，就开始干这种勾当，他们把自己在和平时骗取群众的信任交给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匪帮随意支配，使后者能更加放心大胆地愚弄并掠夺人民。这些社会党人早在1914年8月4日就曾发表声明，说他们不会让“祖国”——应理解为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祖国——在外敌面前孤立无援，现在这个祖国正遭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冲击，他们当然不会使它得不到自己的支援。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代理人谢德曼和鲍威尔之流派来参加政府，以便在巴登亲王马克斯^①的

^① 巴登亲王马克斯是最后一届德意志帝国政府首脑，本届政府的成员除资产阶级活动家之外，还有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和鲍威尔。——原编者注

统领下保住王公们的宝座和资本家们的金库。

除此之外，德国资本家和容克地主还企图与处在同样危险境地中的“敌国”阶级兄弟一起散布谎言再次欺骗无产阶级。威廉二世、普恩加来、劳合-乔治、威尔逊之类大大小小的凶神恶煞使本国人民遭了4年屠杀之后，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国联的最高公断人。玩弄这场把戏的用意一目了然，因为经过这场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和炮灰损失很大，在若干年内无力再战，他们所要防范的只有一点，即不让无产阶级发扬战斗精神，用本阶级的力量堵死未来战争的根源。为了麻痺无产阶级的意志并分散其精力，所以发明了“国联”。这个组织实际上只是把战争罪犯团聚在一起，而且只不过是100多年前就有过的那种“神圣同盟”，当时各国君主为了保障和平结成这一同盟，结果却使十九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血淋漓。

鉴于这种总的局势，所以德国，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就面临着下述任务：

一、前线士兵冒着战争时期从严惩处的重大风险开始革命斗争之后，后方群众就有义务不仅不从背后打击他们，而且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推向前进。之所以必须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即从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对去年海员罢工的态度及他们目前的表现来看（他们拥护议会制，拥护国联及普鲁士的选举法），他们已成了反动派的走狗（尽管不是自觉地），所以根本不必指望他们有所作为。

无产阶级应该不顾法律和司令将官的命令尽一切办法，达到下列各项要求：

1. 立即释放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受苦受难，如坐牢、服苦役、遭判决前羁押或正在服刑的所有人等；释放一切定了军事和政治罪的士兵，解除一切由于政治原因被征入伍或被羁押在军队中当兵的人的军役；取消由于政治原因给士兵规定的种种限制。

2.立即解除特别戒严。

3.立即废除补充兵役法。

此外无产阶级还应该要求：

1.宣告军债无效不予抵偿。

2.没收全部银行资本及各种矿山和矿场，大大缩短工作日并确定最低工资额。

3.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地产，把生产领导权交给农业工人和小农的代表。

4.彻底改革军役制，即：

(一) 给现役和非现役部门的士兵结社和集会权；

(二) 取消长官的纪律处分权，由士兵代表维持纪律；

(三) 撤消军事法庭；

(四) 根据大多数部下的决议解除长官的职务。

5.把产品分配事宜交给工人选出的代表管理。

6.废除德国各独立邦国和王朝。

无产者们，达到上述要求并不等于你们的目的已经达到；这只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证明统治阶级和他们的走狗用来愚弄你们的所谓民主到底是什么货色。争取真正民主权的斗争不是争取国会、选举权、责任内阁和其他骗局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的是要推翻人民的敌人得以确立其统治地位的现实基础，即土地私有权、资本和对军队及司法系统的控制权。

资本主义腐朽的统治体系已经烂透了。

无产者们！历尽空前未闻的压迫和被变节分子出卖之后，你们该觉醒了。关键时刻已到，愿你们大显身手证明自己当之无愧。效法你们的俄国兄弟吧！效法你们前线的兄弟吧！和平和面包，富人是不会给你们的，为了你们自己，为了你们的子女，为了你们全世界的兄弟，现在你们应该亲自夺取过来！

社会革命万岁！

各族人民的和平万岁！

打倒政府！

消灭资本主义！

“国际”派（“斯巴达克派”）

德国左翼激进派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79—283页。黎扬译）

“斯巴达克团”关于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呼吁书^①

（1918年11月10日）

柏林工人和士兵们！

把你们争得的政权巩固起来！

保持警惕是民主派的当务之急！

让红旗在柏林上空飘扬下去！

你们理当支持无产阶级和士兵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城市。如果说从前人们眼睛看着你们，心里在想，你们是否能完成自己的任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18年11月9日推翻君主制度以后，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斯巴达克团”为使十一月革命深入下去并广泛开展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18年11月10日“斯巴达克团”机关报《红旗报》发表了德国各派革命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纲领。但是由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左翼当时还很软弱并且犯了错误，所以该纲领在1918—1919年内未能实现。不仅如此，而且群众领导权也落到了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及思想支柱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领袖手中。

务，那么现在人们却眼巴巴地期待着你们如何完成任务。霍亨索伦王朝退位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参加政府的几个社会党人在政府处于领导职位，这一事实尤其没有价值。

在4年之内，他们一直支持资产阶级；除接着支持下去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作为。不要相信那些高高在上，身居总理和部长要职自命能支配你们的命运的人。不是从上到下重新安排职位，而是从下到上重新组织政权。要注意的是，不要疏忽大意使你们现在已经获得的政权再从你们手里失去，而是要利用它来达到你们的目的。而你们的目的则是要迅速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世界，用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并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须作到的就是穿工作服和军大衣的柏林无产阶级要宣布自己有充分的决心和必胜的意志，不达下述要求誓不罢休：

- 1.解除一切警察以及一切不支持新制度的军官和士兵的武装；武装人民；凡是有武器的士兵和无产者都不要放下武器。

- 2.把一切军事和民政大权以及指挥要职交给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委托的代表掌管。

- 3.把储备的全部武器和弹药以及军事企业交给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管理。

- 4.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监督运输业。

- 5.取消军事诉讼程序；以士兵的自觉纪律代替士兵的盲目服从，并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进行监督。

- 6.取消国会和所有议院以及现存的全德政府。

- 7.在全德国范围内选举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一切立法权和行政权应全部集中于苏维埃。

- 8.取消德国境内一切王朝和邦国；我们的口号是：统一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

- 9.立即同国内一切现有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以及其他各国的

社会主义兄弟党建立联系。

10. 立即向俄国大使馆发请帖邀请返回柏林。

工人和士兵们！

千年的奴役行将结束；新的自由正从无法形容的战争苦难中脱胎而出。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谢德曼之流，驱赶你们走上屠场为时长达4年之久。他们对你们说，应当保卫“祖国”，其实指的只是保卫贪暴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现在德帝国主义快要垮台，他们又妄图替资产阶级挽救尚能挽救的一切，妄图摧残群众的革命毅力。

决不能再让谢德曼之流呆在政府里；只要政府里还留有谢德曼之类的人物，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不应参加政府。

决不能和那些4年来一直出卖你们的人同流合污。

打倒资本主义及其走狗！

革命万岁！

国际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84—285页。黎扬译）

附录 魏玛宪法^① [节录]

（1919年8月11日）

第20条 国会由德国人民代表组成。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魏玛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德国的新宪法，该宪法于1919年8月11日开始生效。宪法宣布德意志为共和国，并对各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作了明文规定。同时魏玛宪法也给统治集团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第48条），准备阶级斗争一旦激化就抛弃议会政体，代之以赤裸裸的独裁统治。法西斯上台以后，国会于1933年3月24日颁布了授予希特勒政府非常全权的法律。这就意味着魏玛宪法已被废除，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国会已被取缔。

第21条 所有代表都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良知，不受委托书的约束。

第22条 代表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根据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之。选举应该在星期日或公休日进行。

细节由共和国选举法另行规定。

第23条 国会任期4年，新的选举应在4年期满前60天进行……

第25条 共和国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但理由相同，不得超过1次。

新国会应在解散后60天内选出。

第41条 共和国总统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产生。凡年满35岁之德国人都可以当选。

第43条 共和国总统任期7年。并可改选……

第47条 共和国总统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第48条 如果某一地区不肯履行根据宪法或国家法律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共和国总统可以使用武装力量迫使履行。

如果德国境内社会安全和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或这种破坏有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则共和国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恢复社会治安。必要时可使用武装力量。为此，他可以对宪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及153……诸条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全部暂停保障，或部分暂停保障。

第54条 总理和共和国部长需要取得国会信任，才能履行其职责。若国会作出某种决定使彼等当中任何一人失去信任，此人即当提出辞呈。

第109条 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男女在原则上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并负有同样义务。按出身或阶层决定的社会和法律特权和限制都必须取消。表示贵族身

份的称号只能算作姓氏的组成部分而且今后起名时不能再用……

第114条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允许公安机关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被剥夺自由的人最晚不过次日即应得知，拘禁令是哪个当局下达的，根据什么；并能立即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声辩。

第115条 每个德国人的住宅都是他的自由避难所。住宅不得侵犯。只有根据法律才允许例外。

第117条 通信以及邮政、电报和电话交往等的秘密不受侵犯。只有根据国家法律才能例外。

第118条 每个德国人都拥有权遵照一般法规口头、书面、出版、绘画或以其他方式自由地表达意见。任何工作或职务等有关方面都不得限制他行使这项权利，任何人都无权由于他行使这种权利而使他遭受损失。不得设立书报检查机关……

第123条 所有德国人都拥有权参加非武装的和平集会，且无须事先声明或征得特别许可。

国家法律可以规定露天集会必须事先声明，如果这类集会直接危及社会治安，也可予以禁止。

第124条 所有德国人都拥有权组织不以触犯刑律为目的的社团。不得用强制手段对这种权利进行限制。上述规定对宗教社团也同样适用……

第125条 保证选举之自由与秘密……

第153条 宪法对财产安全予以保障……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95—297页。黎扬译)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① [节录]

(1921年1月8日)

德国统一共产党认为，在这对全德无产阶级如此重要和艰巨的关键时刻，向各社会党和职工会组织发出呼吁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资本主义日趋腐朽，已经开始的世界危机使本来就不断深化的严重危机更为加剧，币值连续不断地下跌，而德国各种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则仍有不断上涨之势，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广大群众日益贫困——凡此种种都要求无产者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起来自卫；另外，这里所说的无产者阶级指的不仅是工业无产者，而且还包括刚开始觉醒并意识到自己无产者本质的所有阶层。

无产阶级的处境如此难以忍受，是由于反动派仍然存在，他们企图藉助于替司法系统搞暗杀活动的艾色里西集团^②给无产阶级戴上新的枷锁，并利用无产阶级没有联合起来的现状，从中取利。

德国统一共产党向所有社会党和工会组织提出建议，希望团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十一月革命以后，共产党为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来反击反动派的进攻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8日致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的《公开信》就是为实现这一任务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封《公开信》作为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历程中的一面典型的政治里程碑，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

② 由大资产阶级资助并用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巴伐利亚反动恐怖集团（1920—1921年），其组织者是格奥尔克·艾色里西。——原编者注

结起来并立即开始行动。细节问题以后再行讨论。

I

(1) 为保障工人、职员和官吏的生活，开始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统一斗争。把为提高工资分别进行斗争的铁路工人、官吏、矿工以及其他工农业工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2) 根据要求提高的工资水平和等级相应地提高各种养老金及战争受害者的抚恤金。

(3) 根据工作满额的工人工资规定全国统一的失业津贴。津贴应由国家发放，其所需款项完全由资本家负担。

失业者应通过专门设立的失业者苏维埃同工会一起进行监督。

II

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

1. 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监督下，通过消费合作社降价出售食品给全体工人和津贴数量微薄（养老金、寡妇及孤儿抚恤金等等）的人。

此举由国家拨款进行。

2. 立即没收现有一切归国家管辖的住房，不仅有权强制迁入，而且有权强迫人口少的家庭从大面积住所尤其是整栋住宅中迁出。

III

保障供应食品和日用品的措施

1. 所有现存原料、煤炭、肥料一律由工厂委员会监管。

让所有停工的企业生产日用品，并根据本公开信的第Ⅱ项建议第1条所述的原则进行分配。

2. 由农庄苏维埃和贫农苏维埃协同农业工人组织监督播种、收割和所有农产品的出售。

IV

1. 立刻解散资产阶级的一切自卫组织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在全国各州和村社建立无产阶级的自卫组织。

2. 对一切犯罪行为，不管起因于政治动机或普遍的贫困现状，一律实行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

3. 取消现行的罢工禁令。

4. 立即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

在提出上述各点作为开展行动的基础时，不论对自己本身还是对工人群众，我们一刻也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不可能消除他们的贫困。同时，统一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工人群众当中传播斗争和专政的思想，认为这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只要时机有利就提出号召并率领工人群众为夺取专政进行斗争，虽然如此，本党仍愿意和以无产阶级为支柱的其他各党一道为实现上述措施共同行动……

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297—299页。黎扬译)

柏林各工厂委员会关于推翻 古诺政府的呼吁书^① [节录]

(1923年8月)

致德国各劳动阶级!

大企业主和大地主、交易所的豺狼和执政者们使德国劳动居民陷入空前未有的贫困，根本无法生存。如果不立即改变这种状况，劳动人民就会陷入绝境。柏林工厂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受自己的选民，柏林全体工人、职员和官吏的委托通过了下列决议：

大柏林的各企业订于星期六开始总罢工。并暂定罢工持续进行到下星期四午夜12点。

工人阶级向国会提出下列断然要求：

1. 古诺立即辞职。
2. 没收粮食以保障食品供应。
3. 立即承认同物价昂贵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监督委员会。
4. 立即取消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
5. 立即规定所有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基数，每小时按战前的60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国家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古诺政府推行了敌视人民的反动政策。1923年8月1日，柏林各工厂委员会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抵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召开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立即罢工3天的决议并提出了罢工的各项要求。这一号召掀起的罢工斗争席卷了全国，古诺政府彻底垮台。

分尼计算。

6. 给所有失业者安排工作，并保证领取战争抚恤金者全部就业。

7. 撤消禁止游行和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

8. 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同时，柏林工人阶级号召所有工人组织立即采取共同行动争取建立工人政府。柏林各工厂委员会向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表示，确信全德工人阶级定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柏林无产阶级上述行动。下星期二上午9时，柏林工厂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以便根据情况制定新的措施。

工人、职员、官吏、小农和城乡劳动者们！所有遭受资产阶级和政府造成的贫困之害的人们，大家都来参加伟大的人民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指出了摆脱大难临头的危险处境的唯一出路。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01—302页。黎扬译）

汉堡起义的教训^① [节录]

恩·台尔曼

汉堡起义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

1. 一支人数不多的无产者小分队，怀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奋战人数超过自己20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资产阶级部队，顶住了他们的猛烈进攻，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① 恩·台尔曼所著《汉堡起义的教训》一文于1925年10月23日为纪念起义两周年由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公诸于世。——原编者注

2. 汉堡七月战士的不朽光荣在于，他们在革命形势到来之际，虽无必胜把握，仍然拿起了武器。列宁主义教导说，只要时机成熟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就应当拿起武器。但是决不可能事先就有把握一定能取得胜利。只要敢于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虽然遭到失败，对未来的阶级搏斗而言，它的成效和价值要比一枪不发的退却胜强百倍。

3. 起义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孤立无援，因为无论是萨克森，或是德国其他地区都没有立即支持这一起义、工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起义都能进行极其英勇的斗争，同时也要靠强大的群众运动来支援，如果他们得不到全国无产阶级的支援，就必然要被击溃。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就是要把全国各工业中心和各大城市的全体工人阶级组织并联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需要有一个无比坚强无限团结和统一的、绝对遵守纪律的党。

4. 说汉堡起义是盲动，这是不对的。事实是它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甚至警察头子亨兹也不得不恶狠狠地承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属于极右派的汉堡社会民主党工人以及最大多数居民群众都站在共产党人一边。我们唯一的弱点在于不善于把这些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不善于在他们分散出动的过程中及时地把他们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并同他们一起组成反对社会民主党首领的统一战线。

5. 如果汉堡战斗以更大的规模重演（这是必然的），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就应该像楔子一样打入群众，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和我们打成一片；并同千百万工人组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应该在工会和一切非党工人阶级组织内，成立一个人数众多的革命派，他们将和共产党人一起进行未来的战斗。

6. 汉堡十月战斗的一个突出的缺点是，没有开展争取建立苏维埃的强大运动。目前在我们党内对这一事实还没有足够的认

识。苏维埃是在革命形势下团结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无产阶级战斗骨干的机构。目前正处于两次革命的间隙阶段，我们更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7.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非一举即能成功。它不仅要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资产阶级的军队，而且得经过共产党和全体无产阶级多年的顽强工作才能准备就绪。在未来的战斗中打败资产阶级的人们要经过多次发动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过程中教育、培养和组织起来。这就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

8.有人以为1923年十月起义的失败，似乎意味着独一无二的特殊革命形势已经“错过”不会再来，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1923年的失败和1919年诺斯克当政时“斯巴达克同盟”的失败一样，都是暂时的。资产阶级德国的稳定维持不了多久，虽然有“道威斯计划”和“保证公约”这种稳定也会消失，勿宁说正是由于这二者它才无法保持。德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局面现在正患着初期“气喘病”。汉堡起义最大的成效就是，工人们在3昼夜的战斗期间看到了似乎是不可战胜的阶级敌人的全部弱点。在汉堡起义的日子里工人们看出资产阶级已濒临绝境。当时的情况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前进的目的并不是要陷进泥潭，而是要去迎接新的战斗！德国的第二次革命绝对不可避免，我们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去迎接这次革命。汉堡起义之所以不属于“历史的过去”，而是未来战斗的演习，原因就在这里！

9.起义是一次作战行动组织得非常出色、毫无漏洞的革命战役的典范。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党组织工作的严重错误。虽然各厂工人都同情汉堡战士，但在组织上却同他们没有联系。这就说明从前我们社会民主党按街道组织支部的老一套办法极端落后，根本无用。为选举而设的机构，对于街垒战哪能中用！所以汉堡战斗前线上最大的缺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工厂支部。将来，在同样革命形势下，像汉堡这样的战斗队伍有各厂坚强支部作后盾并团

结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就会无往不胜。

10. 汉堡起义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教训就是出色地体现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是在口头，而是在行动上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和带头人。他们给运动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和简单明了的纲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汉堡战斗比以往历次发动的水平都高出很多。例如，1921年水兵发动就比不上汉堡起义。只是由于党牢牢地掌握了斗争的领导权，汉堡革命者才能在西欧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即起义是一种艺术及这种艺术的主要规矩就是英勇无畏和百折不挠的进攻。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303—305页。黎扬译）

二，匈牙利1919年革命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关于在匈牙利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①

（1919年3月22日）

无线电。大家注意，并请周知！

我们向全世界工人宣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已经合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19年3月21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匈牙利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权，经过4

并成为社会党，并以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名义宣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没有流一滴血便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权暂由人民委员会行使，直到匈牙利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为止。匈牙利全国无产阶级已在自己的专政和和平社会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将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那些确信战胜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社会主义别无它途，只有依靠全体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奋斗才有可能的一切无产者一起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两股力量的冲突促成的：第一股力量是工农无产者及士兵运动，另一股力量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压力，这些协约国力图断绝匈牙利的粮食使其无法生存，而且还想大量掠夺它的领土。

为了策应协约国关于立即彻底把匈牙利交给罗马尼亚寡头政治的最后通牒……（无线电报脱漏）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征服者们企图用武力消灭匈牙利的工人革命。我们号召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士兵们：

不要唯命是从，要奋起反抗并调转枪口对准自己本身的压迫者，

不要当屠杀自己的兄弟——匈牙利工人和士兵——的刽子手。

我们向捷克和罗马尼亚的工农致意：

你们的奴役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塞满自己的腰包，驱使你们跟自己的兄弟打仗；你们要挣脱他们加在你们身上的枷锁。

个多月的奋战，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派的夹击，在全国宣告成立，这是匈牙利人民历史上充满英雄气概的光辉的一页。下面发表的是一系列重要文献：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关于在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工矿交通企业国有化及地产国有化的法令、关于建立红军的法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告世界无产者书等等。

我们向全世界无产者、向我们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人兄弟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全力以赴奋起反抗他们本国的资本家，不让他们用饥饿来扼杀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希望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的庇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捍卫我们的革命成果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同任何侵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行为进行斗争，而决不动摇。此外，我们也声明，我们随时准备并愿意尽快签订能够保证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并使它能同世界各国、首先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的和约。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世界革命万岁！

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共产国际万岁！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
委员会代表、外交人民委员

库恩·贝拉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150—152页。黎扬译）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工矿 交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节录〕

（1919年3月26日）

1. 苏维埃共和国认为把生产资料转归劳动人民所有及整顿和扩大生产是自己的任务。

为此，苏维埃共和国将一切规模大于手工业企业的工矿运输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同时交由全体无产阶级管理，并由各该企业的工人进行监督。

为此，凡1919年3月22日以前工人人数超过20名的工矿运输企业一律转归国家管理，并由工人进行监督。

2. 收归国有的企业由苏维埃共和国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任命的生产委员领导。生产人民委员会可以授权一个生产委员领导几个企业。生产委员代表他负责领导的那个企业的全体无产阶级。

3. 在上述企业，工人可通过选举产生工人监督委员会。工人人数不超过100人，工人监督委员会由3人组成；超过100人，由5人组成；如果超过500人，则由7人组成，不能再多。

革命行政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2—453页。黎扬译)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 关于地产国有化的法令

(1919年4月3日)

1. 匈牙利的土地归劳动人民所有。不从事耕作者，不得占有土地。

2. 一切中型和大型庄园及其全部财产、牲畜、农具和企业，无偿地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

3. 小农场及少量地产连同房屋及附属建筑物，即便在今后，仍归个人所有。至于哪个地产属于哪一等级——小型的或中型的——由农业人民委员会考虑当地条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而定。

4. 凡收归国有的地产、农具、都不得在个人或群体之间私分。

5.收归国有的地产交给耕种这块土地的农业劳动者成立合作社共同经营。凡年满16岁并完成一定的劳动日数的任何男人或妇女，都可以成为该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全体社员根据所付出的劳动参加分配。

6.关于合作社，以后将颁布专门的法令。

7.大型和小型农场的生产活动，由农业人民委员会指导，由地方苏维埃实行监督。

8.本法令从颁布之日起生效。

革命行政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3—454页。黎扬译)

匈牙利革命行政委员会关于 建立红军的法令 [节录]

(1919年)

1.革命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按照以下原则建立以苏维埃匈牙利革命纪律为基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

军队定名为“红军”。红军首先由从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及目前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员组成。加入红军需经部队代表机关、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等组织推荐……

3.红军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革命行政委员会。军队的直接领导和组织，由军事人民委员会掌管。

4.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红军，只有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纪律，方能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革命法庭是监督革命纪律的上级审判机关，一般违反纪律的行为和细微过失，则由军事部门或

部队选举出来的陪审员审理。

5.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红军战士的责任是，捍卫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防范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犯，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

9.任何部队或支队都要根据匈牙利社会党的推荐，由军事人民委员会委派政治委员……

11.在红军内部，为了补充其兵员，组织工人后备队。在这些后备队中，指挥员完全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训练由专业军官领导，但他们没有指挥权亦不得佩带武器。训练在业余时间进行。武器由工厂苏维埃保管。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4—455页。黎扬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告全世界无产者书

（1919年）

最近出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叛卖事件。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强盗和社会党变节分子骇人听闻的叛变所造成的双重压力下崩溃了。支持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第二国际领袖们破坏了国际抗议罢工。克列孟梭和威尔逊为首的帝国主义凶徒们赤膊上阵厚颜无耻地提出了最后通牒，叫嚷什么：“推翻苏维埃政府，我们就让你们安宁。”

在这幕丑剧中，原社会民主党的卑鄙嘴脸更加暴露无遗。它曾发誓忠于无产阶级专政，并同匈牙利共产党签定过协议。不仅如此，它还同这个党合并在一起。在庄严的会议上、在苏维埃代

表大会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它宣称，将为共产主义和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它在同共产党人合并之后，也加入了第三、即共产国际。

在这个党的额头上，现在打上了该隐^①的印记。它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光荣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和国际。它同凡尔赛的凶手和本国的反革命分子签订了秘密协定，仗恃帝国主义者们的金钱和刽子手的屠刀推翻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正在恢复私有制。参加国联的每个大国都派了一个团的兵力来支持他们。白德利这个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和匈牙利的诺斯克被捧上台，成了政府的首脑……

共产国际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覆灭和它的光荣领袖蒂波尔·萨穆埃利的牺牲表示哀悼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周围，更加有利地冲击资本的堡垒……

共产国际号召匈牙利无产阶级沉着、勇敢、百折不挠地坚持到底。同志们，干吧！立即组织地下共产党！匈牙利的血的教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上了一课，使他们懂得：同社会党妥协分子绝不能搞任何联合，绝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一定要把那层居于领导地位的卖身投敌的渣滓扫除干净，让后起之秀来领导运动。工人阶级定会把他们推举出来。因为胜利必定属于工人阶级，而不是它的敌人。

苏维埃匈牙利虽遭不幸，却永垂史册。苏维埃匈牙利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58—459页。黎扬译）

^① 据圣经记载，该隐乃亚当长子，因嫉妒而杀死其弟亚伯。——译者注

三，欧美和亚洲各国的革命运动

苏俄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 芬兰共和国独立的决议^①

(1917年12月31日)

为了答复芬兰政府关于承认芬兰共和国独立的请求，人民委员会彻底遵循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决定：

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

1. 承认芬兰共和国的国家独立。
2. 根据同芬兰政府的协议，双方代表组成特别委员会，制定使芬兰脱离俄国的具体措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72—473页。黎扬译)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独立，是以实际行动对待俄国各民族自决直至分立问题的一贯政策。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就已声明执行这一政策，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兑现，这就用事实使俄国境内过去受压迫的各族人民相信，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们的确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宣言^①

(1918年1月29日)

芬兰工人们、公民们！

如果你们同意在这历史关头让我们和目前正在成立的中央工人委员会一道担负起全国革命政府的职责，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坚决履行这一职责。目前无产阶级的贫困已达极点，工人同志只得拿起武器来摆脱这种困境，而且他们满怀热望，情愿以死相拼求得社会解放。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从事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我们每个人的神圣职责就是，无论让我们走上什么岗位，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尽一切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

但，同志们，假如你们想让别人来担当革命政府的职务，你们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共同组织开会提出，而且只要你们提出人来，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把政权移交给他们。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在脱离苏维埃俄国之后，芬兰反动派对工人阶级转入坚决进攻。芬兰工人阶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就要求自己的领袖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坚决行动。1918年1月22日，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会议上，终于成立了最高革命机关——“芬兰工人执行委员会”。1月28日，赫尔幸福斯（即赫尔辛基——译者注）的无产阶级左翼社会民主党来领导便开始了革命。赤卫队占领了首都，1月29日，建立了工人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由14人组成），成员有Ю·西罗拉、O·B·库西宁、A·П·泰米以及其他等人。

下述文件（《人民代表委员会宣言》）是芬兰工农革命政府（即上述工人革命政府——译者注）于1918年芬兰工人革命一开始就发表的头一份告全国劳动人民书。

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①，因此你们知道，我们的行动纲领如何。它当然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相信，不管前面的斗争多么艰巨，芬兰无产阶级在当前这场革命搏斗中一定能战胜自己的敌人。到那时候，不仅当代人，而且连后代都一定会大有收获。不仅能消除当前岌岌可危的险恶局面，而且还能争取到提高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

根据我们的看法，在芬兰，现在应当极力以果断的、经过周密考虑的措施改变整个国家制度。应当彻底消灭官僚政权，使它今后再也不能统治人民。应当彻底铲除法庭的恣意专横，使它今后再也不能为所欲为。整个国家机构应当根据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

应当取消贫苦人负担的重税，把它们加到靠剥削发财致富的人身上。在颁布正式的保险法之前，就应实际开始对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者实行保险。应当把一切反动的东西从国民教育的领导工作中铲除干净。应当立即把佃农和孤苦农民从其雇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应当更彻底地对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银行资本应当服从社会监督，并应以这种方法尽快地控制工商业资本。

非富有者的财产应不予触动，但在某些部门，根据人民的普遍需要已显然应该把大事剥削的分子所经营的企业收归公有，属于这类部门的上述非富有者的产权亦可取消。

由此可见，应当毫不停顿地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日日前进。

在革命时期，这只能通过革命政权机关颁布革命命令来实现，这些命令能否兑现主要靠革命人民自己及其组织的努力。

芬兰资产阶级政府曾厚颜无耻地走上了反动的夺权道路。现在芬兰无产阶级也应当运用其革命权力为社会进步服务。

^① 党从1918年8月起才定名为共产党。——原编者注

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野心得逞，曾要求采取“果断措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采取果断措施吧，但这只是为了保护贫民，帮助被压迫者！

这就是我们的观点。结果如何，只能靠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同你们一样，干革命不是为了儿戏，而是由于深信：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芬兰劳动人民，而且要不惜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来完成这一事业。

但是，我们也要直言不讳，革命的工人同志们，我们能取得多大成果，现在主要关键在于你们自己。任何代表委员会本身都不可能改变现状。只有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作到这一点。

现在需要的是力量和万众一心！伟大的牺牲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芬兰工人阶级能否取得胜利，目前的关键就在于此。

赫尔辛福斯，1918年1月29日。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73—475页。黎扬译）

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①

一、普雷肖夫宣言

(1919年6月16日)

全世界无产者！势不可挡的爱好和平的革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今天在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斯洛伐克大地上，诞生了独立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摆脱了捷克帝国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天经地义的措施是，实现压迫者如此信誓旦旦、而实际上却背信弃义地任意践踏的自决权。斯洛伐克的工人、士兵和农村贫民在夺取政权之后踏上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正在跋涉的革命征途——苏维埃道路，伟大的苏维埃思想，在全世界占领的阵地正在日益扩大。

重新建立起来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把自己的已经取得胜利的兄弟——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当作天然盟友，并把自己置于国际无产阶级和日益壮大的统一的工人共产国际的保护之下。

共和国首先向迄今仍在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捷克工人兄弟致敬。

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以无产阶级民主作为其建国的基本原则，它把无情的专政矛头对准那些威胁这一名符其实的真正民主、威胁各族人民不可侵犯的自决权的人们。因此共和国要打碎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19年6月16日，在普雷肖夫市宣告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是斯洛伐克劳动人民革命斗争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兄弟般的援助的结果。下面发表的是一些与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有关的文件。

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国家机器，铲除剥削的一切可能，并准备在全世界建立劳动人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斯洛伐克无产阶级继承自己先辈的事业、英勇无畏地、毫不妥协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以便成为名符其实的、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后辈。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执行 委员会主席致布拉格捷克斯洛 伐克政府的电报〔节录〕

今天，1918年11月13日，斯洛伐克无产阶级宣告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我们依靠工人夺取了政权，并已授权人民委员负责管理国家。我们严正声明，从今天起，斯洛伐克完全属于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并由具有充分权利的国务委员，斯洛伐克社会党人对苏维埃共和国施行领导……

我们的真诚愿望是：同我们的骨肉兄弟捷克无产阶级保持最密切的、牢不可破的国家关系。我们向我们的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捷克的同志们保证，我们对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恶感，而且总是尽力向捷克无产阶级表明我们对他们怀有同志般的手足之情，我们愿意同他们结成统一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为普遍和平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共同努力。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15—416页。黎扬译）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 (马克思主义左派)执行委员 会关于总罢工的号召书^①

(1920年12月10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工人们!

昨天，政府以武力强占了布拉格的“人民之家”，并以扰乱秩序为借口查封了《红色权利报》的印刷所。政府名义上说是处理情节不重的违法事件，实则利用这一借口进行挑衅，并且采取了前所未闻的暴力行动。查封印刷所竟动用了好几百名警察和宪兵。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流血事件，一些工人被宪兵用刺刀扎伤或被警棍打伤。昨天目击这一事件的工人无不愤慨万分，热血沸腾齐声高呼：

我们要以总罢工来回敬!

昨天，克拉德诺区的矿工们，刚一得到出事的消息，立即宣布实行总罢工。由于事先曾不止一次地警告过政府当局，叫他们不要干预工人运动的内部事务，不得帮助威信扫地和厚颜无耻的右派领袖；所以执行委员会认为，当局这样作纯属恣意妄为蛮横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0年12月9日，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照资产阶级政府所出的主意，在警察的支持下，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左派）执行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印刷所及编辑部所在地——布拉格“人民之家”。党的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阶级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参加12月总罢工的工人达100万以上。罢工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地区都成立了苏维埃。

透顶，认为这是矛头指向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暴行。“人民之家”乃工人所建，绝大多数工人都拥护自己的党，现在竟胆敢把“工人之家”从这个党手中夺走，使全国最大的政党连出版日报都不可能，那么试问，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权利、还有什么法制、还有什么民主？

相比之下，难道工人不是更有理由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地主的田产吗？

由杜萨和斯维拉扶植上台并由他们操纵的车尔内政府陷入困难重重的境地：国家经济处于危机状态，国家官员要靠忍饥挨饿才能保持收支平衡；政府无力反对资本家和大地主，也无法对付投机倒把活动，供应岌岌可危，眼看就要中断——而在这个时候，得到资本主义政党和假社会主义政党鼓励的这个政府，竟想用其对真正的工人政党的粗暴专横行为来炫耀自己。它想迫使该党箝口，因为该党的批评使它反感透顶。其实，表示不满的何止工人，——特种军团的士兵一再提出要求，但枉费口舌，残废军人的正当要求也遭到拒绝，而且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所以怨声载道，不仅工厂，而且兵营靶场到处都传来不满之声。如果政府想用阻止《红色权利报》出版的办法来把不满压制下去，那只不过是枉费心机！

这是政府在杜萨和斯维拉、右派叛徒和妥协分子教唆下所干的闻所未闻的野蛮行径和令人气愤的血腥暴行。流血的罪责要由政府 and 右派分子来负！

右派叛徒欠下的这笔帐，工人们定要清算。从政府方面讲，这是一种挑衅，工人们必将予以回击。工人们，我们要照你们的要求去办。请你们用强有力的抗议来回答政府的这一暴行：**向全共和国宣布举行抗议性的总罢工！**

工人们，血不能白流，暴行不可容忍，你们的荣誉不能受到沾污，因此你们必须起来抗争，抗议政府大胆妄为对我们党采取

暴力行动。你们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让任何人再也不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迫害和施加暴行！

社会民主党（左派）执行委员会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16—417页。黎扬译）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告各国无产者书〔节录〕

（1920年）

波兰政府这支凶恶的野兽，昨天刚被打翻在地，今天又准备作新的反扑。昨天还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是要维护独立并得到所谓波兰社会党阵营中资产阶级同盟者的热烈捧场，今天就把这套漂亮言词置诸脑后。在明斯克，波兰政府的使者们正在阴谋破坏和平谈判，而毕苏斯基集团却又制造在波兰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国的谰言，这就说明波兰帝国主义卑鄙虚伪到了极点。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波兰共产党人认为必须坚决表态，并向欧洲无产阶级宣布：

波兰工人与波兰军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犯毫不相干；

他们最坚决地谴责这一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为了捍卫独立，而是为了保卫世界资本的统治；

他们认为，红军不是威胁他们自由的侵略者，而是他们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中的同盟军。

苏维埃俄国首先发表声明承认波兰的独立，不止一次地向波兰提出和平建议，而在它取得最大军事成功的时刻宣布波兰国境不受侵犯，因而苏维埃俄国不是波兰独立的敌人，恰恰相反，是

它唯一的真正的支持者……

一年半以来，波兰政府连续不断地宣布紧急状态，依靠这种办法统治国家。所谓社会党人参加政府，不仅丝毫没有使局势得到改善，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实行最残酷地军事独裁。共产党的刊物和组织横遭禁止，工会由于领导罢工运动而被解散，连工人合作社也不复存在。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塞进监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遭到刽子手们的严刑拷打。除了肉体上的摧残之外，还加之以精神上的摧残，即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横加迫害，往往演成流血冲突并燃起沙文主义的烈焰。

……波兰工人试图挣脱身上的镣铐，但是不仅在华沙，而且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却都在锻造这种镣铐。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们！

别让波兰政府得到国外的军事援助，让波兰资本主义政府单独同俄国和波兰无产阶级，同前线的红军和后方的革命运动较量较量，看它有多大本领！

西方的无产者们！跟我们一起同血腥的波兰军国主义斗争，
支持苏维埃俄国吧！

苏维埃俄国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万岁！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10—413页。黎扬译）

1918年挪威革命运动的高涨^①

(一)

卑尔根市工人群众大会关于成立 卑尔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

(1918年2月10日)

2月2日，星期日，为了讨论当前局势，在图伦哈尔举行集会的大约1,500名男女工人，热烈赞成成立卑尔根及其郊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意见。

因此群众大会的参加者决定成立工人委员会，委托它进行成立本市及其郊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筹备工作。

①、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挪威的工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广大城乡劳动群众对战争年代变得十分尖锐的粮食危机和物价上涨强烈不满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在挪威，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挪威工人阶级对俄国二月革命及接踵而来的十月革命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奋。挪威工人阶级派往革命俄国的使者——H·艾盖德-尼辛和阿尔维德·汉辛回到挪威之后，国内建立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这些苏维埃的目的是同物价高涨进行斗争，争取调整工人的粮食供应和以立法程序规定8小时工作制等等。

通过下列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挪威两个最大的苏维埃，即首都奥斯陆苏维埃和挪威第二大经济和行政中心卑尔根苏维埃的活动情况。

群众大会参加者批准下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临时规定：

1. 工人代表苏维埃由企业和现有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

2. 每个企业至少可选派一名代表参加苏维埃。拥有50名工人或50名以上（至100名）工人的企业有权推选1名代表。工人人数超过100名的企业，每100人可以推选1名代表。选举结果立即通知工人委员会。

3. 为了维持苏维埃的费用，征收一次性会费，每名男工50欧耳，每名女工25欧耳。加入苏维埃的组织交纳其成员会费的一半。会费由选出的代表收集并在总成立大会上交给选出的出纳员。

4. 委托工人代表会制定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章程草案和纲领，并召开至少有100名代表参加的成立大会。

（二）

奥斯陆工人代表苏维埃宣言〔节录〕

《告挪威工人书》

近几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总形势的紧张程度已达极点，使我们当前面临着我国空前的严重时期。在我国，粮食危机极其严重；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已经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主要食品配给不足，已使许多家庭濒临绝境——如果到了春季还要进一步减缩口粮，情况将会怎样，那就不难想象。

这次粮食危机主要是政府当局推行不负责任的轻率政策造成的结果。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和生活缺乏保证的阶级。政府推行的配给制是有阶级性的，它针对的是贫苦大众，触及不到统治阶级。这些统治阶级由于广有钱财，可以购买、贮存和消

费配给范围以外的大量食品，但贫苦阶级却由于缺钱，而没有这种可能。劳动人民当然对此大抱不平，他们一致要求：没收一切食品并按全体人民买得起的价格出售……

为了保证工人阶级不再陷入目前这种处境，应当提出工农业和运输业公有化的要求；对各企业的收益权应当作出规定，原则是根据战争期间物价提高的程度相应地增加各该企业所有从业工人的工资并应为采用新科技成果进行充分投资，等等。

公社应当获得没收权和征收赋税权，以便使它们能够同住房困难进行斗争，并承担销售食品的职责。失业者应当得到就业的保证。进出口贸易应当为人民利益服务。为此，应当允许工人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对是否执行上述要求进行监督。我们并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我们认为条件业已成熟，必须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如果政府当局不自动向人民意志让步，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通过议会，而只能发动全体劳动人民采取群众性革命行动来实现这些主要是由起领导作用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提出来的要求。

每个有政治头脑的工人都会明白，若不同时具备必要的力量作为后盾，那么提出这些直接涉及正在社会上进行较量的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重大要求，就决不会有任何结果。

争取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行动机构，它是一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机构。

这样的行动机构不仅拥有必要的力量，而且得到群众的信任，这就使我们的要求有可能实现。

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已经建立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且召开全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次会议不仅有可能详尽地表达全国工人群众所提出的要求，而且还要决定应该采取什么积极措施来彻底实现这些要求。

奥斯陆工人代表苏维埃已召开由22,000名有组织的男女工人派出代表参加的群众大会，因此它邀请全国各工人代表苏维埃选派代表参加于3月24号星期日，以及其后几天召开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按以下规定进行选举：

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每500名成员推选1名代表。

由于时间紧迫，恐怕各地未必都能举行初选，如果来不及初选的话，那我们就希望由苏维埃理事会自己办理派遣会议代表事宜，并希望各参加苏维埃的组织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

地方工人代表苏维埃参加会议的费用由各苏维埃自负。

致以社会主义敬礼！

奥斯陆工人代表苏维埃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475—478页。黎扬译）

1920年9月意大利的占领工厂运动^①

一、都灵“菲亚特-琴特罗”厂内 委员会书记的讲话

工人们！你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是“新秩序派”和苏维埃俄国的拥护者。我们不能仅限于高喊“俄国万岁”！而是要效法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榜样、按他们的教导去作——夺取政权并把它牢牢掌握。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应当是与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去夺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1920年9月，为了防止企业主搞同盟歇业，五金厂的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其他各厂工人纷纷响应，

取政权。我们不仅要占领工厂，而且要占领所有机关；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订立较好的合同而斗争。我们要为做好准备，而不是为雇主进行工作，应当尽可能多造武器，以便在最近期间走出工厂进行决战！

二、G·吉沃利迪回忆录^②〔节录〕

占领工厂的作法给政府出了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仅种类甚多（从采取警察手段直到实行普遍性的社会政策），而且要马上作出抉择……在意大利全国各地，特别是皮蒙特、伦巴第、利古里亚等各工业区，参与占厂的工人为数不下60万之多。占厂的起因是各企业主未能认清局势的危险，扬言要同盟歇业，采取了要挟手段；而工人则认为他们自己可以管理工厂，用不着资本家和经理人员。另一方面，一些领头的共产党人却希望这次运动能象俄国那样造成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不过工人当中较为温和的社会党人却反对他们这种作法。

事态迅速扩大，遍及意大利全境，成了一种革命运动。工人们把所占领的工厂变成革命堡垒，在那里制造武器、成立武装赤卫队并组织工厂委员会负责管理生产。先进工人认为，他们通过占领工厂开始效法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假如当时由共产党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那就好了，可惜那时意大利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党。而社会党和全意劳动联盟的领袖们则连忙同政府达成折衷性协议，并号召工人退出工厂。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在这关键时刻停顿下来，应由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领袖和中派领袖承担罪责。

^②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G·吉沃利迪在占领工厂时期是意大利内阁总理。下面引述他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说明统治集团在占领工厂时期慌乱到何种地步。

有人指责我没有动用警察来维护法律并保护私人财产，换句话说，也就是我没有事先防止工人占领工厂，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把他们从厂里驱逐出去。但退一步讲，即使我能在工人侵占工厂之前，就派警察据守（鉴于运动规模之大，这一点很难作到），结果我的处境也会非常被动，因为所有警宪及王室近卫部队全部用来守卫工厂，我就没有充分力量来维持街头和公共场所的秩序，结果这些地方很可能有工人聚众闹事。这实际上只能对革命派有利，因此他们巴不得我能采取上述措施。另一方面，假如我动用警察把工人逐出工厂，结果也会造成冲突和流血事件，而且工人也很可能在撤离工厂时毁掉自己的堡垒（指工厂——译者注）。

起初，我所采取的对策使人感到惊慌失措，而且有人对我施加压力，让我采取有效措施结束这种显得非常令人不安的局面。可是危险过去之后，我却甚为满意，因为原先让我动武的那些人，现在都说我选择了能够恢复秩序的唯一可行之路，结果不仅使工人的幻想破灭，而且动摇了他们对那些鼓动他们占领工厂之人的信心……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381—383页。黎扬译）

保加利亚共产党致保加利亚 工人和农民的公开信^①

（1923年10月）

亲爱的同志们：

在这场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没有取得成果而暂时告一段落的大

规模革命战斗之后，我们被迫同许多其他战士一起离开你们大家，以便继续为本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服务。虽然我们只不过暂时远离你们，但我们在这场斗争中肩负的任务却使我们不能不给你们写这封公开信。

而且我们首先要向你们说的就是：“**更高地抬起头来！为自己的政权提心吊胆的白卫军这批败类的血腥报复决不能摧毁保加利亚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失败将教会我们怎样取胜！在保加利亚建立工农政府势在必行！**”

正是到处高喊“秩序和法制”的资本家和富农的党，于6月9日搞了武装政变，从而挑起了内战，而九月事件只不过是这场内战中的一段重要的插曲而已。内战不会有别的结局，只能是劳动人民最后战胜血腥的暴君、剥削者和掠夺者。

保加利亚的劳动农民和工人有两个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庞大的政治组织：保加利亚农民同盟和保加利亚共产党。

白卫军政府利用自己6月9日相当轻易取得的胜利，来给农民同盟以沉重打击。这个同盟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秀人物遭到逮捕，其中大多数遭到卑鄙齷齪和惨无人道的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被宣布为叛乱者，受到毒打，关进监牢，假手法庭进行阶级报复。农民同盟——这个保加利亚人数最多的党——被宣布解散，它的报纸被封闭，财产被查封，它的一切政治活动都被禁止。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这是1923年9月反法西斯起义失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致保加利亚劳动人民的一封公开信。这次起义是劳动人民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发动进攻的首次抗击。信中不仅号召进一步斗争，而且还叙述了发生起义的情况。这封信对于团结工人阶级及其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具有巨大意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9日人民民主革命胜利。

将军和银行家当权的政府，认为来自农民同盟的危险已经消除，于是便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劳动人民的又一群众组织——保加利亚共产党。紧接6月9日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因参加反政变斗争而被这个政府逮捕，遭到甚至比农联成员更惨的厄运。这个政府依靠自己的军官同伙和秘密匪帮，接连不断地袭击共产党员。众所周知，一天晚上，图尔诺沃的全体共产党员统统被当局抓走，送往兵营，并在那里惨遭乔装打扮的军官们的毒打。众所周知，法西斯匪徒在贝尔科维察大搞袭击，他们在当局的庇护下，对这个市和县的共产党员进行了整整一周的恐怖活动。众所周知，在其他一些城市和乡村，也进行了无数次类似的袭击。不愿顺从新的暴力政权的所有劳动人民全都生活在接连不断的折磨、威胁和暴力恐怖之中。没有一座村镇能保安全，没有一个工人和农民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

同时，贪得无厌和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猖狂起来大肆活动，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自己的掠夺目的；地主起来反攻倒算，为的是夺回他们被没收的土地；大房产主吼叫起来，为的是恢复他们盘剥穷房客的自由；大投机商和出口商假手银行资金掠夺工人和贫苦农民；对工人的剥削也越来越加残酷，——总而言之，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富农成了人民和国家的全权主人。凡此种种，都使劳动人民对新政权更加仇恨。政府的对外政策使人民群众尤其不安，因为这个政府是由穷兵黩武的老牌民族主义政党和分子组成的，他们曾使人民遭受过两次战争浩劫。同苏维埃俄国和邻国的不断冲突，使人民担心保加利亚随时都有可能再被卷入灾难更加深重的战争漩涡。

在这种情况下，聚集在政权周围的资产阶级各党派本当举行选举，使自己的地位得以“合法”。但它们毫无指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坚决履行自己的职责，英勇地捍卫保加利亚全体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它

对政府的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它（共产党）宣布成立城乡劳动人民统一战线、向农民伸出兄弟之手、帮助他们恢复受到摧残的农民同盟地方分会，从而事实上宣告城市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联盟业已形成。的确，城乡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困苦状况实际上已经使农民同盟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结成了联盟。所以将军-银行家-教授当权的政府决定向共产党挑衅，并象镇压农民同盟那样对它进行镇压。为此目的，政府捏造谎言嫁祸于共产党，说它打算在9月16日搞政变，而政府好象是为了阻止政变，才于9月12日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我们这些身居保加利亚共产党负责和领导地位的人，在这历史关头郑重声明：共产党从未决定在9月16日或17日或以后任何其他日期，举行无论是总的还是局部的反对政府的武装发动。恰恰相反，共产党正尽心竭力地进行工作准备参加预选，因为众所周知，在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农民同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大多数劳动人民本身就能击败篡权政府并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政府翻遍了党的全部档案，找不出任何这类决议，而且除了捏造永远也找不到，因为这类决议并不存在。但政府要对共产党进行挟嫌报复，于是就捏造了这个口实，而不考虑这种挑衅会给全国人民造成可怕的后果。

谋害共产党，在城市和乡村成千上万地逮捕其活动分子，封闭工人俱乐部、工会和合作社，抢劫他们的档案，查封共产党和工人的全部报刊，禁止任何共产主义宣传及共产党员和工人在农村的任何活动，——这一切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众所周知，政府不允许任何合法斗争。不仅共产党员，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大难临头之感。许多遭到追捕和迫害的共产党员及其大批同情者，从村镇逃入森林。白卫军政府横蛮地宣布他们是暴徒并派出军队去追剿他们。

共产党决定在各城市举行24小时群众性抗议罢工并在全國举

行抗议集会进行回击，而政府竟动员全部力量来镇压这次义举。当局在索非亚及其他各地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多起流血事件，保加利亚全国各地都是一片恐怖气氛，豺狼当道使公众越来越加愤怒，流血冲突有增无已最后终至酿成人民起义，矛头直指肆虐成性并向全体劳动人民宣战的当局。

政府扼杀了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许多地方的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起义旗，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党面临着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是撇下群众，让他们单独起义并被各个击破，要么是站在他们一边并竭力把运动加以集中、统一并给予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共产党虽然深知斗争的种种困难和组织上的缺点，但作为劳动人民的党，只能支持人民的事业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和农民同盟一起发出9月23日全国一致行动的号令。

这个号令是什么呢？全体人民尽皆知晓，这就是推翻窃取了政权的叛乱分子们靠暴力组成的现政府，并用工农政府来取代它。进行这一斗争的目的，并非象现政府故意捏造的那样，要建立专政和在保加利亚确立苏维埃政权，而是为了反对残暴的军事独裁并建立由绝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民——它的劳动阶层——当中产生的大众民主政府。在斗争过程中，起义人民已经夺得了政权的那些地方，成立的只是些工农政府的一般性革命委员会，没有一处象政府捏造的那样成立过苏维埃政权。

由于号令是共产党发出的，所以这一号令受到跟党一起走的群众和追随农民同盟的农民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拥护。全体劳动人民万众一心，以空前的热情奋起争取自己的政治自由，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并建立自己的政权。

九月革命斗争是名副其实的全民运动并具有正是这样的运动才具有的特征。力求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采取过火行动，也没有抢劫和搞私人报复。对银行和每个人的财产都严加保护；在个别地方，对少数革命敌人加以逮捕只是作为一

种使其不能为害的防范措施，但任何地方也没有粗暴地对待他们，更没有打他们，他们全都平安无事。说什么成立了特别法庭并判处了死刑——这都是造谣诬蔑。俘虏得到保护，双方的伤员都得到精心护理。甚至对政府派来镇压起义人民的弗兰格尔匪徒，被俘后也宽宏大量，保证生命安全。

经过将近两周的英勇斗争之后，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政府拥有大批机枪和大炮，能够动员由后备军官和军士组成的众多匪帮以及成千上万的弗兰格尔反革命分子，而起义人民却十分缺乏武器。

吓得要死的资产阶级在主宰了局势之后，对于胆敢动摇其统治基础的劳动人民尽情发洩其恶毒仇恨。

其残暴匪帮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起义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甚至对伤员和和平居民、妇女和儿童也毫不留情。他们蓄意侵犯起义地区的村镇，掠夺那里的劳动人民的财产。

但我们不想去谈目前正在洋洋得意的白卫军的血腥报复：你们正在它的铁蹄下呻吟，比我们体会得更深。这种残酷、野蛮、疯狂的报复，要比所有其他国家的白卫军更加残忍。但正因为如此，它在压迫者和剥削者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就会造成一条更加深阔的血腥鸿沟。

在他们之间将永远、永远不会再有和平！

除非推翻君主、银行家、将军们勾结起来共同掌握的血腥政权并建立工农政府决不能甘休，也唯有如此才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安宁。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同你们曾经一起为伟大的人民事业进行过斗争。现在我们被打散了。但斗争并未终止，而且最后胜利之期要比敌人料想得更近。由极少数凶恶残暴分子组成的白卫军政权，不管它说得多么漂亮，不管它用什么“民主”改革掩饰自己，保加利亚劳动

人民永远不会跟它妥协。我们将从自己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而且我们明天将比昨天更加强大，而我们的敌人则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全体劳动人民——对我们的事业，人民的神圣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定能勇于承受失败的痛苦和磨难并更加坚忍不拔及精神百倍地重新献身人民事业，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我们将重整旗鼓，再次集结我们离散的、人员受到损失的队伍。我们将很快着手医治我们所受的创伤。

我们将共同努力，不惜牺牲地帮助遗孀和孤儿、贫困的家庭和被驱往他乡的同志。

我们要牢牢记住，只有依靠劳动人民的有组织的斗争，我们才能胜利，而且对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最好的报复就是推翻白卫军政府并使工农政权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将不分散自己的力量去搞那些个别的恐怖活动。

我们尤其要保持和加强**全体城乡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个联盟是九月战斗中无数战士为共同的人民事业壮烈牺牲洒下的热血凝结而成！

决不要气馁、失望和畏缩！

光荣的战士们，更高地抬起头来！

工农政府万岁！

劳动人民的保加利亚万岁！

瓦西尔·科拉罗夫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30—436页。黎扬译）

列宁、斯大林和蒙古代表团的谈话^①

(1920年夏天以前)

我们都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在1920年夏天以前关于蒙古的著名谈话。这时，我们从远东战线来到莫斯科，同时蒙古革命者代表团^②也到了这里。代表团请求安排他们与列宁和斯大林会晤，因为他们很想知道苏维埃政府对远东各国民族独立问题所持的态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蒙古人。蒙古人问，他如何看待他们从中国军阀手中解放蒙古的斗争？——中国军阀处在当时占领苏维埃远东的所谓日本远征军团占领势力的影响之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对蒙古战争形势的详细分析作了回答。他指出，蒙古在两个交战世界之间起缓冲作用。他提出，对于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劳动者来说，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为国家独立和经济独立而斗争。伊里奇对蒙古人说，这种斗争不能分散地进行，需要一个集中力量的统一组织，一个政治的和国家的组织。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一位蒙古代表是如何想象这种斗争时，他回答说，他们把它想象为无情地消灭汉民（中国人）。列宁极详尽地阐明了革命暴力问题和暴力的阶级性问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你们应当消灭的不是一般的汉民，你们不应当与一般的汉民——中国人作斗争，而应当与背叛自己

① 原题为《蒙古解放之曙光》，此处只节译了列宁、斯大林的谈话全部，该文的其他部分从略。——译者注

② 代表团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译者注

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中国的军事和内政的政客、商人和高利贷者作斗争。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应当是你们的同盟者。甚至在蒙古作为占领军的士兵，他们也是中国劳动群众的代表，因此，打击的方向朝着他们，实际上意味着背叛人民的指挥他们的上级不受惩罚。你们应当直接向这些穿着士兵大衣的身不由己的群众呼吁，他们将会懂得这是真正的友谊和兄弟之情的流露，如果把这件事做好，你们将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在与共同敌人——中日帝国主义作斗争中的同盟者。

出席这次会晤的约·维·斯大林同志当场继续列宁的思想接着说，不应当说什么把中国居民杀尽烧光，因为这是绝望政策的表现。他建议代替这一政策的应是：把有组织的蒙古劳动群众的力量转向另一方面，即去反对那些驱使伟大的中国和蒙古人民走向毁灭的人们，让他们在不断的军阀的流血内战中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反对那些在中国策划这些军阀内战以奴役中国和蒙古人民的日本资本家。

（译自波里斯·舒米雅茨基著：《蒙古解放之曙光》，1936年7月12日苏联《真理报》。
张心绪译）

列宁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团的谈话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节录〕

（1921年11月5日）

在谈话中，列宁对我国代表团详尽地阐明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思想，并且认为保证向非资

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主要条件是加强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工作，以便由于这一工作以及党和政权的影响的加强，使合作社得到发展，树立新的经营管理和民族文化风气，使阿拉特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发展本国的经济和文化奋斗。阿拉特蒙古的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能由在党和政府的影响下在全国各地分别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新的经济机体构成……

蒙古代表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应否使蒙古人民革命党变成共产党？弗·伊·列宁的回答是：

“我劝你们不要这样作，因为一个党不可能‘变成’另一个党。”

列宁同志在阐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的实质之后说：

“革命者在自己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还将需要作许多工作，在这以后才能从牧民分子中形成无产阶级群众，其后，无产阶级群众才有助于把人民革命党‘变成’共产党。简单地换个牌子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699—670页。黎扬译）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①

（1924年6月13日）

1. 将博克多汗的印鉴移交给政府保存。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鉴于人民政府和博克多格根（蒙语，意为活佛——译者注）之间的誓约（因后者去世）已经失效，根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人民政府的决定，宣告成立共和国。

2.在国内建立没有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共和国政体，把全部最高权利交给大人民呼拉尔及由其选举的政府。

3.每年阴历正月初六举行庆祝活动，纪念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和蒙古独立。

4.从同日起将“共戴”年号改为“蒙古国纪年”，今年为第14年，往后接着推算。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02页。黎扬译)

蒙古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①

(1924年11月26日)

第一章 社会制度

第一条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劳动人民(阿拉特-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它保证国家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今后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条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人民代表)呼拉尔，它是在人民推翻封建制度夺得政权并消灭了封建主(汗、王、公、台吉^②、呼图克图^③、呼毕勒罕^④)加在广大

^① 原编者在此件前加有说明，原文如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通过了“蒙古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该宣言后来(1940年6月30日)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1章。

这里所发表的“宣言”系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文本。

^② 贵族。——译者注

^③ 清朝对喇嘛教高级僧侣的封号，这里指高级僧侣。——译者注

^④ 转世佛。——译者注

阿拉特群众头上的特权和专横、政治和经济压迫及剥削之后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第三条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以劳动人民代表呼拉尔为代表的城乡劳动人民。

第四条 为了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并在今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加以改造，即由国家协助劳动阿拉特大力发展和改善他们的个体经济，由国家帮助劳动阿拉特建立自愿的集体联合社，发展马拉割草机站网，发展全国畜牧业、工业、交通、邮电，等等。

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目的在于，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巩固国家独立、加强国防力量。

第五条 一切土地及其蕴藏、森林、水域及其资源、工厂、矿井、矿山、金矿及铁路、公路、河道、航空等运输、通讯工具、银行、割草机站、国营牧场均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私人不得占有。

第六条 公民对牲畜、农具及其他生产工具、原料、制品、住宅及院内建筑物、毡包及家什、劳动收入及存款的私有权、以及私人财产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

第七条 合作组织和阿拉特联合社内的公共企业及全部设备和工具、它们所生产的产品、以及自愿公有化财产：牲畜、农具和公共建筑物是这些合作组织和阿拉特联合社的公共财产。

第八条 土地为国家所有，即全民财产，交给公民以及劳动人民自愿结成的联合组织作为牧场或耕地无偿使用。

第九条 自觉自愿的诚实劳动是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力量和进一步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福利的基础，也是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义务。

(译自《现代史文献选编》第1卷，莫斯科
1960年俄文版，第703—704页。黎扬译)

朝鲜三一运动宣言书

(1919年3月1日)

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由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阐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正权。

仗我半万年历史之权威以宣言焉，合我二千万民众之诚忠以布明焉。为我民族恒久如一之发展而主张焉。基于人类良心之发露而为顺应，并进乎世界改造之大机运而提起焉。是天之明命也，时代之大势也，全人类共存同生之权之正当发动也。天下何物能阻止此，抑制此耶？

乃牺牲于旧时代遗物侵略主义强权主义之下，备尝有史以来累千年未有之异族箝制之痛苦者，已十年矣。凡剥夺我生存权者几何？障碍我心灵上发展者几何？毁损我民族的尊荣者几何？我以新锐独创而得世界文化大潮流之寄与补禅之机者，被其遗失几何？

噫！欲宣畅我旧来之抑郁，摆脱我时下之苦痛，蔓除我将来之胁威，兴奋伸张我民族的良心，国家的廉义之压缩消残者，遂我各个人人格之正当发达，不以苦耻的财产遗与我可怜之子弟，导迎我子子孙孙永久完全之庆福者，惟确实我民族的独立为最大急务。二千万各个人怀方寸之刃，以人类通性及时代良心之正义军与人道之干戈为其护援，今日吾人进而取之何强不挫？退而作之何志不展？

丙子修好条规以来，时时种种食金石之盟约，日本之无信固

可罪也。学者于讲坛，政治家于实际，视我祖宗世业以殖民地，遇我文化民族以土味人，徒快征服者之贪欲而已。无视我久远之社会基础，卓越之民族心理，日本之无义固可责也。而吾人方急于策励自己，奚暇怨尤他人？急于绸缪现在，奚暇怨办宿昔？今日吾人之任，但有自己之建设，而决不在于破坏他人也。以良心上严肃之命令，开拓自家之新运命。而决非以旧怨与一时感情，嫉逐他、排斥他也。彼羈縻于旧思想旧势力之日本，为政家为功名的牺牲，而有不自然、不合理之错误者，使之改善匡正，归还于自然与合理之正经大原也。当初两国并合非出于民族的要求者，故毕竟并合之结果，以姑息的威压与差别的不平，而统计数字上虚饰之下，利害相反之两民族间永远不和，怨沟益深，乃今日之实绩也，诚能以勇明果敢，廓正旧误，基于真正理解之同情，打开友好之新局面，詎非彼此间远祸召福之捷径乎？且对二千万含愤蓄怨之民，专以威力拘束者，非止障碍东洋永久之和平而已，因此而为东洋安危主轴之四万万中华人对于日本而危惧猜疑去益浓厚，其结果必致东洋全局共倒同亡之悲运也。明矣今日吾人之谋独立，使朝鲜人获逐正当之尊荣也，并使日本人救出于邪路全其支持东亚者之责也，使中华人脱免于梦寐不安之恐怖也，且世界平和人类幸福以东洋平和为重要一部，则朝鲜独立为必要之阶段，岂区区感情上问题已哉？呜呼新天地展开于眼前矣！威力时代已去，而道义时代斯届矣！过去全世纪之所练磨长养之人道的精神，方投射新文明之曙光于人类历史上矣！新春已来于大界，催万物之回苏，闭蛰呼吸于冻冷寒雪者，彼一时也，振舒气脉于和风暖阳者，此一时也，吾人际天地之复运，乘世界之变潮，固无所踌躇忌憚也。护全我固有之自由权，饱享我生旺之乐，发挥我自足之独创力，结纽我民族的精华可也。

吾等今兹奋起矣！良心与我同存；真理与我并进。无论男女老幼皆活发奋起于阴郁之古巢，与万汇群象得遂欣快之复活，千

百世祖灵佑我于冥冥，全世界气运为我外护，着手即成功也。第
向前头之光明，而暮进也哉！

（选自《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1分册，北
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编印，第134—136页）

朝鲜三章公约^①

（1919年3月1日）

一、吾人今日此举为正义人道生存尊荣之民族的要求，须要
发挥自由之精神，决毋逸走于排他之感情。

一、以最后一人最后一刻为限，快快发表我民族之正当意
思。

一、一切行动务要尊重秩序，使吾人主张之态度一出于光明
正大，贯彻始终。

朝鲜民族代表：孙秉熙、崔麟、崔南善等十八人

（选自《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1分册，北
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编印，第137页）

迎接“三一革命”告朝鲜人民书^②〔节录〕

（1946年3月1日）

金日成

亲爱的同胞们：

① 在朝鲜人民群众反日斗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者由于惧怕群众的“一切行动”冲破资产阶级的秩序和损害他们的阶级利
益，便公布了这个公约，企图把人民群众的反日斗争引向对日本帝国主义
妥协的道路上去。——原编者注

今天，我们3,000万朝鲜同胞在获得了解放和自由的国土上，自由地庆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三一革命运动”27周年纪念日。

同胞们！3月1日这是我们民族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高呼朝鲜独立万岁，进行全民反抗斗争的一天。这是痛杀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一天。同时也是我们民族为了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光荣流血牺牲的一天。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天。我们要以这一天的斗争精神作为榜样，誓为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同胞们！今天我们庆祝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一革命”纪念日。然而我们在已经获得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朝鲜应该用什么精神来纪念这一天呢？

第一、我们不能忘记27年以前的今天全民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勇敢精神。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朝鲜国内各阶层，甚至流浪在海外的同胞，都在大团结的精神下行动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实现朝鲜独立！”的口号，形成群众性的斗争。他们流血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刺刀之下毫不畏惧。这种民族团结的精神，我们决不能忘记。而且，我们应该以“三一革命”的精神为榜样，依靠我们的民族大团结，战胜一切困难，投到新朝鲜的建设运动中。

第二、“三一运动”以我们民族的群众斗争行动，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朝鲜2,300万人民在活着，不愿做亡国奴；表明我们民族具有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精神。然而，“三一运动”最后是失败了，它未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且充分吸取当时的教训。

② 这是金日成首相在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举行的“三一革命运动”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词。——原编者注

“三一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客观上，在帝国主义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一起，并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同意和唆使下，加强了统治和压迫我们的力量。其次，虽然我们民族极为勇敢地起来斗争，然而没有得到足够战胜强大敌人的国际援助。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对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但还不能直接支援我们。于是，我们必须进行孤立的斗争，这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主观上，“三一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仅运动的主要领导组织机构不健全，而且这些主要领导组织机构当时还为若干动摇分子所掌握。换言之，就是对于当时那样一个伟大的运动，缺乏有力的政党领导。而当时主要的领导组织机构却为几个既无主张又无计划的少数人、几个不坚定的地主、宗教家、学者所掌握。如果当时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民主主义政党来计划和领导这次运动，那么斗争将会更为激烈，更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然而，运动最终是失败了。“三一运动”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组织的、涣散的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虽然广泛地展开了，但是行动起来的群众没有组织，没有任何组织的群众是决不能取得胜利的。另一点是由于当时的运动没有政党的领导，因此没有一个斗争纲领和战斗性的计划。任何国家或社会，一切运动都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力量。而且只有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有群众的紧密团结和正确的纲领计划，才能保证取得胜利。

其次，我们从“三一运动”失败的原因中可以知道，今天在我们当前的建国运动中，最必要的是更坚强的领导和群众的紧密团结。

第三点是：“三一运动”虽然失败了，可是谁又继续展开了这个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镇压“三一运动”时，朝鲜的地

主和资产阶级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监禁和收买之下屈服了，变节了。他们出卖了民族的利益。可是完全继承“三一革命运动”的精神而进行斗争的是朝鲜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对我们来说，可以明确得出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就是建国运动中的基本动力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无需多加阐述。

同胞们！当我们纪念这一天的时候，必须充分地认识“三一革命运动”的这种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后必须运用这些经验教训，加强广泛的全民大团结的力量，在民主的基础上，坚持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统一战线，建立一个新朝鲜的新政府——民主主义朝鲜政府。……

（选自《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1分册，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编印，第132—134页）

第十三题 苏联社会主义
建设的胜利

一，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经济和政治

(一)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

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一次常会决议

(1920年2月3日)

红军给白卫军反革命匪帮的决定性打击，使在经济战线上进行同样坚决斗争，集中力量和利用一切手段来恢复和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前的任务。

除了有关整顿交通运输，消除燃料和粮食危机，防止流行病，组织有纪律的劳动大军这些当前最紧迫而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以外，苏维埃俄国第一次有了可能来开始更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着手科学地制订和彻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国家计划。

鉴于电力在利用苏维埃俄国境内以各种燃料矿藏和水力形式大量存在的动力主要天然储备方面有最重要的意义，考虑到把建立在天然动力来源附近并能完善分送到全国电力输送网的各个区域发电站的动力生产集中起来非常有利；估计到电力对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满足居民文化需要的意义，特别是使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农民群众有利用电力照明来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可能，从而大力推进农村吸收城市文化财富和提高农民的农副业生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农业人民委员部共

同拟定电站网建设草案，并于两个月之内送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3—374页。方钢
译)

关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条例

(1920年3月24日)

1. 为了编制俄罗斯电气化总计划，按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委托，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机工业部之下设立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2.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决定和批准。

3. 由于国家给予任务的重要性的规定完成时间的短促，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有权按计件劳动报酬条件吸收各种机构或个人来工作和给予特殊的委托。

4.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科室、各管理总局和各中心，按照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为执行该委员会的工作所需的各种情报、资料和证明书。

5. 拨出专款2,000万卢布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支配，作为执行委托的费用。

6. 发给的贷款由根据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决议工作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团支配。

7. 由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异常紧迫，因而必须迅速进行拨款。根据本条例第5条规定拨出款项的支出，可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团贷款管理人直接负责，但须由工农检查局进行监督。

8. 由于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委托必须尽快执行，并且具有特殊性质，因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有权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最高机关、各人民委员部及其下属机关直接联系。

9.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有权在其工作进行期间，讲清必须就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有关的问题赶快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时，可以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说明实现这些措施的办法。

10.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公文用纸。

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4—375页。方钢
译）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0年12月29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赞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其次是农业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而特别是俄罗斯电气化委员会关于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的工作。

代表大会认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倡议下，由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是伟大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步。

代表大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其他各人民委员部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

其次，代表大会委托政府，并请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使最广大的城乡群众都了解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每个电站和每个多少有些起码设备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应当成为熟悉电学和讲授有关了解电的必要知识的中心。

代表大会委托人民委员会拟出一个决定，以普遍动员一切拥有足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来宣传电气化计划和讲授有关了解电的必要知识。

代表大会委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制定为实现电气化而适当联合利用这些力量的措施，也制定为使整个电力工业具有突击性质的措施。

代表大会坚决相信，一切苏维埃机关、各级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全体工人、劳动者和农民，都会不惜任何牺牲、不怕任何困难，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5—376页。方钢
译）

国家计划条例〔节录〕

（1921年2月22日）

第一条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总计划委员会，以便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赞同的电气化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全国经济计划，并对这一计划的实现进行公共监督。

总计划委员会或其分会应当最充分最仔细地考虑具体经济实际的现有条件，来制定首要的、尤其是应当在最近期间、包括在

1921年内实现的经济任务。

第二条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负责：

(甲) 制定统一的全国性经济计划，及其实现的方式和办法；

(乙) 审查主管机关和省（经济）组织按国民经济各部门制定的生产规划和计划提案，使它们同全国性计划相协调，并确定工作顺序；

(丙) 制定为实现国家计划所需的关于提高知识和组织研究的全国性措施，以及关于使用和培养所需人员的全国性措施；

(丁) 制定关于向广大居民群众传达国民经济计划、关于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和相应劳动组织形式的消息的措施。

第三条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在履行它所担负的职责时，有权同共和国一切最高国家机构和机关及中央机构和机关进行直接联系。

第四条 人民委员部、省的机构和地方机构有责任向国家总计划委员会提供所需的一切情报和资料，并通过负责人员作必要的说明。

第五条 人民委员部和主管机关中提出的一切有关国家经济问题的计划建议及其实现纲要，都应送交国家总计划委员会审查并同全国性经济计划相协调。

第六条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和委员都要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任命。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主席有权向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直接报告。

第七条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拥有自己的在编人员。此外，委员会有权把个别专家吸收到委员会来长时间工作或做些临时性工作，也可以把个别工作交给别人去执行，而按计件劳动报酬制付酬。

第八条 国家总计划委员会的经费和执行它所委托工作的报酬都由专款中拨付。在未弄清国家总计划委员会的全部工作量之前，暂时拨出预付款 3 亿卢布归其支配。国家总计划委员会的正式经费，按以后修正的结果发给。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6—377页。方钢
译）

人民委员会《就小工业、手工业 和农业合作社给政权机关 的原则性指示》的法令

（1921年5月17日）

人民委员会1921年5月17日会议决议：

1. 采取必要措施发展私人企业形式或合作社形式的手工业和小工业，并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社。
2. 避免束缚个人和居民团体经济首创精神的多余的规定细则和多余的形式主义。
3. 不要束缚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自由支配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但利用根据特殊合同条件由国家供应的原料和材料生产的商品除外。
4. 为了在采取上述措施时能严格符合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法的要求，并且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劳动力、燃料、设备、粮食和必需材料方面削弱国营企业，要非常注意地方政权机关本身的责任。

5. 鼓励小商品生产者努力合作化，为此目的要做到：（甲）定货时使合作组织优先于个人，（乙）在国家定货和确定国家任务时，要把属于国家的原料和货币资金预付给合作组织，（丙）在寻找所必须的房舍和购买器具等等时，要使合作组织比个人有优先权。

6. 对于不履行对国家的合同义务，以及不正当地利用给予合作社的优先权，都要按一般诉讼程序追究责任，同时要对合作社的活动不断进行行政监督。

7. 在确定对农业合作社的态度时，也要遵循上述原则，并要鼓励成立所有各种合作社，尤其要鼓励那种从国家得到工具而交付农产品的机器合作社，以及种子繁育合作社、牲畜饲养合作社和土壤改良合作社。

8. 国民经济委员会、扩大播种和改进土地耕作委员会以及土地局都要采取一切措施广泛宣传加强所有各种合作社建设，并为此采取必要的组织步骤。

9. 省经济委员会和省农业委员会应讨论旨在开展合作社、手工业和农业活动的主要措施。

10. 一省范围内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要遵循以下原则：（甲）允许申报成立有关的合作社，（乙）允许自愿入社，（丙）允许自由选举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同时公布关于改变原先就该问题的立法中相应部分的决议。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64—466页。方钢
译）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决议

(1921年12月28日)

听了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之后，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承认：

1. 农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过度单薄，本身没有用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力量。可以采取两种途径对它进行帮助：（1）由国家进行调节。（2）用全面互助形式把力量集中起来，并在经济利益基础上发挥其首创精神。

2. 就目前情况来看，第二种途径较易实行，并可尽快取得所希望的成果。在历史上合作社提供了把小农经济的力量集中起来的组织形式。苏维埃政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使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成为自己农业政策的基本方面之一。

3.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使各种农业合作社有成立和发展的广泛和完全自由的可能，同时认为必须特别支持那些以生产任务、广泛的土壤改良工作和认真的耕作活动来奠定其活动基础的合作社，并且要向它们提供购销农药和农产品的广泛可能。同时要求信用合作社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因为在农村中把生产信贷组织好，可以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正确工作创造可能。鉴于地方对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不够有力，代表大会建议地方要为此采取有力措施。

4. 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集体农庄），作为在社会上已充分显示出来的劳动人民基层组织，应当被吸引到合作社建设方面来。把集体农庄纳入农业合作运动的总轨道中，这必须非常

小心谨慎地进行，不能急剧改变它们积极的革命的内容，也不能通过各别集体农庄自发地改按一般合作章程行事，而是应当采取把这类农业合作社有组织地包括在合作社联合总社中的办法。同时，集体农庄有权组织自己独立的省联社。在公社和劳动组合改成合作组织时，必须考虑每一种特殊情况，为该集体农庄选择最适合其生产活动和地区条件的合作形式。土地机关有权从物质上直接支援那些加入联社之外的合作社网的集体农庄，其目的是使这些集体农庄具有耕作核心的意义。

5. 组织上正确的工作只能依靠向合作运动注入新鲜力量来保证，尤其是应当把在德国和奥地利很熟悉农业经营高级形式的前战俘，把掌握革命的纪律性和组织方法的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军指挥员，以及能够给农村带来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工厂工人，都吸引到农业合作社中来，——所有这些人员都应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工作。代表大会还特别注意广泛吸引女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必要。

6. 在业务工作上，无论是在组织工作上——在制订示范章程、规定对某种条件来说最有利的合作形式及其他方面，也无无论是在经营上——在生产、供应、收购等方面，地方土地机关应当努力从经济上调节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活动，通过吸引它来解决产生的问题以及与它协调自己活动的办法同合作社建立最密切的联系。相应国家政权机关的监督，应当表现在注册、仔细认真进行核算和对准备执行法令和法律的监督上。

7. 苏维埃政权机关应当严格计算农业合作社所采取措施的经济后果。在签订合同、发放贷款和预付款、给予经济权利和优惠时，不仅必须根据直接的经济理由，而且必须竭力保证那些最符合本地区经济性质、最能提高本地区农业生产率、又使最富有生命力和最稳固的合作社能够蓬勃发展。

8. 为了促进合作运动的发展，必须宣传它。必须把管理耕

作工作的机关以及出版社和地方报刊吸引到这种事业方面来。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62—464页。方钢
译)

(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① [节录]

Ю·С·帕普科夫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一种后来被列宁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特殊的非常的经济政策。其特点主要有列几点：将所有工业生产集中在苏维埃国家手中，根据严格的集中原则（总局制）对它实行管理；实行余粮收集制和城乡间的直接产品交换；禁止贸易并代之以按等级的国家分配；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劳动报酬制度的平均化；全面的劳动义务制和作为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形式的劳动动员。

在内战形势下，这是唯一可能的和正确的经济政策，因为当时必须使整个经济为前线服务，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和资源，按军事方法改组整个国家生活。同时又应考虑到，党是从具体历史条件，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考虑出发而使经济政策

① 摘译自《列宁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质》的第二部分，几处断译处未加删节号，标题系译者所加。译文的第一部分是译者从原文最后一部分提上来的，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但顺序号系译者所加。——译者注

服从国防利益的。根据军事形势、经济潜力、改变了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共产党拟定并实行了某些经济政策方案。因此党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不会是整齐划一的事先考虑好的制度、计划。它是为了国防利益，并由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特别困难的条件而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一定的综合体。

根据战争的需要，经济政策的改变在各个方面不是同时进行的。首先，在1918年下半年开始组建军事工业并建立红军的供应机构。余粮收集制完全建立是在1919年上半年。1920年底禁止一切粮食贸易而代之以按等级的分配。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工资实物化、工业领导中的一长制原则则是在1920年确定下来的。

应该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改变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计划中要解决的基本任务的实质。在内战时期“为加强新的、自觉的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继续顽强斗争；党和苏维埃开展了各种旨在使小资产阶级服从无产阶级监督的活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在打仗，而且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上半年和内战后几年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统一的”。

为了尽快动员国家的一切资源以应军事需要，无产阶级国家不能不在最短时间内在所有最重要的经济生活领域，首先是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占领关键阵地。但是只有通过完成列宁在前一时期提出的经济任务，这一点才能实现。如果说列宁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计划具有过渡时期措施的逐步性质，那么战争形势则要求立即、有力、高效率地实行它们。

所以，内战和干涉时期没有改变社会政治任务的阶级方针，而且加快了这些任务的完成，在实现工业国有化和集中化，在建立核算和对生产及产品分配的监督，在实行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使供应和分配机构隶属于国家领导，以余粮收集制加强粮食垄断，在几乎完全禁止私人贸易、在使居民合作化并吸引他们参

加义务劳动等方面成了催化剂。在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下，违背这些非常措施，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阵地拱手让于反革命势力。

一、加快工业的国有化和加强集中领导

1918年7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开始把按照1918年6月28日法令^①实现国有化的各企业转交国家行政当局管理。1918年12月下半月举行的全俄国营农场第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工业国有化基本完成了。1918年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俄国中部地区统计的9,542家企业（其中半数左右是大中型企业）中，已经社会化的有3,338家，占35%。

1918年底，大部分国有化企业转交国家管理，1919年第一季度全部转交完毕，但是小工业的国有化暂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党认为私人小企业要保留很长一段时间。

1919年4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帮助手工业的办法》的决议指出，小工业和手工业企业既不国家化，也不没收，除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做出专门决议；决议列出了允许手工业者在地方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清单。1920年9月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调整手工业和国有化工业》的法令。所有手工企业必须完成国家机构的订货，并向它们提交自己的产品。只有那些不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者才保有在地方市场上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

据1920年底的工业企业调查，358,447家开工企业（企业总

^① 该法令全文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105页。——译者注

数为412,707家) 中有37,226家属于国家所有。绝大多数的非国有化企业仍是小型和特小型经营。不过它们也要受国家监督并必须完成国家订货。

国防委员会对国家经济实行总领导，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进行直接管理，它将各工业部门划归有关总局（即所谓的“总局”制）：采矿工业总局、石油工业总局、煤炭工业总局、燃料工业总局、中央纺织工业总局、中央糖业总局等等。总局（1918年秋为18个，而1921年底则有52个）按部门特征设置。总局的责任不仅是计划生产、分配产品，而且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拨款和采购原料。它们实行集中领导，不经过地方苏维埃。总局的指令，其主管的企业和部门必需执行，这些企业和部门按照集中指令无偿上交自己的产品，作为交换，它们也按照相应指令得到原料、燃料和其他企业的产品。总局在地方设立分局。

党动员一切资源对付敌人，特别注意建立和完善苏维埃国家机构。为此，1919年12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精简苏维埃政权民政机构》的法令，规定为了最大限度使用一切国家资源要合并一些人民委员部，要裁减机关人员数量，合并同类生产的总局等等。同时加强下列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军事人民委员部。

应当指出，只有坚决克服地方主义倾向，党才能建立集中管理体制，从而使所有国有化企业接受统一领导，并使其生产服从国防利益。1918年11月2日人民委员会向地方苏维埃机关发出列宁签署的命令，指出不允许地方政权机构干涉中央所属企业的活动。1918年12月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同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的决议，全部实质在于强调必须迅速和毫不迟疑地执行中央政权的指令。

党关于加强一长制原则的路线得到了彻底的贯彻。1920年

底，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交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的2,483家企业中，有2,183家变为一长制管理。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提拔的行政管理人员数量不断增长：1920年底，工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总局、分局机关工作人员中占51.4%，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占57.2%，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中占63.5%。

这样，在内战年代，工业领域发生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强有力过程。在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加强了，城市中社会主义成分增长了。所有这一切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随着国家管理的极端硬性集中和运用军事领导方法，大中型企业的国有化加速了。

二、在农业中实行余粮收集制

为适应战争局势的需要，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粮食政策，采取非经济的强制措施，以解决粮食问题。

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贫农的组织和供应》的法令是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基本措施，它决定了这一政策的阶级倾向和执行的成功，对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农村苏维埃政权，粉碎富农和争取中农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民委员会1918年10月26日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0月30日批准的《关于在农业中通过扣除部分农产品的形式征收实物税》的法令从法律上体现了列宁关于在解决粮食问题时的阶级立场原则。该法令的实质是以对农民中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征收区别对待的实物税来取代建立在“对所有农民一视同仁”基础上的货币税，因为在富农和大批富裕农民手中还有相当多的粮食储备。然而关于实物税的法令没有解决粮食问题。

在苏维埃国家粮食政策上出现了两种趋势。第一种是富裕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尚能支配自己的余粮，允许一定产品的自由贸易，即一部分供应工作仍然要靠私人所有制。同时第二种趋势日益加强，它表现在非经济的军事性的措施的加强：征粮队的工作；限制自由贸易，尽可能代之以产品交换。战争形势的困难更加强了第二种趋势。

协约国经赛瓦斯托波尔和奥德萨侵入到国家南部粮食高产地区。高尔察克在丕尔米地区转入进攻，东南部反革命猖獗起来。1918年底红军人数达到100万人。实物税法令不能保证军队、军工企业工人、运输工人和其他重要国民经济部门的粮需。极端严峻的粮食形势迫使党和政府实行余粮收集制。1919年1月11日通过了《关于在产粮省份收集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余粮收集制给国家找到了实现粮食垄断的有效办法。从前在确定农户的余粮额时要考虑粮食的实存数量和农民的需要，而本法令则从国家的粮需出发。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必须把所有余粮上交给国家。

该法令指出，新的立法行为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粮食垄断和实物税的法令的发展。

鉴于国内粮食形势严重，1919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召开联席会议，列宁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的决议指出，如不坚决贯彻已经颁布的对基本食品（粮食、砂糖、茶、食盐）的国家垄断，如果不按照固定价格对其他重要产品（肉类、海洋鱼类、大麻籽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动物油〈牛脂除外〉、马铃薯）实行大规模的国家收购，对居民的粮食正常供应是不可思议的。

接着决议作出非常重要的补充，高瞻远瞩地为党和苏维埃机构规划出进一步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向。除马铃薯外，只允许国家

粮食机构收购并运出上述粮食产品。只有工人组织、专门的和合作社的联合企业才有权按照定价大规模采购马铃薯。

所以，在1919年初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时候，国家垄断尚未涉及到所有粮食产品。作为临时办法，允许工人组织和合作社联合企业采购非垄断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各地方苏维埃机构不明了所贯彻的粮食政策的实质。例如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宣称，在他们乡，“私人贸易受到无情惩办，因此它已看不到了”。有这种观点自然无法贯彻人民委员会1918年12月10日的允许劳动人民的组织购买非垄断粮食产品的法令。因此苏维埃政府要求地方苏维埃切实履行颁布的法令。

这样，在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下，在不能不转为余粮收集制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同时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地惩办粮食垄断的破坏者；坚决地同地方主义的尝试和地方机构的“左倾”——阻挠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非垄断产品——作斗争。

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鉴于粮食供应困难，在粮食政策上作了重大改变。迄今为止只在采购粮食和肉类方面实行的国家垄断，现在扩大到马铃薯，必要时还可以扩大到其他农产品。遵照这一指示，人民委员会扩大了属于余粮收集制范围的产品清单。1920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肉畜的义务供售》的法令。该法令涉及到饲养牲畜的一切个体农户和集体单位。牲畜禁止出售。国家垄断逐步扩大到所有基本食品。这实际上意味着禁止一切粮食自由贸易，它破坏了农民所习惯的通过市场买卖进行的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

然而应该指出，余粮收集制的实现不是只靠非经济的、军事行政措施。在强制收集的同时，广泛地使用说服的方法，在农民中做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工作；也采取经济刺激的办法（例如运来商品），然而，很遗憾，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国家没有应有数量

的农民必需的工业品。党耐心地解释，收集制的实现不仅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广大农民劳动群众的利益。数以千计的当地共产党员和派往农村的工人鼓动员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耐心地强调指出余粮收集制的阶级性，用事实说明“收集制符合贫苦阶层居民的利益”。在这一工作中，他们遵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各省委的信办事。这封信说，余粮收集制的基础是“阶级原则……任何乡执行委员会或农业苏维埃都不允许按人口或田亩分配任务”。

余粮收集制阻止了大型富农经济的产生，促使具有反富农方向和使农民中农化的倾向的农业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干涉和内战时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使红军和工人阶级免遭挨饿。苏维埃国家正是借助于它得到了最必要数量的粮食。如果说自1917年11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只征集了3,000万普特粮食的话，那么自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8月1日就征集了2亿1,250万普特，而在1920年的最后5个月中则征集了2亿2,500万普特。粮食收集是按阶级原则进行，因为全部负担落到了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这就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破坏。它不涉及没有剩余粮食的农户。

三、禁止自由贸易，建立分配系统 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

国内战争和由国内战争所造成的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极端缺乏，加快了把分配事务转到国家手中的过程，因为形势要求尽快把整个供应-分配机构集中起来。因此，就实行了通过逐步扩大垄断商品和食品的清单来缩小私人贸易的方针。

1918年11月，对国内私营商业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和征用政策。

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对居民所有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的供应》法令规定了内战时期国家供应的原则。法令的第一条写道：“为了取消私人贸易机构并由苏维埃的和合作社的分配点对居民有计划地供应所有产品；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采购所有个人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

根据该法令，只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构才有权采用法令所涉及的产品来调节贸易的措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协同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了垄断产品的清单。每个公民都应在加入了分配网的某一指定的零售店登记注册。

5天以后，即1918年11月26日，颁布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对某些食品和日用品贸易的国家垄断》的决定。其中对烟草制品、糖果工厂产品、茶、咖啡、盐、火柴、织布厂的产品、线、工厂产的鞋子、煤油、工厂产的钉子、工厂产的肥皂、砂糖产品等大量食品和日用品宣布实行国家垄断。1918年底，具有全国意义的收归国有的大型仓库连同其全部商品储备统统转交粮食人民委员部支配。这意味着取消了私人贸易。私人零售贸易最后就转到市场、集市和旧货摊上去了。

但是国家不能完全保证城市居民的粮食需要。为了养家糊口，居民只好通过市场购买和交换产品。1919年存在着市场、集市、小摊小贩等形式的私人贸易，在这些地方自由地买卖国家收购计划没有涉及到的产品。1919年莫斯科苏维埃的调查表明，仅在苏哈列夫卡市场上，平均每天就有3,258个商人在从事贸易。在市场上有投机商在活动，他们收买和转卖已经垄断的产品，“从挨饿的工人的身上”剥去了“九层皮”^①。

苏维埃政权力图压缩实际上是在滋生以各类产品进行投机的“自由”市场。1919年6月29日，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供应委员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1页。

会建立了非规定产品的中央采购委员会，以便在统一的组织内把对非垄断产品的采购业务统管起来。

为了同投机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人民委员会1919年10月21日的《关于同投机、盗窃国库、诈骗和其他滥用经济和分配机构职权行为作斗争》法令宣布成立了特别革命法庭（属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领导），该法庭在解决问题时服从特殊的革命利益，不受任何诉讼程序形式的约束。它的庭审是公开的。彼得格勒是最早完全禁止私人贸易的城市之一。1919年8月，市苏维埃禁止18—50岁的所有男子从事贸易；1920年初封闭了所有市场。因此，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年代禁止自由贸易，这是由一些军事和政治原因，以及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中，在工业品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只能有利于反革命，因为它会使工人阶级挨饿，它有葬送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然而应该指出，尽管采取了上述法律行动，苏维埃国家并没有完全禁止私人贸易。小型市场贸易在地方范围内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城市居民的消费。在国内拥有小商品经济和存在千百万小生产者的条件下，这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实行缩减私人贸易的方针的同时，提出了重新审查工农国家同资产阶级合作社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1918年春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妥协，对他们的暂时让步不符合军事和政治形势的要求^①。1918年12月6—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会上列宁发表了论工人合作社的任务的演说。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保持住合作社对苏维埃政权的“独立性”，代表大会还是谴责了他们的反苏维埃目的，认为必须把工人合作社的全部力量都放到协同苏维埃粮食机构组织对居民的供应事务上去。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09页。

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通过了《关于消费公社》法令。根据该法令在地方上设立了统一的分配机构——消费公社。每个公民必须成为公社社员，并到它的一个分配点登记注册。这样，从1918年（原文如此，应为1919年。——译者）上半年开始，供应和分配工作便纳入了固定的全国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愿望首先是在地方上表现出来的。1918年5月2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了关于同饥饿作斗争的紧急会议，会上通过了把彼得格勒居民分成4类、并据此组织对居民的供应的决定。1918年9月17日，根据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主席团的决定，在把莫斯科居民分成4类的基础上实行了新的面包和粮食卡片制度。

1918年10月，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令，开始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实行的分类分配经验进行总结，并力图使分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指令把消费者分成4类：1. 特重体力劳动工人；2. 其他种类的工人，负责工作人员和某些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等）的职员，手工业者，孕妇及哺乳期的妇女；3. 其他职员和学生；4. 其余居民。每类人员的粮食定量分别为36俄磅、25俄磅、18俄磅、12俄磅。指令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明确而清楚的分办法。1919年春进行的调查表明，地方上实行的卡片制度是不正常的。1919年5月16日《经济生活报》报道说：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分类原则的实质不是缺乏了解，就是做出五花八门的解释；另一方面地方粮食机构在农民居民（特别是饥荒地区）的粮食分配方面软弱无能。

战时条件改变了正在形成的全国的供应和分配体制。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和持续的内战，要求采取非常措施保证红军家庭的供应。1919年8月20日，工农国防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保证红军家庭的粮食供应》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他们的家庭有权增加粮食定量6俄磅面粉，半俄磅食盐和糖。1个月后，1919年9月20日，该决定传达到指挥员的家庭。在这一时期工厂和燃料组织

的工人享有特殊的“专用”标准，还有特殊的铁路标准等等。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11月15日决定建立的专门机构——工人供应委员会——又对所有这些标准做了各种改变和补充。后来这个委员会被授予特殊权力，来解决与为工人增加供应和规定供应定额有关的一切问题。分配权集中在一个中央机构，这就消除了地方制订“土标准”的任何可能性。

1920年4月27日，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实行统一的粮食定量法令草案。列宁对讨论草案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修改意见^①。列宁的指示就成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4月30日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劳动定量》法令的基础。该法令的基本思想表现为3条原则：第一，按类别分配，但非劳动分子不在供应范围之内；第二，加强工资中粮食部分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三，在统一分配方法和形式方面完善组织工作。所以，该法令只涉及劳动者：（1）体力劳动工人（用1号卡片）；（2）在苏维埃企业和机关中从事脑力劳动和监督性劳动的人（用2号卡片）；（3）在私营企业、机关和经济中从事劳动的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用3号卡片）。

随着该法令的实行，以前颁发的一切命令等均被废除，这就保证了供应办法的统一。例外的只是关于保证红军家庭的粮食供给的决定、关于在伤寒流行区工作的医护人员的供应条例和免费的儿童供给还继续有效。法令没有规定供应标准，但却规定了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的比例，大约为4：3。该法令涉及到3,500万非军事人员。在上述几类人内部实现了“按人口”分配，这是由于极端缺乏食品和工业品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在把分配系统的个别办法集中起来并加以调整的同时，苏维埃政权还通过组织社会供给来解决供应问题。苏维埃政权对这个

^① 参看《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问题的解决起端于组织儿童的社会供给。1918年9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儿童供给》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在所有学校中立即组织食堂，以保证学生吃上热饭，在校外则为所有5—16岁的、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上学的儿童设置供给点。在批准人民委员会1919年5月17日《关于免费对儿童供应》的法令以后，这个制度更广泛地推行起来了。这项法令使14岁（包括14岁）以下的所有儿童有权享受国家的免费供给，不受其父母定量类别的影响。该年6月这个原则扩大到16岁以下的所有儿童。1919年9月24日人民委员会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扩大现有的儿童食堂网点和其他的儿童供应点。

除了扩大免费儿童社会供应网之外，在成人的社会供应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17日《关于改善工人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状况》的决定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该决定规定，首先是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职员建立免费社会食堂网点。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项工作，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则责成统一的消费合作社——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彼得格勒消费合作社组织这项工作。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遵照这项法令于1920年2月10日通过一项决定：在莫斯科对工人和苏维埃机关职员免费供应午饭。

这样，从苏维埃政权第一天就开始的统一的包罗万象的消费合作社的创办过程顺利完成了。这个合作社成了苏维埃国家——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分配机构。这是以有组织的国家分配取代私人贸易的最重要的步骤。

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和纸币的急剧贬值是这一时期经济生活的特点。苏维埃国家财政政策的锋芒所向，是摧毁城乡资产阶级的财政实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使不劳动分子手中的货币失去任何经济意义。同时国家面临着通过货币流通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保证余粮收集的财政拨款，组织红军供应的任务。

通过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没收资本，实行有关的税收政策，实现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非常需要的货币资金的总动员。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最初和最重要的行动之一，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0月30日关于向不劳动分子一次征税100亿卢布的决定。但是所有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上述所有任务，因为余粮收集制的实行和非垄断供应品数量的逐步减少，压缩了贸易的规模和商品流通额，这同样影响到卢布的购买力。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削减了工农业商品总额，而且生产出来的商品几乎没有进入流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因为只有通过国家发行纸币才能弥补不断增长的国家开支，才能使资产阶级手中的货币贬值。

最初是通过规定极限数目来控制纸币的发行的。但是人民委员会1919年5月13日的法令允许在国民经济对纸币的实际需要范围内发行货币。内战年代大量发行的纸币失去了任何价值。人们这时不是储积，而是尽量抛出纸币，人们不再出售商品和食品，而是拿商品和食品互相交换。到1920年底，纸卢布只相当于1918年7月的 $\frac{1}{188}$ ，相当于1913—1914年的 $\frac{1}{13000}$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意义。各种奇缺商品：食盐、火柴、粮食、面粉、肥皂、糖、印花布等开始发挥货币的作用。

1920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取消若干货币结算》的法令。法令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拟出关于废除国家机关、企业和工人、职员、职工的邮政费、电报费，以及使用自来水设备和其他市政公用设备费用的法令草案。燃料、住房和粮食人民委员部控制的产品等的费用也予废除。

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和市场流通的急剧收缩导致了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它首先遍及到城乡间的相互关系。实物化是在两个方面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国家采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另一方面是实

现了城乡居民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不是通过买卖，而是在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国家无法付给农民等价的工业品。同时市民和农民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大大扩大了。城市居民不得不用衣物、鞋子、家俱和其他东西换取粮食和其他食品。经济关系的实物化直接影响到工资的内容，它越来越具有实物性质：货币让位给食品，布疋，鞋子及其他必需品。在干涉和内战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工资的实物化符合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促进了在分配制度上进一步实行计划原则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市场自发势力。

由于国家经济生活的实物化，信贷-银行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1920年1月1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把仍然有意义的信贷-结算职能交给了财政人民委员部。由于同样的原因，财产和人寿保险也被取消了。应当指出，干涉和内战时期的货币发行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它们那里的通货膨胀是统治阶级大发横财的手段。苏维埃国家发行纸币首先是针对不劳动分子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积累贬值。

1918年12月，彼得格勒完成海军定货的工厂和许多其他企业实行计件工资。据1919年7月14日《真理报》报导，“实行计件劳动付酬大大提高了彼得格勒工厂的生产效率”。1919年2月2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工资》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不论男女，成年工人的最低工资规定为每月600卢布，最高工资即高级技术人员、医生、部长和其他同类工作人员的工资定为3,000卢布。为各类人员和职员（总共36类）的劳动工资制定了工资级差表。

1920年3月23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奖励的总条例》法令具体说明了必须实行奖励制度的原则。制订这一条例的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技术和完善组织。其中指出了几种奖励办法：个人奖、集体奖、生产奖（整个工厂或

团体的)、综合奖——整个机关的奖励。还明确规定出了受奖人的范围。

由于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当货币工资用消费品来支付的时候，奖励制度也变成了实物奖励。这种情况在苏维埃立法中也有反映。1920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劳动奖励》的法令。它在确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人付给货币奖和实物奖方面也制订了同样的制度。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实物奖励的总计划。

1920年6月17日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总条例》法令十分确切地规定了劳动时间、生产定额和劳动报酬：计件工资、奖金等。由于国内经济生活实物化的加强，1920年10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实物奖励的暂行条例》，它在当时的形势下加强了奖金的作用，刺激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但是，尽管“平均主义”日趋消灭，粮食基本上仍按平均原则分配。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源，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按人口”来分配最低的生活必需品。

四、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和作为吸引 参加劳动的形式的劳动动员

由于工人去参加正在组建的红军和一部分熟练工人因为工业中心地区的粮食危机而流入农村，自1918年秋天起越来越感到劳动力的不足。这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由自由雇工制过渡到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劳动义务制的实现分三个阶段：1. 从1918年年底起吸收没有参加公益劳动的人参加义务劳动；2. 自1919年初开始吸收农民参加各种形式的义务劳动（准备燃料、清除积雪等等）；3. 自1919年底开始对某些专门人材（铁路员工和矿工等）实行劳动动员。

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非劳动者的劳动手册》法令。这些劳动手册代替了过去的身份证、公民证和其他证件。法令规定了按照劳动义务制应当参加公益劳动的公民范围：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使用雇佣劳动获取利润的人；私商；不参加公益劳动的自由职业者等等。只有取得标明相应月份标记的劳动手册，才有权迁移并得到口粮。

苏维埃国家在劳动方面的各种法令没有包括这个课题里的所有问题。1918年12月10日第一个《劳动法典》的颁布则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该法典规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劳动义务。责成劳动局吸收人们参加义务劳动。酬额，付酬的条件和手续取决于工资级别，不能低于最低生活费。第二天，即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实施劳动义务制》细则。细则指出，必须“使用闲散劳动力参加公益劳动”，同时强调这种义务劳动不应带有只适用于非劳动分子的惩罚性质。

这样，只适用于城市资产阶级和非劳动分子的特别措施——劳动义务制开始具有普遍的性质，涉及到了国家的所有阶级。

鉴于燃料危机的激化，工农国防委员会1919年11月19日通过了《关于筹集木材的物力、人力和畜力义务制》的决定，其中指出，“逃避这些义务将被视为临阵脱逃”。

1919年12月5—9日举行的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吸收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参加筹集和搬运木柴，为了采伐和搬运木柴在城乡实行义务劳动，并规定了有关的劳动定额。

燃料问题仅仅是共产党在经济战线面临的问题之一。军事政治形势要求采取坚决措施来保证工业、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必要劳动力。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1月29日通过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普遍的劳动动员制度具备了国家法律的形式。责成工农国防委员会对

贯彻劳动义务制实行总的领导，在其下面建立了相应的总局。逃避劳动义务，擅离职守，故意破坏劳动工具，组织工作粗心大意等等犯罪分子均送人民法庭治罪，在特殊情况下则送革命法庭治罪。

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七届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法令，并批准了这个法令。会议在其决议中指出，为了使国家摆脱经济灾难，必须做到：“1. 彻底地、有计划地实行居民的劳动义务制，使用军队的一切机动力量参加生产劳动；2. 使熟练工人从军队、农村和其他地方返回生产劳动岗位；3. 通过创办专业学校和训练班扩大熟练工人人才队伍。”

为了实行有计划的劳动动员并统计一切劳动力，1920年初建立了在全国劳动义务总委员会领导下的许多专门的劳动义务委员会。这些机构在满足交通运输和其他同国防直接有关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要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体现在下列方面：把工人从一些企业调往另一些企业；从农村调回熟练工人；在无损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把专家从红军中复员；通过动员使人们从其他行业返回自己原来所在的专业。譬如，1920年1月30日，工农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宣布铁路员工的劳动动员》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最近10年来在铁路上工作的18—50岁的司机、副司机、各级司炉、工长、机车装配工等都在动员之列。军事工业从1919年10月1日—1920年11月15日共需36,678名工人，而实际得到24,347名，即通过动员满足了它68%的需要。

因此，内战和干涉时期的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不同阶段、由自由雇用劳动力转变为实行全民的劳动义务制和作为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形式的大规模的劳动动员。因为只有采取这些吸收参加劳动的形式，才能保障在全国范围内吸收和分配劳动力，才有利于国防。

（译自 IO·C·帕普科夫：《列宁论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的实质》，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
第13—52页。李光林译，刘献洲校）

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产粮省分收集 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

（1919年1月11日）

为了对红军和缺粮地区紧急供应粮食，阐发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粮食垄断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18年，第38号，第498项）和关于实物税的法令（同上，第82号，第864项和第99号，第1012项），规定将余粮和饲料交归国家支配的条例如下：

第一条 为满足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摊派给各产粮省分向居民征收。

第二条 收集余粮的省分，以及每个省分应收集的粮食和谷物饲料的数量，均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产量、储备和消费数额规定。

第三条 种籽谷物、粮食谷物以及粮食机关按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清单收购的谷物饲料全部数量均列入余粮收集制。

第四条 除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摊派任务外，还要按省粮食委员会的指示加上当地城市人口和农民所需的粮食和谷物饲料。

第五条 余粮收集制的一般原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

第六条 按余粮收集制归省负担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根据本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应在1919年6月15日以前按固定价格从农民那里收到。

第七条 按余粮收集制摊派到各省的粮食和饲料的70%应在1919年3月1日以前供给。

第八条 粮食人民委员部有权按当前收获物的种类,减少在3月1日之后应供给的数量。

第九条 按照余粮收集制应交粮食和谷物饲料的农村业主,在3月1日以前所交数量不少于70%,并在6月15日以前交足其余数量时,可免交实物税。

第十条 未按规定期限交出应交谷物饲料的农村业主,发现其储备时则予以没收。对于其中存心顽固窝藏自己的储备者,则采取严厉措施,直至依法没收财产和剥夺自由。

附注 对于不正确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起诉权和起诉条例由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副粮食人民委员 布留哈诺夫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4—365页。方钢
译)

《铁路员工》杂志关于铁路运输情况的报道

(1919年5月1日)

一般说来,运输,而尤其是铁路运输,是俄国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制造铁路装备和为修理铁路而工作的企业,其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每周都在发展,并因燃料不足而更加复杂化,使铁路运输有完全瘫痪的危险。据交通人民委员部报道,1917年俄国机车制造厂出产新机车数为520辆,而1918年只有191辆。其

中货运机车，1917年出产346辆，而1918年为152辆；客运机车，1917年为174辆，而1918年为39辆。至于说机车车辆的修理状况，只有这方面今年年初的资料。即是说，到1919年1月1日实有全部机车为8,758辆，其中在修的为2,491辆，待修的为1,690辆。到1919年2月1日，实有机车为8,829辆，在修的为2,542辆，待修的为1,827辆。换句话说，“患病的”机车所占的百分比在一个月之内就有显著增长。车辆的情况也是如此：1919年1月1日车辆总数为240,108辆，在修和待修的为39,835辆，而2月1日总数为241,467辆，在修和待修的为44,125辆。

铁路和机车的修理原来一直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部门之间的铁路委员会负责，不久前才刚成立专门的全俄铁路运输修理委员会，主席是阿瓦涅索夫同志。新的委员会在讨论自己的任务时，认为首先必须完成的是：1. 制定自己活动的详细计划；2. 挑选足够数量的适于做此工作的人员；3. 同从事铁路运输修理工作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机构进行联系；4. 从技术装备，从材料、工人和粮食供应的角度调查工厂和工作场的状况；5. 弄清机车总数并算出需要修理机车和车辆数目。

委员会决定向冶金工人工会、铁路职工工会及其他组织提出派遣积极工作人员的要求。

附注 国防委员会红军供应特派全权代表处存在一年来发出的物品，均为在此期间所制造。在该处成立前2年内军队供应机构发出的物品多于它成立后的1年，但这些物品是取自旧存。这些旧存到1919年春即已罄尽。由于旧存告罄，军队便感到发生困难，但军需品生产安排得不佳，也是成立红军供应特派全权代表机构的原因之一。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5—366页。方钢译)

农业人民委员部报表

(1920年制)

机器和工具名称	分 配 数 (件)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犁	32,049	187,144	73,589
耙	10,253	24,573	5,071
播种机	372	2,441	674
大镰刀	104,016	923,275	1,251,780
干草收获机	9,109	10,636	9,816
镰刀	70,360	873,085	849,304
谷物收获机	17,623	18,255	9,962
脱粒机	1,138	2,153	1,881
马拉传动装置	930	1,099	1,293
清理籽粒机	1,675	10,003	3,127
饲料准备机	479	6,953	1,923
分离机	—	27,053	13,472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6页。方钢译)

粮食人民委

(1920)

地 区 年 份	生 产 省			消 费 省			西
	1年的头4个月		全 年 收购量	1年的头4个月		全 年 收购量	1年的头 收购量 (千普特)
	收购量 (千普特)	对 1916/17 年的%		收购量 (千普特)	对 1916/17 年的%		
1916/17	12月1日 36,711	100	206,222	366	100	6,366	7,962
1917/18	12月1日 19,404	52.9	26,624	19	5.3	19	12,557
1918/19	12月1日 47,070	128.2	105,986	352	96.2	1,937	—
1919/20	12月1日 54,664	147.3	165,825	3,212	877.6	14,644	—
1920/21	11月20日 64,965	177.0	—	9,397	2,567.5	—	20,267

员部报告〔节录〕

年)

伯利亚		高加索			合 计		
4个月	全 年 收购量	1年的头4个月		全 年 收购量	1年的头4个月		全 年 收购量
对 1916/17 年的%		收购量 (千普特)	对 1916/17 年的%		收购量 (千普特)	对 1916/17 年的%	
100	39,117	13,605	100	71,324	58,644	100	323,081
157.7	20,896	—	—	—	31,980	54.5	47,539
—	—	—	—	—	47,422	80.8	107,923
—	32,039	—	—	—	57,576	97.9	212,508
254.5	—	23,309	171.3	—	117,938	201.1	—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8页。方钢译)

国防委员会红军供应特派全权代表报表

(1920年7月16日)

	按中央通知单发给			前线全权代表处生产和发出的	共 计
	后方	前线	合计		
军大衣	550,000	1,300,000	1,850,000	1,250,000	3,100,000
短皮大衣	130,000	250,000	380,000	120,000	500,000
棉背心	620,000	410,000	1,030,000	70,000	1,100,000
棉裤	530,000	460,000	490,000	50,000	1,040,000
皮鞋	800,000	1,400,000	2,200,000	1,850,000	4,050,000
毡靴	125,000	680,000	805,000	150,000	955,000
羊毛衫	500,000	1,010,000	1,510,000	800,000	2,310,000
毛裤	400,000	1,060,000	1,460,000	650,000	2,110,000
夏季衬衫	1,300,000	800,000	210,000	500,000	2,600,000
单裤	950,000	750,000	1,700,000	450,000	2,150,000
贴身衬衫	1,700,000	2,650,000	1,350,000	2,000,000	6,450,000
衬裤	1,700,000	3,000,000	1,700,000	2,300,000	7,000,000
卫生衣	1,050,000	1,300,000	2,350,000	—	2,350,000
贴身衬裤	850,000	1,300,000	2,150,000	—	2,150,000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7页。方钢译。)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0年12月28日)

由于煤炭工业和重工业对于恢复共和国的整个经济有重大意义，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使共和国各机关集中注意加紧煤炭和金属的开采，以便保证工业的燃料和金属的供应。

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附近和顿涅茨地区的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对于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来说，应有特别良好的条件。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认为，同时必须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议采取各种措施以增加顿涅茨地区煤和金属的开采量，使1921年煤不少于6亿普特，生铁不少于2,500万普特。

在为了开展上述地区的生产活动而应采取的措施中，第八次代表大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建议紧急解决下列问题：

(1) 考虑到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利益，对上述各地区的辖区赶快重新进行安排；

(2) 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并在工人中间进行有关生产的宣传；

(3) 首先要保证顿涅茨矿区和乌拉尔的劳动力和负责工作人员；

(4) 关心这种工业在业工人的劳动保护；

(5) 既从国内，也从国外向顿涅茨矿区和乌拉尔输送尽量多的技术装备；

(6) 首先使顿涅茨矿区和乌拉尔电气化并在那里修筑铁路专用线；

(7) 在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地区维修已有工人住宅并有计划地建造新的工人住宅和工人新村；

(8) 为了顿巴斯矿区和乌拉尔适应军事行动的需要，使生产方面的运输和粮食运输平衡；

(9)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给顿涅茨矿区和乌拉尔矿区留下够2个月口粮的特别库存，并按照定额不间断地充分地进行供应。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69页。方钢译)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给全俄苏维

(1920年)

生 产 类 别	调 查 企 业 总 数	其 中 工 人 总 数	1919年
			企 业 数
石头、黄土和粘土的开采与加工……	998	187,487	206
金属加工……	1,155	243,547	308
木材加工……	242	9,984	93
化学工业……	261	45,735	163
营养品和调味品的加工……	2,639	161,554	1,067
肉类产品加工……	421	43,322	92
各种纤维加工……	847	454,639	468
纸张和印刷品生产……	146	32,694	125
其他……	66	6,600	—
加工工业合计……	6,775	1,185,552	2,522
采矿工业……	133	91,963	
采矿工业与加工工业合计……	6,908	1,277,515	—

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节录〕

12月)

其中已经国有化的企业						备 考
10月1日		1920年4月1日			1920年 11月1日	
工 人 数		企业数	工 人 数			
总数	按企业 平均		总数	按企业 平均		
44,434	215	437	130,768	299	445	1920年11月1日 缺少有关国有化 企业工人人数的 资料
158,313	514	554	179,925	324	582	
5,623	60	157	7,828	50	157	
42,885	263	195	39,101	201	244	
73,724	69	1,081	153,777	85	1,946	
16,477	179	195	28,645	147	228	
372,521	798	613	106,297	663	629	
35,642	285	146	31,634	217	146	
—	—	43	5,074	118	43	
750,619	298	4,141	983,049	237	4,426	
(资	料	缺)	127	
—	—	—	—	—	4,547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0页。方钢译)

军事工业委员会报表

(1920年)

	炮													兵			
	步枪	机枪	机枪座	左轮手枪	军刀	子弹 单位：千个	雷管	火药 (单位：普特)	瞄准镜	望远镜	剪形镜	掷弹筒	平射炮	炮弹	兵		
															步枪	炮	
1919年																	
1月	39,213	480	500	6,500	1,100	19,720	11,126	3,920	—	—	—	—	17	27,476			
2月	50,183	500	560	5,100	1,380	24,358	12,670	3,483	—	30	4	—	20	26,783			
3月	43,677	420	340	5,060	3,480	22,748	16,786	5,209	7	—	42	—	15	5,222			
4月	16,010	325	378	5,000	1,200	16,610	20,613	5,813	5	30	41	—	19	6,286			
5月	25,800	390	520	8,000	2,100	28,291	22,562	6,990	111	29	13	—	45	11,538			
6月	26,500	500	633	7,500	2,700	28,544	20,662	5,825	91	259	33	28,800	34	21,418			
7月	42,800	720	786	6,400	989	31,610	19,665	7,270	78	87	49	77,200	50	24,545			
8月	35,910	595	667	6,200	2,000	32,497	27,693	4,086	88	90	50	60,300	9	16,698			
9月	46,923	690	947	7,500	2,300	34,311	31,393	2,491	110	93	27	51,800	26	16,816			
10月	51,201	618	941	8,000	1,720	34,558	36,530	7,112	73	29	14	24,700	45	7,145			
11月	34,023	456	633	5,500	1,200	38,665	30,001	5,856	97	90	25	3,200	35	6,959			
12月	47,810	562	712	6,800	2,060	45,348	35,737	5,712	36	—	35	—	51	14,112			
	470,155	6,056	7,617	77,560	22,229	357,260	285,248	63,767	696	737	333	246,000	366	183,998			

每月平均	39,179	504	635	6,463	1,852	29,771	23,770	5,314	58	61	28	20,500	30.5	15,333
1920年														
1月	27,301	400	409	4,500	4,560	27,899	49,652	3,124	50	40	—	—	28	3,662
2月	15,815	50	145	850	7,212	17,072	67,686	720	50	40	7	7,000	26	1,637
3月	34,004	503	612	4,157	5,100	31,270	68,876	5,104	38	—	15	—	20	2,834
4月	17,649	121	134	1,685	1,470	21,481	50,454	4,641	25	53	2	35,950	39	586
5月	26,300	500	483	4,000	3,570	28,934	55,448	4,737	50	67	—	21,200	94	289
6月	33,994	300	455	4,000	4,510	33,094	72,918	3,414	50	—	5	(资料缺)	—	553

1919年	空军		海		军		辅				重		汽车业 适于大 修理的 汽车总 产量	
	飞机 产量	飞机 修理	炮	炮 弹	火 药 筒	船 舶 修 理	1890年 型路用 双轮马 车	运送药 品用双 轮马车	行军炊 车和炮 兵用车	救护用 双轮马 车	雪 橇	电报通 讯用双 轮马车		骑兵用 炊车
1月	15	4	—	816	524		—	—	—	—	—	—	—	炮兵供
2月	2	—	—	536	501	共修理	—	—	—	—	—	—	—	应站所
3月	13	2	—	747	853	巡洋舰	—	—	—	—	—	—	—	属各企
4月	27	2	1	373	2,958	7艘，	—	—	—	—	—	—	—	业合计
5月	34	10	5	3,596	6,954	潜水艇	—	—	—	—	—	—	—	每月平
6月	44	8	11	2,484	11,165	17艘， 驱逐舰	26	—	—	—	—	—	—	均为163

(续前表)

	空军			海军			陆军						重工业				
	飞机产量	飞机修理	全副后体	炮	炮弹	火药筒	船舶修理	1980年型双轮车	运送药品双轮车	自行车和炮兵用车	军炊和炮用炊车	救护用双轮车	雪橇	电报用双轮车	骑兵用车	适于大修的汽车产量	
																	飞机修理
7月	26	1	10	4	1,725	8,845	11艘	—	—	—	—	—	—	—	—	—	
8月	7	3	21	4	877	2,760		—	—	—	—	—	—	—	—	—	
9月	24	2	26	9	983	31,600		100	—	68	—	—	—	—	—	—	
10月	34	6	13	4	771	2,800		—	127	—	30	—	—	—	—	—	
11月	16	5	5	3	509	2,470		126	50	95	19	292	75	—	—	—	
12月	16	7	15	3	158	1,500		—	20	101	4	1,651	—	—	—	—	
	258	50	174	44	13,575	44,400		226	223	263	54	2,613	75	—	—	—	
每月平均	21	4.2	15	4	1,132	3,708		18.9	18.8	22	4.4	170.2	6.2	—	—	—	
1920年																	
1月	13	2	1	4	—	—		—	—	—	—	—	—	—	—	—	
2月	19	2	1	6	1,000	—	71	—	159	25	—	45	—	96	100	155	
3月	23	2	2	12	1,220	600		—	45	—	—	—	—	—	—	127	
4月	12	1	—	16	1,200	1,000		17	10	—	—	—	85	46	127	160	
5月	14	—	2	4	1,222	1,000		—	—	—	—	—	—	—	—	—	
6月																	

(资料缺)

(资料缺)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 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 第371—372页。方钢译)

沃洛格达省格里雅泽维茨县潘非洛弗 乡农民致弗·伊·列宁的一封信

(1921年3月8日)

向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天才列宁同志致敬。

在这封信中我们向您叙述以下一些情况。现在几乎把我们乡的农民的一切东西——粮食、牲畜、种籽、原料都拿走了。给每一个农民留下的粮食每个月只有18到30俄磅。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什么也不考虑。不论庄稼长熟了还是没有长熟，都得拿出来。在北方，我们最好的收成通常是种籽的6倍，而1920年由于干旱，有些地方的收成仅为种籽的4倍半。但是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是按种籽的6倍要粮食的。春播谷物根本没有种上，还向我们要了相当于种籽3倍的粮食。

到春天播种时，我们几乎就没有种籽了。去什么地方买种籽吧，对我们来说又很困难，因为价钱已经很贵。

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和整个播种运动，都要求给予农民以种籽上的帮助，把牲畜、农具加以很好安排。而且这些都要做得及时。最好在可能的地方现在就改行多圃轮作制。但是，如果不用向农民收税（不是货币税，而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那么整个播种运动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应当按照土地肥沃程度计税，在我们北部边区大约从播种的每俄亩土地上收税10到15普特为宜。

当农民知道自己应纳的税额和交纳的时间时，我们就勿需在一个乡里保留数以十计的宣传员了。我们想，全体劳动农民都会同意采取这种税收制度和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有了集体

经济和公社，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向我们表明它们有良好的榜样时，我们才会跟随它们，而现在它们甚至连自己都还不能养活呢！

还要请您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木柴收购不足。如果收购，最好告诉农民收购定额和规定期限。当农民觉得这比别的都合适时，他会收购和运出的。

声明关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时，请不要认为我们是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相反，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富有成效，以巩固农民和工人取得的自由。

农民：亚力山大·索洛维约夫、巴维尔·苏沃罗夫、尼古拉·伊萨柯夫、米哈依洛·维克托罗夫、扎哈尔·茹果夫、库季马·茹果夫、阿列克赛·菲鲁列夫、雅科夫·索科洛夫、雅科夫·沙科夫、安德烈·库兹涅佐夫、瓦西里·苏沃罗夫、伊万·叶尔绍夫、阿列克赛·叶尔绍夫、巴维尔·索科洛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47—448页。方钢译）

(三) 新经济政策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1—1922年 粮食实物税数额》的法令〔节录〕

(1921年3月28日)

鉴于农民经济状况困难，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和使土地占有者从经济上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人民委员会决定：

不再象1920—21年通过国家收集制从共和国领土上（乌克兰和土耳其斯坦未计在内）收集4.23亿普特谷物产品，规定要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用税收代替收集制的决议（见《法令汇编》，1921年，第26号，第147项），即规定1921—22年在中等收成时征收粮食实物税的数额不超过2.4亿普特谷物产品。

人民委员会决定在最近期间将各省税收与收获量的确切比率，以及征收该税的程序、期限和方式公布周知。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53—454页。方钢
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合作社》 的法令〔节录〕

(1921年4月7日)

1919年3月20日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工农单一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19年，第17号，第191项），使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一切分配事宜均已转归合作社办理；而由于建立几乎对全部农产品的国家收集制，使消费合作社在收购方面的权利受到限制。现在，由于公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3月21日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和原料收集制及关于居民纳税后可将剩余产品自由交换的决议（见《法令汇编》，1921年，第26号，第147项），上述限制便完全失效，合作社便得到收购各种农产品的权利。

由于以上所述，在废除1919年3月20日法令后，人民委员会特决议如下：

第一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公民均须加入消费合作社。各地区的公民均须加入单一消费合作社。每一个公民的名字均要编入消费合作社的一个配给站的名单。

消费合作社可以为附近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居民点服务（指有许多零售店的合作社而言）。

第三条 在一个消费合作社范围内，允许公民们按较小的地区单位或从事同一种工艺或职业者集团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联合组织必须在它们进行活动的那个地区的单一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进行登记。

加入和退出这种联合组织均为自愿。每一个公民不得同时成为一个以上的合作联合组织的成员。

第四条 上述一切联合组织，均有权通过它们所在地区的单一消费合作社，用它们成员的补充交纳（货币的和实物的）获得各种产品和物品。

这样获得的产品和物品，在本联合组织成员中间进行分配。

第五条 消费合作社有权交换和购买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并可出售它们。同时合作社有权向农村或城市的独立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合作社进行购买，同每一个生产者、生产者集团或各种合作社订立不与国家立法相矛盾的合同，诸如：采购、供应、制造、保管、净化、装配上述产品的合同，订立供应工具和材料的合同，并须按照这些合同承担义务。

第六条 消费合作社有权组织产品的采集和加工的企业，以及设立菜园、牛奶场和其他同类企业，有权执行自愿消费联合组织、机构和个人提出的供应、采购和分配方面的委托。

第七条 国家使消费合作社担负下列义务：

（甲）执行粮食机关在收购、在以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交换农产品方面的强制性任务；

（乙）在国内分配国家收购的，从国有化工厂、租让制企业获得的和由国外进口的一切食品和日用消费品。

第八条 国家向居民提供的任何食品和日用消费品，都只能通过消费合作社在居民中间进行分配。

附注：上述规则的例外，须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用专门决议加以规定。

第九条 消费合作社及其联社有权向其社员收取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的人社费。

附注：在规定交纳人社费的消费合作社，要定出特殊条例以保证最穷苦居民能够入社。

第十条 领导单一消费合作社的是至少由 3 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以及监督检查机关。它们均由社员大会选出。全体公民（按

照苏俄宪法被剥夺选举权者除外)均享有选举和被选入消费合作社一切管理和监督机关的权利。

第十一条 单一消费合作社联合成省联社。根据专门条例,联社管理委员会由联社代表大会选出。

第十二条 单一消费合作社及其联社的选举和改选的时间,均由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协商规定。在其他方面,单一消费合作社的活动程序由示范章程规定。

第十三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权派出自己的代表,该代表和选出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具有同等权利参加单一消费合作社及其联社的管理委员会。

第十四条 在单一消费合作社及其联社执行国家给予的强制性任务方面,粮食人民委员部实行指导,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合作社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自本条例公布之时起,便作为按1919年3月20日法令迄今发生作用的单一消费合作社之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 本法令的执行和有关指示的公布均由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负责。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59—461页。方钢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交换》的法令

(1921年5月24日)

1. 交纳实物税之后,农民剩下的农产品,准许自由交换、购

买和出售。

交换、购买和出售之权，也扩大适用于手工业和小工业的产品和物品。

附注：交换、购买和出售之权不适用于中央政权有专门决议规定的材料和产品。

2. 准许公民个人、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进行交换、购买和出售，并且既可在市场和集市，也可在其他地方，经由货摊和小贩以及在商店进行。

3.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机关（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中心、工厂管理委员会等等）准备出来或归它们支配的产品，为了商品交换而列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待交换商品，但此商品只能按第4条规定的办法进行买卖。

4.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待交换商品受粮食人民委员部管理，并由它安排主要通过合作组织，在个别情况下也通过按代销原则经营的私人进行交换，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与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签订的合同，每次均须通知后者。

5. 在市场、集市和其他地方经由货摊和小贩以及在商店进行的贸易，须受在粮食人民委员部颁发的一般条例范围内的、执行委员会颁发的决议和规章调节。此处所说的一般条例须经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意并由人民委员会批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66—467页。方钢
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关于手工业和小工业》的法令

(1921年7月7日)

为了提高手工业和小工业的生产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修改其1921年5月17日决议（见《法令汇编》，1921年，第47号，第230项），特决定：

1. 每一个公民均可自由从事手工业，以及开设小工业企业。

附注：年满18岁的公民方可开设小工业企业，并且每一个公民只能是一个企业的主人。

2. 凡雇佣工人不超过10人或20人（包括在自己家中工作者）的企业，均为小工业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的小工业企业的最高限额，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协商规定。

3. 使用雇佣劳动的小工业企业，须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注册，后者则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前者列入注册簿。

4. 手工业者和小工业企业主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生产的产品，并且在现行法令规定的范围内可自由购买原料、材料、工具和设备。

5. 小工业企业既不实行国有化，也不实行市有化。归手工业者和小工业企业支配的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及为了自己进行生产而购买的原料、材料、工具及其他设备，只有根据法院的决定或人民委员会有关的特殊决议方能予以征用（偿付价值的没收）或没收（无偿的没收）。

6. 关于劳动保护、雇佣和解雇、工资等级标准、学徒学习的

一切决议，一切手工业者和本法令所规定的小工业企业均须遵行。

7.对本法令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对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协助，均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负责。

8.随着本法令的颁布，以下各个法令和决议即行废除：人民委员会1919年9月24日关于重新登记生产劳动组合、手工业合作社、协作社、联合社和各种手工业联合组织与加入它们的权利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19年，第48号，第467项）；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9月24日法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重新登记、检查和清理合作组织的程序的决议（见《法令汇编》，1919年，第54号，第522项）；人民委员会1920年1月27日关于各种合作组织，一部分涉及手工业合作组织联合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20年，第6号，第37项）；人民委员会1920年4月19日关于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20年，第30号，第147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1920年5月20日关于手工业、小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事务管理总局的决议（见《法令汇编》，1920年，第50号，第218项）第5节第11和14段及第7节；人民委员会1920年9月7日关于调整手工业和非国有化工业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20年，第78号，第366项和第84号，第416项）。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4月26日关于协助手工业措施的法令（见《法令汇编》，1919年，第14号，第140项）予以废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阿·叶努基泽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67—469页。方翎
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的法令

(1920年11月23日)

既为了在俄国恢复整个世界经济主要原料基地之一，又为了发展俄国受世界大战破坏的全部生产力，一年多前，人民委员会把吸引工业发达国家的技术力量和物质资料作为实践问题提上了日程。

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在3年时间里必须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它在这3年内用自己的力量和资金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仍然收到了显著的成果。但是，通过吸引外国的国家机构、公营机构、私人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来开发和加工俄国的自然资源，可以使恢复俄国生产力和整个世界经济的过程加快许多倍。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原料奇缺和闲散资本的过剩，曾真正促使外国资本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在某种条件下将外国资本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广大地域的自然资源上。

现在，苏维埃政府拥有整整一系列有关予以租让开发俄国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具体建议（例如，享有用拖拉机耕种闲置可耕地的建议）和租让设立个别工业企业的建议。

为了广泛运用来恢复和加强共和国生产力和整个世界经济的这种方法，人民委员会决定公布以下租让的一般法规和法律条件，并列举那些可以与殷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外国工业公司和组织订立合同的租让对象。

1.承租者可享有合同中规定的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并有权

将其输出国外。

2. 在大规模地采用特殊的技术成就时，承租者可享有贸易上的优惠（例如，机器的采购，大宗订货的专门合同，等等）。

3. 根据租让的性质和条件，可以长时间的租让以保证充分补偿承租者可能的损失和投入租让企业的技术设备。

4.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保证，承租者投入企业的财产不会被实行国有化、没收和征用。

5. 承租者有权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为自己的企业雇佣工人和职员的权利，但要遵守劳动法典或保证遵守能够维持其生活和健康的一定劳动条件的专门合同。

6.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承租者保证不以政府的某些指示或法令来单方面改变租让合同规定的条件。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54—456页。方钢
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所属企业出租条例》的法令

（1921年7月5日）

1. 合作社、协作社及其他联合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为了使国营工业企业开工生产有权租用它们。

附注1：承租条件相同时，合作联社享有优先权。

附注2：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能依照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各省经济会议的专门决议参加承租工业企业。

2. 无中央任务但因地方需要而工作的企业（3类企业）的出租^①，以及其出租合同的签订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进行；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钢铁企业的出租合同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省级机关发挥作用的地区，由省一级的工业局批准。

附注：从合同草案送到之日起1个月内得不到回答时，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有权签订所提出的合同；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拒绝批准合同时，可以根据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倡议把问题转给劳动国防委员会。

3. 有关工业部门管理总局签订的1类企业的出租合同，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4. 所有业已规定的和今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工会全俄中央委员会将要规定的章程；在非国有化企业中采用的关于工人的雇佣和解雇、关于劳动保护和其他劳动条件的章程，国营企业的承租人必须遵守。

5. 承租人对于交给他们使用的财产的完整无损在民事上和刑事上都要负法律责任。

6. 在合同规定的期限之内，要废除合同则必须经过法院；无论国家机关，也无论承租人，都不得单方面终止按合同规定的相互关系。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执时，须由人民法院解决。

7. 承租人有权接受私人定货、生产商品到自由市场销售，以

① 出租给私人的企业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形式之一。到1922年年底已出租约4,000个工业企业，其工人总数为70,000。出租的企业通常是为本地区居民的需要而工作的、属于3类企业的小型企。——原编者注

及同私人或国家机关订立承包和供货合同。

8. 在为出租企业及其工人和职员供应方面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只有在国家机关定货或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个别特许场合，才许有例外情况；承租人可以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所允许的权利，并须遵守有关在国外获得工业供应装备品、粮食和工人供应等等的现行法令。

9. 为了贯彻上述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可在现行法令许可的范围内，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公布工作细则和向地方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从国家利益观点出发希望出租某种企业的程度、关于按工业部门和企业种类区分的出租合同期限、关于因使用企业而向承租人收取的等价物的性质和数量、关于对承租人执行合同情况的监督等等的一般指示。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56—458页。方钢
译）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节录〕

（1921年12月28日）

1.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政权完全适时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且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为正在显露的经济周转的活跃完全证实，因此代表大会完全赞同工农政府采取的旨在

迅速实现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各项措施。

2. 在进一步实行这一政策时，必须非常细心地考虑经济情况，应当认为目前经济情况的特点是：（1）作为放弃余粮收集制的结果，国内市场的形成；（2）货币交换的发展。这二者都是我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直接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如果在国民经济方面采用它在前一时期采用过和内战时期的特殊条件使它不得不采用的那些方法，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工农政权通过有条不紊的深思熟虑的和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精确计算上的经济措施，应当把对市场和货币流通的调节掌握在自己手中。

3. 为了整顿市场，应当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来恢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流通^①。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通过有条不紊地实行税收政策和对国家提供的经济劳务实行收费来坚持实行迅速缩小纸币发行量的计划。苏维埃政权应当依靠集中在工农国家手里的生产资料这种经济力量，通过国家参与使商品交换便于发展的机构（信贷机构、交易所、贸易公司、进出口公司、各种合作组织等等）发生对它们所代表的劳动群众有利的影响。

4. 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一切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支出应缩减到最低限度，使支出同共和国的财源相适应，应严格符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国家预算，同时也应使有关国家机关在支配按预算发给它们的现款和物资方面有较大的自由。由于缩减国家支出而在满足某种需要方面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应当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因为如不坚决缩减国家预算，就不可能使苏维

^① 在1922—1924年，苏维埃国家曾经进行货币改革：因经济破坏而贬值的苏维埃纸币禁止流通，代之以新的苏维埃卢布。这种新卢布的价值是由苏维埃共和国的黄金储备和流通中的现有商品来保证的。货币改革巩固了苏维埃卢布并促进了整个经济生活的改善。——原编者注

埃俄国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5.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提高农业是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在毫不动摇地保持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应当保证农民经济合理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办法是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固定下来，并给农民以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①。用目前国家资财状况所允许的一切可能措施支援力量单薄的农户。

为了同样目的，苏维埃政权首先应研究征收粮食税的初步经验，研究使农民在完成国家义务时手续简化、统一和方便的可能以及更加合理地分配这种义务的可能等等^②。

巩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要求进一步活跃、简化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交换。

6. 为了增加国内产品总额和活跃商品交换，苏维埃政权应当：（1）广泛支持各种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它们具有生产、收购和全面发展地方工业及提高一般经济生活的广泛可能；（2）保证小型和中型（私人的和合作社的）企业有正确发展生产和自由支配其产品的条件。

7.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恢复和全面加强仍然归国家和国家机关直接管理的大工业^③，是共和国除恢复农业以外的

① 1922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了土地法典。这个法典为土地使用奠定了巩固的秩序并使农民享有自由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权利。——原编者注

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3月4日法令规定，从1922年8月起实行统一实物税。1923年5月实行了统一农业税，而代替了一系列的税收（统一人口税、马车税、按户征收的货币税）。1924年统一农业税实行按货币计算。每个农民所纳统一农业税按阶级原则而有所不同。——原编者注

③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所有工业企业分为3类：第1类是对国民经济和国防来说最重要的企业，它们由国家管理；第2类是出租给合作社或私人的小企业；其余的一切企业属于第3类。——原编者注

一项基本任务。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国营大工业，要求把全国资源的大部分集中在它那里并实行计划分配，以保证国营工业企业的生产工作不会间断。为了这项任务，必须进一步坚决地精简苏维埃机关，对国家用现有物资难以维持的那些企业，必须取消国家对它们的供应。

8. 经济核算和根据精确考虑生产资源以及每个国营企业和所有国营企业的预算而制定的全国工业计划，应当是整个国营工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应保证国营企业及其联合组织在支配国家给它们的资源方面有广泛的自主性，应供应企业以原料、燃料和辅助材料等等，同时企业有权出售一部分产品以补充国家未能提供的资源。

代表大会认为，把许多同一类型或彼此互相依存的国营工业企业，按省、区域或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管理，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是适宜的。这些联合组织应享有充分的管理和经营的权利，以保证在严格经济核算基础上对企业的合理经营。代表大会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根本抛弃“管理总局”的经营方法的，必须坚决反对恢复这种工业管理方法的一切企图^①。

9.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要求工资政策要以工人直接关心生产和保证其基本需要为基础。

一切供应机关对工人的供应，必须根据工会规定的标准通过工厂管理处办理。

工人保险、社会保证、医疗补助等等问题，都应联系新经济

^①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消灭了工业管理过度集中的现象——“管理总局制度”。把同类企业联合成了托拉斯，这些托拉斯从属于地方经济机关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国内战争时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52个管理总局和中心，而按工业部门成立了16个管理总局和421个托拉斯。在工业管理方面广泛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原编者注。

政策所造成的条件专门重新审查。

10.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在工会的积极参加下才能实现。联合组织的建立，它们的生产任务的确定，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出租企业和租约的条件确定，劳动组织问题和工业企业的管理问题都应当和工会一起讨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把工人-组织工作者提拔到国营企业的负责领导者的岗位上，也应当是工会的基本任务之一。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工会在私营企业和出租企业中坚决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必要性。

11. 为了对于恢复苏维埃俄国的国民经济有利，要求给外国资本以租让形式或贷款形式投入各种经济部门的便利。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苏维埃政府在同国外恢复贸易、工业和信用关系方面已经采取的步骤。同时代表大会认为，为了进一步发展同国外的贸易关系，要求工业与国外市场发生更直接的联系。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认为，为了保护人民财产，为了使那些准许输出的产品能够在国外市场上最有利地销售，要求国家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同时认为还应允许全国和全区域的各种合作组织、国营工业联合组织、区域的和省的经济委员会及其他大型经济机构直接经营进出口任务（根据它们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关于许可或限制某些商品出口或进口的特殊协议，并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监督下经营）。为了同样目的，应当允许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参加下组织合营公司，以便在国内收购出口商品向国外销售，并且输入苏维埃俄国所需要的产品，但必须规定进出口关税。

12. 由于劳动人民的胜利保证苏维埃俄国获得了和平（尽管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和平），并允许我们从国内外战线上的军事紧张状态转向和平经济建设，因此，在生活各个方面实行严格的革命法制原则就成为当前的任务。对于破坏苏维埃政权所颁布的法

律及其所维护的秩序的机关、政权代表和公民，要严厉追究责任，而对于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则应加强保护。

在革命过程中在国家政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的新形式，应当在法律中表现出来并依法得到保护。为解决财产关系方面的各种纠纷，应当规定一些固定的民事准则。应当使那些同国家机关有合同关系的公民和团体相信自己的权利是会受到保护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应当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职权和活动范围应适当缩小，该机构本身也应适当改组。

13. 早在1918年春第一个“喘息”时期就已经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的所谓“新经济政策”，是以严格查清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力量为根据的。由于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向工农国家的联合进攻而中断实行的这一政策，在1921年初在军事上消灭了反革命企图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现在共产主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斗争转移到了经济阵地，即转移到了市场上来，在这里，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国有化工业应当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上的竞争方法，以争得决定性的统治权。无产阶级越是善于系统地有计划地支配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大量生产资料——这是十月革命的成果——，依靠城乡交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越巩固，城乡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越快学会在新阵地上用新方法进行斗争并利用新环境和成为新工作部门的领导者，胜利就会越大。

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地切实地把在恢复苏维埃俄国经济生活方面的上述指示贯彻到底。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89—493页。方钢
译)

(四) 苏维埃文化教育

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 招生规则》的法令

(1918年8月2日)

1. 凡年满16岁者，不论其国籍和性别，均可到任何高等学校听课，而无需交验中等学校或其他学校的毕业文凭、证书或证明文件。

2. 除有关身份和年龄的证明以外，禁止向入学者索取任何其他证明。

3. 根据《关于实行男女合校》的决议，共和国的一切高等学校为一切人，不分男女，进入高等学校打开了大门。任何负责人违反上述决议者须受革命法庭制裁。

4. 关于1918/19学年新生须有文凭或经过考试方能入学的规定，宣布无效。适合目前审查中的关于高等学校一般条例之要求的新的招生条件，将在今年9月1日以前公布。

5. 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高等学校学生的学费。1918/19学年第一学期的学费将予发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教育副人民委员 米·波克罗夫斯基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9页。方钢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俄罗斯 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统一 劳动学校(条例)》的法令〔节录〕

(1918年10月16日)

一、关于统一劳动学校的一般条例。

1. 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之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学校，除高等学校外，名字一律叫作“统一劳动学校”。

附注1:个别学校可以简称为“苏维埃的”加上地名、学校号数和等级，例如：“彼得格勒市纳尔佛区第3苏维埃初等学校”。

附注2:废除学校之划分为初小、高小、文科中学、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商业学校及其他各种初等和中等学校。

附注3:从1918年10月1日起各主管机关所属之一切学校均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见《1918年工农政府法令汇编》，第39号，第507项)。

2. 统一劳动学校分为两级：为8至13岁儿童设立的为第1级(五年制)；为13至17岁儿童设立的为第2级(四年制)。

附注1:为6至8岁儿童设立的幼儿园附属于统一劳动学校。

附注2:学校自治机关由省人民教育厅批准后可将年龄标准提前1年。

附注3:学生在校时间超过规定标准，以及接收超过规定年龄的儿童入学，均须由学校委员会决议批准。

3. 第1级和第2级学校的教育均为免费进行。

4. 一切学龄儿童均须到第1、2两级学校听课。

附注：为了实际贯彻这些措施，人民教育厅应当立刻着手编制学校网计划，着手查清所有6至17岁的学龄儿童数，编制学校建设和设备预算、全体人员薪金预算以及有关入学儿童衣食和学费的预算。在有足够数量学校可为所有儿童服务，和在目前就有普及教育条件的一切地方，都应立刻进行教育。对于不识字儿童，但按其年龄说又不能被一般学校招收的，应当组织到统一劳动学校所设之特别班或校外特别班里进行学习。

5. 第1级和第2级的学校均为男女合校（见《法令汇编》，1918年，第38号，第499项）。

6. 在学校里不许讲授任何教义，也不许举行宗教仪式（见《法令汇编》，1918年，第18号，第263项）。

7. 取消对教员等级的划分。一切学校工作人员（见第8条）均按人民委员会《关于教育劳动报酬定额法令》（见《法令汇编》，1918年，第47号，第552项）上的1类工资表获得报酬。

附注1：教师劳动报酬不按课时计算，而按月计算。

附注2：学校工作人员中负责人员的特殊报酬不得超出所规定的定额。

8. 一切学校工作人员，即是说，教员、校医、体力劳动指导员，均须按照1918年2月27日关于选择一切教育人员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决议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进行挑选。

附注1：人民教育厅准许学校工作人员的代庖在学校工作，并且在执行任务期间可享有学校工作人员的全部权利。

附注2：当学校集体力量不能满足学校的经济需要时（见第26条），允许按雇用办法聘请技术服务人员，但这些人员不得参加教学工作，也不得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

附注3：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参加另一个学校的工作，须经

相关地方的人民教育厅批准。

9.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人民教育厅之下设指导员。指导员负责定期到各个学校去以保持它们同相关人民教育厅的密切联系，并且为了在教育工作方面给予教员帮助。

10.每一名学校工作人员负担的学生不应超过25人；因此，每一个学校中的学校工作人员总数应当根据这个定额来确定。

附注：根据人民教育厅之决定可以离开上述定额。

11.本条例（第1至32条）也适用于一切私立学校。在地方人民教育厅认为某个学校成绩特别突出时，则该校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79—382页。方钢
译）

《无产阶级文化》杂志关于各地 俱乐部的报道〔节录〕

（1919年2月）。

工人俱乐部正在所有的城市、大村庄和工人新村中出现。

10月里，许多以列宁命名的共产主义工人俱乐部开幕了。它们是梁赞的俱乐部、巴拉绍夫的俱乐部、别廖夫的俱乐部、雅穆布尔格的3个俱乐部，等等。土拉省的叶弗烈莫夫的“无产者”俱乐部开幕了。

在特维尔的“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工厂图书馆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指出俱乐部图书馆为数不多，邮寄报纸不准时。由于缺少指导员，工人只好自己独立研究图书馆的卡片制。土拉的

工人俱乐部曾组织到莫斯科参观。在特维尔，莫罗佐夫区的共产党人俱乐部开幕了；在萨拉托夫，纪念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俱乐部设立了儿童俱乐部和青年俱乐部。在彼尔姆，无产阶级儿童俱乐部开幕了，在斯摩稜斯克成立了以鲍罗霍夫（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镰刀”的著名活动家）命名的犹太工人俱乐部。在下诺夫哥罗德特别注意俱乐部图书馆的设立。在托尔若克和维谢冈斯克，创立了俱乐部附设的剧院，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库瓦也夫工厂成立了以十月革命命名的工人俱乐部。上沃洛茨基区工厂委员会开会拨出了25,000卢布来实现文化任务。在工人俱乐部里还请人进行讲课，并且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学课和文学课表现出浓厚兴趣……

大多数俱乐部是由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开办的。有一些工人俱乐部，例如在古斯赫鲁斯塔内依的工人俱乐部，拥有藏书达几千卷的征用图书馆，馆中不足的只是当代的政治书和参考书。但是一般地说，俱乐部创建人都声明不能从省里得到书籍，并且首都报纸到达的时间极不准确。

12月份，省里出现不少新的工人俱乐部。在雷宾斯克，开办了一个名叫“纤夫公社”的水运工作者工人俱乐部。过冬时，把纤夫们送到港湾，号召他们到自己的俱乐部去。俱乐部有阅览室、小卖部，并组织有合唱团。在巴拉绍夫，继共产党员俱乐部之后，成立了“列宁”工人俱乐部。俱乐部还为工人的孩子们设立了幼儿园。新托尔若克县的农业工场工人决定成立工人俱乐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叶弗列莫夫的“觉醒”工人俱乐部在12月15日举行了开幕式。在斯摩稜斯克省维亚齐姆创办了“集体”工人俱乐部，还设立了茶室和阅览室。在加利奇创办了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12月13日讲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的课程。据加利奇《消息报》报道，该课受到热烈欢迎，并以热烈交换意见而结束。在喀山，在阿拉弗佐夫工厂委员会属下成立了一

个工人俱乐部，开始正确地讲授社会经济学。在土拉的“无产者”俱乐部，俱乐部剧团为工人演了剧。12月11日成立的、塞兹兰车站的以马克林命名的工人俱乐部，曾向英国共产党人的领袖马克林致敬。在别热茨克的工人俱乐部举行一些通俗讲演。12月14日作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讲演。在喀山省切尔登斯克无产者俱乐部，为无产阶级举办了一系列免费的文化娱乐晚会。在雷宾斯克工人俱乐部举办了革命歌曲晚会。12月19日举行了叶列茨无产阶级中央俱乐部成员第一次大会。科弗罗夫的工人俱乐部为工人举办了一系列晚会。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01—403页。方钢
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

(1919年12月26日)

为使共和国全体人民能够自觉地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人民委员会决定：

1. 凡共和国 8 至50岁不会读书不会写字的人民，必须学习认字，用本族语文或俄罗斯语文，可任选一种。在现有国立学校或按教育人民委员部计划为不识字人民设立的国立学校中进行学习。

附注：这一点也适用于红军。同时有关工作在部队中须在红军和红海军政治部的直接参加下进行。

2. 扫除文盲的期限，由所归属的省市代表苏维埃规定。各地

扫除文盲的总计划，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在本法令颁布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编制出来。

3.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关，有权按劳动义务将没有参军任务的一切识字的人吸收来扫除文盲，其劳动报酬按教育工作者定额计算支付。

4.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关，可把劳动居民的一切团体，如工会、俄罗斯共产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工作委员会等等吸收进来直接参加扫盲工作。

5.除了军事化企业的在业工作人员以外，正在学习认字的受雇工作人员，工作日可以缩短2小时，而整个学习期间的工资照付。

6.为了扫除文盲，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可以使用人民宫、教堂、俱乐部、私人房屋、工厂和苏维埃机关的适当场所等等。

7.供应机关有责任优先满足扫盲机构的需要。

8.凡逃避本法令所规定之义务和阻碍文盲到学校参观者，须负刑事上的责任。

9.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之内印发关于采用本法令的指示。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秘书 索·勃里奇金娜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384—385页。方钢
译）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
国中央统计局关于各省图书馆、
俱乐部数量的报表

(1920年)

省 名	图书馆	农村图书 阅览室	共计	俱乐部	人口表
1	2	3	4	5	6
阿尔汉格尔	279	171	450	21	446,932
阿斯特拉罕	70	66	136	14	416,021
别利安斯克	164	265	429	74	982,647
维切布斯克	274	508	782	50	1,224,784
弗拉基米尔	585	17	602	35	1,403,632
沃洛格达	317	3	320	4	911,548
沃伦	136	218	354	11	1,123,000
沃洛涅日	336	1,001	1,337	71	3,062,791
维亚特	1,079	3,224	4,303	188	3,180,244
戈麦尔	351	1,837	2,188	127	2,172,544
顿斯科依	199	276	475	169	2,078,856
叶卡杰林堡	1,113	266	1,379	153	1,966,445
叶卡杰林诺斯拉夫	89	13	102	24	1,541,200
叶尼塞	162	582	744	19	1,168,788
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282	513	795	56	632,688
伊尔库茨克	208	642	850	99	792,968
喀山	865	690	1,597	57	2,611,714
卡卢什	286	832	1,118	15	965,350
基辅	466	322	788	162	3,327,991
科斯特罗马	539	700	1,239	97	1,102,892
库班-黑海	363	406	769	110	2,994,977
库尔斯克	461	964	1,425	65	2,711,369
莫斯科市	64	—	64	166	1,028,218

(续上页表)

1	2	3	4	5	6
莫斯科	670	89	759	137	1,592,258
尼日哥罗德	930	393	1,323	94	1,916,705
尼古拉耶夫	101		101	117	1,689,382
诺夫哥罗德	347	189	536	53	901,216
奥洛涅茨	117	413	530	21	314,182
奥伦堡	331	430	764	139	829,249
奥尔洛夫	259	579	838	29	1,514,150
奔萨	874	96	970	113	1,746,586
彼尔姆	538	1,224	1,762	42	1,548,746
彼得格勒	562	72	634	186	1,593,345
梁赞	479	613	1,092	45	2,134,214
撒马尔罕	599		599	121	3,029,987
萨拉托夫	814	824	1,668	256	3,058,505
北德维纳	336	496	832	79	790,359
谢米巴拉丁斯克	48	156	204	27	1,125,040
辛比尔斯克	418	182	600	197	1,903,777
斯摩棱斯克	858	1,182	2,040	144	1,994,495
斯塔夫罗波尔	145	40	185	10	1,191,127
特维尔	721	1,003	1,724	112	2,050,794
托姆斯克	216	634	850	12	2,029,310
秋明	145	542	687	18	1,177,371
乌拉尔	75	129	204	14	676,831
乌法	775	912	1,687	117	2,668,327
车里雅宾斯克	204	382	586	48	1,316,980
契列波维茨	468	459	927	19	637,237
察里津	125	140	265	无报道	532,027
雅罗斯拉夫	526	563	1,089	76	1,223,313
阿尔泰	359	339	698	59	2,520,295

(续上页表)

1	2	3	4	5	6
施列克	130	38	168	45	无报道
明斯克	228	—	228	66	无报道
按有人口统计 资料省份合计	20,061	25,597	46,400	4,372	81,573,440
按52省合计	20,419	25,635	46,796	4,483	—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403—404页。方钢
译)

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科学家 的生活》的法令

(1921年12月6日)

为了最好地利用我国科学力量以恢复国民经济，并且为了保证使科学工作者能够安静而有计划地工作，人民委员会在12月6日听取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提出的措施方案之后，特决定如下：

1. 为增补科学工作者现有的各种报酬，兹规定特别补充科学保证。
2. 规定享受补充科学保证的科学工作者人数为7,000。
3. 由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规定科学保证数额，并规定熟练程度不同的各类科学工作者进行分配的根据。
4. 根据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制定的专门条例，规定科

学工作、科教工作和科普工作的奖励。

5. 补充科学保证自1922年1月1日起实行。

6. 责成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根据提出的计算数字保留必要数量的纸币和供应物品。

7. 预先由各人民委员部编制享受科学保证的科学工作者名单，由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批准。

8. 责成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按时制定出经过与应属各主管部协商的关于科学工作者迁出、迁移和归併住宅办法的指示，并须于两周内呈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9. 责成中央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与有关主管部协商定出科学工作者从国外得到出版物的办法。

人民委员会代主席 亚·瞿鲁巴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秘书 莉·福齐也娃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77页。方钢译)

第四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 常会关于文化革命初步总结的决议

(1927年10月20日)

自从进行伟大十月革命至今已经过去10年了。这次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农民从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创造了条件。这次革命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教育获得长足的进展。

几乎人人都是文盲，尤其是在农村，这是沙皇、地主和资本家

的旧国家留给我们的遗产。过去，国民教育事业从上到下都为有产阶级所垄断。沙皇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无情的俄罗斯化被认为是沙皇统治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个帝国的备受列强压迫的人民，被剥夺了任何文化发展的机会。对各少数民族来说，甚至禁止发展用本族语言学习的小学。沙皇制度使那些最愚昧无知的文化落后的民族，处境尤其艰难，使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十月革命使这一切统统结束了，它使文化建设开始服从劳动群众的利益。

在我国已经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证明，它正在起着人类进步真正代表的作用。无产阶级开辟着通往文化知识一切成就的道路，同时也最认真地关心着苏联全体劳动人民和各个民族的发展和教育。

在十月的标志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将要进行到底，因为它依靠着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只是由于十月革命，我国才得以摆脱文化方面过去的一系列野蛮的残余，并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

例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象苏联这样，对于男女权利平等宣布得如此充分，实行得如此坚决和彻底。

在保护母亲和儿童方面，苏联已经居欧洲第一位。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时期，曾反对作为封建制度支柱的教会，并且有时也试图提出关于使文化摆脱宗教影响的问题。但是到以后一个时期，当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又转向教会并与僧侣结成联盟。只有在宣布并且真正实行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保持宗教观点或完全摆脱宗教的苏维埃国家，才在为清除成年人的，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头脑中的宗教偏见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同时，在反对宗教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仅用最广泛教育的方法发挥作用。一个大国的整个文化建设，业已摆脱掉宗教奴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愈来愈

完全地放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只有苏维埃政权一贯地彻底地实行苏联境内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和来帮助来保证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并把它们组成一个各民族自由的团体。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满意地确认，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广大群众的努力，在十月革命10周年到来之际，在提高苏联所有各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方面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就。在全国居民的一般知识的提高方面也有巨大的进展；成年人中间的文盲正在逐渐扫除；学校网有了显著扩大，并且根据预定计划在1933—1934年实行普及教育可以说是有保证的。质量业已提高的各类学校正在日益满足国家对中等熟练专门人才的要求，并且为高等学校输送越来越有知识修养和就其社会成分来说十分可贵的青年。

政治教育工作通过众多的俱乐部、民众图书阅览室、人民宫、剧院、电影院、无线电和工人夜大学等等，便普及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广大群众。

十月革命曾为自己提出消灭城乡居民文化水平之间存在的鸿沟的任务，并且苏维埃政权正在坚持不懈地实现这项任务。

为改善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正在进行巨大工作，因而流行病和居民的死亡率有了急剧下降，而首先是儿童的死亡率有了显著降低。

落后民族的文化正在迅速发展，这就保证了我们整个苏联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工作，都贯穿着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和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的基本思想。

资产阶级报刊是欺骗和剥削群众的主要工具。苏维埃报刊与之不同，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对他们讲真话的。用苏联境内各种不同民族语文、以超过革命前许多倍的大量出版的苏维埃报刊，正在深入到苏联最偏僻的角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村宣传

员积极参加我们的报刊工作，因而它同最稠密众多的劳动居民的联系愈益密切。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建立一支工农知识分子队伍的最复杂的任务。这批知识分子与我国从前的知识分子相比，或者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比，无论如何都不会逊色，同时他们要与劳动者阶级有密切联系，并且充满革命意识。在这方面我们已有十分显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及其子女，通过工人科系和高等学校而开始从事研究高深的科学知识。

革命能够把我国科学力量吸引到从事规模最为广泛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表现出科学创造精神比革命前有显著提高，而且表现出科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是同苏联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要求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社会科学方面，资产阶级不接受这些学科的基石——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而在苏联，正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把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部门。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基地。

苏维埃政权曾为保存过去的艺术瑰宝和组织劳动人民群众广泛参观付出极大的力量。同时还提出了促进新的文学、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和电影的发展任务。这些文艺既反映了革命的现时代，也符合我们伟大创造时代的要求。艺术不再成为有产者的特权，而日益成为劳动人民群众的财富。只有十月革命才提供了在艺术战线上建立民族文化基地和广泛发展苏联各民族创作力量的可能。

近10年来苏联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努力工作的社会团体即工会、共青团、合作社和自愿组织的各种协会等等。

尽管在这10年的前一半时间，内战的深重灾难、贫困、饥荒和疫病连绵不断，苏维埃制度存在的这10年间的成就仍然相当可观。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对过去10年苏联各族人民的文化建设进行总结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在劳动人民群众面前对文化教育工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依然忠于自己的职守，并能克服过去的一切遗毒，找到一条同无产阶级共同友好工作的道路。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满意地指出我国文化总的情况时，认为，虽然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是与革命提出的极其伟大的目标和与群众对教育表示的巨大需要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在保证我国文化高涨方面继续顽强地工作是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全部当前活动的基本任务之一，并委托苏联政府要全力促进这一任务的顺利解决。同时在十月革命进入第2个10年的时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把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直接地最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改造国家的统一社会主义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确认，十月革命宣布的、在苏联宪法中得到反映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并声明今后各民族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事业将得到苏联的大力保证和支持。

根据以上所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如下：

1. 始终不渝地、继续不断地加强苏联社会文化工作的物质基础，以便这一工作的发展速度不落后于我国一般经济的发展。

2. 作为苏联政府、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政府活动中当前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应当提出和解决这样一些任务，如，实行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成年人中间的文盲，消灭无人教育现象，加强改善居民劳动和生活条件、在他们中间普及卫生教育和养成

卫生习惯等方面的措施，保证群众性职业教育，竭力促使工人夜大学和工人进修班的发展，进一步吸引工农广大阶层进高等学校并把高等学校提高到苏维埃国家所必需的高度。

3. 为进一步加紧提高文化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而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

4. 为提高城乡劳动妇女的文化水平而继续努力工作。

5. 为不断改善文化和科学方面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物质状况而继续工作。

6. 为进一步加强文艺（戏剧、电影、音乐、造型艺术）和使其接近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继续工作。

7. 为了保证整个文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应当：

（甲）整个文化、教育和训练工作继续以集体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精神进行；

（乙）为吸引工农群众及其社会团体从事文化建设而继续进一步工作；

（丙）扩大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村向社会主义前进所必需的熟练干部队伍；

（丁）为在苏联各族人民中间造就新的工农知识分子干部，直至科学研究工作所必需的高度熟练的工作者而继续工作。

沿着这条道路，并且象内战和经济遭到破坏时期在前方进行斗争那样努力献身于文化建设事业，苏联工人阶级，在劳动农民支援下，定会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和完全的胜利。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600—605页。方钢
译）

(五) 苏维埃政权建设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的法令

(1922年1月9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1. 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与布里亚特-蒙古族代表协商规定的范围内成立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该自治州包括以下各区：

- (一) 以童克村为中心的童金区；**
- (二) 以奥利佐纳村为中心的埃里希特-布拉加特区；**
- (三) 以鲍汉村为中心的鲍汉区；**
- (四) 以库都利克村为中心的阿拉尔区；**
- (五) 以色楞金斯克市为中心的色楞金区。**

2. 在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该自治州的全部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其会址暂定设立在伊尔库茨克市。

3.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本自治州的执行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可行使省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4. 委托内政人民委员部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设立混成委员会解决在仔细确定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的疆界时可能产生的问题。

5. 脱离伊尔库茨克和外贝加尔两省之地域的管理机构应转交给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其转交时间不得迟于1922年2月1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阿·叶努基泽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05—506页。方钢
译)

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2年12月27日)

1. 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适时的。

2. 联合的基础是各共和国自愿和平等以及每一个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共和国联盟的权利的原则。

3. 委托代表团与乌克兰代表团、外高加索代表团和白俄罗斯代表团共同拟定关于成立共和国联盟与阐明指导各共和国结合成为一个联盟国家的情况的宣言草案。

4. 委托代表团拟定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加入共和国联盟的条件,并责成代表团在审查联盟条约时坚持以下各点:

(一) 成立相应的联盟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二) 合并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

(三) 缔约各共和国的财政、粮食、国民经济、劳动和工农

监察人民委员部都要服从共和国联盟相应人民委员部的指令；

(四) 充分保证缔约各共和国人民民族发展的利益。

5. 条约草案在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要取得以主席团为代表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赞同。

6. 授权代表团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赞同联合条件的基础上，缔结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乌克兰、外高加索和白俄罗斯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

7. 条约要提交共和国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17—518页。方钢
译)

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

(1922年12月30日)

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审查成立苏联的宣言草稿，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各全权代表团缔结的联盟条约之后，决议：

1. 基本上批准宣言和条约。

2. 由于通过的宣言和缔结的条约非常重要，并且盼望听到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关于本约条文的最终意见，并把宣言和条约转交各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再行审查，以便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意见提交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例会。

3.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例会审查收到的意

见，批准宣言和联盟条约的条文并立即付诸施行。

4.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向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宣言和联盟条约的最后文本，并将其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19—520页。方钢
译)

米·伊·加里宁在苏联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2年12月30日)

我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欢迎贵宾们，欢迎乌克兰、外高加索和白俄罗斯各加盟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欢迎苏维埃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的全权代表。同志们，我们工人和农民特别高兴，因为在这里，在莫斯科正在举行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的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且今天——比较起来是在简单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是一桩具有世界重要性的事件。可以说，现在，在此时刻，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大家充分意识到，但是它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将要与日俱增。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这次联合代表大会使我们有可能充实我们的物资来对抗与我们为敌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从政治方面来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苏维埃共和国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前的现实意义。最后，第三，我们在这里正铺下真正兄弟般共同生活的第一块基石。自从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们，为了探求能够使各族人民不遭受巨大苦难、不相互斗争，象朋友和兄弟般生活的形式而研究理论问题以来，已经过去几千

年了。但是，只有现在，只有今天，才在这方面真正铺下第一块基石。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之际，我讲了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的巨大意义，同时指出西欧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都会密切注意今天发生的事件。我毫不怀疑，今天我们进行的工作不会不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思想上留下痕迹。我毫不怀疑，今天我们基本上指出的这些新形式还不完善。将来它们可以得到修正，但重要的是我们铺下了第一块基石。开头，奠定基础是最困难的。今天，4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我相信，我们开创的事业在劳动人民的支持下定会成功。

我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闭幕。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20—521页。方钢译)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致世界各国人民 和政府的公开信》的法令

(1923年7月13日)

各苏维埃共和国，从它们存在的最初时刻起，在签订联盟条约之后，由于密切合作和互助关系而联合起来了。工农政府因有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从外部对它们进攻和反革命从内部对苏维埃制度的破坏这种共同需要，而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了一个整体。劳动人民的团结把它们联结在实现各个解放民族的兄弟合作的共

同任务之中。它们都是来自推翻本国地主资本家政权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它们都曾受过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并且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它们都是在经历了空前未有的灾难之后，在新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从事过恢复国民经济的宏伟工作。

它们不断地用全副人力和物力相互进行兄弟般的援助，它们虽然长时间地被联盟条约联系在一起，但依旧是各个独立的国家。

它们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局势的要求，现在使它们结成了一个联盟国家。

世界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政府侵略野心的加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进攻的危险，使各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力量集中于一个联盟中心便成为不可避免。

同时在曾经遭受战争、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破坏的各个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经济建设，是一项不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便不能胜任的任务，而且也只有在整个联盟的统一经济中心的计划领导下才能胜利完成。

在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制度逐渐发展和巩固的情况下，工农政府的性质本身就会日益推动各共和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并融合在一起。

在不久前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各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一致决定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统一的联盟国家。各个平等民族的这一联合是自愿的，是排斥民族压迫，不许对居住在这个国家疆土内的某个民族实行强制的，每个共和国都有权自由地退出联盟，同时进入的大门也对现有的和即将产生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敞开着。

加入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通过的宣言和条约，7月6日已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开始生效。

由于为防止外来进攻，各苏维埃共和国有必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成立了统一的全联盟的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并正在发生作用。

由于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和需要是共同的，因而成立了统一的全联盟的外交人民委员部。

由于在国家垄断基础上必须把对外贸易的经营完全集中起来，并且为了预防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国家的奴役，它们不得不成立统一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国民经济的计划安排要求把运输和邮电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成立全联盟的交通人民委员部和邮电人民委员部。

各加盟共和国其他国务活动部门，是在每一个共和国保留自己中心的情况下部分地服从联盟的中心，部分地仍旧完全掌握在各共和国手里。

对国民经济和财政的直接管理、对粮食工作的安排、国家对雇佣劳动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工农监察部对一切国家机关的监督，也将同时由全联盟中心来掌握，并且也由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各别中心来掌握，因为在它们的本土上需要进行特殊的领导。

那些负有民族专门任务和同民族生活与特点有关的各人民委员部，如教育、农业、内务、司法等部，则仅仅设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并完全由加盟共和国领导。

整个苏联劳动群众意志的统一，表现在苏联最高机关——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但同时每一个民族在民族委员会中有专门代表，民族委员会与代表大会选出的全联盟委员会一起工作并享有平等权利。

因此，在各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兄弟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国家，抱有维护各民族和平的目的。权利平等的各个民族在相互密切影响和共同工作中，将手挽手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福利，并实现劳动人民政权的各项任务。

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天然同盟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在寻找同一切民族的和平友好和经济合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对整个世界有利当作自己的目的。它正在从波罗的海、黑海和白海直到太平洋这一广阔领域内实现各民族的兄弟般的团结和使劳动占有统治地位，同时力求有助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合作。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阿·叶努基泽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21—523页。方钢
译)

米·伊·加里宁在关于苏维埃 建设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1925年1月5日)

……当前我们的政治任务，正如上面所认为的那样，预先就决定了我们这次会议的性质。这次会议的实质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我们党注意苏维埃、注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标志。我们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召集的会议问题的注意，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对于加强苏维埃机关（党通过它同广大群众发生联系）影响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的态度。

最后，我来谈谈苏维埃本身，谈谈苏维埃中我们工作人员的活动。如果我们要解决关于苏维埃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解决关于我们党的同志，即使不起组织作用，无疑地也起领导作用的同志的问题，那么无论如何在地方的上也会无可争辩的领导作用

的影响，如果这些同志在党的机关对待苏维埃的态度方面能够实现这一切，那么也还是不够的：因为无疑地，还需要在苏维埃本身加强非党同志的影响。现在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就有非党同志。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这些非党同志，无疑地比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非党同志起着更大的作用，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点并不怎么显著。但是我已有来自各人民委员部的资料，这些资料说明对会议工作方面的法典、法律的一系列修正都是非党同志提出的。目前，有许多非党同志在我们的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并且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他们派到地方上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现在，非党同志在我们这里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在增大，并且毫无疑问，从下届起这种作用还会更大。我不怀疑，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他们被吸收来直接参加工作所起的作用，大概还要增大，还要增大。这种工作在地方上也应进行。必须增加非党同志的人数；必须使增加的这批非党同志（从上到下参加到苏维埃中的非党同志将数以千计）直接参加管理；必须让群众看见，不仅是共产党员在进行管理；必须逐渐消除居民中，特别是农民中的这种观念：共产党在直接管理；必须使居民们看到，非党同志也在进行管理。摆在人类面前的目标和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是共产党指出的。共产党是先锋队，实在说，共产党正走在前面。但是，同志们，它走在前面不是为了自己，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员的特殊目的。这些目的是全人类的目的，农民，尤其是我们俄国的贫农也很关心它们，因为地主已经侮辱他们有千年之久，如果不是用革命推翻了地主，那就还会再侮辱他们上千年。但是，要达到这些目的，为这些目的而斗争，参加为争取达到这些目的的斗争——这一切无论对工人、农民，或是对党来说都是同样的，而且也落在他们肩上。所以，我也说，农民参加管理机关，使人看得见的、明显的参加，也应成为我们机关的领导任务，因为可以说，我们的每一步成就都需要大家的努力，而且不

单是共产党员作出了这种努力，非党群众也作出了这种努力。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在行政管理上，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方面，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管理机关也不可能永远正确、绝对正确。相反，总有不少问题解决得有错误、有马虎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的确，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有一个极富哲理的民谚说：只有什么都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谁干，他就要犯错误。这是人民创造的谚语。

但是，应当让人民感到，在犯这些错误方面，也有他们的一份。因此，当一个党外的人与党员一块犯了错误，比如说盗窃了公款（我随便举个例子），那么农民会说什么呢？他，当然要骂街，但是他心里说：“那么好了，怎么样，你盗窃公款，我们就选另外的人。”这不用有任何怀疑。虽然是第一次错误，但是他感到也有份，他曾参加选举，他也担有一份责任。而且当我们带领非党同志，把重任加在他们身上，当农民群众具体看到非党同志参加管理的时候（即使他们也犯了错误），当然这样就能使他们即群众担负一部分责任。不能不担负的。

一句话，我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的基本的任务是，使苏维埃，尤其在苏维埃中工作的那一部分非党同志担负责任。与此相联系，你们也要把一定的责任交给一定的机关和加入这些机关的那些人。不用说，在负这种责任的时候，也应享有一定的权利。吸引非党同志工作成了当前的任务、迫切的任务。摆脱了战争重担的居民，多少也减轻了沉重的物质负担。现在，居民中出现了文化需要，出现了政治需要。这是个事实。无论政府，无论领导国家的机关都不能不考虑它。一个政府，如果它不考虑积蓄起来的一定力量，并且不能把这种力量引上理想的轨道，它就不能坚持下去，因为它不能胜任，它就要垮台。

群众的力量开始积蓄起来了，我们就应当给它找到健康的出路，我们应当把这种力量运用得对苏维埃国家有利，把它纳入苏

维埃建设的轨道。现在我们的任务在于，把工农群众积蓄起来的力量引向苏维埃建设方面。

同志们，如果我们的会议能够在它的工作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份力量用来寻找表达党对苏维埃、苏维埃机关对居民的相互关系的新形式，并且主要是找到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把群众积蓄起来的力量吸引到苏维埃组织中，另一方面把这种力量引上我们所希望的轨道的形式和方式，我想，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会赞同，而且我非常高兴。如果我们把这项任务完成一小部分，那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鼓掌）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627—630页。方钢
译）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 苏维埃建设问题的决议〔节录〕

（1925年5月20日）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消除上述苏维埃工作中的缺点的同时，还应该采取一系列保障和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补充措施。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苏联民族问题政策完全正确并对巩固苏维埃联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认为苏维埃在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活动在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普遍权利方面还应得到更多的发展，并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切实保证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所有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机关中应规定少数民族

的代表，在少数民族数量很多的地方应成立使用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单独的苏维埃，建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法院，等等。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必须对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提出坚定的措施，以加强同苏维埃工作中上述所有缺点作斗争。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要求坚定地迅速地实现这些措施的同时，必须提醒注意列宁给工人和农民的重要遗训：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只是为实现工人阶级在坚固的工农联盟基础上对农民的实际领导提供了可能，苏维埃政权为改善苏维埃工作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只是为劳动群众积极工作、主动和健康的批评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因此，在执行已规定的措施的时候，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工人和农民要更加积极地参加苏维埃建设。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551—552页。张心
绪译)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红军的决议

(1925年5月20日)

听过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报告之后，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如下：

1. 渴望和平与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从550万名缩减到现在只有56万名

红军的屡次缩减，就是这一爱好和平政策无可辩驳的证据。

如果注意一下苏联的人口和国土，并按军队与人口、国土的比例来说，那么现在苏联是世界上军队最少的国家之一。苏联每1万居民中平均有41名士兵；罗马尼亚和波兰每1万居民中平均有100名士兵；法国（不算殖民地军队）每1万居民中平均有200名士兵。如与国土面积相比，苏联每1千公里平均有27名士兵，罗马尼亚每一千公里平均有560名士兵，波兰每1千公里平均有700名士兵。而按军费负担来说，苏联每人不到3卢布，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每人为7卢布左右，波兰每人为11卢布，法国为13卢布70戈比。

可是，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向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申明：虽然有工农政府的努力，虽然已经同许多国家签订了条约和协定，但是苏联仍旧无法保证世界资本不再企图破坏工农的和平劳动。对于苏联政府多次提出的裁军建议，资产阶级的回答是在所有国家大加扩军。大不列颠、法国和美国都在加强海军和空军，普遍增加军费，加深民族矛盾等等，这一切证明，国际和平的维护又受到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威胁。

另一方面，由于爱沙尼亚工人起义，巴尔干、尤其保加利亚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报刊掀起一股疯狂反对苏联的运动，对苏联进行造谣中伤，似乎苏维埃政府参与布置了索菲亚教堂的爆炸而无中生有地责难苏联政府，鼓吹要普遍从道义上和财政上抵制苏联的思想，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政治运动的证据。这一政治运动的目的是要在本国制造反苏舆论，并为对苏联进行新的武装干涉作心理上的准备。

最后，与我们毗邻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赫尔辛基召开关于结成反苏统一战线的会议，那些国家的参谋本部在里加举行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小协约国会议，同占领并强行抓住比萨拉比亚不放的罗马尼亚缺乏正常关系，波兰同罗马尼亚的军事同盟，

这些国家的加紧武装，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都不能不认为是要把反苏集团的思想变成实践，准备进攻苏联。

代表大会象先前一样依然认为，同各国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保证苏联和平发展，是工农政府极为重要的任务，因而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来进一步加强红军这个捍卫和平最有效手段的战斗力的。

2. 过去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证明，现代战争不单单是由武装力量进行的，而且是由整个国家进行的，要求国家的全部生产力处于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防御准备，不仅要求各个居民阶层都有军事方面的训练，而且要求工农业的发展既能保证生产力的正常增长，同时又能为国防需要创造巩固的基础。

代表大会完全赞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及时制定的这方面的措施，同时委托苏联政府在提高国防能力方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其办法为：（一）适当扩大军事工业，并在建立所有其他国营工业时，在和平时期就要考虑到战争时期的需要；（二）完善军事技术并用以充分供应红军需要；（三）适当改善和准备铁路、土路交通网和汽车曳引机；（四）发展养马业，使它不仅能够保证农业的需要，而且能够保证红军的需要，尤其是红军对军马的需要；（五）认真注意全体居民的军事训练，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学生和青年学习军事；（六）加强居民的体育训练；（七）在全体居民中普及军事知识，而首先是射击原理。

只有军事主管部门一个部门的努力是不能实现上述措施的，所以代表大会责成苏联的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所有人民委员部，而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以及应当在加强苏联国防能力方面起重大作用的社会团体在实现上述措施方面积极参加工作。

3. 代表大会赞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为适应进一步提

高红军质量而过渡到和平时期的措施，并且满意地指出它在战斗准备和物资供应方面取得的成绩。

可是，已经做过的工作仅仅是红军和平建设方面的第一阶段，代表大会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还要在加强红军和红海军战斗力，特别是发展它们的技术和改善物质福利状况和生活条件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

4.代表大会赞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红军的民族建设方面的工作，并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保证执行符合苏联各族人民在保护其共同社会主义祖国方面之利益的民族形成的既定纲领。代表大会特别满意地指出，在东方，民族的形成是过去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符合国际和平的确立。同时，代表大会正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注意：民族军队的建设，只有在它们最广泛最积极参加下，从形成固定的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以及一般地训练居民服兵役方面创造它们所必要的基础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根据这一点，在实行民族部队的计划时，应当严格遵守渐进性，以便新造成的这些部分就其战斗力来说不致于落后于工农红军的现有部分。

5.代表大会认为，民兵制度原则上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承认，并且减轻了居民和国家预算在维持武装力量方面的负担，同时也是工农结合的最好方式。

同时代表大会确认，要建立坚强的、用革命战斗精神团结起来而又训练有素的民兵部队，只有在国家机关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和工会组织在这方面对军事主管部门充分而不断地帮助时，才是可能的。

在指出在目前整个武装力量系统中占有一半以上的民兵部队对于国防的重大意义之后，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最

短期间采取以下几项非常必要的措施：（一）从法律上把现有的协助委员会的组织固定下来，对它们的工作给予特别的注意；（二）号召各地一切苏维埃机关广泛协助军事主管部门进行短期集训，——短期集训是民兵制度下战斗训练的基础；（三）帮助军事主管部门安排两次集训之间的工作。把这种工作看成是保证民兵部队战斗力的极重要条件，并使这种工作具有义务的性质，特别是要把扫除民兵部队中红军和应征入伍前受军训者中间的文盲，与发展农村阅览室、俱乐部和一切教育机构中的军事角当作必要的任务；（四）为了使骑兵部队和炮兵部队购到战马，要对这些部队的更换马匹组织国家贷款；为了同样目的，要考虑在税收制度方面给予它们一些优待；（五）在训练期限已经缩短的情况下，认为在入伍之前的训练是劳动人民施行军训的基本环节；用政府特别法令责成地方执行委员会办理以下各项事宜：为教学点拨出带有设备的房舍并从各方面为它们服务，同时为学习人员办理公共伙食，用地方预算或国家预算来保证；（六）为了巩固业已建立起来的服兵役制度和每个公民在兵役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要贯彻执行兵役法。

6. 为了保证工农红军的训练能够正常进行，同时又有必要的战斗准备，代表大会认为进一步改善工农红军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完全必要的。政府和劳动人民群众已经表示的注意和关心，应当保证使每个军人都能将自己的力量充分地完全地用于为劳动人民解放的伟大目标服务。

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委员会；从即将来临的1925—26预算年度开始采取以下一些实际措施：（一）增加发放用于改善工农红军，尤其是工农红军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的资金；（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改善发给工农红军的各种给养；（三）通过增拨国家预算资金和地方预算资金来增加用于修理、新建营房和购置营房

内部设施的货币资金；改善工农红军的住宅-营房条件；（四）特别注意使红军指挥人员、行政管理机构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住房不要过挤，并要设法适当扩大，规定合适的房租和水电费，在部队宿营地为工农红军领导干部特别安排的住区保留一些房间；（五）在一切民事机构、企业和作坊给红军和红海军复员军人保留一些特别安排的职位；（六）在安排工作方面使陆海军复员军人与工会会员平等；（七）加强给帝国主义战争中，尤其是内战中残废军人发放抚恤金的工作；（八）依法通过关于工农红军领导人员退休保证的专门条例，并拨出必要的基金交归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支配；（九）保证红军战士优待法规的真正实现，不许侵犯他们家庭的权利。

7. 代表大会指出了工农红海军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并建议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进一步发展能够充分保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海疆的海军力量。

8. 代表大会确认，空军在战争方面的作用有了提高，并且它在各国都不断发展，因而要求非常注意有计划地加强和发展红色空军这个问题。

在指出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之后，代表大会建议政府在最短期间实现发展空军力量的计划，并同时采取措施使航空工业其中包括发动机制造业提高得足以保证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必要发展。

代表大会向参加“空军之友协会”、“军事科学协会”和“支援化工建设志愿协会”的劳动人民致敬。

航空和化学——人类文化蓬勃发展的两大杠杆——曾经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死亡和破坏的可怕手段。在现今条件下，以帮助红空军和发展航空和化学工业为其直接目的的“空军之友协会”和“支援化工建设志愿协会”，则是劳动群众高度觉悟和他们准备组织苏联国防力量的标志。

代表大会建议苏联政府和各级政权对“空军之友协会”、

“支援化工建设志愿协会”和“军事科学协会”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并号召苏联全体劳动人民都要这样。

（译自《苏联历史文献选编，1917—1925》，
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634—640页。方钢
译）

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

我们要用自己的资金实现 苏联的工业化〔节录〕

——1926年5月8日在全乌克兰
矿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普·埃·捷尔任斯基

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国家工业化。你们记得，工业化问题早在1923年就提出来了，当时我们只是热衷于工业化的一般任务，而忘记了主要问题，即必须满足工农的直接要求。当时我们的生产仅达到战前的30—40%。当时提出工业化的口号还为时尚早，因为当时需要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用于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购

买力。目前出现的货荒证明居民的福利和购买力大大提高了，证明需求超过了我国工业的现有条件。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工业化的坚定方针，我们之所以不能发展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是由于我们的重工业发展得还很不够。为了生产消费品，我们需要原料，而开采原料要有工具，因此需要为工厂生产工具。首先需要金属、燃料和矿石。重工业必须恢复我们的固定资产。但是发展重工业我们遇到了资金不足的困难，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些资金呢？

同志们！你们会清楚地记得同反革命势力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那些漫长年代。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的全部重担都落到了你们矿工的身上。这些年代现在就象英雄时代的神话一样离我们很远了。有人曾预言我们一定灭亡，说什么严重的饥饿将使工人阶级缴械投降。然而工人阶级成了胜利者，他们克服了一切困苦并使生产几乎达到战前水平。现在我们面临的同那时的斗争任务相比，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容易多了。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国内找到资金。这些资金我们国内是有的。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多少材料、燃料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就会知道我们有可以获得资金的巨大潜力。我们首先和最主要地应当注意什么呢？当然，首先是我们的机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机关的工作，谈到这些机关人员臃肿和官僚主义现象。伊里奇的这个遗嘱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管理机关还远没有得到完善，商业和合作社的机关同样如此。应当坚决地提出改善我们的机关以及缩减机关开支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任务是生产合理化的问题。必须注意我们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工厂在人力、材料和燃料方面的空前浪费现象。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节约并使我们的其他需要服从这个主要任务，以便在我们自己这里找到改进技术和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

没有经济工作人员同工人群众和工会工作者最紧密的配合，

现在就不可能进行技术改进。那些认为不需要工人而在他们的办公室自己就能发现和克服缺点的经济工作人员，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我们确有这样的经济工作人员。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成为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人联合起来解决生产问题的地方呢？这就是生产会议。生产会议不应当成为清谈会议，生产会议应当详细地研究生产上的需要，拟定改进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如果现在生产会议似乎停止活动，那么这里的大部分过错在我们经济工作人员身上。我们不应当害怕工人群众在生产会议上，指着我们的鼻子说，应该做什么，而有时又不应该做什么。

如果经济工作人员对生产会议漠不关心，那么会议就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要知道，如果没有叫人帮助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只是形式上的，是由于党或工会下令才来参加这些会议的，那么对谁也不能强行进行帮助。

我们能够在目前的条件下恢复我们的经济，但是，为此需要工人、工厂的管理人员做出牺牲，需要相互配合、相互了解。

同志们！我想，如果我们真正实现生产会议的思想，使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这些会议的工作，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增产节约的任务。我深信，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的矿业工人，也一定能解决摆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的那些复杂任务。

（译自《苏共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面集体化而奋斗》，苏联1960年俄文版，第391—393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

（1927年2月19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听取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最高国民

经济委员会关于电气化情况及其最近五年远景计划的报告后决定：

1. 认为规定把电能生产增加到130万千瓦的最近五年发电站建设计划是最低限度的计划。

2. 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吸收各加盟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参加，交由电工总局对国民经济总计划（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继续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和重新审查，同时迅速地对上述第1条提到的计划进行仔细研究并加以详细说明。这个计划应根据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需要，使各加盟共和国和主要经济地区专业化。依据发展货物运输量的远景和1926年5月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同意的方案，应当特别注意运输业的电气化问题。

3. 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有关国防问题电气化的计划，同军事人民委员部达成协议。

4. 决定依据电气化五年计划编制的电气化工程年度计划，应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核准。

5. 制定发展电力工业的日程计划，以便保证进一步减少苏联发电站建设对国外定货的依赖，与此同时，认为必须保证及时地将电站建设需要的紧急定货转交国外的实际可能，为此要把相应的条款列入电气化工程年度计划。

6. 为了充分保证施工工程所需要的物资，认为必须把建设发电站的计划同预算内和预算外拨款的实际可能、进口和国内定货分配的实际可能紧密结合起来。限定建筑设施的数量，以便规定其施工最短的，但从技术上考虑是允许的期限。

7. 认为发展能够提供最便宜的动力的水电站网是适宜的。认为必须首先建设这样的水电站，它们不需要更多的成本用于功率单位，而且在整个一年的过程中，都可以利用大量的现成的水力。

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指定专家专门委员会来考虑沃尔霍夫水电站和泽莫-阿夫查尔电站的建设经验，同时考虑到国外在这方面已经有的经验，研究中小功率的水电站的设备标准化的问题，编辑苏联可能利用的水力资源调查材料集。

8. 决定准确而坚定地执行1926年8月27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兴建新区电站程序的决定，以便在每次研究技术问题的同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从经济上建设该电站所能得到的好处的详细根据。

9. 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电工总局，以适应最近五年规定的加紧发电站建设的基本需要，改组方案应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查。

10. 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在各地建立电力监督机构。

11.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调整和降低建筑工程价格，其中包括：

(一) 消除建设中出现的缺点：如杂项开支大、工程机械化程度不高、电站建设的拖延现象、在规定定额和定价上的随意现象、工作定额低、忽视预算和预算纪律，以及报表上的缺点等；

(二) 要有计划地学习外国在发电站的建设、设备和使用方面，以及在生产必要的基本建筑材料方面的技术成就；

(三) 在电气化方面提出改组建筑机构的方案，以便以这些机构的活动为基础，进行经济核算，同时应当保证充分利用过去的建筑经验，挑选和保留熟练的技术人员并充分利用不断积累的建筑工程设备。

(四) 为了遵守电站建筑工程期限，合理而正确的花费资金和保证建筑工程及其在投产期间的质量问题，整顿检查机构。

(五) 关于电气化新工程草案的审查和核准程序的新规定，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查。

12. 建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分别投入水力发电站和热电站的资金支付与注销原则加速审查，以便使后一个问题同由国家拨出的新工业建设资金归还的一般问题结合起来并加速制定发电站财产折旧的统一原则。

委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整顿各地电站成本计算的方法和一般提法。

13.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一) 研究关于专门税率政策问题，以便使各电站昼夜负荷图平衡和提高各电站设备的利用率；研究关于各地区电站昼夜负荷图下降时，根据电力的需要来组织电力生产问题；研究在上述时间对供暖和取暖的低价供电问题，以及关于运用蓄电问题。

(二) 研究制定现行电站的共同规章，其中包括控制线路问题和电站与用户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14. 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一) 关于合理安排银行对电气化的拨款问题，除预算内的资金外，要考虑到吸收与电气化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预算外的资金以及居民的资金的可能性并吸收银行参加研究这一问题；

(二) 关于把各企业并入地区网并改造其动力设施而腾出来的资金和电器设备转为电气化基金问题。

15. 认为必须在为各个用电单位集中生产电力的基础上和在利用地方燃料的基础上，实现地方电气化，以便在可能实现电气化的地方同时实现废气余热供暖。

16. 考虑到农业电气化由于缺乏应有的领导而造成的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一) 电工总局下设农业电气化局，以便解决与农业电气化有关的技术、经济和组织问题，确保各加盟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参加该局的工作；

(二) 依照上述第10条所成立的电力监督机构和省、县以及

相当于省县的执行委员会，都要在农业电气化方面就技术、经济和组织问题，对各地的居民给予帮助。

17. 规定所有提交政府核准的农业电气化计划，都应预先征得各加盟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同意。

18. 建议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责成本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发展农业电气化的远景计划，这里所指的是：

(一) 利用具有各种用途的电力干线的能量；

(二) 利用磨坊和其他农村工业企业动力装置的剩余电能来实现附近农村的电气化；

(三) 利用各种不同工业企业的空间热能和其主要产品的废料来经营农业发电站。

19. 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电气化局，在各加盟共和国拟定的农业电气化计划的基础上，拟定发展农业电气化的综合远景计划，以及制定其拨款和给予最优惠贷款的办法，以作为对总的电气化五年计划的补充。

20.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措施，降低电机厂的产品生产价格，整顿工厂接受和完成定货期限方面的问题；认为，农业设备价格昂贵，大部分是由于电机托拉斯产品价格昂贵与它们不认真和不能及时完成定货造成的。

21.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责成农业电气化局：

(一) 拟定措施加强制造农业电力设备的企业；划分它们的活动范围以及把农业电气化工程集中在对其生产业务有专门章程规定的一些企业中；

(二) 在建筑机构的参与下，规定适合于利用各种燃料和能源（水源和风源）的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标准型农业电力设备；

(三) 确保农业发电站建设和区、市电站建设相互配合，以便划分它们的供电范围和为了农业电气化的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区、市电站的电能。

22. 建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为了保证农业电力设备所需的技术人员采取措施成立有农村居民参加的电工和技工专业训练班。

（译自《苏共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面集体化而奋斗》，苏联1960年俄文版，第182—186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联共（布）中央关于工厂 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决议

（1929年5月9日）

1. 整个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要求动员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奋斗。

进一步地、更加广泛地开展工厂、矿山和车间的社会主义竞赛，应当成为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吸引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竞赛的基础上，群众的首创精神应得到充分的发扬；吸引工人中比较落后的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从无产阶级队伍中提拔新的有组织能力的广大干部的工作，也应得到全面的开展。

列宁关于工人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的思想，在我们的条件下，在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组织生产观摩、交流生产经验和生产竞赛等方面已经得到或正在得到体现，这些活动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顺利开展的并受到工人群众越来越积极广泛支持的青年工人的竞赛，以及《真理报》开展的竞赛（“红色维堡人”工厂和卡明斯克造纸厂的生产会议观摩和经验

交流会等)、《工人报》开展的竞赛(全苏采煤竞赛)和其他报纸开展的竞赛,必须作为工厂间、矿山间和运输企业间的竞赛开展起来,使越来越广泛的工人群众都来参加竞赛并把竞赛同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等这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际任务结合起来。

竞赛的具体任务应当是: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预定指标;改进产品质量;消灭旷工和废品;减少杂项开支;模范地遵守生产纪律;积极地进行技术改造和广泛吸收工人发明创造的生产合理化运动。

2.各企业、工厂、车间的工人群众自觉积极地参加竞赛以及专家最积极的参加竞赛,是完成这些任务,取得竞赛的实际经济效果的决定条件。因此一切有关参加竞赛的口号和决定,都必须经车间和企业的全体会议通过。在组织、发展和巩固竞赛成果方面,工人本身的主动精神尤为重要。对群众经验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竞赛形式,官僚主义地规定出细则或把这些竞赛形式纳入“上级”规定的框框的任何企图,都必须坚决反对。同时必须告诫所有的组织,要防止把竞赛变成没有群众真正参加的各组织间闭门的经验交流会的危险。竞赛应由各工会基层组织来领导。

工会和工厂的所有社会团体,都应当对工人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中表现的主动精神,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各俱乐部、红角和宿舍等地的一切群众性的文化工作,都应当围绕竞赛进行。必须巩固全苏生产会议观摩的效果,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活和经验所创造出来的广泛吸引工人参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多种形式(如模范班组、合理化小组、工厂之间和车间之间的经验交流等),并把这些形式变成所有其他工厂的财富。

衡量每个企业竞赛成绩的主要标准是,本车间、本企业、本托拉斯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

果，以及通过合理化措施和技术改造来巩固这些成绩，以便保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对优秀的企业、车间、工人小组、专家和单个工人，应当制定奖励办法，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根据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达成的协议，拨出一笔特殊奖励基金，以便更好的满足男女工人的物质需要和文化要求，以及规定各种社会奖励的各种形式，如光荣榜、奖状、车间和企业劳动流动红旗等。

4. 苏维埃和党的报刊应当对各工厂的竞赛组织广泛而全面的宣传，用活生生的经验动员群众重视优秀企业，促使落后者赶上来，对已取得的成果组织公开的统计和监督。所有的报刊，特别是各工厂的报刊，应当把组织社会主义竞赛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

5. 在工业企业竞赛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广泛地开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学校和医院等单位的竞赛。党组织在工会和共青团的积极参加下，应当支持开展这些不同形式的竞赛，并根据这里存在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实践，确保对这一运动的总的领导。

(译自《苏共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面集体化而奋斗》，苏联1960年俄文版，第363—365页。于秀贞译，蒋春雨校)

(二) 苏联农业集体化

三，联共（布）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

附录 新 方 针

——1923年12月托洛茨基给党内会议的信

（一）

亲爱的同志们！

我曾确信不疑地指望，我最近就能参加关于党内状况和新任务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是，这次患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凑巧，而且患病的时间也比医生最初所预料的更长。我除了用这封信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政治局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正如许多会议正确指出的，转变时需要慎重，但是，除了慎重以外，还需要坚决果断。转变时的观望态度和没有固定的主见是不慎重的最坏表现形式。

某些怀有保守情绪的、喜欢过高估计机构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首创精神的同志们，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为自己规定无法完成的义务；决议只散布虚假的幻想，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显然，这样看待问题是浸透着十足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党的情绪。中央的决议所宣布的新方针就在于：在

实行旧方针时曾把重心不正确地放在机构上，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就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党——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新方针决不是意味着党机关的任务是在某一个时期内颁布法令和建立民主制度。不，党本身就可以实行这种制度。任务可以简单地规定如下：**党应当使自己的机构服从自己，要始终成为权力集中的组织。**

在讨论中和文章上最近经常指出：“纯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民主对我们说来决不是目的本身。这是完全不必争辩的。但同样也可以有权利和有根据地说，纯粹的或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中是党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环境的办法把这两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内丧失了。重心不正确地转移到机构身上。党的首创精神被贬到最低限度。这就养成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神根本违背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方法。用削弱党内首创精神的办法大力加强机构的集中制，就会在党内产生**身体不适之感**，其严重的病态表现这到极点，直到在露骨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下在党内建立秘密小集团的地步。同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机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风气已在整个党内上升了。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到党的官僚主义使党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叫人提防的呼声高昂起来。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实现的程度要看全党即40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

许多文章都坚决贯彻这样一种思想，即活跃党的主要手段是提高普通党员的文化水平，此后，其他一切问题即工人民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由于我党面临巨大任务，所以我们必须提高我党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这是完全不必争辩的，但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种单纯从**教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是十分不够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要坚持这种提法，那么，它只能使危机尖锐起来。党只有通过**对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集体的独立领导而全部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时**，才能提高全党的水平。需要的不是**教学的办法**，而是**政治的办法**。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仿佛党内民主实行与否应当根据党员对党内民主的“准备”程度提出（由谁提出？）。党到底是党。对每个愿意加入我党而留在党内的人，都可以提出极其严格的要求。但是，入了党的人从而也就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积极参加者。

官僚主义堵塞首创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这就是它的主要过错。既然经验更为丰富的有功的同志必然会到党的机构中来工作，所以机构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影响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如果认为，党内问题都由党机关解决这一方法滥用的结果会毫不影响到体现着党的政治经验及其革命传统的老一辈身上，那就错了。不，这一方面的危险也是很大的。说我们党的老一辈有巨大意义（不仅就俄国范围来说，而且也就国际范围来说）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是众所周知和一致公认的。但如果把这个意义看作是孤零零的事实，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辈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构的官僚主义的最完备无缺的表现者。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津盖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斯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

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的前夜更清楚，以老一代的声誉为幌子的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构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的障碍。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允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么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要防止这种毋庸置疑的危险，除了对方针作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使它向党的民主方面转变，并一天天把更多的直接参加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党内民主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法律上的（章程上的）规定和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问题不论怎样重要，到底是次要问题。我们是根据现有的经验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凡是需要的，我们都加以改变。但是，首先必需把笼罩在组织内部的这种气氛加以改变。务必使党——它的一切支部和联合组织——恢复自己的集体首创精神，同志般的、毫无顾虑和犹豫的自由批评的权利，组织上自治的权利。必须革新党的机构，使它感到自己是伟大集体的执行机关。

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党的风气和党的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蜕化现象。对批评的回答是：“拿出你的党证来！”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已经官僚化的机构代表人物认为凡提起改变党内政策的必要性就是异端邪说，就是派别活动，就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也从形式上准备“注意”新方针，也就是以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革新党的机构——当然是在党章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其目的应当是由那些与集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庸碌

之辈的和官僚主义化的分子。而且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想要求别人拿出党证听其压制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销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构内由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恫吓党。

要求青年重复我们的公式，是十分不够的。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使它化为血肉，要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要能够拿出因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来为自己的见解奋斗。消极的听从、机械地顺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都全部清洗出党！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也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勇敢和独立不倚地捍卫自己的见解。要是他今天在自己的组织内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错的。他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务或转变的必要。他坚持不懈地两次、三次、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为党效劳，帮助党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的任务或完成必要的转变而不致于遭到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的痉挛。

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分裂行为是不应当有的，而且将来也不能有。这种行为是遭到作为独立集体组织的全党反对的。但是，只有把工人民主这一方针加以发展和巩固，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机构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每个人或集体带上一顶宗派活动的大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党是在清楚了解整个环境的情况下，抱着因我们所面临的巨

大任务而产生的十分坚定果断的态度去完成必要转变的。从而，党必将把自己的革命团结提到更高的阶段，它是党完成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经济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保证。

不论从那个意义上说，我都没有把问题谈完。由于怕耽误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去考察它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我希望我不久就能战胜在我看来是与党的新方针处于公开对立地位的痼疾病，那时，我想用更方便的口头演说来补充和更确切地说明我在这封信中所没有说到的地方。

致

同志敬礼

列·托洛茨基 于1923年12月8日

附笔：趁这封信在《真理报》上迟两天发表的机会，我想补充几点意见。

有人告诉我说，当我的信在各区的会议上宣读时，个别同志表示忧虑：我对“老近卫军”和青年一代的相互关系的意见不要被用来使青年人和老年人对立起来（！）才好。可以完全证实，这种想法是产生在那些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就惶恐万分地拒绝关于方针必须改变的这种问题提法的同志们的头脑中。不管怎样，这种忧虑所以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和在目前的时刻被提到首要地位，只能是由于对真正的危险以及危险的迫切性估计错误所致。每一个进行思考的党员都了解：具有很大预兆性的目前的青年情绪是由于实行“风平浪静”这个已遭到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驳斥的方法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正是“风平浪静”本身包含着一种危险：党的领导阶层同较年青的党员即大部分党员越来越隔膜。党的机构为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的趋向，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单独依靠传统来巩固领导集团威信的趋势。尊重党的传统，无可争辩地是党的教育和党的团结的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只有通过独立的积极的检验党的传统、通

过集体制定目前的党的政策而不断丰富和巩固起来时，才是生气勃勃的和牢固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那就可能使尊重传统变质，而成为空洞的热情乃至十足的官样文章，即**没有内容的形式**。不用说，这种世世代代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和不巩固的。从外表上看来，它在内部还没有暴露出致命的裂缝以前，可能维持5分钟的巩固。依靠党内“风平浪静”的党机构的方针，其危险也就在于此。由于保持革命传统的、没有染上官僚习气的老一辈的代表人物，即——正如我们所确信的——老一辈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确了解上述这种危险前途，并站在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立场上来全力帮助党实现这个决议，所以可能造成党内各代人物相互对立的主要原因也就消失了。那时，某些“铺张浪费”或青年在这一方面的嗜好就比较容易克服。但是，首先必须创造条件，使党的传统不要集中在机关内部，而要在党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生根和革新。从而也将避免另一种危险：把最老的一辈分成“机关领导分子”即拥护“风平浪静”的分子以及非机关领导分子两类。不用说，党的机关即它的组织上的骨干，如果能摆脱闭关自守的处境，那它就不会削弱，而会更加巩固。至于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权力集中的机关，在我们党内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

也许还可以反驳，信中所引用的社会民主党机构蜕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两个时代有深刻的区别：那时是停滞不前的改良主义的时代，现在却是革命的时代。显然，例子只是例子而已，决不会一模一样的。但是，把两个时代作笼统的对比，这种对比本身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所以指出同国际革命长期性有密切关系的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日常的国家实践工作，这种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工作，正如中央决议中指出的，它蕴藏有使眼界狭隘的危险，即官僚主义蜕化的危险。十分明显，党的领导越是由排外的“书记”一类指挥人员来

代替，这些危险就越是严重。如果我们指望“时代的革命性”来帮助 we 克服一切困难，首先是克服内部困难，那么，我们就是蹩脚的革命者。必须通过正确实现中央政治局一致宣布的党内新方针的办法来尽力推动这个“时代”。

最后还有一个意见。大约两三个月以前，当作为目前争论对象的问题刚刚提出，可以说，刚刚提到党的日程上的时候，某些省一级的负责同志总是喜欢用宽容的态度耸耸肩膀说：这大概都是莫斯科想出来的，外省是万事顺利的。目前这种口吻也在某些外省的通讯报导上流露出来了。把受传染的或扰人不安的莫斯科同平静的和理智的各省对比，这无非是同一类性质的官僚主义（虽然是外省版本的）的明显表现。事实上，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是最大的、力量最强的和最富有生气勃勃精神的组织。甚至在所谓“风平浪静”（这个词很生动，它免不了会载入我党史册！）最沉闷的时刻，莫斯科组织的独立生活和积极性还是比其他任何地方要高。如果说，目前莫斯科与其他地方还有某些不同，那么，它的不同只在于它担负了发起改变党的方针的责任。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功劳。全党都将跟随莫斯科陆续经历对过去时期某些财富重新评价的必要阶段。外省党机关对这一方面反对越少，各省组织就越能有计划地经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不可避免的进步阶段。党定能获得一天天加强团结和党的文化水平提高的成果。

列·托

（二）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

在争论中，关于小集团和派别的问题占着中心地位。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必须说得一清二楚，因为问题很尖锐、很重要。可

是，它总是提得很含糊。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他们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各部分无产阶级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在利益上暂时不相一致，——所有这些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党支部，通过国家机构，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局部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嫌隙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局部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意见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和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从而会更多地受到党外的影响。在共产党出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不愿有派别组织，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小集团；如果你不愿有固定的小集团，就要躲开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现临时的小集团，务必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但另一方面，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全国生活的、拥有50万党员的党究竟如何防止意见分歧呢？这就是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处的地位中产生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不是光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办法就能解决的。

投票赞成中央决议的人、确信一切照旧的人、拥护旧方针的人大体上总是这样议论的：你瞧，好容易在党的大厦上盖了机构这个小屋顶，就马上发现有成立形形色色集团的倾向；必须重新用螺丝钉把小屋顶扭紧一下。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几十篇演说和文章中都贯串着这个简单扼要的聪明主意。这些同志在内心的深处认为，中央的决议或者是一个必须加以制止的政治错误，或者是一种必须加以利用的党机构的手腕。我认为他们是大错特错

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使党遭受极大的破坏，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在彬彬有礼地接受新方针的幌子下对旧方针的坚持。

党的舆论必然会在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中形成起来。使这个过程只局限于机构内部，然后把现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教给全党，这就是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软弱无力。让全党都来参加决议的拟订工作——这就是欢迎临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还有转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派别组织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在党内“风平浪静”制度和党的派别分裂制度之间难道就没有实行党的路线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线是有的，党的领导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转变关头上，都要根据具体的环境找出党的路线来。中央的决议坦率地写道，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集团形成的原因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针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丝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别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就蕴藏有成立临时性或长期性小集团可能的这种争论的爆发（对这一点佯作不知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诚诚恳恳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闭关自守和派别活动的道路。“可是，派别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精神辩护吗？”——我们听到官僚主义高明人士发出这种呼声。真的吗？但是，第一，我们排黑体字的整个句子都是确切地从中央决议中摘录下来的。第二，从什么时候起，解释忽然等于辩护了呢？说脓包是血液循环不良的结果，是氧气不足的结果，这决不是替脓包“辩护”和承认脓包是身体机构中正常的组成部分。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剖开和消毒，除此而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但是，糟糕的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主张党机构实行旧方针的一派人物却坚信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

特别是说明官僚主义是派别活动原因之一的那一部分决议是错误的。如果“旧方针拥护者”没有把这种意见说出口来，那只是出于形式，正如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充满着作为官僚主义思想底细的形式主义精神一样。

不错，派别组织是我们条件下最大的恶行，而小集团——那怕是临时性小集团——又会转变成派别。但是，像经验所证明的，为了使小集团和派别无法产生，只宣布它们是恶行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切实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而且每一次都要适应具体环境。

只要深入钻研我们的党史，那怕只是党史上的革命时期，即正当派别活动特别危险的时期，那就会清楚地看到，防止这种危险决不只是限于形式上对小集团的谴责和禁止。

在世界历史的极其伟大的任务上，即1917年秋夺取政权的任务上，党内产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在事态的发展极其迅速的情况下，问题的尖锐几乎立即使意见分歧具有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性质；反对夺取政权的人甚至事与愿违地实际上同非党人士结成了联盟，在非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声明，等等。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何才避免了分裂呢？只是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和胜利结束。如果事件拖延到几个月，分裂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如果起义遭到了失败，分裂就更不可避免了。党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坚强领导下，猛冲猛打越过了反对派，夺得了政权，于是人数虽然不多但熟悉党务的反对派也踏上了十月革命的大地。派别活动和分裂的威胁，这一次不是用形式上的法规的办法战胜的，而是用革命的行动战胜的。

在布勒斯特和约问题上产生了第二次规模巨大的意见分歧。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结成名副其实的派别，拥有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等等。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流传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几乎要来逮捕列宁同志政府的无稽之谈有何根据。总之，这有些像英国

侦探小说家李达·曼恩式的或共产党的……低级趣味侦探小说。应该认为，党史研究所会把这些弄清楚的。但是，无疑地，左派共产主义派别的存在对党的统一有极端的危险。当时要把事情弄到分裂地步是不必花费很大力气的，也不需要领导方面……大费思索；只要简单地宣布左派共产主义派别已遭到禁止就行了。然而，党采取了更多的办法：暂时容忍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危险现象，采取争论、解释和依靠政治经验进行检查。

在军事建设问题上，我们党内有相当顽强的小集团。按事情的实质说来，这个反对派是反对建立正规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集中的军事机构，吸收专家，等等。有时斗争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但是，这里也和十月革命时一样，武器较量是有助于事的。政府军事政策中某些突出的和夸大的地方有所减轻（不无反对派的影响），这对正规军的统一建设不仅无害，反而有利。反对派则逐渐消散了。反对派中很多非常积极的代表人物不仅参加了军事工作，而且还在军事工作中担任非常负责的职位。

在令人难忘的职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中，小集团显得很突出。今天，当我们有可能回顾这一整个时代，并用后来的全部经验来说明它时，很明显当时争论的决不是职工会问题，甚至也不是工人民主问题；通过这些争论表明党患有重病，其原因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时过长。国内全部的经济机构都处在毫无出路的困境中。在职工会的作用和工人民主的表面争论的掩盖下，转弯抹角地寻找新的经济出路。结果发现真正的出路是在于废除余粮收集制和粮食垄断，是在于使国营工业逐步摆脱官僚主义总管理局的控制。这些全体一致通过的历史性决议完全解决了职工会问题的争论，而且根据新经济政策，职工会的作用已完全不同了，所以几个月后不得不根本修改关于职工会的决议。

“工人反对派”这个小集团为时最久，某些方面危害最大。它歪曲地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党的个别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客观困难。但是，这里的问题也决不只限于一种形式上的禁止。在解决党内民主问题上采取了形式上的步骤，但在清党问题上却采取了实际的极为重要的步骤来处理“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和要求中正确的和健康的成分。而主要的，由于党依靠自己极其重要的经济决定和措施在基本的重要方面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各种意见分歧和小集团，所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形式上禁止派别组织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才有取得实际成效的希望。但不言而喻，——过去的经验和健康的政治理解力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光是依靠禁止的办法，不仅没有绝对的保障，而且没有比较重大的保障，足以使党防止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派别的产生。主要的保障是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注意那些通过党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发展中的种种要求、党机构的灵活性，党的机构不要阻碍而要发挥党的主动性，不要惧怕批评，但也不要派别活动的幻影恫吓人，因为恫吓多半是恐惧的产物！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只有辅助的性质，可是，这个决议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决一切内部困难的钥匙。如果认为，一个空头决议——不问党的发展进程、领导的错误、机构的保守主义、外部的影响，等等——就能使我们防止小集团的产生和派别的震荡，那就是过分肤浅的组织上的偶像崇拜。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

彼得格勒组织的历史就是上述情况最显明的例子。在禁止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彼得格勒就爆发了尖锐的组织上的斗争，结果形成了两个互相尖锐对立的集团。宣布其中一个小集团（至少一个）为有害的、罪恶的派别组织，骤然看来，似乎最简单不过的了。但是，中央断然拒绝了彼得格勒向它提出的这种办法。中央担当了彼得格勒两个小集团之间的

直接中介人，最后不仅保证了——固然，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它们的相互合作，而且使它们在一个组织内溶成一体。这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例子是不应该忘记的；为了清洗某些官僚主义的头脑，这个例子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每一个比较严重的和长期的党内小集团，尤其是组织上的派别，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的趋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它发展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或半敌对的阶级利益的反映。所有这些都完全属于官僚主义，甚至首先是属于官僚主义的。必须从这里动手。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预料，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那么，它在发展过程中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它的危险就在这里。但是，那些比别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露骨地主张**每一个意见分歧、每一类意见**（那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现的同志们，却不愿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僚主义，这一点大可注意，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其实，社会的标准在这里是最适宜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认为官僚主义是十分明显的恶行，是有目共睹和绝对有害的一种倾向，它虽已遭到正式谴责但并未根除。而且它怎能一下子根除呢！但是，如果像中央决议中所说的，官僚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也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能预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等量齐观。相反的，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愿望必然会在党内产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掩护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回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纯粹从形式上看成是异己思想侵袭渠道的派别活动，那这种看法本身就成了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侵袭的“渠道”。

可是，不能把认为党内的意见分歧尤其小集团活动就是各阶级影响的斗争这种看法理解得太简单、太肤浅了。举例来说，对是否需要用武力试探波兰的问题，我们是有局部意见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较谨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冒昧地作这种武断。这是在对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价上的意见分歧的。但是，双方在估计问题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解决。而在那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的问题上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根据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类不同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分歧意见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预防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老一套。如果我们越是严肃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就越能顺利地检验和区别性质不同的、目前反官僚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并抛弃其中一切敌对的和有害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党的机构在思想情绪上没有重大转变，那么，这项工作也就无法实现。相反的，我们遇到的却是党的机构实行新的进攻，它对形式上已遭到谴责但还没有取消的旧方针的任何批评都一概置之不理，借口说这是派别活动。派别活动既是一种危险——确实如此，那么，对保守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性熟视无睹就是犯罪行为了。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首先正是反对这种危险的。

关心党的统一是绝大多数同志最主要的、最殷切地关心的问题。但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如果目前对党的统一有严重威胁的话，或者说，至少对党的思想一致有严重威胁的话，那么，这就

是狂暴的官僚主义。正是从这个阵营中发出了只能被称之为挑拨的呼声。有人正是有鉴于此才敢说：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才到过去的历史中去暗中搜索，想从中发掘一切能够使党内争论更加尖锐起来的手段，人为地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和分裂，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逐渐使党在思想上同意新的分裂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自杀罪行是可能发生的。党要求减少制度中的官僚主义习气，有人则打算使这个要求与党的统一的要求相抵触。如果党走了这一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最必要的有生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推翻自己的主要保证以外，是一无所获的。如果对党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么，决不能片面地和带着下最后通牒的口吻要求党信任机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就是党机构制度中一切坏现象的主要根源。党不希望有派别而且不允许有派别。认为党会粉碎自己的机构或允许某人去粉碎自己的机构，那种想法是令人惊奇的。党知道，参加党机构工作的有体现着过去大部分经验的最宝贵的干部。但是，党想革新机构，并向它提醒：它是党的机构，是由党选举产生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如果彻底想一想目前党内的局面，尤其想一想这种局面在争论中是怎样展示出来的，那么，今后的两个发展前途就非常明显了。或者是：目前党内按照中央决议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这种整顿将真正成为党的有机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骤，成为重大的新的一章的开端——当然，只能是开端，——那时，也将是我们大家极其希望的、对党极其有利的结局。那时，党对过多的争论和过多的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对庸俗的民主倾向，就容易处理了。或者是：转入反攻的党机构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最保守分子的影响，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口号下重新使党回到昨天的“风平浪静”的立场上去。这第二条道路将是更加痛苦无比：当

然，它不能阻碍党的发展，但党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遭到更大震荡才能得到发展，因为它给那些有害的、起腐蚀作用的反党倾向以过多的营养。这就是两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我写这封“新方针”的信的用意就在于帮助党走上第一条道路即更经济的和更健康的道路。我完全坚持这封信的立场，驳斥对这封信所作的故意歪曲和不正确的解释。

托洛茨基

(三)

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

在莫斯科争论时通过的一个决议中，我发现有一种埋怨的意见，认为党内民主问题由于新老两辈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和实行人身攻击等而更加复杂了。这种埋怨说明思想是模糊的。人身攻击是一回事，而新老两辈相互关系问题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不分析党的成分——不论是社会成分，或是年龄和政治经历——而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就是使这个问题陷于空谈。

把党内民主问题首先作为新老两辈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提法是由我党全部过去历史所准备起来的。这段历史可以概括地分成四个时期：1. 十月革命以前25年的准备，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准备；2. 十月革命；3. 十月革命以后时期；4. “新方针”时期，即目前开辟的时期。

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虽然很丰富，它所经历的阶段很复杂很不同，但它只是一个准备时期，这一点在目前是完全不用争辩的。十月革命对党和党的干部作了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检查。我们所说的十月革命是指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最尖锐斗争的时期，譬如说，从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开始到实际夺得国家机器为止的

时期。以月份计算的十月革命这一章，就其内容说来，它的意义并不逊色于以年代或10年计算的整个准备时期。十月革命不仅对党的伟大的过去历史作了一次毫无错误的、破天荒独一无二的检查，而且它本身成了今后工作极其伟大的经验的源泉。十月革命以前的党通过十月革命才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真正的意义。

在夺取政权后，党的队伍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甚至有不健康的臃肿现象。像拥向有势力的显贵一样，向党拥来的不仅有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还有公开的异己分子：钻营之徒、野心家、政治上的寄生虫。在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党只是依靠那批经过十月革命考验的老近卫军切实实行内部专政才继续保持其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在稍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新党员——不仅是劳动人民出身的，而且也有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几乎都无条件地接受老一辈的领导。野心分子认为，他们依靠这种俯首听命的态度就能稳如泰山地保持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是，这些分子失算了。党通过严厉的自我清洗把他们清洗出去了。党的队伍缩小了。但是，党的觉悟提高了。可以说，党的自我检查和清洗是一个起点，那时，新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党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50万党员的集体，它不仅受老近卫军领导，而且本身也有责任了解基本政治问题，考虑和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清党以及与之相联的整个危急时期仿佛是目前正在党内生活中显露出来的这个深刻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大概将要以新方针的名称载入党的史册。

有一点是必须一开始就清楚了解的：我们所忍受的摩擦和困难，其实质不在于某些地方书记作得过火了，因而必须稍为阻止他一下，实质在于，全党都要转入更高的历史性的阶段。党员群众仿佛向党的领导机构说：“同志们，你们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这些经验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的；可是，在你们的领导下我们获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这种经验一天天在增多起来。我们不

仅想受你们领导，而且想同你们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我们所以想这样作不只是因为这是我们党员的权利，而且因为这是整个工人阶级十分必要的。没有我们下层的经验（不是简单地从上级那里参考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积极地带到党的生活中来的），党的领导机构是会官僚化的，而我们下层机构就会在非党群众面前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思想武装。”

如上所述，目前的转变是从过去的全部发展中产生的。表面上察觉不出的党内生活和思想的分子变化过程，早就为转变作了准备。销售危机大大推动了思想危机工作。德国事件的迫近使党震动了一下。正是这个时刻非常突出地暴露了，党的两层楼生活已达到何等程度：上层决定问题，下层只是打听决议。但是，对党内状况的批判性的审查工作由于局促不安地等待德国事件的即将爆发而推迟了。一旦发现这一事件由于事物的发展进程而推迟爆发时，党就把新方针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正像过去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旧方针”正是最近几个月内才暴露了最坏的简直不能容忍的缺点：党机关的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忽视党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只要一打算把关于用批判的态度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会敌意以对。当然，这不是说，党的机关是完全由官僚主义分子组成的，尤其是由某些旧习甚深和不可救药的官僚组成的。丝毫没有这种意思！绝大多数的党机关干部经历了目前的危机时期和懂得了它的意义以后，将会学到许多东西和抛弃许多东西。从目前转变关头中产生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最终将对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机构发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在而临目前这次危机的机构中，官僚主义的缺点发展到了确实很危险的程度。正是这些缺点使目前党内的思想整顿具有如此尖锐的性质，以致使人产生很自然的忧虑。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即：还在两三个月以前，只要一

提到党机构的官僚主义现象，一提到委员会和书记过分压制的现象，就会在中央和地方遭到主张党的旧方针的、身负重责的权威代表人物的冷眼相待或愤怒抗议。内定吗？无稽之谈！官僚主义吗？捏造，为反对而反对，等等。这些同志确实没有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的代表者正是他们自己。只是在下层坚决的推动下，他们才开始逐步承认：官僚主义也许有，不过只是在某些地方，在外省的组织中，在某些省和县中存在；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的偏向，等等。他们并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普通残余现象，也就是一种在逐渐（虽然不很快）减少下去的东西。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的根本虚假是不用赘言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个别外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产生，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其实适得其反，是从中央经过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时的“残余”，而是把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里来的结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起来的，但党的机构不顾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仍继续固执地代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所以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重大原则意义，这种意义是党在思想上应该完全估计到的。实际上，不应该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仿佛决议的全部精神实质在于书记和委员会更“温和”更“细心”的对待党员群众以及某些组织上和技术上的改变。要知道，中央的决议不是平白无故地谈到新方针的。党准备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问题并不像某些人企图描绘的那样，在于摧毁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问题是在于使这些原则适应党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条件。问题首先要在党的老干部和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多数党员之间建立更健康的相互关系。

理论修养、革命锻炼和政治经验是党的重要本钱，它的代表者首先是党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党按其本质说来，是民主的组织，也就是，由全体成员的思想和意志来决定本身道路的一个集体。十分清楚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党越能充分地利用老一辈所积累的经验，委托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党组织内最负责的岗位，那么，党就越能信心百倍地和正确地为自己开拓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老一辈由于在党内处于干部的地位和专心致志于管理工作的各种问题，所以习惯于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对待党员群众，则把纯粹学院式的吸引党员参加政治生活的方法（如成立政治常识班，测验党的知识，举办党校，等等）提到第一位。由此就产生了党机关的官僚化、它的闭关自守、它的孤独自在的党内生活，总之，产生了构成旧方针中深刻的消极一面的一切特征。关于党内今后生活中有分成界限明显的两层的危险，我是在论党内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信里谈到的，而且我所说的青年当然不只是指青年学生，而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这一辈党员，首先包括工厂支部。

党越来越尖锐地感到不舒服的毛病表现在何处呢？表现在党员群众下列这种自言自语或感觉中：“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没有我们参与和为我们包办代替的现象却太多了。一旦我们发出怀疑莫解、反对和批评的呼声时，回敬我们的是吆喝、遵守纪律的号召，更多的是被责难为反对派立场甚至派别活动。我们对党无限忠诚，并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党。但是，我们希望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无疑地；当基层群众这些情绪最初表现出来时，党的领导机构并没有及时地察觉和加以考虑，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一些反党集团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它们的意义固然不应有所夸大，但它们提出警告的意义却也不能加以缩小。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们的错误而形成的旧方针，其主要危险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的对立有日益加深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固执地保持下去，无疑地，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蜕化是在党的两极上发生的，即，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以及学生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相当多的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中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用品，即各种小集团和派别。像“工人集团派”这种小集团之所以具有预兆的意义，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在另一个极端上，即执政的极端上，这种拖延过久、党认为是官僚主义的方针，它的危险性也是不小的。如果不懂得或看不到中央决议对官僚主义的谴责正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谴责，那是可笑的、毫无价值的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问题不在于党的实践在个别地方有脱离正确的理想路线的倾向，而正是在于党机构所采取的方针，在于它的官僚主义倾向。官僚主义是否包含有蜕化的危险呢？否认这种危险是盲目无知的。官僚主义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有下列这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缩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或多或少地使老一辈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这种过程是缓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着的，但是一旦暴露出来却快得很。只有有了官僚主义的病态的多疑心理和党机关的傲慢态度，才会从这个以客观的马克思主义预见为依据的警告中看到某种“侮辱”、“侵害”一类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这种蜕化的危险是否很大呢？党懂得或感到这种危险并对此有积极的反应——比如政治局的决议就是因此而问世的——，这个事实证明党有雄厚的生命力，从而也发现抵抗官

僚主义毒素的有生力量。这就是采用革命的办法对党实行自卫的主要保证。但是，既然旧方针力图千方百计地通过压制，通过更多的人为的挑剔和恫吓的办法保持下来，总之，通过对党采取官僚主义的不信任的办法保持下来，那么，大部分干部遭到蜕化的实际危险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党是不能只依靠过去的本钱为生的。过去准备了现在，这已经够了。但必须使现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能跟得上过去，为将来作准备。现在的任务则是：把发挥党的积极性的重心转移到党的基本群众中去。

有人可能说，重心的这种转移是不能立即一蹴而成的；党不能把老一辈“送人档案馆”，就立即开始新的生活。对这种愚蠢的恶意的理由未必值得一驳。只有疯子才会说出把老一辈送入档案馆的话。问题正在于老一辈自觉地改变方针，从而继续保证自己在独立政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必须使老一辈把新方针看作是党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种手腕、一种外交方式、一种暂时的让步。那时，担任领导工作的一辈人物和全党都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党的社会成分

当然，问题不仅限于新老两辈的相互关系。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来，问题是由党的社会成分决定的，而且首先是由工厂支部和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在党内所占的比重决定的。

执政阶级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国家机构、合作社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人化，按其本质说来，就是削弱党的基本工厂支部并使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出身的行政干部在党内大量增加。这就是事物的矛盾。只有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健康地活跃工厂生活和经常地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这种矛盾。至于这个主要过程实现的速度如何，它将经历那些来潮和退潮，目前还很难预察。不

言而喻，即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也必须尽力吸收更多的产业工人入党。但是，要大大改变党的成分，使工厂支部大约占全党2/3，这是不能很快做到的，是只有在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估计到最有经验和最积极的党员——当然，其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还有很长一段时期要在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和党机关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个事实本身也就包含有危险，将成为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

由于党内的需要，教育青年现在和将来都会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通过工农专科学校、党校、高等专科学校来教育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苏维埃新型知识分子，从而使年青的无产阶级分子不仅在学习期间而且按一般规律也在今后的一生中脱离生产；高等学校毕业的青年工人那时显然都将被工业机构、国家机构或这两个部门的党机构所留用。这就是破坏党内平衡、不利于基本工厂支部的第二个因素。

关于一个共产党员是从无产阶级、知识界出身或从其他阶级出身的问题，显然有它应有的意义。在革命后的初期，关于十月革命以前职业的问题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岗位调去担任某种苏维埃的职位乃是一种暂时现象。目前，在这一方面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无疑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乃是苏维埃社会中一定的类型，甚至往往不问每一个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的出身如何的。最近6年来，形成了相当固定的苏维埃社会集团。

因此，我们有——而且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这样一种情况：很大数量最成熟的党员都在不同的领导和管理机关以及经营和指挥机关内工作；另一部分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在学习；第三部分分散在农村里种田；只有第四部分（就人数说来，目前还不到1/6）才是由产业无产者组成的。十分清楚，党机构的增加

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化的缺点不是由于通过机构而结合起来的工厂支部产生的，而正是由于党通过管理、经营、指挥和学习等国家机关而实施的其他一切职能产生的。换句话说，在工业的发展并不十分迅速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政府机构和机关上去，乃是党内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鉴于这些主要事实和倾向，我们应当更清楚地了解党的老干部的蜕化危险。如果认为只是由于老干部经历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锻炼，他们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堕落和机会主义蜕化的自满自足的保障，那便是浅陋的偶像崇拜。不！历史是通过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人们常常决不是有意识地在创造历史，其中也包括创造自身的历史。归根结蒂，问题当然是由具有国际意义的各种重大因素来解决，如：欧洲革命发展的进程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但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这些客观因素上去，这和只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主观激进主义中寻找保证一样是不正确的。在具有同样的革命精力和同样的国际条件下，党反对腐化倾向的斗争却有好有坏，这决定于党对危险的认识程度和克服危险的积极性。

十分清楚地，由整个环境所产生的党的不同社会成分不是削弱，相反的是大大加剧党机构的方针中的一切消极方面。要克服各部分党员的地方行会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除了他们在党内民主制度下积极接近起来以外，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办法的。党内的官僚主义一方面拥护“风平浪静”，把一切都加以隔离，同时又以同等沉重的分量，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既打击工厂支部又打击经济工作人员，既打击军人又打击青年学生。

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无怪乎列宁同志建议要广泛地吸引学生来反对官僚主义。青年学生就其社会成分和社会关系来说，是反映一切有代表参加我党的社会阶层的，并且受他们情绪的影响。由于年青热情，青年学生总是立即使这种情绪激动起来。他们作为青年学生总是力图说明和归纳问

题。但这决不是说，青年在自己的一切表现和思想情绪中都是反映健康的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党内万事如意，或者是青年不再反映自己党的情绪了。但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有人说，我们的基础不是学校支部而是工厂支部，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说青年是晴雨表时，我们正是认为他们的政治表现不是具有主要意义，而是具有征兆意义。晴雨表不能创造气候，只能预察气候。政治气候是在阶级的深处和阶级相互冲突的地方造成的。工厂支部使党和我们的主要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系。农村支部在差得多的程度上与农民建立联系。使我们和农民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军队支部，但军队支部处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最后，从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中招收来的成分复杂的青年学生反映着我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如果我们不是十分用心地了解他们的情绪，那我们就会是感觉迟钝的人。在这一问题上还必须补充的是，我国大部分新的学生都是具有一段对青年一代说来十分重大的革命经历的党员。目前最热心的党机关迷对青年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是完全徒劳无益的。青年是我们的检查者，是我们的接班人，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如何克服因自己的苏维埃职权而分离的党内各个部分和集团地位不同的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并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决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古董，相反的，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中产生的新现象。

无产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国家来实现自己专政的。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因而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整个问题在于如何实行这种领导，而不过分密切地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构纠缠在一起，并在这种纠缠中遭到官僚主义蜕化。

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员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

起来的。他们在国家机关内相互之间是处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并与非党群众保持复杂的个人关系。他们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因为这是涉及到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共产党员直接参加生产，参加工厂委员会，管理企业、企业托拉斯、辛迪加，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既然问题涉及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所以党要考虑——应当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阶梯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我们党的主要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它能够每个具体的时刻通过党员施工、党员工会干部、党员经理和红色商人的眼睛来观察工业，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结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

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主基础上才能实现。相反的，机关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越会被它的执行机关（党委会、支委会、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强调这种方针时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书记可以任免人，发布指令，追究责任，等等。在领导上发生了这种退化现象时，党的主要的无可估价的优越性——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就失去了意义。领导具有纯粹组织上的性质，常常转变成简单的强迫命令。党的机构日益陷于解决苏维埃机关的琐碎任务和问题中去，一天到晚关心它的日常问题，受它的影响，结果，党的机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果说作为集体的党组织一向具有比国家机构的任何组织更丰富的经验，那么，对于党机构的个别负责人就决不能这样说。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其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门、官僚主义情报和书面资料的附属机构，并用这个原来使自己同苏维埃机构接近的附属机构，把自己和生龙活虎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像德国的名言所说

的情况：“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官僚主义日常行为都进入到党的机构中来，造成了党机构内官僚主义的发展。作为集体组织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行领导。因此，即使在领导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有不满或怀疑的情绪产生。但是，这种领导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分散精力，因为它没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样，官僚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团结，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确影响作用。这一点总是那些在党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问题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们所不注意和不理解的。

托洛茨基

（译自1923年12月11日、28日、29日《真理报》第281号、294号、295号。徐平译）

附录 索科里尼柯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5年12月）

同志们，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许多人觉得是在大会前争论中很少研究的新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在大会之前没有在党的组织内进行充分的讨论，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增加我们在大会上工作的困难。无论如何，这个情况证明，现在人们指责中央的少数对于把这些问题提交广泛讨论应负责任，这是不对的。我们原来根本不曾打算把这些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广泛讨论。据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是由于许多争论问题在列宁格勒组织内讨论了

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了解，列宁格勒组织内讨论这些问题丝毫不预先决定把这些问题提到代表大会上来。我认为，对于一个组织，虽然是最大的组织批评了党中央政策中的某一点，中央尽可能心平气和。只是当莫斯科代表会议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报告作出决议，使其他许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处境仿佛是在列宁主义的队伍之外，从这时起，实际状况才起了变化。

当莫斯科代表会议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的报告作出决议说，某些观点是（而你们是很清楚这些名词的）取消主义、失败主义、阿克雪里罗得主义等等，在这以后，这个决议就真的动摇了我们曾经遵守、我们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完全遵守的布尔什维克的统一。

每个人都了解列宁格勒某些同志辩护自己观点和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这两个事实是无法比拟的，因为这个决议不是某个人的言论，而是中央本身在代表大会前的言论。我认为，辩驳列宁格勒代表会议的意见，可以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发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但是，是否需要中央出马，站到一边说自己一部分成员和一部分政治局委员有失败主义、取消主义、缺乏信心的过错等等。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在极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知悉下通过的。正是这个决议在列宁主义者中间划了一条界限，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这条界限两旁分开了。结果就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及做了副报告。

应当求得至少在基本上说清意见分歧。我们仅仅打算说明这些争论问题和我们的经济实际有何联系。这里的争论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吗？有的。显然问题并不是像某些同志在这里了解的，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应当在苏维埃系统提出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在代表大会上指出基本的路线、基本立场，然后再在苏维埃和党的方面加以发展。应当指出与实际任务有着联系的

这条基本路线。我认为，在这里讨论了的那些问题的假名称之下，实际上为讨论三个基本经济的同时又是政治的问题作准备。这三个问题如下：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成熟的程度；由于对社会主义因素这种成熟的程度作不同的估计，而提出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同的实际路线。第二个问题，城乡关系中的何种变动使农村中的分化日益增长。现在在发生分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第三个问题，苏联经济和国外市场应建立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经济现在依靠的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成熟程度的问题是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假名称下讨论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布哈林和列宁的争论中就提出了。布哈林同志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合，所以显然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会有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从原则上排斥这种可能。”（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第一部分）

这是一种提法。布哈林同志过去和现在的观点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般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还要引证列宁一个著作中的一段话。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这样提出问题：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这些黑体字删掉，不要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而同样用国家，但已是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那你们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列宁同志在同一篇文章中举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许多例子：粮

食垄断、受监督的贸易、资产阶级合作者。

现在我们的情况如何呢？为了弄清楚我们在经济中有那些因素，当然不能仅限于提到工业。除了工业以外，我们还有“工业”这个名词包括不了的国家经济范围：铁路、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信贷系统。

请问：当铁路这种过去沙皇制度下的国家企业转到新政权即工人政权手中时，从这时起铁路是否实际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单位了呢？否。正如列宁同志所写的，仅仅给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列宁同志写道：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用一个新型国家来代替容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你们就有了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各种条件。你们将有属于国家的企业，而由于这个国家是工人国家，这就保证了无痛苦的、和平的、不经过新的革命，不再经过夺取政权的斗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照列宁说，犹如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国家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转变，资本主义因素逐渐消亡和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加强的过程中。没有疑问，我们这里现在还没有一个工厂能称作完全社会主义的组织。我们有没有已经是完全社会主义的企业呢？没有，甚至在工业中。

（喊声：“而铁路呢，你把它算进国家资本主义去吗？”）但是我不仅谈到工业方面，我问一句：我们的对外贸易是怎样组织的？我们的对外贸易是像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经营的。如列宁同志所说，1918年的粮食垄断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国内贸易组织也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还要说，国家银行也正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我们的货币系统呢？我们的货币系统的基础是，在苏联经济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货币系统浸透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任务在于，在无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这样组织经济，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常识。怪

得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争论。

但是如果一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如果否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决不意味着全部经济的根本改造，而只是意味着财产转归新的国家，转入新的阶级手中，以及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如果这样了解，那么我们就很清楚，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使国家资本主义组织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组织，使私人资本因素消失。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应当向工人说清楚，他做工的工厂是什么性质。工厂是国营的，属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国家。我们可以说，这种类型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关系。但这种类型的关系发挥自己可能性的程度，真正达到社会主义“实质”的程度，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们说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时，往往忘记了一点：我们不应从静止不动的状态来看这个社会主义的工业，我们应当从过程中，即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来看它。但参加再生产过程的不仅有国家，而且有私人资本。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现在是在私人资本参加再生产的条件下保证自己可能再生产的，因为产品的推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私人资本的，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个私人资本从再生产过程中抛出去，我们就会发现，如今私人资本这些异类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参加经济过程。而且我们整个的经济体系，由于和商品经济有联系，由于和信贷系统有联系，由于浸透了货币关系，所以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这些因素有着联系。因此我要说，如果我们在事实上作出从布哈林同志对我们经济的不正确分析中必然产生的那些实际结论，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难道不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从今年秋天起在经济战线上遭受的损失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过高估计了我们国营经济现在领导全部国民经济的可能；我们的困难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正是因此我们才发生了一系列局部的危机。如果我们采取了必然从错误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产生出来的那种观点，

采取了那种当我们在实践中尝到这些错误的味道时而会给这些错误加上理论基础的观点，那是不足为奇的。

粮食采购计划的错误、进出口计划的错误现在已使我们削减信用计划并修改我国工业发展的计划，这一切是由于什么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目前实行坚定计划领导的可能，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计划的意义，我们硬要订出的经济计划由于我国无政府状态因素、小资本主义因素的巨大势力而无法实现。今年秋季的经验，以及过去我们遭到的困难和现在的困难都说明一点，不要过高估计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熟程度，要知道你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行动，要了解你手中掌握的是怎样的经济机器。

我很担心，列宁同志所说的“左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辞句”这种思想如今在布哈林同志身上复活，这种“左倾幼稚病”的复活可能给我们的经济严重的打击。

我认为，今年秋季的经验是警告我们相反的道理。

很清楚，当我们不得不缩减工业的发展（而且我认为，尽管鼓起全部力量，我们今后在这个事业中仍会有很大的困难），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我们的工业，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我们可以不依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环境为转移而发展，因为这个环境给我们规定发展的规模和范围。

下面来谈另一个问题，农村中正在发展的分化过程在城乡关系中有什么意义呢？很清楚，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后（而且越来越这样）我们将看到农村上层经济比重的增长。这里我不打算来争论，中央统计局的哪些数字是对的，是以前公布的数字还是后来公布的数字。我认为，以后这个农村上层的经济比重将越来越增长。但是那时由此就产生出这种情况，如果在城市工人与贫农的政治联盟方面我们在农村中有中农，那么，随着上层经济比重的增长，在我们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经济联系方面，经

济结合将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个情况中有许多新因素。不看见这个情况，佯作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表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之后，当农村经济在私人小经济方面开始增长之后，上层中农农户就开始倾向于我们现在称为富农的集团并和他们结合。当我们说到和中农的联盟时（我一分钟也不怀疑这个联盟的必要），我们应当估计到这个基本情况，我们指靠中农决不能和指靠中农上层混淆起来。

如果迄今以前分析中农各阶层对于我们没有意义，那么现在这个分析对于我们就有了很大的意义。由于中农结构中的这些变化，我们应当特别仔细地在政策上理解哪些问题，例如关于粮食价格政策的问题。我们赞成怎样的粮食价格政策？你们知道，去年秋季曾有过从低额限价政策动摇到粮食高价政策方面的情形。然后在春季又发生了农民对粮价过高表示不满的风潮，所以很明显，当我们现在来规定粮食价格政策时，这个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估计哪些中农阶层的利益。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正是从与我有密切关系的方面，在这方面我和中央曾有分歧，这是关于改革农业税的问题。去年春季这个问题被取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动摇，有过不明确的地方。这种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农业税的改革在过去的计划和现在的工作都是要增加对富裕农户的征税。但是，同志们，我重复一遍，这在许多年里面是办不到的。请允许我确信，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里真的遇到了来自农村的反抗，这种反抗我们暂时还无法克服。因此，虽然我们增加对实力较大的集团的征收，以保证今年秋季从余粮户手里把粮食挤出到市场上来，但这样做在今年农业税收的工作中也没能帮助我们

布哈林同志说他已自动放弃了“发财吧”的口号，但我究竟要向你们说，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布哈林同志根本不是承认自

己的错误，他是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之后这样说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是对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感到兴趣，重要的是，哪些力量能够迫使布哈林提出这个口号。中央委员会迫使他收回了这个口号。而迫使布哈林同志提出这个口号的势力是与我们敌对的势力，即小私人资本势力的压力。（喊声：“胡说！”）

我们绝对应当考虑与我们敌对的阶级，但是不要把他们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合作化”的口号与“发财吧”的口号是两个相反的口号。

当我们来估计农村和城市的状况对工业的关系时，我们应当回答关于合作因素成熟程度的问题。我们应当根据的前提（承认不愉快的事情）在于，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比合作社的发展快得多。我们指的是要加强合作社，至少要使合作组织能够克服日益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因素。而现在农村中占优势的是什么呢？占优势的正是加强着的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因素。因此，如果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提出向哪个方面集中主要火力的问题，我则认为，不应提出向党内哪个派别和哪种意见开火的问题，而应当提出问题，按照什么阶级路线开火。很清楚，在这些资本主义阶层巩固和农村资产阶级上层增长的条件下，我们在政治上的火力应当集中在这些阶层的头上。我们现在在经济上不能阻止他们发展，虽然我们应当限制这种发展。我认为有可能限制这种发展，但是在政治上我们应当随着这种发展巩固自己的阵地。（喊声：“是为了燃起阶级斗争吗？”）不，在农村中进行选举运动是向农村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的一种方法。

（喊声：“发现了美洲大陆，这是小孩子都会讲的。”）请问，你们打算怎样进行这个政治运动，你们将在什么口号下进行这个政治运动呢？（喊声：“贫农与中农的联盟，这就是口号。”）如果你们不善于明确地规定集中火力的那条路线，那么你们在农村中任何政治运动都是搞不起来的。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对待从

农村这种分化现象中产生出来的问题过于轻率。无论如何，我们农村中经济的基本事实正是在于农村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集中火力。谁也不会主张回头去摘掉富农屋上的瓦，剥夺富农，这不算什么。谁也不主张这样。可是，让我们改革农业税。让我们用农业税来限制农村中富农和富裕成分的增长。我们把这件工作已经拖了一年了。

最后，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由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这是关于我们的经济及其与世界市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这里有两条总路线。

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适应着我国所有的资源发展我们的工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我们需要工业最大限度可能迅速地增长。但值得争论的是：哪一条道路能最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呢？无论如何，我们要向代表大会充分提出这个问题。哪一条道路能最迅速地提高近年来落后于外国技术增长速度的我国工业呢？我回答说，有两条道路使我们能够迅速发展和重新装备我们的工业。第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现在我们是行不通的）在于吸收外国的长期贷款，以取得资金、输入必需的装备；只要输入这种装备，就能轻而易举地重新装备和发展我们的工业。但由于没有这些贷款，则剩下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开展我们的输出的道路，输出在最近年代内可能仅是农业品的输出。只有走发展农业品输出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在最近年代内从国外取得支付手段，付款输入我国工业所需的装备和原料，并重新装备和发展我国工业，如果我们真想在速度和规模方面和外国工业并驾齐驱的话。

但是如果这样，斯大林同志就完全不正确了，他把发展我国工业的纲领与从国外输入装备的纲领相对立。其实，只有当我们从国外输入制成品过多的时候，我国工业才会遭受损失。

增加农产品输出以输入装备的这个纲领与发展工业的纲领有

什么矛盾呢？没有任何矛盾。所以，当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两条总路线时，他无疑陷于混乱，因为他应当用别的话来讲这两条路线，应当不说输入装备，而说输入制成品。这样才会有对立，而那样是不会有对立的。但是请允许我更具体一点谈谈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曾简短讲到的问题，即当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时，我国应当是经济上独立的国家。当然，我们应该建立和巩固可能在我国建立的那些工业部门。

但是这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采取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方针？我们是否认为，除了和世界市场密切联系以外，我们不可能而且将来也不能有别的办法来发展联盟的全部经济？当斯大林同志说，在许多年内，农业将要比工业发展得更快，不是因为我们不想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工业（我们都会愿意尽快发展工业），而是因为农业在投资比工业少得多的条件下才能够发展，——这是无需争辩的。我国的农业和比较有高度组织的工业相反，它陷于中世纪的落后状态，即使不用基本资金大规模重新装备农业，也能从这种落后状态达到高涨的。这乃是我国现实经济计划的关键之一。请问，出路何在呢？在农产品占多数的条件下，出路在于走向国外市场，而且走向国外市场的问题对于我们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拿这些不断增加的农产品到国外市场上去呢？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当然，我们走向国外市场，首先是为了输入工业所必需的装备和缺少的原料。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和国外市场联系，我们不能离开国外市场。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中不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免不了靠农产品出口输入装备。

至于我们党的组织领导的问题，应当密切联系我们经济政策的问题来看。我首先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些组织问题。从在整个经济加重负担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现有的高涨和高速度中，不仅产生出令人满意的业绩，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产生出解决所有任务的

复杂情况。同时，在每一个充实起来的部门中，形成自己的利益。这个部门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经济领导中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加剧；以前从来还没有过象近几个月来这样的冲突和矛盾，这个那个经济任务轮番提出，每一个工作部门和方面都企图尽量把经济上的权柄推到自己方面来。因此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在这个经济领导中要有最大的坚定意志的任务。由于我们没有充分协调一致和坚强的党领导，这种坚定的经济领导被破坏了。经济不是自发地发展的，而是在主要机关领导下发展的。

同志们，党代表大会不仅应当保证明确所有一切政治问题及其他问题，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它还应当真正保证明确对全党和全国经济的领导。

（译自1925年12月29日《真理报》第296号。
徐平译）

附录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
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
叶夫多基莫夫六人声明

（1926年10月16日）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之后，我们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与大会的多数及中央分歧了。我们的观点表达我们在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发表的正式文件和发言中。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些观点。我们坚决摒弃“派别与小集团自由”的理论与实践，承认这种理论与实践是和列宁主义的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切实贯彻党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

同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向党公开承认，-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和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是绝对错误的，声明坚决放弃用派别方法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这种方法危及党的统一，并号召同意我们观点的所有同志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们号召立即解散一切围绕着“反动派”观点形成的派别小集团。

同时我们承认，不顾中央的决议而开始全国争论，我们在十月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表的言论违背了中央关于不允许全国争论的决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到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不正确的，因为，尽管克鲁普斯卡娅决无此意，旧事重提却可能被人理解为分裂的远景和以分裂进行威胁。我们一致摒弃这样的远景，认为这极端危险并且与我们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坚决申斥那种变成攻击的对共产国际或我党政策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削弱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共产国际的地位，削弱共产国际的先头部队苏联共产党，削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不仅科尔什以及像他一样与共产主义决裂了的人，而且超出这些范围的任何人的宣传，都必将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击。我们断然否认那些进行任何反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或苏联的宣传的人自命与我们同心同德的权利。

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每个成员有权在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认为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支持共产国际个别支部中任何集团进行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派别活动，不论这是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德国的马斯洛夫-费舍尔、乌尔邦斯-韦伯集团，意大利的波尔迪加集团或任何别的集团，不论这个集团对我们观点的态度如何。我们认为特别不许对已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的人如鲁特·费舍尔、马斯洛夫的活动有任何支持。

奥索夫斯基在文章中表现的观点，以及麦得维节夫的在《真理报》上被分析过的观点（“两党”论，宣传取消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企图与社会民主党统一，使租让政策超出列宁规定的范围等等），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认为是极端错误，反列宁主义并与我们的观点根本矛盾的。列宁对施略普尼科夫和麦得维节夫同志所捍卫的“工人反动派”政纲所作的估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赞同。

我们认为应绝对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绝对服从并执行这些决议。

我们每人只应通过由党章、代表大会和中央决议所规定的形式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深信这些观点中正确的东西将会被党在今后工作进程中加以采纳。

* * *

近几个月以来，许多同志由于违背党纪和采用派别方法为反对派观点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由上所述，下列签名者对这些行动的政治责任显而易见。我们坚决希望，反对派用实际行动停止派别斗争，将使被开除的同志们能够重新加入党的队伍，只要他们已经承认违背党纪和党内统一利益的错误，况且我们有责任尽力协助党消灭派别斗争和反对违犯纪律的旧病复发。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皮达可夫

索科里尼科夫

托洛茨基

叶夫多基莫夫

1926年10月16日

（译自1926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40号。

徐平译）

附录 八十四人声明^①

(1927年5月)

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下面的信，从它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在出现了如下的情况之后写的：蒋介石的叛变和柏林协议已经表明，中央的多数派在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策以及在一些国内问题上的明显的投机，使得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把这封集体的信件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现在，英国的保守党人已经使外交关系陷于破裂，其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对中国革命以及对英国本身的工人运动的政策的优势。由此而形成的极其紧张的形势，使这个党的文件具有十倍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处境越是困难，则越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正确的路线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假使掩盖错误，那就是闭着眼睛走向深渊的边缘。有人叫喊说：现在英国正在破坏外交关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却瓦解自己的队伍，或者更坏的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些困难，——对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叫喊，我们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冷静地置之不顾。我们在列宁的学校中已经学会了对一切附有条件的东西、伪善的东西、装点门面的东西

^① 这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一个重要文件，又叫《八十三人声明》、《五百人声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波诺马辽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称为《八十三人纲领》和《八十三人政纲》。——译者注

以及同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不予理睬。我们面临的任务和困难越严重，就要越坚决地提出党的国内外政策中的一切主要问题。例如革命和战争这样一些问题上，玩弄一文不值的花招，一个劲儿等待或者瞎忙一气向来是无助于人无济于事的。

在这里无需重复说，我们需要和平政策。假使战争真的在我们头上爆发了的话，那么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雇农和贫农，以及另一方面，每一个富农、每一个官僚和每一个耐普曼都会提出问题：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它是以什么名义而发动的？它以什么方法和手段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危险也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的一切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言论和行动上给予明确的答复。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些答复，而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模棱两可、束手无策、在各个阶级之间摇来摆去、举棋不定——可能使我们陷于灾难。相反地，一条明确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则能够使我们得救，并且一定会使我们得救。

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最近以来它人为地被剥夺了讨论以及集体解决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命运所联系的问题的机会。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有人为它、为这个党操心并且作出种种决定。在严重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制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声明。中央委员会能够而且必须给党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并从而使党能够有充分的把握去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在这条唯一的拯救党的道路上，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支持中央委员会。

格·叶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伊·斯米尔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6日

致联共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在领导中国革命当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只有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才能加以克服。讨论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时的那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在党内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形势。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由布哈林等人领导的党的理论机关刊物）上所进行的片面的“讨论”，以及对反对派的观点的有意歪曲（例如硬说它要求退出国民党），表明中央委员会中的领导集团企图通过迫害反对派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在把党的注意力转到错误的方向。

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由于中央在党的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路线，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声明。

1. 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在中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问题还在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遭到了失败。

尽管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尽管上海工人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举行了起义并且占领了该城；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拥有起义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总之一句话，尽管取得“中国的1905年”（列宁语）胜利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工人为资产阶级进行了火中取栗，而且迄今为止是扮演了工人在1848年革命中注定要扮演的那种角色。

把中国工人（尤其是上海和汉口的工人）武装起来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然而，英雄的上海无产者却没有武装起来，即使现在，汉口的多数工人也还没有武装起来，虽然在汉口是“左派”国民党占统治地位。（而两个月以后，蒋介石就在汉口消灭了共产党人，并且把权力夺过去了。——作者）

在中国的“领导”事实上只限于发布指示：不能组织革命的罢工，不能武装工人，不能彻底发动农民反对大地主，不能出版

共产党的日报，不能批评右派国民党中的资产者先生们和“左派”国民党中的小资产者，不能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以便不致“推开”资产阶级，不致“吓跑”小资产者，不致动摇“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作为对此的答复和答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如本来应当料到的那样——枪杀中国工人，而且今天请求日本帝国主义者、明天请求美帝国主义者、后天又请求英帝国主义者来帮助自己。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其中包括联共党内的广大党员)，大家对于中国的失败都感到十分迷惑莫解。有些人昨天还在告诉全世界说：中国的国民军是红色的军队，蒋介石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中国——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会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现在，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路线针锋相对，有人却在发表一篇篇无可奈何的文章和讲话，说什么：中国根本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中国大体上刚刚在经历封建时期的开端；中国人不会读书写字等等；在中国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纲领和建立苏维埃，还为时过早。那些人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在扩大错误。

中国的失败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对苏联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帝国主义者如果能长期“制伏”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进攻我们苏联。中国革命的失败可能使反对苏联的战争异乎寻常地迫近。而在这种情况下，党却被剥夺了彻底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而中国问题对于它——共产国际中的第一个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准彻底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粉饰中央领导核心的错误路线，却组织一次冷冷清清的——当然是片面的——讨论，即对反对派的迫害。

2. 去年英国的总罢工，被总委员会^①出卖了，背叛了，遭到

① 指英国工联总委员会，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26页。——译者注

了失败。矿工的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千千万万的群众大大地向左转了，尽管在这次英国的大罢工中，改良主义的背叛和卑鄙行径空前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但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所取得成绩却极其微小，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方面的领导举棋不定、首尾不一和一贯地行事半途而废。苏联工人在经济上对英国矿工的支持是很出色的。但中央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支持了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的权威，而且恰恰是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极其危急的时日里支持了他们。我们从而帮助他们站住了脚。最后，在最近的柏林会议上我们又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的代表（甚至是它的各种观点的唯一的代表），而且赞同了不干预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事务的“原则”。

在中国事件的背景下，英俄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决议就尤其显得糟糕。托姆斯基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另一些代表在全国的报刊上宣称：柏林会议具有“亲切的性质”；一切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些决议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所谓胜利等等。

这一切胡言乱语只能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到新的失败。

柏林会议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强盗行径只字不提，它根本不要求帝国主义的军队撤出中国。当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始了反对中国革命的公开战争时，英俄委员会罪恶地保持沉默，即恰好做了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事情。

那些今天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背叛英国无产阶级利益——而且甚至是在英国工联的自由这样一个问题上背叛——的人，一旦发生了反对苏联的战争，这些先生们会扮演他们在1914年已经扮演过的那种卑鄙的叛徒角色，对此难道还容置疑吗？

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这二者之间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的路线现在也通过共产国际的总政策表现出来了。现在，在德国，成百名左派无产者和

先进工人被开除出党了，因为他们同俄国的反对派共同发表了声明。右派分子在各国党内越来越占极大的优势。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德国、波兰、法国等国）仍然没有受到惩罚。从左的方面进行一点轻微的批评，就导致分裂。**苏联共产党和十月革命的威信被利用来把各国共产党拉向右转，使之离开列宁的路线。**由于这一切，共产国际不能按照列宁的方式来准备和进行战争。

3.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以及在英俄委员会方面的错误路线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苏联的经济总的来说已结束了自己的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工业、农业以及苏联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我们或者是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甚至在合作化方面成绩也很可观。这些成绩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列宁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成绩也是对十月革命的敌人的最好的回答。事实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初步的成绩，因此，正在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准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但是，在取得了这些重要成就的同时，由于是恢复时期，也出现了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和我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有些人向党员群众隐瞒这些困难，这就反面增加了困难。他们不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情况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用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来款待党。这种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导致的结果是：党越来越难以看到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而革命的目前时期的种种消极现象，恰恰在于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阶级分化，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困难的处境。

工资和失业问题越来越尖锐。

错误的政策加速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富农、耐普曼、官僚分子的增长。这就导致如下的结果：我们不再可能为了工业和全部国营经济而适当地、正确地利用国内现有的原料。大工业既落后于国民经济向它提出的要求（商品匮乏、物价高、失业），也落后于整个苏维埃制度向它提出的要求（国防），这就使得苏联的资本主义成分加强了，——尤其是在农村。

工资不再增加，而且在个别部门甚至有降低的趋势。近来，劳动生产率一般都已提高，但是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工资，而照例却采取如下的作法：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工资（参看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所作的第2条决议）。这就意味着，苏联的工人从现在起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同时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而只能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和体力来改善自己的物资状况。尽管劳动强度基本上已达到甚至已超过战前的水平，现在却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失业的增长不仅牺牲由农村来的人的利益，而且牺牲基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的失业比已经登记的要多。失业大军的增加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

在许多地方，工人的居住条件，无论就居住面积或使用条件而言，都仍然跟过去一样地恶劣。

减少对成长中的工人的资助以及取消免费的学习时间，使青年工人的状况大大恶化。

显而易见，由于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因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之间的关系，对于工人国家的命运来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得微乎其微：虽然反对派在中央二月全会上赞成关于降低物价的决议案，而整个官方的宣传鼓动却指责反对派，说他们不愿意降低物价。这样的宣传鼓动使党误入迷途，

使它不去注意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降低物价的问题根本并没有接近于解决。因此，城乡消费者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

农民的分化进行得越来越快。中央领导核心从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起，到要求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止，发展到了对农民中的分化讳莫加深，加以抹煞，同时在实践上依靠经济上强大的农民。在十月革命的1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却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350多万农业工人在各地的苏维埃、合作社和党支部中只扮演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贫农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和帮助。最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农业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农村中的分化，即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由于这一切，农村对我们的支持被削弱了，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联盟变得岌岌可危了。只有同富农的剥削倾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个联盟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这种斗争的重要意义却被抹煞，这种斗争的发展却受到阻挠。这样的政策构成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长期地日积月累，有朝一日会突然爆发出来。可是，党和苏维埃的整个官方机构却向左开火，并且对真正的即来自右边的阶级危险大开方便之门。

免除50%的农户即贫农和贫苦农民的农业税，——这一建议被用来进行打击迫害。然而，这一建议被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越来越证明是正确的。在50来亿的预算当中，几千万卢布只具有非常微小的意义。可是向贫苦农民征收这个数额，却会加速分化的过程，并且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语）。这应当是我们的农村政策的基本路线。

去年9月，我们读到了由3位占据最负责的岗位的同乡（李可夫、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同志）签署的一个呼吁书。其中说：似乎反对派，即我们自己党内和我们自己中央委员会内的一部分人

想要“剥夺”农民。呼吁书允诺要通过节约每年缩减3至4亿卢布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实际上这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厉行节约的斗争，又把工人折腾了一番，而没有取得任何令人可以感觉到的结果。

工业的合理化带有偶然的、时作时辍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它导致的结果是：尽管成本并没有因之而有所降低，却有越来越多的一批批的工人被抛入失业的行列。

必须取消最近两年来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的一切决议，并且一劳永逸地明确：如果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改善工人阶级“这一基本的生产力”（马克思语）的状况，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既不可能发展经济，也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

为了有可能解决党当前面临的经济建设问题——而且何况又是在国内的阶级结构错综复杂、外国对苏联的进攻日益迫近的情况下——，由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延迟，必须首先活跃党内民主，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积极的联系。

我们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铁的纪律。可是，我们也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党内民主。

全党必须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 and 组织团结成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它和全体党员群众一起，切实地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共同解决有关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一切问题。

最近以来，党内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党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积极性大大地降低了。下层的广大党员群众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自觉地参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

这表现为，而且不能不表现为工人阶级同党的关系中、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活动中的一些消极的现象。

现在党内流行的制度被完整地搬到了工会中。俄国工人阶级具有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进行三次革命的经验；它以自

己优秀儿子的鲜血奠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它创造了英雄主义和组织的奇迹；这个工人阶级具有一切先决条件去广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和组织力量。但是，现在流行的制度，妨碍工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充分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遭到削弱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告诫党说：正确地挑选人材是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可是，现在的方针恰恰是对这些指示的否定。事实上，一些最积极主动、技术最熟练的党员同志，一些热爱事业的经济工作人员，经常不断地被赶出企业，无一例外地被那些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善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阿谀奉承的分子所代替。党的制度中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不正常现象；就这样在千百万群众的极其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4. **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战争危险正在增长。现在，苏联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锋队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争（至少是尽可能长久地推迟战争），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只有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才能贯彻到底的和平政策。

苏联的事业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使苏联避免迫在眉睫的新战争危险，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通过同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结成联盟，无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用同珀塞尔、西特林之流结成同盟的办法，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斗争以制止战争。只有越过那些叛卖的领导人并且与之作斗争，才能把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和非党的工人吸引过来和发动起来去进行反战的斗争。

我们坚决主张，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协助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以文件为根据对中国最近的事态进行详细的、认真的、毫无偏见的讨论（并且要吸收了解我们观点的同志参加），以便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广泛地提出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以便不仅使我们党，而且使国际的共产党报刊能够详细地、

彻底地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自然应有必要的保密）。

苏联国际地位的巩固有赖于苏联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加强。不增加工资，恶化工人的居住状况、增加失业，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对贫农的错误政策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由于经济政策中的缺点，我们被削弱了。由于英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被削弱了。最后，由于错误的党内制度，我们被削弱了。

我们党的总的政策就是吃了右的方针的亏。既然现在对反对派实行有计划的打击，于是，部分地存在于我们自己党内、大量地存在于党外的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横行无阻，弹冠相庆。打击左派必然使乌斯特里亚洛夫倾向获胜。乌斯特里亚洛夫早就以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名义，要求对反对派实行这样的打击。乌斯特里亚洛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彻底、最坚决、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些自满自足的行政人员，那些紧跟领导的职员，那些爬到了领导岗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小资产者，——所有这些都感到自己的脚跟站得越来越稳，他们越来越趾高气扬。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的新经济政策分子。他们的后面站着专家——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追随者，而最后一排还有以经济上强大的农民为幌子的耐普曼和富农。真正的危险就来自这里。

这种投机在国内问题上暴露得不象在国外问题上那样明显，因为国内的一切过程，其进展比英国的总罢工或中国革命要缓慢得多。但是，政策的总倾向在两种场合下都是一样的，这种倾向在国内事务上进行得越缓慢，它将来就可能表现得越严重。

列宁说，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农民占优势、官僚主义的腐化现象很严重的国家中的工人国家。这话是在1921年初说的。列宁的这个定义现在尤其具有生命力。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城乡的新资产阶级成了一股严重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击反对派，这无非是意味着企图在维护团结的虚伪的喊叫声中（恩格

斯说：“任何分裂的罪魁，团结喊得最响亮。”^①）诋毁和狠狠打击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左派。这样的狠狠打击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联共党内的右派会很快地得到加强，无产阶级的利益显然会要屈服于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5. 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党的团结，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在列宁的学校中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应当通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路线来谋求团结。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在非法的年代里，然后是在1917年，当我们在战争的包围中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在1918年，当我们在空前苛刻的条件下解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后来的年代里，列宁领导下的党都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找到了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团结的道路。在比现在的条件要更加严重得不可比拟的条件下，那种作法拯救了我们。

主要危险在于：对党和工人阶级隐瞒了分歧的真实内容。要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党的面前的任何企图，都被说成是妄图破坏党的团结。这条错误的路线是由上面机械地确定的。这会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团结和形式上的平安无事。然而事实上，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工人阶级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种情况大大妨碍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以及它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一旦出现急剧的转折，一旦遇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打击，就必然给我们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正是为了党的团结一致，根据列宁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中央委员会预防这种危险。

^① 恩格斯的原话是：“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译者注

应当如何克服分歧，如何端正阶级路线，而又丝毫不损害党的团结呢？

就是要采取列宁在世时的一贯的作法。

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应作出如下的决定：

1. 至迟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3个月召开一次专门的中央全会，以便事先讨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

2. 这次全会应提出一项任务：尽最大的可能草拟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各项决议。因为通过这种作法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团结并且真正消除党内斗争。

3. 该全会应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坚决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重新接纳已被开除、但请求共产国际重新接纳并且站在共产国际基础之上的同志，以便在各兄弟党内搞好充分的团结（当然，这与卡茨和考尔施之流无关）。

4. 如果在这次非常的全体会议上难免产生原则分歧；那就应当及时地把分歧表述和公开出来。每一个同志都应当有机会在党的面前、在报刊上和会议上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在世时我们就一直是那样做的。

5. 论战应当在严格的同志式的、切切实实的界限内进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

6. 无论中央委员会的或个别组织、个别党员、一批党员的提纲草案，都应大致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2个月，在《真理报》上（或《真理报》的附刊上）和地方报纸上发表。

7. 党的出版机构也要努力为那些愿意向党摆出观点、但至今没有在党内获得多数的同志出版小册子、文集和各种书籍等等。

8. 进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准备工作当中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团结的口号，——苏联共产党的真正的、列宁主义

的团结的口号。

附言。我们的声明，由于要经过大家签名，自然就出来得晚了一点，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现在，来自上面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正在加紧进行，而借口是，他在5月9日的一次所谓非党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凡是听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演说的人，或者有机会看了那个演说记录稿的人，都会片刻也不犹豫地在那个演说稿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真理报》渗透了马尔丁诺夫的方针，他的演说用温和的和无可挑剔的形式表达了党内广泛人士的担心。不言而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演说仅仅是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表面上的借口。从我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迫害反对派的运动的直接准备工作，在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就已开始了。

看来，似乎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的直接目的，是要实现这样的企图：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不经过党代表大会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便在准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减少一个对错误路线的批评者。对中央委员会持反对派立场的其余的党员，明天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玩弄这样的花招，除了使党受到损害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之一，是根据列宁的建议而选出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由于政治局的阻挠，现在他不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却不让他参与讨论世界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声明：那些只想用行政权力的命令来代替思想斗争的人，没有丝毫的政治勇气。撇开事情的政治意义不谈，这里的问题是粗暴地破坏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正式的权利。排斥和搞臭列宁主义者，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不是达到团结的道路。我们的这个声明很可能被作为指责我们

搞派别活动的借口。“新的”“青年”学派中那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官员和“文人”，将会特别卖力。而我们的信件的锋芒之所向，其中也包括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危险的时刻会首先置无产阶级的事业于不顾。我们提出这个声明，就是履行人们始终认为是置身于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行列中的革命者和党员的义务。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我们毫不怀疑，还有其他许多现在在苏联的不同岗位上、或者在国外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只要及时了解到了这件事情，也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毫不怀疑，这个文件中阐述的观点，会得到我们党内大部分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工人的赞同。谁了解工人和我党党员的真正的呼声，谁就明白，情况一定会是这样。

本文件最初是由83位同志递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签名的人数很快就增加到了500人。1927年7月1日就已达而且超过了这个数目。签名者的总数约为3,000人。许多签名者都是非常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下列的同志，我们注明了他们的党龄：

别洛博罗多夫(1907)；维斯涅夫斯卡娅(1905)；武约维奇(1902)；瓦西里也夫(1904)；瓦尔金(1907)；A·格尔季克(1902)；H·戈登(1903)；叶梅利扬诺夫(1899)；叶甫多基莫夫(1903)；舒克(1904)；季诺维也夫(1899)；萨克斯-格拉德涅夫(1906)；库克林(1903)；卡弗塔尔泽(1903)；穆尔多夫(1903)；奥斯特罗夫斯卡娅(1905)；皮达可夫(1910)；拉狄克(1902)；谢烈布里亚科夫(1905)；伊·尼·斯米尔诺夫(1899)；萨姆索诺夫(1903)；索斯

诺夫斯基（1905）；捷尔·瓦甘尼扬（1912）；
恰里托诺夫（1905）；沙罗夫（1904）；齐布尔
斯基（1904）；叶尔增（1898）。

（译自《苏联的左倾反对派（1923—1928）》第
5卷，西柏林1977年德文版，第84—95页。杨
彦君译）

附录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7年12月）

同志们，我到这个讲坛上来的唯一目的是寻找反对派和党和解的道路。我听了安得列耶夫同志的发言，从这个发言里可以得出结论，这条和解的道路已经切断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认为，由于代表大会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好几天的讨论，由于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特设委员会，所以这个委员会的一员安得列耶夫同志说各种道路都试过了，一切都结束了，代表大会只须记下决定的事项，这些话未必言之过早。（喊声：“取决于你们。”）

我希望，并非如此。反对派在党内占着少数。反对派这方面当然不能向党提出任何条件。反对派只能向代表大会说出他们从两年的斗争历史中给自己得出的那个结论，并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两年以前，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和多数派在有关我们革命的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有了不同意见：关于火力方向，关于国内、尤其是农村中反无产阶级因素的增长及其意义，关于向他们作斗争的方法，关于从稳定局面的巩固程度着眼对国

际形势的估计以及因此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近两年来党内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斗争达到了如此尖锐的程度，使我们面临着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其中的一条道路是成立第二个政党。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于革命是有致命危险的。这是政治和阶级蜕化的道路。对于我们，这条道路是被整个我们观点的体系、被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学说所禁止和除去了的。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愿使自己的同道者走上这条道路。

因此只剩下了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在为辩护自己的观点而作了激烈、顽强、尖锐的斗争之后）是完全服从党。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只能在我们党内而且只能通过党、而不能在党外不通过党来取得胜利。走上这条道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服从并执行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不论这些决议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沉重。（喊声：“形式上！”）

我们这样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行动。但是如果除了无条件完全服从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完全停止和取消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和解散派别组织之外，再加上放弃观点，那么，在我们看来，这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了。在我们党内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观点的这种要求。如果我们放弃一两周以前辩护的观点，这会是一种虚伪，你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如果我到这里来说：我放弃两周前在自己的提纲中提出的观点；你们是不会相信的，这在我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虚伪。这种虚伪会腐蚀问题的实质、和解的基础，它是谁也不需要的。当然，我说的是我们真正的观点……（伏罗希洛夫：“我们要求放弃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签了字的政纲和提纲中说明的观点，而不是指人们常常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夸大之词。近来许多负责的党领导人公开向党说到党和国家面前的严重困难。我们认为，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但克服这些困难的必要条件是批评自己的错误，如果必要，准备纠正、审查自己的政策，根据事实加以检查、修改。我

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在党章的严格范围内进行的批评对党还是有好处的，而在实际生活证明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在许多场合下，党在一定的程度上接受了这些观点。

请你们说，要我们放弃什么思想？难道能要求我们放弃我们对英俄委员会的观点？难道能要求我们放弃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喊声：“那你们放弃什么？”）难道能要求我们放弃关于农民分化的观点？难道能要求我们放弃关于工业落后于国家总的发展进程的观点？……

难道英俄委员会不是不光荣地消失下去，辜负了对它的希望？难道中国革命的进程不是证明了指望国民党的右翼和左翼是错误的？难道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证明，农村富农上层破坏我们的国家计划、出口计划因而以及基本投资的计划？难道日益尖锐的商品荒不是重新成为中心的经济问题？

这是党的领导人告诉你们的真理。这不是我的真理，这不是我告诉你们的，这是每一个经济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们的道理。同志们，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放弃观点，是显然行不通的。我再举一个有着完全迫切意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你们知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和以后有了分歧。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你们责备我们缺乏信心，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观点带有无根无据的乐观主义精神，粉饰新经济政策，低估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而火力方向是取决于此的。这是我们争论的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几个月前，我们经济和政治的最负责的领导人之一正是在这个中心问题上在政治局说了下列的话：

“……我应当声明，我们争取到了使农民自发势力、农民粮食市场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降低和提高粮

食价格，我们掌握了一切杠杆……因为没有人支持农民和妨碍我们。”（米高扬同志关于降低零售价格的报告，1927年1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录，第4页）

难道这没有被现实所推翻吗？难道这不是错误的估计、错误的瞻望吗？难道我们经济状况的事实在不是证明这里作了错误的估计吗？而从这种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中产生出错误的政策。这种错误政策没有消除困难，而是使困难积存下来，使困难加剧和尖锐了。这种政策掩盖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且应当设法克服的前景。但这并不是某个同志的个人错误。

对国内阶级关系的错误估计是这个错误的基础。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学生（喊声：“过去的学生！”）知道，从对阶级的错误估计中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当党内可能有这种估计（它们是错误的实际政策的基础）时，我们就不能放弃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不能放弃纠正这些观点并警告党、甚至在党内引起对这种估价和前景的一定的忧虑。我深信，在党章范围内、在我们党是执政党的条件下进行的批评能帮助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困难和震荡。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是行不通的，不能容许的。我们有责任在党章的严格范围内、在党的决议的严格范围内宣传和辩护这些观点。

如果你们要求别的，你们就是人为地增加我们诚心诚意和党和解的道路上的障碍。（喊声：“你们是在玩手段！”）只有当你们决定截断这条路时，才能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你们选择了这种做法，那当然可以提出任何要求，可是这是明明行不通的。

现在我来谈第二个问题。你们成立了一个解除反对派武装的委员会。你们要求我们提供保证。这是很自然的。谁也不应在政治上相信空话。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自己检查我们活动的办法。（喊声：“已经检查两年了。”）否则你们就得不到任何保证。保证何在？你们又不相信我的诚心之言。

（笑声。喊声：“我们不相信诚心之言吗？不！”）因此，同志们，党检验我们声明的诚恳和坚决与否的唯一办法，是让我们能够在行动上表示。别的法子是没有的。（喊声：“把你们的秘密组织摆到党的桌面上来！”）我没有在口袋里装着秘密组织，所以不能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自从我们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决定在党的面前解除武装，并交出自己一切的派别装备，从这时起我们在你们面前没有任何秘密了。

我们的同道者在我们送交党中央的许多文件上签了名。（喊声：“甚至看都不看就签名。”）在83人声明上有将近3,000个签名。这个声明现在在你们手里。我们的同道者在争论时期到处在支部中公开辩护我们的政纲。他们象勇敢的革命者一样行动，虽然你们可能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可能认为他们迷失了方向。（喊声：“可耻的行动！反革命分子是这样行动的！”）

索里茨：孟什维克也勇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为这些观点坐牢。

加米涅夫：公开辩护了自己的观点，把这些观点看得高于自己的地位，准备为了你们认为不正确、你们可能谴责、而他们则认为正确的东西牺牲自己的地位，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

当姆拉奇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坐牢，（喊声：“因为私设印刷所”）而我们却在你们眼前自由，这种状况是难以制止的。我们和这些同志一同作了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全部行动负责。现在我们和他们一同向党建议，让我们能够消除党史上的这个时期。不能把我们和他们分开。当你们企图把我们分开时，你们是不再尊重我们。（喊声：“10月16日以后就已经不再尊重了！”）

我们对子成立第二个政党或者回到党内来的选择是很明显的：无论如何要回到党内来。我们请求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如果这次代表大会打算不作为分裂的代表大会、而作为和解的代表大会列入党史的话。

不要跟这件事情为难，提出一些行不通的和有失布尔什维克身分的要求。工人阶级想要和解。虽然有种种意见分歧，虽然斗争非常尖锐，但我们和你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保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杠杆的党内统一。这可以在我们向你们保证的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做到。（喊声：“不敢相信！”）为了列宁开始的那个事业的利益，应该这样做。（喧哗声）我深信，代表大会无论如何会这样做的。（喧哗声。喊声：“首先取得信任吧！”）

（译自1927年12月8日《真理报》第281号。徐平译）

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莫洛托夫同志给《共产党人》杂志 编辑部的一封信

（1955年9月16日）

请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我下面的这封信。

1955年2月8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在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说法。在这个报告中谈到：“和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苏联一道，还有朝着社会主义采取了只是初步的然而十分重要的步骤的各人

民民主国家。”

这种错误的说法导致一种不正确的推论，好像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只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ОСНОВА），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ФУНДАМЕН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并且是同许多党的文件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结的历次评价相违背的。

还在1932年，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就曾指出，苏联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建设，而列宁的关于“谁战胜谁”的问题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是以不利于资本主义和有利于社会主义而彻底地和永远地解决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进一步成就的基础上，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苏联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

在这以后的时期中，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完成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大厦建设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社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无可比拟地增长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都彻底地巩固和确立了，这种生产关系是以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绝对统治和排除了人剥削人的任何可能性的同志合作关系为基础的。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成就也反映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我党党章中。党章指出，党“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1955年2月8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从这一说法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建成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害就在于：它造成思想问题上的

混乱，同党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得对我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发生怀疑。

维·莫洛托夫

1955年9月16日

（选自《学习译丛》1955年第11期）